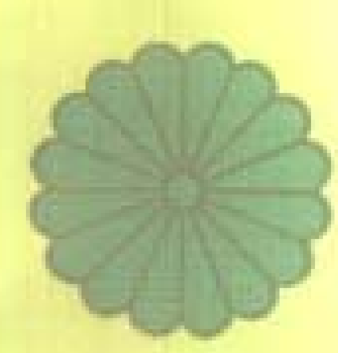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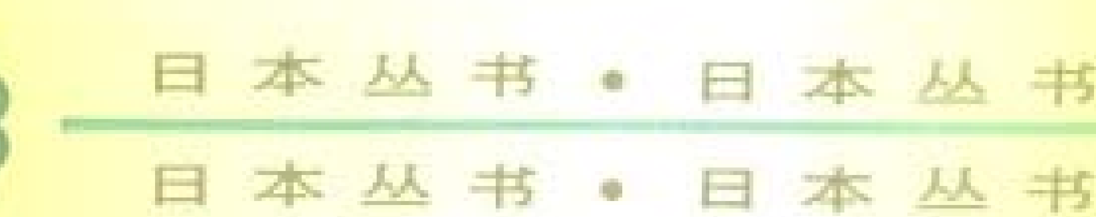
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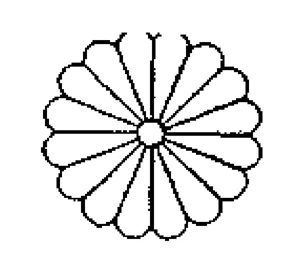
——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

〔美〕西里尔·E. 布莱克等 著





商务印书馆



日本丛书

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

——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

〔美〕西里尔·E. 布莱克等 著

周师铭 胡国成
沈伯根 沈丙杰 译

商务印书馆

1992年·北京

Cyril E. Black and others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 RUSSIA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75
根据纽约自由出版社
1975年版译出

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

——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

〔美〕西里尔·E. 布莱克等著
周师铭　胡国成
沈伯根　沈丙杰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089-6/F·119

1984年4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2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290千
印数2 000册　　印张14 1/4　插页2
定价：6.40元

《日本丛书》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组译日本学术论著。三十多年来，已出版有关日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及宗教方面的译著一百多种，加上最近所组新译，已初步形成系列。为便于读者研读，现汇编为《日本丛书》印行。第一辑选目，刊印前曾征求学术界意见，幸蒙赞许，但仍难称美备，深望海内外读者有以指正。

此次汇编出版前，曾对各书体例、译名略作调整，有几种系据原纸型重印，不及一一改订，尚希垂察。

编　者

1991年4月

出版说明

《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是一份对日本和苏联的现代化过程进行分析比较的研究报告。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八位教授和副教授。他们都是研究日本和苏联的历史、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为了写这本书，他们前后花了五年时间。

本书引用大量材料，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相互依赖以及知识和教育等几个方面对日苏两国现代化过程进行了分析，比较了它们的异同之处，并据以探讨了对现代化过程本身具有重要意义的若干因素。

本书对我们研究现代化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作者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偏见，书中宣扬了不少错误观点，未及一一在脚注中指出，读者参阅时应加注意。

目录

第三部分　当代

作　者

本书作者简介

西里尔·E.布莱克：普林斯顿大学纪念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讲座欧洲史教授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他的教学和研究范围包括俄国和东欧以及比较史。1965年夏季，他曾在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问题研究所讲学。他编辑和参加写作的著作有：《俄国社会的变革：1861年以来社会变化的若干方面》(1960年)、《现代化的动力：对比较史的研究》(1966年)。他参加编辑和写作的著作有：《国际法律秩序的前途》(共四卷，1969—1972年)。

马里厄斯·B.詹森：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和研究东亚问题的教授。他是日本史专家，1959年来普林斯顿以前曾在华盛顿大学任教。他的著作有：《日本人和孙逸仙》(1954年)、《坂本龙马和明治维新》(1961年)；他编辑和参加写作的著作有：《日本对现代化的态度的变化》(1965年)；他同别人合编和合写的著作有：《对现代日本早期体制历史的研究》(1969年)。

赫伯特·S.莱文：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坦福研究所和国务院的顾问。他是苏联式经济研究协会的前执行秘书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研究苏联

问题的联合委员会主席。他的著作有：与人合写的《美国和苏联经济的对比》（1959年）、与别人一起编辑和写作的《数学和计算机在苏联制定经济计划工作中的作用》（1967年）、与人合写的《经济制度比较》（1971年）。

小马里恩·J.利维：伍德罗·威尔逊学院纪念马斯格雷夫讲座社会学和国际问题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问题研究系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驻东亚的美国海军中服役，其后又去日本从事研究工作。他的著作有：《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1949年）、《社会结构》（1962年）、《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国际问题的背景》（1966年）、《现代化：后来者和幸存者》（1972年）、《利维的十条法则》（1972年）。

亨利·罗索夫斯基：哈佛大学纪念沃尔特·S·巴克讲座经济学教授和文理学院院长。他的研究范围包括俄国和日本的经济史。他曾在东京大学和一桥大学任客座教授。他的著作有《1898—1940年日本资本的形成》（1961年）、由他编辑的《两种制度的工业化》（1966年）、与人合写的《日本经济的发展：二十世纪速度加快的趋势》（1973年）。

吉尔伯特·罗兹曼：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他为了写书曾对日本、中华民国和苏联现代以前的城市化情况进行过研究。他的著作有：《中国清朝和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城市结构》（1973年）、《1750—1800年俄国城市的结构和现代以前的几个时期的划分》（1975年）。

亨利·D.史密斯第二：1975年至1976年任康奈尔大学人文学会的副研究员，专攻日本史；1969年至1975年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他的研究范围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学生运动（他在1972年写的《日本的第一批学生激进分子》一书反映了这种情况）和东京市的发展。

S.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和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学者国际中心俄国问题高级研究所主任。他专攻俄国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体制和文化史。他的著作有：《1830—1870年俄国权力的分散和自治》（1972年）；他编辑的书有：《奥古斯特·冯·哈克斯索森：对俄国内部情况的研究》（1972年）和《康斯坦丁·麦尔尼科夫：建筑师》（即将出版）。

前　言

我们不知道这样一本书由一个人来写是否写得出来，虽然毫无疑问，写这本书可能不需要八个人。要了解现代社会的变化，不仅要有许多学科的专门知识，而且还要对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进行比较，它仍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的文化传统是千差万别的。偶尔也许有个别学者，他们学识渊博，了解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情况，但是这样的学者是很少的。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一个人的学识渊博到能够象本书那样对日本和俄国这样两个千差万别的国家进行对比的程度。

集思广益虽有好处，但也有它的问题，我们已设法解决了这些问题。有时候，并列是同真正的比较混合在一起的。在分别进行多少是平行的叙述以后进行的比较，一般说来仅限于说一些概括性的话，并不详细叙述多方面的异同之处。即使作者们采取分别撰写平行的章节来对两种社会的彼此没有联系的方面进行比较这样的形式，他们也很难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们对彼此的工作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讨论，对他们的任务取得了共同的理解。为了克服这样一些困难，我们经常进行小组讨论，交换草稿，并且几乎是逐节进行比较，以便把两个社会的异同之处尽可能充分地揭示出来。

讨论和写作前后花了五年时间，因为在这期间，我们还有其他许多事情要做。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研究的主要兴

趣都是同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的。所有的作者都是研究日本问题或俄国问题的专家，其中有两人对这两个国家都有研究。两人是经济学家，两人是社会学家，四位历史学家也懂政治学，足以担当写此书的任务。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在普林斯顿举行了六次为期两天的全体会议，讨论各个章节的草稿并根据情况的变化修改计划。当时在国内的作者都参加了会议，我们还设法同在我们合作期间的不同时候到日本和俄国进行研究工作的四位作者保持通信联系。而且，普林斯顿的六名作者，经常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进行讨论。

由八名作者进行集体研究，密切合作，并对研究成果共同承担责任，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所以应当再解释几句。在考虑了各种方案和建议以后，我们商定了各章初稿的分工。布莱克和詹森准备有关国际环境各章（二、八、十四）的初稿；史密斯和斯塔尔准备有关政治结构和发展各章（三、九、十五）的初稿及有关知识与教育各章（六、十二、十八）的初稿；莱文和罗索夫斯基准备有关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各章（四、十、十六）的初稿；罗兹曼准备有关社会的相互依赖各章（五、十一、十七）的初稿；利维准备在三个部分的序言和在三个部分的结尾几章（七、十三、十九）中提出的解释的草稿。序言和跋两章（一，二十）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不可能分辨其中哪一部分是谁写的。

在工作过程中，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采用了一些用法，对这些用法应当加以说明，以免引起误解。在本书的标题中，而且常常在整部书中，我们把日本放在俄国的前面，这是按英文字母的次序排列的。在俄文中，而不是在日文中，次序正好相反。

“日本”一词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它的领土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它的海外领地从未并入过日本本土，凡在适当的地方，我们都把它们分开来讨论)，它的人口中同种族的人所占的比例异常大。与此相反，“俄国”一词的含义却并不那么简单或明确。这是一个方便和传统的名称，我们用以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其以前的各个国家，从俄罗斯帝国起一直往前追溯到莫斯科公国、蒙古入侵和基辅国时期。我们还笼统地把俄国各族人民称为“俄罗斯人”，尽管事实是，真正的俄罗斯人或大俄罗斯人——而不是其他主要的斯拉夫集团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以及许多大小非斯拉夫民族——在近代只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左右(具体地说，在1898年占百分之四十三，在1926年和1970年占百分之五十三)。我们认为，读者会感觉到使用这种比较简单的(虽然从法律上说是不正确的)称呼的好处，并且会注意到我们的这种努力：凡是我们进行的比较涉及到俄国复杂的领土和种族结构时，我们都把它们考虑进去了。

我们还用“西方”这个词来指说英语的国家和西欧国家，这些国家开始使它们的社会适应科技革命的时间先于日本和俄国，并被日本和俄国看作是威胁、刺激和榜样。具体地说，到1900年前后，西方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瑞士、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瑞典和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欧洲在西半球派生出来的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有意思的是，俄语里西方一词的含义在革命前后都是与这一含义相同的，一直到今天，总的含义同英语里西方一词的

含义还是一样的。日本人也用西方一词或者比较狭隘的欧洲一词，其总的含义也是一样的，虽然他们通常把俄国也看作是西方的一部分。只有在所谓的冷战达到高潮时，他们才把"苏联"和"西方"的势力范围加以相当初步的区分。我们在研究中，比较详细地研究了俄国和日本对西方的看法的这种重要区别。

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各方面相当多的同事向我们提供了意见，给予了帮助。1970年10月，我们同其他单位的客人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们讨论了进行这样一项研究工作是否可行的问题，并给予鼓励，但也提出了警告。在我们工作后期的各个阶段，普林斯顿的几位研究生对我们的草稿提出了有益的批评。尼尔·B.韦斯曼(研究俄国历史的)和丹特·叶普(研究日本历史的)参加了我们的几次讨论。1973年夏季，巴巴拉·安德森(研究社会学的)、苏珊·奇泽克(研究社会学的)、詹姆斯·康特(研究历史的)、阿黛尔·林登梅尔(研究历史的)、安妮·D. 拉斯韦勒(研究历史的)、D. 埃莉诺·韦斯特奈伊(研究社会学的)和米基奥·乌梅加基(研究政治的)同普林斯顿的作者举行了四次会议，研究各章的草稿。在这一阶段，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威廉·布莱克韦尔也研究了我们的原稿。

我们还希望对克利福德·格尔茨、詹姆斯·T.C.刘、弗雷德里克·W. 莫特、约瑟夫·斯特雷耶，并再次对巴巴拉·安德森提供的意见和帮助表示感谢，在1974年最后的修改阶段，他们同我们一起讨论了手稿。我们还要特别感谢苏珊·沃特金斯，她担负了整个编辑工作，因而减轻了使八名作者的风格和观点协调一致的困难任务。埃尔斯贝思·G. 卢因对我

们改过的校样作了卓有成效的编排，我们也对她表示非常感谢。

我们在此还要感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行政干事简·G.麦克道尔，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相当宽阔的空间范围内承担了作出有利于我们合作的许多复杂的安排的主要责任；帕蒂·亚当斯、玛丽安·卡尔戴拉、琼·卡尔、多萝西·戴伊、琼·特劳布尔和乔安妮·韦斯曼承担了为本书各个章节的无数草稿的打字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 者

第一章 问题

在当代世界上，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五花八门的形式越来越多。它们是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很长时间才出现的；正如亨利·亚当斯很敏锐地指出的那样，知识方面取得的突破和同作为能源的电力相联系的技术的出现，加快了同现代化有关的各种形式的步伐。我们认为，现代化的各种形式有三个特点。它们都出现不久，虽然这一点并未得到公认；它们都前所未有地推倒了过去的一切；它们都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奇特的。

第一，这些形式出现的时间总的来说都是不远的。在当代世界上，它们已经是那样的普遍，以致我们往往把它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至多在一百五十年以前，这些形式都是不存在的，其中许多形式的历史只有几十年的时间。

第二，从两个意义上说，这些形式已经成了全球性的社会溶解剂。它们已经表明能够侵蚀和影响一切国家的制度，不管这些形式是自愿采取的还是用武力强加的；它们往往把以前人类传统经验的许多主要的共同点化为乌有。在这两个意义上，现代化成了世界上的新事物。

第三，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在很大的程度上把这些形式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还没有现代化的国家又是漫不经心地捡起

了这些形式，但是这些形式使人类的整个命运在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最根本的变化。在最近的这些发展出现以前，大多数人（将近百分之百）在大部分时间（将近百分之百）里都生活在自己家人看得到和听得见的生活圈子内。但是一接触到现代化——不管这种接触的形式如何，也不管现代化的“成败”程度如何——这种生活方式和人类各种各样行为的其他许多共同点就会在一夜之间开始消失。

对现代化的研究是最近才开始的，重点是研究现代化的根源、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的问题和现代化社会的前途。本书研究的是第二个问题，即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的问题。不管现代化的根源是什么，不管已经现代化的社会的前途多么美好，现在迫切需要了解这样一些国家的人民的问题，他们的社会已经由于采取现代化的形式而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对参加这一行列的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和对照，可以从中找出一些对现代化过程本身必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可以进行的许多比较中，两个比较是特别使人感兴趣的。一个是中国的经验和日本的经验的对照。十九世纪的观察家没有一个预见到日本会以那么快的速度加入到少数几个现代化社会的行列，日本的经验同中国不同的特殊发展道路和步伐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一本书专门论述了这种对照。

第二个同样有趣的比较是日本经验和俄国经验的比较，但是人们对这个比较还没有那么注意。本书的任务就是进行这种比较。作比较分析是极其有趣的，但是其原因同以前对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进行的比较是很不相同的。根据年代、文

化传统和受西方挑战的影响的程度，马上就可以对中日两国的情况进行比较。但是，俄国和日本的背景和传统看来是那么的不同，在创建现代国家时所走的道路是那么截然相反，以致它们所取得的成就的相似之处几乎被忽略了。它们在迅速实现现代化方面取得的非常相似的成就是历史的怪现象。但是，在它们发展的许多可以衡量的方面——教育、城市化、生产——它们都达到了同样的水平。如果象本书所做的那样寻找以前的形式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那么也可以看出，在它们的早期发展阶段，在一般为人们所注意的巨大的差别后面，存在着惊人的共同点。这至少是我们自己的总的假设。

如果考虑到那么明显的历史差别，取得这样相似的成就就更加惊人了。俄国是一个巨大的大陆国家，同西欧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它是整个欧洲文化的积极参加者。日本是一个岛国，它小心地不与外界发生这种接触。日本人主要是同种族的，俄国的民族和社会特点则是千差万别的。它们的宗教是不同的，经济是不同的，政府是不同的。在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各族人民中间，人们的生活方式是极不相同的，但是即使在这样情况下，日俄两国的社会格局的差异也是惊人的。在讨论比较的时候常常谈到的各个方面，日本人和俄国人几乎都是不同的，但是在二十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内，它们是采取现代化形式比较晚的，但是获得“成功”的国家的主要例子。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内，它们无疑会同说英语的国家和欧洲国家一起承担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地区所肩负的责任。

本研究报告是专门对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行分析比较的，但我们意识到，我们对那两个地区的实际研究是不够的，

对现代化本身的分析大多数是有缺点的。同时，我们认为，如果能找到这样极不相同的开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惊人地相似的结果的原因，那么人们就会得到有关现代化的新知识。具体地说，我们希望找出使日本和俄国在这一过程中取得"成功"的特点。我们还希望，我们的目的将会使人们了解到有关别国所面临的问题和可能性的一些新的情况。

现 代 化

本研究报告中使用的几个名词对作者来说是具有相当确切的含义的，但是在社会科学的语言中还不具有标准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名词是"现代化"，目前的许多著作在使用这个名词的时候，由于加上一些不正确的假设和不相干的判断，有时候把它的意思搞得含糊不清。

所谓现代化，作者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正在发生着变化。在本研究报告中，我们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扩增过程。在比较日本和俄国的情况时，我们特别关心国际环境、政治结构(协调和控制的形式)、经济的增长、整个社会的相互依赖及知识与教育，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是进行比较并研究其意义的最主要的方面。

我们认为，现代化过程的定义和对这个过程的描述是不同的。我们关心的是对这个过程的描述，而不是它的定义。我们认为，"现代化"的定义是：就同时存在的社会形式而言，无生命动力源泉对有生命动力源泉的比例已经增长到了或者超过了不可回转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如果无生命

动力的比较少量的减少无法为有生命动力的增加所“弥补”或者如果不对社会作不可避免的、广泛的改革就无法弥补，那么这个社会或民族就现代化了。但是，我们在本书中的任务是描述和分析同我们的“现代化”概念有着全面地联系的形式。

在政治方面，现代化是要日益提高社会成员通过公私机构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能力，以期把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各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一过程都需要越来越多地统一使用和控制人力和物力。

从经济观点来看，现代化就是用新技术来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提高按人口平均的产量。促进这种增长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政策、资源的分配、投资、创造或引进技术、管理和贸易。现代化总是毫无例外地意味着无生命动力源泉对有生命动力源泉的比例不断地急剧增加，以致有人错误地认为，有生命动力源泉不再有什么意义了。对无生命动力源泉的这种新的依赖同以前的全部人类历史形成了那么鲜明的对照，以致形成了它自己的明显的特点。

社会的互相依赖是同伴随着城市化而来的居住方式和整个社会组织有关的。它同由工作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而造成的作用和价值标准方面的变化也有关系。这些变化常常使居住的密度和人们的接触大大增加，最后伴随而来的是寿命的延长。由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以前那种喜欢以局部的和自给自足的标准来管理和组织整个社会生活的心情，一般也就烟消云散了。

人们普遍相信理论研究，这是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点，通

过教育增长和传播知识对现代化过程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技术来产生知识所花费的资源在国家资源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通过各种各样的传播手段，特别是通过正规教育，传播这种知识。在现代化社会中，接受这种教育是全体青少年在十二年中的主要任务，越来越多的人要接受十五年或二十年的教育。随着专业知识的数量和门类的增加和扩大(按照以前的标准是难以想象的)，普通的基本知识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增加。

现代化对个性的影响也有心理上的一面，对比迄今还研究得比较少。我们在谈到知识和教育时对这一方面已间接地有所触及，但是我们并不想详细加以叙述。如果要充分加以叙述，就得包括个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从比较孤立的和高度自给自足的农村地区流入互相依赖的城市社会造成的。在变化过程中，这些社会里个人安全和相互依赖性之间在紧张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手头有供分析的材料的话，这一点也是应当作为密切相关的因素加以讨论的。在现代化社会中，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和其他的社会限制，似乎随之也会出现无数与人疏远和反常现象，这些现象也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对此知道得很少。

我们在本研究报告中谈及的各个方面的变化，以一种并不为人所充分理解的方式彼此发挥着作用，从而使社会发生了变化，由五分之四或更多的人居住在比较孤立的地区和主要从事农业和渔猎业的社会，转变为在不断增加的总人口中有同样比例的人现在居住在城市并在办公室和工厂工作的社会。即使那些仍从事农业和渔猎业的人们，他们也是在与他

们的祖先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这样做的。

没有一个指示数字或公式可以全面地描述整个变化过程。但是，变化的许多特点是可以相当精确地加以衡量的，而要进行比较，它们是必不可少的。政治上的变化可以用中央决策机构分配资源的变化以及随之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增长来衡量。经济上的变化可以根据总的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和贸易额、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和叫做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社会财富的更全面的方法来衡量。向现代化转化的程度，同样可以根据人口增长的情况以及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由从事手工劳动转向从事非手工劳动、由一个社会阶级转变为另一个社会阶级的情况来衡量。还可以根据人口中具有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所占的比例，以及受方式不断变化的结婚、离婚、疾病、犯罪和自杀的影响的人所占的比例来衡量。但是，在这些衡量标准中，没有一种是完全准确的或完全令人满意的。因此，对现代化的许多特点的估计，目前还只能靠判断，而不是靠衡量。

现代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自身没有界限分明的阶段。但是，为了便于叙述和分析，不妨把它划分成几个阶段，但必须把这样划分的标准说清楚。人们历来安于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这与作为现代特点的追求理解和变化的努力之间是没有明显的界线的。但是，尽管如此，人们可以认为，西欧的现代化过程始于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英国十七世纪和法国十八世纪的政治革命以及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工业革命。

自从有了这些开端以后，变化的影响席卷了整个世界，变

化的速度加快了。只要知识继续增加，这一过程将会持续下去，虽然变化的某些具体方面可能会达到顶点。例如，当社会的全体成员都住在城市里的时候，城市化必然就到了头，或者至少必须改变它的性质；当生产的一切方面完全实现机械化的时候，工业化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有时候，人们提到“工业化以后”，甚至“现代化以后”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中，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的水平将允许社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分配、一体化、组织和研究价值标准上，而不是集中在维持生计上。但是这样的观点包含的意思是重点的变化，而不是变化的结束，我们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将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对未来进行猜测的价值是，它使人们强调重视长期的变化。大多数关于现代化的理论都认为，在未来，为人们的福利分配物品将取代生产物品而成为人们的主要活动。

我们可以把现代化的过程设想为三个阶段。在最初的第一阶段，变化的基础在现代以前已经确立，现代化思想和机构开始向已有的现代以前的形式进行挑战；在过渡的第二阶段，社会从主要是农村的农业生活方式转变为主要是城市的工业生活方式；在进一步的第三阶段，农村和城市的比例颠倒过来了，高度现代化的水平已经达到。人们还可以猜测未来的阶段，这个阶段也许用不了很多代人的时间就可以实现，到了那个阶段，生产出来的财富之多将足以使人们强调质量和分配，而不是强调数量和生产。到那个时候，工业化的含义可能不止是工厂了，因为那时服务业和农业将同制造业一样工业化了。

有几个词我们在本书中是有意不使用的，因为它们往往

把许多有关现代化的讨论搞得含糊不清。第一个词是“传统的”。在有些文章中，把“传统社会”说成是同现代化直接对立的没有区别的清一色的社会。实际上，在非现代社会内部，很多事情确实是有差别的，而且很复杂，我们将指出在现代以前的基础内是如何包含着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变数的。另一些文章强调“传统的特点”，好象有些民族比别的民族更加重视他们的传统，因而在实现现代化方面落在后面。但是事实上，各个民族都是重视传统的，即使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有些老传统仍然是重要的，而且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也创造自己的、也许并不那么持久的传统。在现代，大多数可以衡量的增长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增长，而在长期内，每年增长的幅度比百分之二、三多不了多少。传统的形式对现代时期具有很大的影响。以前的传统的消亡并不证明取代这种传统的现代化形式能生存下去。在任何社会内，一切比较现代的特点都是由以前的特点变革而来的。特别是对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来说，这些变革更有可能是在旧的形式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由旧到新的直接变化的结果。当旧与新并存的时候，这种旧同原来的旧已经根本不同了。实际上，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所受的限制只能来自以下两个方面即现代以前的形式和现代化形式的生命力。传统的因素，比如英国的大宪章或日本的王位，可能是完全可以适应现代化的。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特别强调日本和俄国的我们称之谓“过去的传统”的东西。

我们避免使用的另外两个词是“西方化”和“欧洲化”。人们常常用这两个词来指这样一个事实：对所有齐集现代化行

列的后来者来说，挑战都是来自外部的。我们讨论的现代化过程，好象是在各个社会的范围内进行的。但是事实上，现代化的思想和制度在欧洲是由法国的革命战争和拿破仑传播的，同样，这种思想和制度也是靠西方的探险者、商人、传教士、移民和军队传播到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去的。"西方化"一词的含义是，西方或欧洲的制度本身是现代化的根本内容，其他社会可以忘掉自己的历史传统而采纳西方或欧洲式的现代价值标准和制度，就象它们把牛车换成汽车或把土耳其帽换成大英帽一样。但事实是，必须由每个社会的成员自己来改革他们的社会以前的制度。使用"西方化"和"欧洲化"这两个名词还会出现其他的矛盾。例如，二十世纪的日本在某时某地所起的作用是一支现代化的力量，但不一定是西方化的力量。在另一方面，一些无可怀疑的欧洲和西方社会目前却仍然属于比较非现代化社会的行列。最后特别要说明的是，现代化的西方人同他们的祖先是不同的，就象现代化的日本人同他们的祖先不同一样。所有非现代化的人彼此之间的共性比同他们的现代化的子孙的共性多。只有极少数象莎士比亚那样的伟人，他们的话才是没有时限和国界的。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话里包含着隐藏在现代化国家和非现代化国家的种种差别后面的共性。带有新的共性的现代化国家的出现，使得非现代化国家之间本来隐藏在差别中的共性显示出来了。

我们之所以强调过去的传统奠定的基础，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必须根据以前几代人的社会传统来理解各个发展阶段的价值标准和制度。即使一个民族全部照搬一种外国宗教

或法律制度，其结果也必然会受到实行这些制度的环境的很大影响。因此，我们还要提醒世界其他地方不要匆匆忙忙地"集中"效法目前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社会的形式。因为毕竟不是命中注定这些社会将永远如此。如果象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日本目前的增长和变化的速度继续下去，那么可以想象，不论人们现在集中效法哪种形式，到头来都可能发生变化，由效法美国那样的"西方"模式变为效法日本那样的其他模式。

我们也注意到有时有人抱怨说，关于现代化的讨论得出的是"成功"和"失败"的标准，而对付出的代价及两者之间难以分清的地方考虑不够。必须承认，现代化的过程是艰巨的和痛苦的。现代化同"进步"这个比较旧的概念当然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不应该设想，每一个社会经过变革以后都可以完全保持原状。也无需为了本书的目的而把已经发生的变化都看作是"进步"。在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特点向相互依赖程度更高的水平发展的时候，已经被取代的较老的形式随之解体。这些形式也并不是立即就都消失了，有些形式似乎是根本不消失的，但是，即使这些形式不消失，它们的环境已发生了变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人总是把自己看作是倒霉者，不管有没有外国人卷入。在那些感到倒霉的人中间，有些人也总是认为，出路在于恢复以往的好日子。原教旨主义的信徒的反作用总会跟着发生。强有力的利益集团要保卫现行的或以前存在的价值标准和制度，他们同那些谋求或要求变革的利益集团发生了冲突。内战、革命和国际战争是现时代的特点，因为主张维持现状的利益集团和主张变革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提出对立的现代化思想的派别之间的斗争，给过

去造成流血的许多问题增添了新问题。世界各国人民现在已经掌握了既能毁灭敌人也会毁灭自己的军事技术。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间接的影响可能比直接的掠夺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原料的消耗以及水、土地和空气的污染如果以目前这样的速度继续下去，那就维持不了几十年了。还会有足够的资源使现在还比较落后的三分之二的人类能达到目前比较现代化的那些国家的水平吗？如果三分之三的人实现了现代化，他们是否都能保持住现代化的形式呢？不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如何，想用制止现代化的形式或对这些形式置之不理的办法来逃避这种情况的一切企图迄今为止都证明是不攻自破的。

当然，现代化的内容怎么说也是与“进步”不同的。不管用什么价值标准来衡量，现代化提高了创造善恶的能力。由于这种能力的提高，长期存在的目的和手段问题也就变得更加严重了。的确，失败和成功都是同样可能的。许多社会无论从制度的力量还是从自然资源来讲，很可能都没有能力来达到今天已经比较现代化的社会所取得的成就的水平。那些比较现代化的社会同样也可能无法再超过它们已经取得的成就。

阶段和时期的划分

我们认为，在日本和俄国，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开始进行现代化变革的时期。这个第一阶段与其说是静止不动的线或点，不如说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延续期，在这个期间，对现代化运动有很大影响的一些趋势已经开始出现了。当

然，在那段时期内，这两个社会的成员是前几世纪的发展的继承者，但是在十九世纪面临现代化挑战的正是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彼得一世开始实行改革的了不起的时代，是改革防务的时代，目的在于加强军政机构保卫国家，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同样，德川作出的通过长崎的窗口仿效西方的发展的有限努力，以及在佩里海军上将到达后的数十年内，日本人匆匆忙忙地试图改革防务的事实，也并没有改变现代以前的社会的基本特点。本书第一部分谈的就是作为后来发生的变化的出发点的历史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变革的阶段。为了对付内外的挑战，主张搞现代化的上层人士上台执政，他们考虑和制定了对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计划，目的在于加强国家的和他们自己的促进这种改革的权力。在这一时期内，对一些较短的过渡时期加以区分是可能的，有时候也是可取的。这种较短的时期之一就是初期的试验阶段，在这个阶段，对将要仿效的模式往往表现出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乐观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进入巩固的阶段。在巩固阶段，领导者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了，因为他们认识到，不仅必须进行控制，而且必须放慢进行根本性的革新的速度。到了某个时候，当教育、工业和政治制度开始有了惯性并造就一批参加革新的新型公民时，变革的速度就加快了。到二十世纪初叶，日本和俄国显然都已经达到了这一阶段。然而，虽然作这些小的划分和进一步的划分是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八十年的时间，看作是从农业的和农村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工业的和城市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持续的过渡时期。我们之

所以作这种选择，是因为我们认为，根据我们可以用数量来表示的一切指数和分析程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以后的阶段，同我们可以加以划分的以前各个小阶段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不同的。我们认为，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止的变革时期内的长期趋势的意义，超过了这一时期内比较短期的变化的意义。甚至可以认为，象俄国革命这样的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也没有阻碍这种趋势的发展。因此，我们把这一革命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看成是范围更为广泛的变革的一部分。我们完全理解这些事件产生的变化的意义，我们也知道把十月革命说成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的解释。但是这些事件的参加者是从在更长时期内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些事件的意义的。第二部分谈的就是这个变革时期。

第三阶段是高度现代化阶段。象第一阶段一样，这一阶段与其说是时间上固定的一个点，不如说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我们认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日本和俄国就一直在进入这一阶段，虽然道路是大不相同的，困难和有利条件也是大不相同的。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收入和生活享受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人口住在城市里，受教育机会的激剧增加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他们越来越准备和渴望参加社会各个方面的管理工作。可以用来进行衡量和比较的数量指数现在比以前多得多了。但是，象在以前的各个阶段一样，这些指数对于了解政治和社会限制如何影响个人生活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为什么需要把高度现代化看作是一个阶段呢？一个明显的原因是，那些对早期的变革是有益的并且也许是必不可少

的制度，到了现代化的后期阶段可能起阻碍作用。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中央控制的极端做法——虽然在一个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的社会中这并不是一体化的极端做法——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象日本的天皇制或苏联的党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思想工具虽然在变革时期对取得支持是有益的，但事实已经证明它们对解决现代问题来说太僵硬和太不灵活。

我们并不认为，目前的阶段——本身也是一个变化时期——是人类历史一直在朝着它发展的一个固定不变的目标，这一点几乎是无需多说的。我们在前面提出的有关“集中”和“成功”等名词的告戒仍然是适用的。但是，显而易见，从生产能力和破坏能力来讲，少数先进的社会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内，日本和俄国都将进入这个行列。它们的变化不仅是数量的变化，而且是质量的变化。第三部分谈的就是这个第三阶段的情况。

比　较

对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根据它们搞现代化的不同时间进行比较，因为每个社会遇到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这取决于这一过程发生的时间比其他社会早还是晚。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要确定，现代以前的价值标准和制度最初受到的挑战来自社会内部的领导人还是通过战争或殖民主义来自外部。另外，一个社会的成员进行自己的变革的能力，取决于这个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自己的领土和人口保持连续性的程度，或者取决于它是否受到在统一、脱离、独立、民族统一主义和建国的其他问题上发生

的斗争的破坏，这些斗争往往无法使资源用在发展的需要上。也可以根据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动员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的大小对不同的社会进行比较。此外，还可以把一个社会的某一个制度单独拿出来同其他社会的制度进行比较。

在本研究报告的三部分中，为了进行分析而有选择地对日本和俄国的发展情况进行的比较，为解释它们的经验及其意义以理解现代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在三个编年时期的每个时期内，我们考虑的是下列五大方面：国际环境、政治发展、经济增长、社会的相互依赖以及知识和教育。凡是我们认为对这一目的具有明显重要性的每一时期的问题，在三个部分的每一部分的序言中都作了阐述，第七、十三和十九章谈到了我们的研究结果。第二十章谈的是我们对整个现代化过程的总结，以及对这些结论同其他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的关系的一些看法。

我们试图条理分明地作出解释，同时在使用分类法方面尽量简单。我们提出的中心问题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在现代以前的日本和俄国可以看到的搞现代化的前提、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一时期内，两国人民满足进行变革在职能方面必须具备的条件的方法，以及他们满足实现高度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特殊条件的方法。我们对前提与进行变革和实现高度现代化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感兴趣。

所谓现代化的前提，我们是指为取得接受科学和技术的能力以及实行导致激烈而全面的社会变革的政策的能力所必要具备的条件。所谓进行变革和实现高度现代化所需的条件，

我们是指为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维护这一制度所需的条件。前提是由适应形势需要的社会行动结构或制度和价值标准来满足的。社会成员在保持由于稳定而产生的团结的情况下改变制度和价值标准的能力，以及在必要时采取外来的制度和价值标准的能力，是他们满足为进行变革和实现高度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特殊条件的能力的基本因素。

对日本和俄国进行的比较就其本身而言是值得注意的，但是要判断它们同现代化有关的异同的意义，只有把这些异同之处同其他社会的经验作比较。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具有实质内容的十五章的每一章的最后，都同处在同样的三个发展阶段——现代以前的时期、变革时期和高度现代化时期——的其他社会作了比较。

我们用来同现代以前的日本和俄国进行比较的有三种类型的现代以前的社会。第一，我们同一些搞现代化比较早的社会——比如十八世纪以前的英国——进行比较。作这种比较的用处是以这样一种设想为前提的：如果日本和俄国之间的共同点是同搞现代化比较早的国家共有的，而为其他社会所没有的，那么这些因素大概就代表了现代化的前提。第二，我们把日本和俄国同似乎已经处于现代以前的高级发展阶段的其他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作比较。中国是引用得最多的一个例子，但是土耳其发展的某些方面也是可以说明问题的。我们认为，虽然搞现代化比较早和比较晚的国家的前提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各国的前提大概都是十分相似的。如果日本和俄国之间的共同点是其他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所没有的，我们就可以假定，

这些共同点就是使日本和俄国能够变革它们的社会的重要因素。第三，我们同不发达得多的现代以前的社会作了一些一般性的比较，以表明现代以前的日本和俄国在哪些方面是比较先进的社会，并表明这些因素对迅速实现现代化可能起了什么作用。

对于过渡时期，都是从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那里寻找进行比较的例子的。我们把日本和俄国进行变革的速度同其他国家的速度作了比较，并解释了这两个国家取得的成就比较大的原因。许多解释提到了现代以前的时期存在的条件，但是我们也不想忽视那些似乎加快了变化速度的新政策和新方法。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主要是拿日本和俄国同其他比较现代化的社会进行比较。

为了这一讨论，我们只考虑拥有一百万或更多的人口的国家，我们认为，比较先进的西方社会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在1970年，这些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由世界银行按市场价格计算）为二千二百五十美元到四千七百六十美元不等。可以被认为同日本（一千九百二十美元）和苏联（一千七百九十美元）具有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先进国家的同样特点的主要国家有：奥地利（二千零一十美元）、捷克斯洛伐克（二千二百三十美元）和意大利（一千七百六十美元）。其余约一百七十个独立国家和附属领地就是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不那么先进的国家和地区了，它们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六十至一千六百五十美元。在这第三类国家中

也有一些按人口平均计算国民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但它们算是例外，这些国家有：以色列、波多黎各和产油国家。

这种分类显然是随意划分的，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是初步的，可能会有很大的误差，特别是就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这些估计数字也没有把比较先进的社会由过去几代人生产的货物和技术的大量存货考虑进去。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家，进口技术、工艺和资本是可能的。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以及对数字所表达的关于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准确性的虚假印象，我们还是认为，这种分类同对搞现代化比较早的西方社会和某些搞现代化比较晚的但比较先进的社会在利用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机会方面的纪录所作的了解情况的估计还是相当接近的。

在把这种比较扩大到其他社会的时候，我们希望了解，日本和俄国的明显的共同特点哪些与1800年以前的所有社会都是共同的，哪些只是对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是共同的，哪些只与处于实现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的国家或者只与高度现代化的社会是共同的。我们还想知道，这些明显的特点是同整个现代化过程有关的呢还是只同现代化过程的某些阶段有关。因为比较既涉及相同之处，也涉及不同之处，所以我们还希望探讨日本和俄国之间的重要差别（不管是总的差别还是某个发展阶段的差别）同现代化的关系。最后，在研究日本和俄国的经验对其他社会的意义时，我们希望探讨这两个国家的那些同现代化特别有关的明显的共同特点和重要差别，在多大程度上在发展中的社会里是存在的或者是能够通过采纳其他的制度而产生的。

为什么选择日本和俄国?

对这个问题的简短回答已经讲过了，即：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尽管它们现代以前的和现代的制度结构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发展水平是比较相似的，这就可以使我们在考虑现代化过程的时候得出某些重要的结论。再也找不到两个国家有如此明显的相互关系，即在不同的制度下取得如此相似的结果。对这个问题的长篇回答放在本研究报告的其他部分中，特别是在第七、十三和十九章里(在这几章里，我们对三个编年时期得出了结论)以及在第二十章中所提供的比较一般性的结论里去讲。

但是，现在也有必要对为什么选择日本和俄国这个问题作出一个不长不短的回答。首先是因为需要更详细地说明这种比较为什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以及为不熟悉这两个国家的读者提供一些背景情况。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强调的相似之处是使这两个国家不同于其他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的那些情况。这些情况是日本和俄国的共同特点，它们可能是促使这两个国家迅速地向高度现代化的水平转化的因素。日本和俄国进行变革的时间和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它们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发展水平，提供了对它们进行比较的基础。当然，它们之间的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差别涉及到面积、资源和气候，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其它方面，政治制度和国际作用。这些差别可能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对迅速实现现代化起过推动作用，也可能同这一进程毫无关系。

一个基本的共同点是，日本和俄国在十九世纪同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的距离是差不多的。虽然日本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同英法两国基本上是没有来往的，而俄国在同一时期与这两个国家有着积极（虽然是有限的）的交往，但是这两个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在发展水平方面同实现现代化比较早的国家的差距差不多是一样的，即使在那个时候，它们也都同样处于中间状态，说得更具体一点，据估计，在1870年，它们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约为英国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日本是四分之一，俄国是三分之一。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除了少数几个实现现代化比较早的国家之外，日本和俄国都是比较先进的。

这些情况的重要性在于，有能力和决心赶上实现现代化比较早的国家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日本、俄国可能是其中的两个。它们受到它们所看到的榜样的鼓舞，通过学习比较现代化的国家的成就并吸取它们失败的教训，它们已经相当充分地动员起来了，能够使它们的现代以前的制度适应科技革命所提供的机会。

同样有意义的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和俄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发展水平大体上也是相同的。由于许多因素，个别的指示数字自然是不同的。例如，按人口平均计算，日本生产的钢比俄国多一倍，但是它消耗的能源只有俄国的四分之三。就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而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两国的水平差不多是一样的，虽然此后日本走到前面去了。它们现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不再象1870年那样为英国水平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是

同英国基本相等。但是在这期间，其他国家已确立了新标准，日本和俄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经济水平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二，约为最发达的欧洲国家的四分之三。无论如何，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和俄国不仅以差不多同样的程度改变了它们的国家，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它们和实现现代化较早的国家之间的差距。

1970年，俄国的人口有两亿四千二百万，日本的人口有一亿零四百万。除非把其他一些因素考虑进去，否则它们的人口看来可能是一种差别，而不是相似点。就人口而言，俄国和日本都是比较大的，在世界上一百四十四个独立国家中，分别占第三位和第六位，在比较现代化的国家中，分别占第一位和第三位。世界上只有为数很少的国家拥有建立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现代工业社会和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大国影响的人力资源，日本和俄国是其中的两个。

同样有意义的是，在现代以前，日本的人口比俄国多；俄国到十八世纪末才赶上它。上世纪在人口方面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俄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日本是同种族的。如果只考虑俄国的俄罗斯族的人口，而不考虑其他斯拉夫民族（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和非斯拉夫民族的人口，差别就会大大缩小。日本的人口1900年为四千四百万，1970年为一亿零四百万，而俄罗斯族的人口1900年为五千九百万，1970年为一亿二千九百万。

日本和俄国自现代以前的时期起，不仅属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列，而且也同少数几个国家一样，有效的中央统治的传统从十七世纪一直保持到现在。日本和俄国都处于更

大的文化区中国和拜占廷的周围，这种共同的经历对它们象已经做到的那样成功地采用现代化模式也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对这种适应能力以后还要详加叙述，但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德川时代日本的政治制度和俄罗斯帝国初期的政治制度（对以后的发展来说）大概比欧洲封建时代晚期和现代初期的制度优越，因为中央政府官员及对中央负责的地方当局能够对付内部的危机、进行改革和调整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方面，它们的政府的效率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的效率高得多。在世界上现代以前的其他国家中，也许只有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才有具有同样能力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日本和俄国现代以前的政府在正常和长期的基础上动员和分配资源方面可能比当时欧亚两洲其他国家的政府更积极。这种能力产生的后果之一是，日本和俄国同大多数实行现代化比较晚的民族不同，建立了抵抗西方殖民主义的能力，并基本上依靠自己的努力对付现代世界的挑战。

这种行政能力的建立和维护，伴随着一种在国家的正式意识形态中，在政府的活动方式中，以及在各界活跃的公民的政治思想中，有牢固的历史基础的价值制度。这种价值制度强调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中央政府应该在发展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思想以及由权威的政界人物确定的为国家利益献身和作出牺牲的道德。

虽然这两个国家上世纪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发展水平大体上是相似的，但是在它们的社会的某些方面变化的速度是不同的。以十九世纪略低的经济基础为起点，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长期的平均年增长率日本为百分之二点二左

右，俄国为百分之二左右。以从事工业和服务业及从事消费品生产的劳动力的比例来衡量，日本也发展得比较快。但是，总的说来，俄国的重工业比较先进。在1870年，日本社会的城市化程度比俄国高，它的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仍然大于俄国。俄国用于研究和发展的资源及用在集中管理的社会服务业的资源比较多。另一方面，直到不久以前，两国对消费品的需求量及社会经常费都注意得不够。

在估计这两个国家在两个世纪的时间内在机构和发展方面的这些广泛的共同点的时候，必须要看到它们的一些重要差别。最明显的差别莫过于面积、资源和气候方面的不同了。俄国的面积大约为日本的六十倍，俄国为八百二十六万三千一百平方英里(二千二百四十万零二千二百平方公里)，日本为十四万二千七百六十六平方英里(三十六万九千八百八十一平方公里)。俄国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二十五人(每平方公里十一人)，日本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六百五十四人(每平方公里二百八十人)。一般说来，俄国的自然资源丰富，一个工业社会所需的各种自然资源它都有，日本除了水力以外，缺乏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

在自然环境中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几个方面，两国也有明显的差别，虽然两国都有各种各样的气候。俄国地处北纬45度以北，几乎有一半的陆地是常年冰冻的；日本则在这个纬度以南。俄国是大陆性气候，冬季又长又冷，雨量较少，而日本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俄国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内陆国家。它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进行领土扩张以后才获得了它的不冻

港，但其中大多数冬天都是结冰的。除了摩尔曼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外，由于波罗的海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狭窄，即使这些港口通往公海的航道也是受到限制的。与此相反，日本进行海上贸易则极为方便，虽然它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封锁了起来。此外，俄国没有什么自然屏障可以保护它不受人口众多的和咄咄逼人的邻国的侵犯，许多世纪以来，把它同欧洲连接起来的平原一直是人口流动和入侵的主要路线。但是，除了蒙古人的未获成功的入侵以外，日本的岛国地位在现代以前使它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如果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概括的话，似乎可以这样说：气候和地理对俄国的发展造成的障碍比对日本造成的障碍大得多，而俄国的自然资源财富则使它获得了明显的有利条件。

除了已经指出的两国在政治制度的效率方面有相似之处以外，它们的文化遗产是极不相同的。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俄国基本上是一个欧洲国家，虽然它的历史背景同它西边的邻国有所不同。象它西边的邻国一样，它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它成了基督教国家，在十世纪以后，它的统治者家族同中欧和西欧的统治者家族是通婚的。由于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之间在神学上发生的争执，俄国的基督教与西方的基督教分道扬镳了，但是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同基督教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宗教之间的分歧比较起来是比较小的。在价值标准和看法上也有差别，这可以归结到许多因素，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被蒙古人征服。尽管如此，到十八世纪末，俄国在很大程度上再次成了欧洲的一部分。

与此相反，日本同欧洲没有历史上的联系，而且由于它在

地理上——后来在政治上——比较孤立，欧洲人对日本的了解比对中国或南亚和东南亚的了解要少。凡是了解日本人的欧洲人都知道，日本没有什么东西是同他们的文化相似的。十六世纪到过日本的一名耶稣会会员说："可以正确地说，日本是一个同欧洲相反的世界；一切都是不同的和相反的，几乎在任何一个方面，他们都是与我们不同的。"俄国人则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人，尤其是在1700年以后。但是，日本人把欧洲看作是异邦，积极设法保持他们的民族特性。日本人的排外情绪一直持续到现代，尽管他们成功地适应了科技革命的挑战。在日本政界、军界或经济界的上层人士中，没有接纳过一个外国人，不管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更不用说皇室了，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是在不削弱种族障碍的情况下进行的。

俄国对现代科学作出的贡献也反映出它参加西方文化的程度比较大。在十九世纪，没有一个日本科学家对知识作出的有独创性的贡献比得上门捷列耶夫、季米里雅泽夫、洛巴切夫斯基和彼得罗夫等人（其中有些人是在外国出生的）。在二十世纪（1901—1973年），在物理、化学和医学方面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二百七十六个人中，俄国人有八名，日本人只有三名。

我们已经指出，日本和俄国在1870年和1970年的发展水平比较相似，但是在这些水平的某些组成部分中，则有明显的差别。在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社会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它的动员程度比俄国高，虽然经济生产水平略低于俄国。这种较大程度的动员反映在下列几个方面：日本交通比较方便、国内贸易额较大、中央政府的官员接受的训练较多较好、整个社会比较统一、组织得比较严密。可能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日本到

十九世纪后半叶一旦开始搞工业化，就能更好地利用其潜力。

自1917年起，日本和俄国的正式制度就一直被分别叫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这两个制度的差别实际上并没有象这两个名词所表达的那么大，但是尽管如此，两国在作决定的过程，在社会各主要部门之间分配资源和在各社会集团之间分配收入等方面是有着明显的差别的。然而，在1917年以前的半个世纪中，这两个国家在它们国家制度的正式结构方面是相似的。两国的正式政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德国和奥地利的模式为基础的。

还应当指出两国在国际作用方面的差别。虽然日本在1905年击败了俄国，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它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是个比较次要的国家。作为一个既没有战略核武器也没有战略常规武器的战败国，日本已不是俄国的对手，1945年以后，俄国已经成了两强之一，拥有全球性的利益、权力和军事力量。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国际关系由对抗转向和解，随着生产和贸易作为国际影响的标志的重要性的增加，日本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才再次变得值得注意。政治家们现在开始认为，在今后一二十年内，日本将同苏联、美国、欧洲共同体和中国一起成为未来国际关系中的主角。

最后，应当指出，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触及其他一些使人感兴趣的重要方面，即日本和俄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它们对彼此的看法的变化以及它们在文艺方面的成就。俄国是十九世纪最先“发现”日本的欧洲国家之一，虽然两国人民频繁的接触并没有防止彼此之间出现严重的误解，以它们1905年的冲突为背景，这一点是很值得探讨的。本书所谈及的

许多情况在两国人民的文艺作品里都很敏感地反映出来了，我们很想把我们的比较扩大到包括这些问题，但我们必须克制自己，因为归根结蒂，这对我们的主题来说并不是主要的。

政治年表

日本	俄国
I．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历史	
七至八世纪：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	十至十三世纪：基辅国
十三世纪：蒙古入侵	**十三世纪：蒙古入侵**
	十五至十八世纪：莫斯科公国
1600—1868年：德川时代	
1639年：颁布锁国令	1689—1725年：彼得一世（彼得大帝）
	十八至十九世纪：俄罗斯帝国进行扩张
1853年：佩里远征	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
II．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变革	
	1861年：解放农奴
1868年：明治维新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进行其他重大改革
1871年：废除封建割据	
1890年：颁布明治宪法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

	1905年：革命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对西伯利亚的干涉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沙皇统治结束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
	1928年—　　：五年计划
	1929—1930年：集体化运动
1931—1932年：满洲事件和政党政府的结束	
1937年—　　：对华战争	

Ⅱ. 当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1941—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5年：帝国崩溃	1945—　　：共产主义在国外的扩张
1945—1951年：美国占领	
	1953年：斯大林逝世

第一部分　过去的遗产

第一部分是对日本和俄国现代以前的社会进行对比研究的。它提出两个问题：(1) 两个社会之间的主要异同之处是什么？(2) 它们是否具有其他大多数社会所没有的，并且似乎使它们在其后的现代化过程中得到了重大的有利条件的明显的共同点呢？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既要选择大量的特点进行比较，也要寻找它们的共同点，即使在乍看之下差别非常明显的地方也要寻找共同点。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前提，即对过去历史中的战略因素作出假设，因为作为现代化特点的变化，正是从过去的历史开始的，这种历史也帮助了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迅速现代化的过程。过去对现代以前的社会没有作过什么分析比较，所以甚至连哪些因素一般来说起着前提作用这个问题基本上仍未得到解答。鉴于过去对开始搞现代化以前的社会作得比较是那么少，第一部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表明，作这样的比较对我们了解这一过程是有极大帮助的。

我们在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日本和俄国同还没有经过初步现代化变革的其他社会进行比较的时候，有意识地力求避免在对现代以前的社会发表比较性的评论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缺陷。这些评论常常用否定的口气描述日本和俄国。

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现代化社会中存在的但在日本和俄国却完全没有的那些因素上。当然，同十八世纪后半叶之前所有现代以前的社会以及在进入十九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以前的所有社会（少数社会除外）一样，以现代化社会的标准来衡量，日本和俄国是贫穷的农业国。但是，如果以大多数尚未触及现代化的社会的标准来衡量，情况就可能大不相同了。我们应当同所有现代以前的社会进行比较，这样才能确定为什么某些社会在进行科技革命以后首先实现现代化，为什么有些社会虽然实现现代化比较晚，但是情况很好，为什么大多数社会作为实现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在实现变革方面确是收效甚微。

现代以前的社会这个概念并不是说，在这种社会里，不存在对后来有可能实现现代化这一点起过作用的那些重要因素。毫无疑问，过去的遗产对面临现代挑战的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可以在许多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也可以起“阻碍”作用。但是，哪些重要，哪些要紧呢？我们谋求从现代以前的时期中去寻找日本和俄国后来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根源，并从实现现代化的能力这个观点出发，对现代以前的社会作一个初步的比较。

我们认为，过去的遗产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影响后来的变革的结果。许多研究社会历史的人都指出，在过去和现在的社会中，社会控制的形式是不同的。第一，从以家庭和团体为中心的控制方法转为与个人无关的控制方法可能是一个引起解体的过程，所以我们应当料到，在各个社会之间，由旧的控制形式顺利地转变到新的控制形式的程度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如何才能更好地避免出现全面的解体期？第二，由于现代

以前的社会的某些特点看来是许多世纪以来有条不紊地发展起来的，所以如果达到的现代化程度同以前存在的发展形式有很大的关系，那是不足为奇的。在研究了在现代化开始前不久的几世纪中各个社会的明显特点以后，就有可能确定在哪些方面已达到了某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在下面几章中，我们将设法找出日本和俄国之间在这两个方面以及在其他方面的共同点。我们也将简单地谈谈同实现现代化比较早的国家和实现现代化的速度比较缓慢的国家比较起来，它们的情况如何。

在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挑选一些还没有进入现代化的初期阶段的国家来进行比较。对西欧来说，这一般是指十八世纪后半叶的某个时候以前，而对没有新近到达的欧洲人定居的世界其他地方来说，分界线一般是十九世纪中叶或末叶。为了弄清楚同所有现代以前的社会比较起来日本和俄国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可以研究政体发展和城市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各种很大的差别。

我们认为，在开始研究现代化时先对这个过程的历史基础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现代化因素最后是如何由外部的人和内部的人引进的这个事实，远没有在发生这些接触以前社会中已经存在什么样的因素这一点那么重要。在下面几章中，对前提进行比较研究的重点是日本和俄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内部的社会结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找出这两个国家的前提，这就说明，在研究现代化时，比通常多得多地注意以前的时期是可取的。

第二章 国际环境

乍一看，人们往往只看到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前的长时期内日本和俄国同其他社会的关系有差别。这两个国家受到的中国和拜占廷的影响，其差别同它们原来的本国文化的差别一样大。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西方对日本来说基本上仍然是陌生的和不熟悉的。而俄国确确实实是欧洲的一部分，虽然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入侵导致基辅各公国和西方之间以前的密切关系中断了约两个世纪。在1700年以后，彼得谋求欧洲的政治模式，自此以后，俄国放弃了拜占廷的传统，而采用西方的传统。日本同欧洲的关系脆弱得多。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日本人同欧洲的商人和传教士有过短暂的接触，但是就借鉴制度而言，这种接触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这之后的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出现了一个几乎是完全与世隔绝的时期。

但是，除了这些明显的差别以外，还有它们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同日俄两国现代的发展可能有很大的关系。两国都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一种外国文化——日本吸收中国文化，俄国吸收拜占廷文化——以致它们好多代领导人都习惯于接受外国的思想和制度，在这一点上，可能使他们的后代作好了准备，欢迎由“西方”开始的科学和技术革命。伴随着中国和拜占廷的传统而来的是有利于实现国家团结和进行有效的治理的价值标准和制度，德川幕府的统治者和莫斯科公国的统治

者在建立他们的社会结构方面都大量吸收了这种价值标准和制度。

日本和俄国在许多世纪内都采用了中国和拜占廷的制度和价值标准，但是它们不仅仅是模仿而已。它们对这些制度和价值标准进行了改造，用以解决具体的问题，从而表现出它们的民族特性；当这些借用来的制度失去早先的效率时，日本和俄国就抛弃了中国和拜占廷。

起初，日本和俄国都试图利用西方的技术来保卫它们的传统制度不受西方的影响，它们认为西方的影响是颠覆性的。俄国首先为了防御而利用西方技术来支持它的传统制度，一个半世纪以后，德川幕府在十九世纪中叶也试图用同样的方法来保持它的地位。但是，在日本作出这个决定以前，它一世纪来对西方在医药和军事方面取得的进展越来越感兴趣，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危机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学者们对俄国在十八世纪末期以后在北太平洋的扩张极为关切。例如，著名的而又非常不了解情况的民族主义者藤田道德在1826年就根据衣着相似这一点得出结论说，荷兰的独立已经丢失给俄国了，日本现在受到了清一色信罗马天主教的西方的威胁。

中国和拜占廷的影响的意义

日本和俄国在早期历史上同一种居主导地位的外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比较近的时期内，又同西方发生了联系，这在两国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本国传统和外国影响的内容在许多方面是有着明显的差别的。但是，日本同中国的关系的形式和俄国同拜占廷的关系的形式，以及外国

影响的某些方面的具体内容，却有着一些显著的共同点。俄国受一种主要外国文化的影响的程度比日本小得多，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它同蒙古、奥斯曼土耳其以及西欧和中欧的思想和制度都发生了联系。另一方面，对日本来说，中国不象拜占廷对俄国那样，它一直是强大的，不断对日本的制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着影响。

起初，宗教是外国影响的主要手段。大约在五个世纪的时间内，佛教完全渗入了中国和朝鲜的文化，在这以后，在六世纪和七世纪，佛教也传入了日本，它不仅带来了价值标准，还带来了制度。同样，基辅公国时代的俄国统治者在十世纪改信了拜占廷式的基督教，这不仅产生了精神的影响，而且还对制度产生了影响。两国最初受影响的仅限于人数很少的统治集团，他们把中国和拜占廷看作是比他们自已的力量和成就大得多的力量和成就的中心。宫廷和高级贵族起先是把新宗教当作维护权力和地位的工具加以接受的；但是过了不久，佛教和正教就主宰了日本和俄国人民的文化。有趣的是，在这些较大的文明社会周围的国家成了传播这些制度和价值标准的媒介。巴尔干国家——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特别是阿索斯山的修道院——在向俄國传播拜占廷文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日本最初是通过朝鲜详细地了解中国的文明和佛教的。

因为佛教和正教是作为一种文明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作为一套宗教价值标准传入的，所以它们带来了文学、艺术、建筑以及法律和政治价值标准。奈良的庙宇以及基辅、弗拉基米尔和诺夫哥罗德的教堂，都是日本和俄国受中国和拜占

廷影响的证据，从日本和俄国的特权阶级逐渐传到广大人民中的书法、文学形式以及关于人和自然的概念也都是这种影响的证据。因此，这两个国家都是在一个更大的文化区域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朝鲜和中国的僧侣把中国的影响带往日本，被早期的日本政府派往中国学习后回国的僧侣和世俗学生也带回了中国的影响。在俄国，拜占廷教区（在十六世纪以前，俄国的教会是它下面的一个大主教管区）的圣職人员在许多活动领域内起着中间人的作用，也是很有影响的指导者和顾问。在日本，中国的影响被迅速吸收和内部化，虽然佛教本身在中国逐渐走向衰落。但是在俄国，基辅（后来莫斯科）的许多大主教都是希腊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589年俄国的教会最后取得自治时为止。

中国和拜占廷对日本和俄国的另一个明显的影响是在政治和管理方面。对日本来说，中国的范例就是一种通过由宫廷统治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制度实现政治统一的模式。中国的模式同六七世纪大和国家结构松散的和大家族各霸一方的制度比较起来略有很大的优越性。对具体的制度的模仿开始时只是局部的，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就逐渐深入下去。在此以后，由于家族、地区和最后是封建分权制的影响，仿效的范围就缩小了。但是尽管如此，建立一个统一的官僚国家的理想还是保存下来了，成了日本传统的一部分。在俄国的基辅公国时代，希腊—罗马的法律取代了异教的习俗，教会法庭取得了对信念和道德的裁决权。拜占廷的管理方法也引进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教会和国家在不同的领域进行分治的理论，但是，俄国的各个公国还是保持了联邦的形式，在那个阶段，

还不是按照拜占廷的独裁统治的形式实行中央集权的。

不同的民族特点的形成

外国对日本和俄国的强大影响，对于它们按照先进的模式建立价值标准和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各自的文化的内容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灵感，两国早期的编年史——记载从太阳神起皇室神圣家世的日本《古事记》(712年)、《日本书记》(720年)，和记载从诺亚之子耶弗特的时期到十二世纪罗斯人民的历史的《俄国最初纪事》(大约1110年)——都采用了中国和拜占廷纪录本国传统的编年史的体裁。在宗教、艺术和政治方面，就象在文学方面一样，本国文化的发展以及满足当地直接需要的制度的建立，构成了不同的民族特点的发展。

十三世纪蒙古的入侵，对俄国和日本的民族觉醒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同俄国遭受的创伤性影响比较起来，日本受到的影响要小一些。在蒙古的入侵(1241年达到了顶点)破坏了基辅各公国的联邦和它们的很大一部分文化以后，过了一个世纪，一批新的公国在基辅东北约七百五十英里的莫斯科的领导下又开始联合起来，又过了一个半世纪，在莫斯科人的领导下，才建立了一个能够同蒙古进行决战的权力比较集中的国家。实际上，新兴的俄罗斯国家的具有特点的制度是在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期间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统一了约二十五个公国和领地，使它们的领主从属于莫斯科的权力，同时不仅保护它们抵抗日益衰落的蒙古势力，而且还保护它们防御来自西方的威胁。

由于地理、气候和军事上准备不足的关系，蒙古征服日本

的努力失败了。蒙古在1274年和1281年对日本进行了两次未遂的入侵，第一次是从朝鲜发动的，第二次规模大得多，是从中国和朝鲜发动的。后来，这两次入侵被认为是日本在十九世纪以前遇到的唯一的一次外来军事威胁，是日本受到民族神的特殊保护的证据。但是，蒙古的挑战使日本领导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动员人力物力的问题，为了防止入侵而长期进行的紧张的战备工作对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日本和俄国以后的发展中，中国和拜占廷的先例主要被用来使根据当前的考虑建立的制度和采取的政策具有形式和权力。实际上，中国的权力同拜占廷的权力不一样，根据拜占廷的权力，可以专断地使俄国的继承者成为绝对的真理或得到合法的地位，根据中国的权力，则不宜要求直接移交和得到合法的地位。无论如何，中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中心。对日本人来说，尽管有中国的影响，对自己的标准保持一种独立的自信心可能比较容易。无论如何，日本从来没有完全屈从过中国的传统。此外，由于中国的传统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和不具体的，而不是狭隘的和竞争性的，所以它看来不一定是“中国的”。日本当地的文化传统则是非常具体的和狭隘的，所以它往往把传入的具有普遍性的中国文化变为它自己独特的文化。在《古事记》中以新传入的书法第一次纪录下来的传统就是神道，它讲的是有关神的起源和神怎么成为神圣的统治者的一些神话。日本在民间宗教、语言、诗歌和美学方面拥有并保持了顽强的和富有弹性的传统。几世纪来，尽管“进口货”在上层人士中影响很大，但很少影响到大多数日本人的衣食住和劳动的生活方式。到十二世纪，日本宗教

领导人开始同在传入阶段初期建立的那种佛教分离。在镰仓幕府时代，佛教得到蓬勃发展，日本与众不同地开始把着重点放在阿弥陀佛派和禅宗上，特别是放在日莲的著作上，日莲声称，日本是佛教世界的中心。这些发展使佛教更易为大众所接受，代表着日本的一种把传入的东西加以改造以适应当地的需要的明显趋势。

当日本人和俄国人在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经历中国和拜占廷影响的第二个浪潮时，他们甚至更加积极地使这些影响适应他们的需要，这反映出他们要保持民族特性的意识已经是很强的了。由禅宗佛教僧侣传入的新儒教思想使日本不再象过去那样依靠佛教，并提供了一种能满足德川幕府统治者需要的对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看法。儒教思想在上层政界人物的头脑中占了主导地位，同时，佛教和神道仍然指导着民众的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但是，中国的范例是独特的，因为它所起的示范作用在东亚仍然占主导地位，使一种巨大的文化保持了不间断的连续性。

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拜占廷对俄国来说已只是一种往事而已，仅在同圣书和律书有关的学习传统方面还保持着影响。即使如此，莫斯科的统治者再次利用拜占廷的传统来制定他们的政治理论，以便为他们统一俄国的各个公国进行辩护。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之手，这件事起到了加强拜占廷的影响的作用，因为它表明，削弱独裁统治会导致分裂和被外国敌人打败。它也使莫斯科后来能声称自己是“第三罗马”，以便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失败的地方保持独裁统治的传统。莫斯科统治者采用了拜占廷的徽记和头衔，以

维护他们进行统治的神圣权利，1472年伊凡三世和拜占廷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亚·帕列奥洛格结婚，因此维护这种权利就更有力量了。

俄国和日本后来为摆脱拜占廷和中国的影响所采取的方式也有很重要的共同点。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莫斯科的统治者们把自己看作是拜占廷的继承者，而不是拜占廷的门徒。在同立陶宛、波兰、瑞典和土耳其的一系列接触中，他们对各种不同的文化的眼界也扩大了。当彼得一世在十七世纪末决定性地转向欧洲时，他同样拒绝了深深扎根于拜占廷的莫斯科文化。在彼得朝代过后不久，俄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把彼得以前的时代说成是落后的、陈腐的和没有成效的；他们认为，在宗教和民间文化方面继续存在的旧俄因素是一个不幸的时代的残余，到适当时候就会被抛弃。

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文化，标志着中国文化在日本知识分子中传播的高潮时期。但是某些儒教作者已经准备颂扬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比中国的文化优越。到十八世纪，一个新的"民族"学派甚至更加强调当地的传统，他们颂扬神道传统，试图使日本文化摆脱他们所认为的中国的儒教思想强加给它的不自然的理性。到十九世纪初叶，有些作者把他们的文化的民族特点说成是能够吸收各种形式的有用知识，不管其来源如何。神道学者平田在《古代方式概述》(1811年)一书中说，应当利用各种传统的长处为日本服务，并得出结论说："我们不仅可以正确地把中国的学识看作是日本的学识，甚至还可以正确地把印度的学识和荷兰的学识看作是日本的学识。"

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初步挑战

正如前一章中所指出的，日本和俄国的传统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差别。但是，在这两个国家对科学和技术革命最初的挑战作出的反映中，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在日本和俄国领导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作出按照西方的方针进行彻底变革的重要决定前的几世纪中，这种挑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西方影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些共同的反应形式首先表现为两国出现的一种趋势，试图同西方及其影响不发生任何接触。后来，他们发现这样做既不理想也是不够的，于是就试图利用西方的技术，不是把它当作变革自己的社会的手段，而是作为保护自己的领土和制度的手段。两国领导人不断强调要保持“历来的”价值标准和制度的传统，这种传统现在包括佛教、儒教和正教。

就象这两个国家首先是通过宗教受到外国的重大影响一样，它们也首先把西方看作是天主教基督教的世界，并认为西方的这种宗教是一种威胁。欧洲人最早是在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到达日本的，那是动乱的变革时期，一批批军事领导人在实现民族统一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这种纷争的局势中，载着货物和武器的西方船只就具有战略意义了。但是葡萄牙的船只也带来了耶稣会传教士，后来，西班牙的船只带来了圣芳济会和黑袍教的传教士。由于这些传教士同贸易和武器联系在一起，日本人对他们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但是当耶稣会传教士在封建贵族中开始取得成功的时候，当圣芳济会和黑袍教的传教士在老百姓中吸收教徒的时候，统治者担心这是

把宗教和政治结合起来的颠复活动。1600年以后，当德川幕府的领导人建立他们的控制时，英国和荷兰的船长们很高兴地证实了对天主教帝国主义的担心。在日本统一之后，武器就不需要了，所以当传教士和他们的信徒们不执行对基督教的限制时，迫害就开始了。在1637年，基督教徒的一次叛乱使幕府领导人相信，他们应当使日本摆脱同欧洲的进一步的接触。

在俄国，由于同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比较密切，以及由于正教徒们忙于应付正式教会的老信徒和祈祷仪式改良派之间日益严重的分裂，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即使如此，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改宗是严格禁止的。外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只许住在城市里专门划定的地区，而到政府里工作的人必须改信正教。

虽然日本和俄国对现代西方的初步反应都是尽可能地使自己不受颠复性的影响，但是这种做法的程度和性质是有很大不同的。在1640年以后的两个世纪中，根据已成为正统和传统的一部分的锁国政策的规定，日本同西方世界是隔绝的。同荷兰东印度公司驻长崎的代表仍然进行着少量的贸易，但是日本人不得出国，如果出国就不得回来。在全体人民中定期进行检查，以防继续传播基督教，特别防备以前的或改变信仰的基督教徒的后代的活动。结果是，由于迫害和牺牲，基督教被消灭了或被赶入地下。在上层社会，西方文明经常受到诽谤，用中国人常用的各种诅咒字眼来诅咒它。西方人被认为是不懂得传统的价值标准和礼仪的，虽然他们在制造精巧的物品方面是聪明的。除了排斥文化以外，神道还担心日本神

圣的传统和国土被玷污。但是，的确穿过了这些防线的个别西方人常常报道说，人们对西方文明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在接受西方文明时之所以表现得小心翼翼，主要是由于怕官方反对。

德川幕府的首批领导人准许同东南亚进行贸易，试着向西班牙的采矿工程师发出邀请，并保护英国和荷兰的贸易使团，这些使团似乎避开了天主教的影响。但是即使如此，在一个由武士统治的社会里，作为商人，荷兰驻长崎的贸易人员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他们的行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即使在他们按制度去幕府首都进行礼节性朝觐以后，他们也被当作人们感到好奇的目标，在十八世纪以前，他们的礼品没有引起什么人的兴趣。

在俄国，随着贸易和外交接触的增加，闭关自守的政策极其严格地反映在精神方面。天主教和新教受到的限制，只是排斥西方思想的整个努力的一个特殊阶段，西方思想被认为是颠复沙皇统治的潜在威胁。在十七世纪以前，统治集团所受的教育基本上限于拜占廷的传统学识，少数出国的俄国人主要是去接受专门训练的。但是，在技术方面，从十五世纪就开始从西方引进了，以后这种趋向不断发展。英国、荷兰和瑞典的技工帮助他们建立造船厂和兵工厂，他们常常在俄国政府服务很长一段时期。

在十八世纪的前二十五年内，彼得一世的政策标志着这种引进技术的活动迅速扩大，通常被称为“西方化”或“欧洲化”。但是，尽管如此，认识到彼得的“改革”的局限性是重要的，他广泛引进西方技术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造俄国的社会，而是为了保护它。彼得参观了英国的造船厂，但是他对英国的

议会不感兴趣。他为了集中政治权力，采用了瑞典教会的管理结构，但是并不关心路德教。发生变化而且是很大的变化的是军政机构以及上层人士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带有欧洲倾向的俄国，同在与世隔绝的日本一样，影响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的传统文化和农村经济制度几乎都原封不动地保持着。

日本闭关自守的政策在1720年以后开始有所改变，因为驻长崎的荷兰贸易代表团逐渐被当作是一个了解西方在医学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进展情况的消息来源。到十八世纪末，幕府的和地方的统治者们提倡学习荷兰文，1811年，在首都成立了一个翻译局。向荷兰人提出的索书单的数量和长度都增加了，荷兰和中国商人定期提出有关外部世界的发展情况的报告。私人和政府组织的学习荷兰文的计划造就了一批专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西方在科学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进展情况，他们发出的警告为应付危机作了思想准备并加深了危机感，随着1842年中国的失败和1853年佩里的到来，这种危机就发生了。日本的作者对彼得一世学习西方的努力表示赞赏，他们描述了拿破仑的成就并提醒人们注意日本的弱点。1842年向荷兰人发出的一张征询意见表问道："据说鞑靼人非常英勇，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呢?"回答是令人泄气的，但却是直截了当的，那就是："光凭勇敢是不够的，战争的艺术要求有更多的东西。没有一个欧洲以外的国家是能够同一个欧洲国家竞争的，只有四千人就可以征服偌大的中国，这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同荷兰人的接触和交往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它的内容

和连续性，不如说在于它们造成的态度和觉醒。在1859年港口再次开放后潮水般涌进日本的西方知识的冲击下，在德川幕府时期准备的大多数翻译读物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随着横滨取代长崎的位置，“荷兰文”学者很快发现，他们学错了语言。但是，幕府作出的努力和设立的一些局，为德川时代后期和明治时代初期设立各种学会铺平了道路。天文局（1811年）内部的翻译局是外国书籍研究会（1856年）的前身。外国书籍研究会后来改名为发展学会（1862年），最后并入东京大学（1877年）。

国际比较

外国的影响和借鉴外国的东西对各个国家的重要性——外国影响的作用、不同的民族特点的形成和科技革命的挑战——是不同的，从这些方面对各国进行的比较，其准确性必然远不如对经济和社会指数进行的比较。但是尽管如此，了解一下日本和俄国与国际环境的相互关系，同其它国家的经验比较起来情况如何，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种比较是有限制的，因为日本和俄国都属于为数很少的，保持作为界线分明的民族单位的连续性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国家之列。日本的地理位置使它不大容易受到外部的侵略，这就使得一个种族比较纯一的民族能够建立起独特的制度。俄国的民族特点形成得比较晚一些。在划定和扩大边界以及巩固安全的时候，不断使用武力。但是，到十世纪，基辅国仍然存在。因此，在这两个国家内，发展相当明确的民族意识的机会和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

这种实行自治和具有不同特点的长期经验，也有助于有选择地吸收外国文化。它们的经验扩大了控制和限制外国影响的机会，减少了担心被这种影响淹没的理由并扩大了在政治和其他社会管理方面进行试验的选择。外来的制度可以同当地的传统结合起来，吸收外来东西的自觉性所起的作用往往是使当地的文化的界线更加分明，而不是冲淡当地的文化。西欧受古典文化的影响，奥斯曼土耳其受阿拉伯和拜占廷文化的影响，这同中国和拜占廷对日本和俄国的影响是一样的。在西欧和奥斯曼帝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传统常常不仅是吸收宗教价值标准和制度的工具，而且还是吸收世俗价值标准和制度的工具。但是，俄国，当然还有日本，是不同的，因为它们有那么多东西是以一个国家为范例的，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特别受到了中华帝国的稳定和连续性的影响。

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同日本和俄国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本国的制度也是在同外国的影响发生相互作用以后形成独特的民族实体的。它们建立的客观公正的制度，得到了以前人们对家族、团体、贵族和教会的那种效忠，并保留了由于传统和政治环境而产生的基本差别。另一方面，它们同日本和俄国不同的是，它们在现代在精神和制度方面的变化是缓慢地靠内部力量发生的。在经过了比西欧所知道的更严重的孤立以后，日本和俄国一旦认识到它们制度的不足，就立即有目的地采取相应的行动。搞现代化的上层领导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指导它们的行动并使其持之以恒。

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缺乏适应能力。在重要问题上，中国领导人更重视通过过去的传统的价值标准来说明自己的

作用的合法性，而不是象德川幕府的军事领导人那样通过切实的调整来适应危机，并以此来说明自己的作用的合法性。中国人往往把自己的国家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因此如果没有大量的失败的证据，就不可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他们对接受西方的影响比较迟钝，而他们的政治制度也加强了这种倾向，在这种政治制度下，现代技术知识在长期内同职业方式没有什么关系。中国十九世纪同西方的接触由于民众的叛乱而进一步复杂化了，因为这些叛乱消耗了大量资源并严重削弱了官员和民众的能力。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在被由于应用外来技术和制度而突然强大起来的日本打败以后，才最后认识到西方知识的特殊意义。用改良派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1894年战争中的失败、台湾的割让和两万万两白银的赔款使我们中国从四千年的睡梦中醒过来了。

奥斯曼帝国虽然没有中国那样的土著文化，但是它有政治、军事和文化成就的优良传统。在那里，伊斯兰教似乎成了妨碍接受西方影响的主要障碍。虽然奥斯曼的领导人经常同欧洲武装部队接触，但是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他们不愿意自己进行这种接触，而往往利用希腊臣民作为中间人。他们自己对西方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他们把欧洲人看作是必须使其改宗的基督教异教徒。直到十八世纪末奥斯曼同欧洲发生对抗以后，土耳其人才开始认真看待西方。

第三章　政治结构

到十九世纪初，日本和俄国的政权具有明显的相似点。统治两国人民的是在全国一级行使职权的、组织严密的和公认的政府，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极少的。两国都是在长期实行的制度下实现政治统一的，这些制度已经成为全国团结的有力象征。俄国的沙皇政府及日本的中央幕府和地方藩国政府都拥有自上而下（直至乡村一级）的稳定的结构，这些政府的官员来自这样一个阶级：它的地位不仅来自出身，而且还来自对具体的政府职务的义务。两国政府都密切管理着独立的利益集团，都拥有极其广泛的权力，因此加强了对国家负有义务而没有反对国家的权利这一普遍的概念。受强大的集体精神支配的农村政治生活，在日常事务中基本上仍然是自治的。

两国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日本政权分散的程度比较大，它松松散散，分成许多领地（藩国）。俄国的独裁政权的集中程度大得多。造成这种差别的部分原因是，两国的地缘政治情况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同其他现代以前的社会相比，日本和俄国的有效统治都发展到了比较高的程度。

地缘政治上的差别

两国之间的实际差别是明显的。日本独处一方的地理位置使它的居民在十九世纪以前没有受到过外国的军事威胁

——唯一的例外是蒙古在十三世纪的入侵，但没有成功。日本领导人面临的任务是把许多地区的权力集中起来，这个任务到十七世纪基本上完成了，但是由于主要岛屿上的山脉把平原分隔成许多小块，这一任务变得复杂了。另一方面，俄国辽阔的大平原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但也使它同外部世界之间没有明确的政治边界；在俄国早期的历史上，许多时间用在通过抵御外国入侵者和通过扩张新的领土来划定国界。

这种差别的第一个最明显的含义是，在现代以前的时期的末期，日本人用在军事机构上的人力物力不得不比俄国少得多。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战争对两国政治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当日本国内的政治斗争突然结束时，日本人所需的军事预算比俄国少，俄国进行的战争需要有大量的防御工事和大量装备精良的军队来对付外部敌人的挑战。两国在军事开支方面的差别在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1600—1868年)是明显的，在那个时期，日本尽管故意保持着一种军事理论，但是花在战争上的资源是极少的。在同一时期，由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冲突，俄国需要向人民征收大量的资源，用于庞大复杂的军事系统。要是不这样做的话，俄国决不能把它的领土扩大到现在的规模，甚至它的主权都可能丧失。

大规模战争给俄国不断造成的压力，促使它建立了某种国家政治制度，这些制度是日本长期以来所没有的。俄国的军队要是没有武器和其他装备就不能上战场，而购买这些武器和装备的钱是用由沙皇的代理人为莫斯科征收的税款支付的。早期的俄国政府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支持军队而在机构和人员方面作出安排。

日本同它的敌对的邻国是隔开的，而俄国同它的敌对的邻国则是毗连的，这意味着，由于俄国的危机比较频繁，所以它在机构方面激发出来的创新精神比日本大得多。俄国的机构是在战争的压力下形成的，并且常常是以外国的模式为根据的，因此往往是“自上而下”建立的。一旦产生这种机构的危机过去以后，它们要么向前发展而起新的作用，例如参议会，要么消亡而不留什么痕迹，例如缙绅会议。正如在上一章中所指出的，外国的影响，不管是用武力强加的还是自愿接受的，在促使日本改革制度的诸因素中都不是那么突出的——一个重要的例外是七世纪时大规模向中国唐朝学习。因为日本在国际关系中没有经历过不时出现的严重危机，因此也就并不迫切需要进行突然的和彻底的革新，所以它的政治制度是逐步发展的，没有什么急剧的变化。诚然，重大的革新也是有的，但总是在地方一级进行多年的试验以后才进行的。旧制度往往也不抛弃。日本的宫廷制度和等级，虽然早已失去了权力，但还是保存下来了，这是说明尊重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例子。

君　权

当日本和俄国的领导人在十九世纪全力以赴地搞现代化运动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机构：皇宫·在这两个国家，几百年的王位是稳定的，足以成为主张搞现代化的人的一块盾牌，这尤其是因为俄国的“沙皇”和日本的“天皇”被政界的大多数上层人物认为是全国效忠的核心。

但是，除了这种广泛的共同点以外，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

差别：俄国的沙皇既是政治统治者，又是神授的国家团结的象征，而在日本，天皇只有象征性的力量，实际上没有政治力量。在日本，许多世纪以来，实际的治理和君主的名义几乎是完全分开的。军事代表或者幕府将军负责实际的治理工作，但是只能以在位的君主的名义进行治理。日本君主的原型在六七世纪佛教传入日本以前就出现了，从一开始，他的合法性似乎主要不是来自军事力量，而是来自部落首领的祭司职能。当地的这种制度同大不相同的中国对皇帝的概念结合起来了，中国的皇帝是一个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的统治者，他的合法性来自天命。

在七八世纪，日本事实上的确实行一种帝王制度，它是根据中国的模式起作用的，由皇帝（或者经常是由皇后）充当政治上的独裁者和得到神承认的全国团结的象征，在他下面是集中在首都的各大家族的联合体。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情况是暂时的，因为在平安时期（794—1185年），皇帝的政治权力逐渐被各种代表，首先被藤原家族的摄政者篡夺了。中国帝王制度的政治内容削弱了，此外还发生了一种变化，即由中国关于君主的概念转向当地关于统治者的概念，前者把君主看作是由天上的神明选定的，后者则把统治者本身看作是神，是太阳神，最终是日本列岛的创造者本身的直接后裔。但是，即使人们并不把帝王制度看作是受神命来行使政治权力的，它起的作用也是使别人行使权力具有合法性，因此在社会生活中是一支潜在的活跃力量。

俄国的帝王制度来自拜占廷关于世俗君主（后来是凯撒或沙皇）至上的概念，上帝授予他管辖世俗事务的全部权力，

并负责领导正教教徒。鞑靼汗的职位的广泛权力和奥斯曼苏丹的职位也使莫斯科大公国的领导人得到了启示，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是国内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唯一的统治者”或“独裁者”。莫斯科大公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个人作用。但是，在日本，十六世纪的统一完全是通过军事领导人来完成的，他们想得到作为君主的代表的合法地位。在十七世纪俄国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独裁统治在处理世俗和宗教事务方面的主导地位再次得到了巩固，那些希望搞寡头统治或神权统治的派别未获成功。因此，虽然彼得一世和德川家康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但是他们的形象是不同的。彼得是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力的，而德川则小心地保持着他作为幕府的将军而得到的权力的特点。

这种差别的含义是重要的。一方面，日本有一个比俄国稳定的全国注意的政治中心，这个中心远不是象俄国那样容易受到在继承权问题上发生的争执以及篡权和杀君的企图的破坏性影响，在这个中心下面，由于君主具有起合法作用的力量，实际的政治革命可以顺利地完成。另一方面，由于实际的治理和君主的名义是合一的，沙皇的职务的生命力就强得多了，许多代沙皇都采取了有力和坚决的行动，而在日本，只有德川幕府时代早期的将军们才表现出这种魄力。

国家权力的分配

到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和俄国的政治制度最最明显的对比表现在中央和地区或地方机构之间国家权力的分配方面。因为长期以来俄国政权的首要任务是筹集用来向敌对的邻国

发动军事进攻的经费，所以它是在全国范围内按照高度集中的方针进行组织的。即使在必要时由沙皇的代表在地方上行使相当大的独立权力，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拥有的权力是靠同中央政权的联系得到的。日本几乎不用担心外国入侵和发生公开同国家脱离的事情。因此，地方领地（藩）的领导人可以得到远远大得多的自治权。在日本，由于由中央征收的税收所占的比例比较小，建立机构的最大量的工作是在藩一级进行的。俄国的情况则相反，全国一级的机构比较发达。

日本中央和地方政权的特殊结构的法律名称叫做幕（府）藩（国）体制，这就是在一个中央政府（幕府）和约二百五十块叫做藩的大小不同的单独的领地之间分配政治权力。幕府具有两重性。它是中央政府，因为它负责包括贸易（虽然在德川幕府时代贸易关系是非常少的）在内的所有对外关系，负责管理三大城市，负责各藩之间的一切关系，负责偶而更换大名的封地，负责藩之间的土地的重新分配，甚至负责藩内部的某些事务——例如，领导权的继承问题。但是，幕府本身也是最大的藩，全国约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属于幕府管理的范围。每个藩都要为幕府承担各种劳务，但同时在直接管理自己的领地方面拥有范围非常广泛的自治权。例如，全部税收都完全由藩掌握；藩的官吏得到的岁入用作藩的开支，特别是藩的武士阶级的俸禄。幕府对各藩的大名进行消极和积极的两种控制，前一种控制就是要求大名宣誓效忠和限制他们的防御工事，后一种控制则要求他们每隔一年到幕府首都服侍一年以表示尊敬。

日本的幕藩体制从其根源来说是封建性质的，将军（幕府

领导人）和各个领地的大名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效忠的基础上的。但是实际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封建性质的关系几世纪来是变化的，每一个将军都是靠小心地保持力量平衡来维持这种体制的。因此，人们用"封建集权制"这样一个奇怪的名词来形容德川幕府的政体，虽然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个体制的封建性质已经大大减少了。政治上缺乏高度的集中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个人联系的长期存在，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不存在什么外部威胁，因此不需要集中。在这方面，日本同俄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经常被迫团结起来抵御外敌。

日本的政治机构在藩一级是高度发达的，在中央一级则是相当松散的，而俄国的政权是两极化的，一边是高度集中的独裁国家，一边是高度地方化的（甚至村一级的）制度，尤其是农奴制。农奴制就其性质来说是地方性的。但是，它同时又是同中央政府密切相关的，因为国家本身拥有并直接控制着将近一半的农业人口，并把对另一半农业人口的控制权交给了当地的贵族，后者对国家权力的依赖和依靠始终是非常明显的。在日本，地方政府的职能是由各个藩的官吏行使的，而在俄国，这种职能是由中央政府授予警察和管理农奴的其他权力的当地的贵族行使的，或者是由在首都任命的官吏直接行使的。权力的这种划分是俄国的统一过程产生的结果，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地区政府和上层人士常常是被消灭的，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并入莫斯科的中央政府。这样划分管辖权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俄国根据自然条件划分的地区，范围是那么大，是那么缺乏明显的特征，人口又常常是那么稀少，很难建立起强有力的地区机构和形成忠于地方的势力。

国家和地方的控制权的这种不同的分配方式给两国带来了不同的利弊。在日本，政府一级的连贯性比较大，地方一级大力进行发展工作和适应当地条件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在俄国，尽管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着各种明显的问题，中央的执政者在许多世纪内在管理极其巨大的单位方面必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在早期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日本当局的主要经验是管理规模比较小的单位的经验。

政府的权力和人员

从政府权力的一般分配到政府机构的具体权力，人们发现，到十九世纪中叶，两国都拥有范围广泛和结构严密的政治控制制度。由政府机构指导的各种活动和由它们控制的全国的产量，同其他现代以前的社会相比都是异常全面的。除了铸造货币、准备定期的地籍测量报告及建立和供养军队等通常的国家职能以外，日本和俄国的政府还垄断或者至少严密地控制着国内物价、外贸和交通等各种不同的活动。教育机构是由两国政府兴办的（其中包括日本藩一级的学校），虽然小学有很大一部分仍然是私人办的。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两国政府都能兴建大量的公共工程，其中包括日本修建城堡、兴修灌溉系统和执行开垦土地的计划，俄国修建复杂的运河系统和进行广泛的城市规划。最后，两国政府的发言人老早就强调，它们在伦理问题上对民众进行指导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工厂主、商人、行会和其他有势力的利益集团的政治作用将在另一节里讨论，但是这里必须提一提日本和俄国在政府

的控制方面的一般差别。差别似乎在于，在日本，幕府和藩的领导人对个人和团体的商业活动往往是管理得相当严格的。另一方面，俄国政府虽然有时候也采取类似的政策，但它更加经常地垄断这些职能，把它们纳入国家结构。例如，俄国政府历来从事自己的银行和信贷活动，而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大阪的私商有权从事同样的活动，虽然是受国家的严密管制的。同样，俄国政府在某些工业企业中也占有显著的地位，并直接管理将近一半的叫做国家农民的农业人口。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主要不在于俄国政府善于把许多事情揽过来，而在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两个世纪内，日本独立的经济利益集团发展的速度比较快。同时，大规模的村际控制对俄国平原上新定居地区的广泛活动可能比较合适，而对于人口稠密的日本可能并不合适。

笼统地说，两国政府机构的人员是相似的，但是如果作比较具体的比较，他们又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总的来说，人们可以强调日本和俄国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有庞大的上层官僚阶级，足以担当国家机构里许多中上层的职务。这些官吏能够担任职务越来越依靠他们合格的管理才能，而越来越少地依靠独立的财富或出于世袭的考虑。虽然在日本世袭是录用的第一个标准，但是由于有大量的后备公务员，所以成绩这个标准就有很大的余地来发挥作用了。然而，虽然总的趋向是朝现代式官僚机构的方向发展的，但是在俄国和日本的上层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要了解这一点，最好是看一下两国的这一阶级的起源。

日本的武士——军事扈从——最初是一个"封建"阶级，

他们首先强调个人忠于君主，因为他们得到俸禄和封地。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日本统一的过程中，新兴的大名使武士离开了土地，住到地区的城堡市镇里去，以此作为政治控制的手段。从那时起，大多数的武士得到的俸禄就是大米了。这些大米原来来自某块土地，但是到德川幕府末期，这种俸禄同支付给家长的世袭俸禄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了。同时，武士的专门的军事职能也逐渐变为形式更为多样的公务了，因为德川幕府时代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国内外太平的时期。在训练武士阶级的时候，仍然强调军事是有用的，但是，武士和领主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通常表现为个人关系减少，而同管理职能有联系的抽象关系增加。总之，武士逐渐由军人变成了官吏。

俄国的贵族则相反，他们并不象日本的武士那样是从以土地为基础的封建阶级发展起来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官吏阶级。从十六世纪中叶起，大多数比较老的占有土地的世袭贵族逐渐为担任公务的贵族所取代，后者不是靠生来就有的权利占有土地，而是靠做官占有土地。到十八世纪彼得一世的时代，法律明确规定光是做官就可以成为贵族，所以俄国的贵族比严格地世袭的武士来得开放。当然，俄国的贵族同领取俸禄的武士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一般都拥有世袭土地和农奴，这是事实。但是这种土地的拥有者从来没有完全忘记国家最初对他们的恩德，因此整个说来，俄国的贵族从来没有发展成为能够成功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中央独裁政权影响的独立的阶级，虽然他们也经常作这样的努力。因此，到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的贵族和日本的武士，尽管起源有很大的

不同，却是朝着十分相似的方向发展的，即成为一个完全依靠国家的按功劳取得某种地位的官吏阶级。因为特权阶级也是不独立的官吏，所以政府领导人就可以比较自由地采取行动，而不必担心会使武士或贵族作为自治的阶级采取坚决维护自己利益的行动。

除了按官衔的大小确定一个人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他能否进入上层社会这个共同点以外，在日本和俄国，一直到现代以前的时期的末期，存在着两个重大的差别。第一，日本上层人士的人数比俄国多得多（见第五章），这使得日本可以派武士去担当低得多的职务。俄国贵族的人数比较少，这使它在配备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员方面条件比较不利，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初期，因为当时职务的数目迅速增多。此外，由于日本上层社会的成员可以担当相当低的职务，这就使各个武士的财富和地位出现了很大的差别。德川幕府时代新的儒教思想强调担任公职是崇高的，这虽然可以消除这种差别产生的影响，但是也只能消除一部分。

两国上层人士之间的第二个差别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即使在俄国规定对土地和农奴的占有要根据为国家服务的情况来确定靠土地生活仍然是理想的和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俄国的贵族看来，为国家服务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俄国独裁政权同这种缺乏热情的现象进行的斗争从未取得过什么成效，因而它经常从下层社会和其他国家吸收一些非常重要的官员。但是在日本的一些地方，则坚决将武士从他们的领地迁往城堡市镇定居。武士普遍把为国家服务看作是目的本身。两国上层人士的这个差别反映在：

日本领导人能比俄国的领导人进行更为直接的控制，可望得到更为全心全意的效忠。

特殊政治利益集团

上面已经着重指出，在日本和俄国，政府行使范围极其广泛的职能。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相对来说，这两个国家都不存在可以向国家的权力提出挑战的独立的力量和利益集团，各宗教团体、银行和商人组织等。另一部分原因是政府在维护对这些集团的管理权力方面效率较高。上面已经提到，日本和俄国之间的一个突出的共同点是，两国都没有可以作为一个起作用的独立的利益集团起来反对国家的世袭贵族。

在中世纪，日本和俄国的官方政治权力受到的唯一的最大挑战来自宗教机构，因为俄国的正教和日本的各佛教教派都是大土地占有者，因此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虽然两国的宗教团体并没有对国家的合法性提出任何重大的思想上的挑战，但是有时候在短期内却对政治上的稳定构成威胁。这种威胁在日本特别明显，因为在那里，某些佛教教派拥有大量的私人军队，建立了筑有坚固工事的地区据点。但是，到十七世纪，在日本和俄国，教会的政治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了。在日本，摧毁这种力量的办法是彻底摧毁佛教的军事力量、没收教会的土地和控制寺庙，利用寺庙对平民的登记注册活动使它成为国家实行政治统治的一个工具。在教会积极参加创建和维护国家的活动的俄国，使教会从属于国家的安排遇到的唯一的一次严重威胁发生在十七世纪，当时尼康大主教试图发挥积极的和独立的政治作用，但是没有成功。没收教会土地、把教

会变成国家的一个机构以及在尼康垮台后的一个世纪内采取的其他措施，产生了同在日本相同的结果。到十八世纪，两国的宗教机构都没有什么独立的政治力量了，国家的实权大都掌握在非宗教人士手里。

倒是两国经济的发展给国家造成了最大的独立的政治威胁，因为这使一些新兴的集团得到了相当大的资源，也可能是相当大的力量。但是在日本，大阪的交易所由于承担了很大的责任而受到必要的限制，这些交易所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以致能够起到政府银行的作用。同样，许多藩的制造商和服务项目承办商要求政府允许他们组织起来，以便对付竞争者。商人们由于他们的职业在新的儒教等级中地位低下，也许逃避了严密的管制，但是如果商人的财富积累得那么多以致使它的所有者情不自禁地想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那么政府会毫不犹豫地没收他们的财富，虽然这种情况是很少出现的。

如果日本的方式一般来说是从外部来限制商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权力的话，那么在俄国，新的商业企业经常被纳入沙皇专制主义的单一结构之中。这种努力在十九世纪已被部分抛弃，但是在此以前的几代人的时间内，新的商人阶级被组织在协会或行会内，它们有责任向国家说明其成员的事务。此外，独裁政权非常广泛和直接地参与各种类型的制造业和农业的事务，因此进一步防止了形成一个在公共事务方面有强大的和独立的发言权的资产阶级。

至于军队，它在许多传统的政权中，已经建立了很大程度的独特的政治力量，在日本和俄国，到早期阶段结束时，它在权力结构内似乎仍然是一支紧密团结的力量。正如我们所看

到的，在日本，武士阶级的成员在作为军政府开始的政府中任职，但是几世纪的和平和缺乏军事训练的机会，以及直接参与政府各机构的工作，这些因素已经使它变成了一个文多于武的官吏阶层，从而失去了独立行动的任何可能性。在俄国，军队既有自已的庞大组织，在1860年以前也有足够的机会行施它的职能。但是，尽管如此，从彼得一世的时代起，军衔同政府中的职衔是相等的，基本上是可以互换的，而政府因其成员穿上军装也就“军事化”了。除了这些措施以外，还有其他许多措施使政府能够严密控制军队和防止它产生一个独特的阶层的人员或思想。

村庄一级

在谈到现代以前的日本和俄国的时候，有必要区别村一级的统治和其他各级的统治。尽管象其他现代以前的社会一样，在两国的地区和国家一级，政府的作用比较容易看见，但是，大多数的社会职能是在村里执行的。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在村子上，放在它同地区和国家的接触的具体性质上，才能了解国家的许多政治行为。

在日本和俄国的农村里，暴力和不安定局面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到十八世纪，农村是很安定的，上级对它们的内部管理可以采取“不插手”政策，而无需担心会发生混乱。这种不管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由于农民的实践的结果，这种实践加强了普遍存在的集体和互助的精神。在日本，在共同耕作和管理稻田方面投入的大量劳力产生了这种精神，此外，使得集体的成员很难退出和抛弃集体拥有的资源。在俄国，定

期重新划分集体拥有的土地以及集体耕作和收获同样培育了这种互助精神，就象农奴制的目的是使个体农民拴在某一村庄及其土地上一样。这些因素使村庄的政治生活保持了高度的互助精神，防止了个人主义的强烈表现。

不管两国村庄的政治生活在集体的稳定性和对上级保持自治这两方面多么相同，但农民在当地行使权力的方式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虽然两国的村庄制度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两国的这些制度在现代以前的几世纪中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日本村庄中的权力是以大体上同地产相符合的家族等级系统为基础的，而俄国村庄中的权力在很大的程度上则是以男子中的长者为基础的。

在日本，至少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村庄统治的核心是不断地大力争取使村庄内部的意见达到完全一致。但是，由于佃耕制度的兴起以及十七世纪以后村庄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越来越大，这种集体因素很早就受到了压力。每个村庄都有许多五户一组的“共同负责的单位”，这进一步加强了集体因素。领导权在世袭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落在来自起主导作用的农户的个人手里。村议会的传统仍然存在，但是，在许多地区，它们在政治上仅仅处于从属地位，要同已经由政治领导人作出的村子里的一致决定相符合。

俄国的村庄甚至更加强烈地保持着集体性，尽管有些地区出现了富裕的农民企业家。毫无疑问，在谋求取得一致意见的过程中，财富越多，影响越大。但是，领导权主要不是起领导作用的农户行使的，而是通过由定期选举的、代表全村的长者主持的村议会行使的。在行使职责时，这些长者大力依

靠意见的一致，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只有全村团结一致，才能在同贵族或国家官吏打交道时处于有利地位。

两国的大多数社会职能都是交给作为自治单位的村子来行使的。即使如此，国家（或者日本的藩）在村庄里有着长期的利害关系，因为村庄是税收的来源。在这一背景下，最好考虑一下村庄的机构同上级联系的手段。俄国国内遥远的距离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日本国内多山的地势使得村庄和大城市的实际联系发生了困难，而把村庄当作一个单位来征税而不是向各个农民征税这种做法，进一步限制了农民和上级的交往、甚至是接触的次数。

其他的因素则起到了加强各级统治机构之间的联系的作用。这种接触无疑在日本比较多，在进行接触时发生的摩擦也比较少，因为在日本，在村和藩之间存在着非常有效的书面联系制度，其中包括当地的布告牌，官方的条例和通知可以贴在上面。日本的权力格局一般说是合适的，因此村和藩之间的联系是顺利的和有效的，而这却是俄国所缺少的。

在考虑俄国的村和国家之间比较薄弱的联系时，需要对贵族拥有的农民村庄和国家直接拥有的农民村庄加以区分。国家拥有的村庄同中央政府有着较直接的（但不一定是较经常的）联系，因为它们不是通过当地的地主而是通过正式任命的官员同国家进行联系的。在贵族拥有的村庄里，贵族地主在所有问题上代表国家的权力。

俄国的村庄和上级之间的一个政治接触因素就是经常要提供新兵，这是日本所没有的。经过二十五年服役期的严峻考验而幸存下来的老兵一般返回他们的村庄，他们把同独裁

政权的军事机构的长期接触带到了村庄里。但是，这种联系不足以使一些俄国人（受过教育的和没有受过教育的）相信，村庄和国家这两个政治世界是最理想地充分结合在一起的，或者到现代以前的时期的末期，情况正在好转。

整个说来，村庄和国家之间在分配权力和责任方面的相似之处是值得强调的。日本和俄国的村庄是作为集体作出决定的单位进行活动的，因此在许多方面是自治的。但是，在同财政权力、商业、维持地方秩序和传播知识有关的重要方面，外部的管理者可以进行干预，也的确进行了干预。在这种接触的效率方面，两国形成了某种对照：整个说来，日本的村庄和国家的关系是顺利的和连贯的，而在俄国，这种关系造成了某种冲突，有时候造成了脱节。

冲突的控制

根据上面对国家的权力范围进行的讨论，可以这样说，在日本和俄国，实际上不存在同西欧的罗马和德国法律传统中存在的概念相似的、针对民政机构的司法权的概念。在日本和俄国，管理各级事务的主要标准是习惯法而不是书面准则。官方的条例定期汇编成册，但是主要不是作为应用于一切行为的抽象办法，而是作为国家官员以个人色彩很浓的方式进行司法工作时的指导方针。同西欧的这两种主要法律传统（它们强调辩护和职业律师遵循法院的法律程序）相反，日本和俄国主要依靠已经发展起来的并由诉讼当事人自己进行解释的伦理"自然法"。在日本尤其是如此，因为在日本，正统的新儒教的道义基础妨碍着审判法的产生。但是俄国的情况亦是如

此，一直到十九世纪，那里没有什么真正的成文法或受过训练的律师。

在比较两国对冲突和越轨行为的控制方法时，有必要对村内的冲突和其他各种冲突加以区分，因为村庄的自治是政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日本和俄国主要是农业社会，所以大多数的冲突和暴力行动都是在村内发生的，整个说来，这种冲突是由村民自己解决的，而不诉诸外部的权力机构。象在所有现代以前的社会中一样，人们对全村的团结，对维护当地的一致意见是非常珍惜的，因此需要用调停的方法和通过第三者的仲裁来解决冲突。可能会给以严厉的惩罚，但是更经常采用的办法是不予合作，尤其是在劳工集约度高的日本种植大米的农村更是如此。

如果说日本和俄国在解决村庄的冲突方面有什么明显的差别的话，那大概就是俄国的农奴主和国家官员对这些问题进行个人干预，有时候是进行仲裁的权力比较大。除了在藩内由武士单独控制的一些地区以外，日本藩政府的最低一级机构会干预村内的争执，不过这种干预是极其勉强的，通常只限于干预严重的刑事案件。例如，日本的村庄保持着对罪犯处以流放重刑的权力，而在俄国，只有农奴主和国家官吏才能给以这种处罚。另一方面，德川幕府的官吏主要管村庄之间的争执，即个人色彩较少和比较重要的争执。

在村级以上，两国都明显地缺乏完整的司法机构，因为大多数判决都是通过行政机构，而不是通过独立的司法制度作出的。既然没有使受害方面得到赔偿的正常渠道，那么社会秩序为什么没有遭到破坏呢？对这个问题的部分回答在于两

国都十分强调集体负责制。在集体负责的情况下，旨在发现犯罪分子的机构在社会内所起的作用，不如集体单位的整个自我管理制度的作用大。这种依靠集体负责制的情况在日本最为明显，因为儒教和封建制度都强调特权、合作和忠诚，其作用是无需建立解决争执的复杂的机构。在俄国的大多数生活领域里，都建立了在长者的指导下互相进行监督的小集体，其作用同日本大体相同。

除了这些方法和习惯以外，两国的确还有高级司法机构，以解决贵族之间的争执。在日本，除了藩政府以外，还有上诉委员会（幕府称它为陈情委员会）。在俄国，社会的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法院，官吏由成员集会选举。两国都不使用陪审团。

毋庸说，两国的伦理和司法手段是不能解决本国所有的冲突的。例如，虽然武士要遵循高尚行为的准则，但也会发生族间仇杀这样的重大事件。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在两国的城市和农村都不时爆发过大规模的动乱，虽然这种起义的频繁程度是不同的。大多数这样的动乱是自发性的，原因是经济困难，如粮价高昂和赋税过重，同社团本身之间的冲突没有明显的关系。在俄国，没有什么农民叛乱是为了达到具体的政治目标的，但是比在日本更经常地可以看到一些更为广泛的目标，例如十八世纪由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叛乱就有这种更为广泛的目标。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当局和选民之间的关系经常恶化到发生暴力的程度，不管原因如何，仅仅这一事实就使那些谋求具体变革的人得到一件现成的、得心应手的武器。与此相反，在日本，唯一的一次有明确政治纲领的起义是1837年由以前的武士官吏大盐平八郎领导

的叛乱。虽然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的最后一个世纪内，有组织地表示不满的次数和规模都增加了，但是，同样真实而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德川幕府时代初期相当普遍的个人猛烈的暴力行动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秩序和组织，这使在德川幕府倒台前不久访问过日本的欧洲人感到惊讶。因此，休·米特福德在他的证词中指出："那个国家非常繁荣的景象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惊异……很难找到比他们更快乐的人民了。"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规模的持续的宗教暴力行动几乎已经消失了，日本最后一次大规模暴力行动是1637年到1638年发生的岛原起义（名义上是基督教徒进行的），俄国最后一次大规模暴力行动是十八世纪初的老教徒大屠杀。但是，在俄国，有些这一类的暴力行动却继续存在着，特别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对犹太人的屠杀。

国际比较

早就成功地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所有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许多世纪以来，它们在全国一级进行了有效的治理，这对它们开始搞现代化是一个有利条件。有一个能使全国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服从的政府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对于因变化迅速而造成的严重混乱中保持团结却是有重要的价值的。此外，复杂的政府机构所培育的习惯和方法可以随时为新的任务服务。因此，难怪每一个希望实行现代化的国家总是首先认真地注意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

在当代一百四十多个国家中，只有极少数国家在开始进行现代变革以前就有了这样的政府，日本和俄国是其中的两个。除了少数例外，这一类国家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其中最明显的是英国和法国。明显地例外的国家如土耳其、西班牙和中国，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在政府发展的重要方面都落在日本和俄国的后面。如果说德国在十九世纪以前缺乏一个有力的全国政府，它还是有许多通常属于全国政府的部分内容的因素——民族意识、有力而庞大的领导阶级、管理技巧——所以如有必要，可以很快形成一个全国政府。

日俄两国与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其他的陆地大帝国不同，它们很早就表现出了一种以单一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为基础的显著的民族特性。奥斯曼的军队和哈普斯堡的外交所取得的一切辉煌成就都不能把这些特性传给在它们统治下的人民，甚至不能传给在文化上和语言上仍然是世界的中心的首都。

日本和俄国的领导阶级在某些方面同西欧发展得比较早的国家的领导阶级是相似的。如果就能力而论，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上层人士可能比俄国的上层人士更接近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上层人士的话，那么他们都是以人数众多和强调取得的成绩而不光是强调继承的地位而著称的。在有一点上，日本和俄国的上层人士同西欧的上层人士是大不相同的。尽管日本的封建主义和西欧的封建主义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但是，日本的武士由于没有权利拥有可以从中获得独立的财富的地产，因此与西方贵族相比，是一个"政府化"程度大得多的阶级。俄国的贵族除了发挥地主的作用以外，同样是一个官吏阶级，他们和日本的武士一样，履行现代欧洲初期的律师所履

行的许多职能。但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的上层人士都强调为国家服务，而不是强调反对国家的权利，因此他们更象二十世纪政治革命产生的领导阶级，而不象西欧的封建贵族。

对于在一个包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社会的环境中谋求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需要比"早发达国家"有更大程度的民族团结和控制。这样的国家如果不想失掉经济独立，甚至政治独立的话，必须在各个方面高速前进，并且一定要能控制这种高速度带来的紧张局面。德国是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极权政策的帮助下才取得了必要的团结。但是，在今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里，具备了这些条件是否就够了，这也还是不清楚的。

在现代以前的时期结束之前很久，日本和俄国就已经形成了高度的政治团结和政府控制。它们的政府机构能够控制中层利益集团和中层统治机构的程度比实现现代化比较早的国家所能做到的程度大得多。虽然两国都仍然存在着封建特权和效忠，但是从这些权力源泉中得到好处的个人对国家政权的感恩程度比其他国家要大，比如 1789 年以前的法国和1832年以前的英国。同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以及奥斯曼帝国和哈普斯堡帝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不存在要加以克服的领地或部落的效忠问题(虽然随着俄国成为一个帝国，它不得不再次遇到地方上根深蒂固的效忠问题)。此外，到现代以前的时期的末期，日本和俄国都摆脱政教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曾经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全国政府遭到严重削弱。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两个国家内，没有那么严重的军政权力并存的现象，今天，在希腊、秘

鲁、埃及和加纳等国，事实已经证明这种现象是起严重的削弱作用的。

日俄两国政府对权力的垄断，比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政府要全面得多，因此即使在现代以前，也能有效地管理全国很大一部分产品。在日本和俄国，全国和地方政府的许多任务，在西欧和北美是自治的行会、市镇自治机关独立的商人的正常职能。因此，不管在对俄国报讽刺态度的人看来，俄国官僚机构的工作效率多么低，它的政府象日本的政府一样，取得了后来可以加以利用的宝贵的管理经验。以当代许多新成立的国家的情况来衡量，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和俄国，政府的某些职能确实是由一个早就成熟的管理网行使的，而远不是行使得不完善或不全面。

在西欧和北美，各个共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以及它们和政府之间的竞争，是造成摩擦和变化的根源，而在日本和俄国，这种现象远不是那么明显的。不存在非政府机构产生的摩擦对于日本和俄国的政治发展是否是一个起妨碍作用的因素呢？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的，但是，在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时还要作其他的考虑。首先，在十九世纪中叶，国际冲突对俄国造成的往往是建设性的压力，以及藩之间的争执对日本造成的这种压力，或许已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两国共同的利益集团之间没有发生尖锐冲突的情况。此外，由于两国没有很发达的中间团体，这就进一步迫使两国政府比其他大多数现代以前的社会更加一贯地积极推动发展和变化。在这方面，只需考虑一下中国政府或不久前的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政府的情况，就可以了解日本和俄国的制度中所固有的力量了。

因此，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兼有两种重要特征，我们认为，一种是西欧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特征；另一种是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内更经常地看到的特征。总起来说，同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相似之处，远远超过了同后来发展起来的国家的相似之处，但是日本和俄国内部的差别产生了各有特色的政治制度。同英国或法国相比，日本的政治生活（同德国的政治生活一样）在地方（藩）一级是比较发达的，而俄国的重心则比较牢固地在全国的首都。但是，象西欧国家一样，在俄国，特别是在日本，各级的政治生活彼此是比较适应的。这同那些摆脱了殖民地地位的国家形成了对照，在那些国家内，一个"欧洲式"的政府岌岌可危地凌驾于现有的乡村结构之上。俄国在彼得以后的年代里，这种适应性渐趋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以后的几个时期内，俄国的政治发展中外表象西欧模式的东西比日本少。

第四章　经济结构和经济的增长

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和俄国的人民大多是种庄稼的农民，没有什么资本设备和农业科学知识。在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迅速扩大的鸿沟使得日本和俄国的经济同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经济隔离了。然而，在发展市场和贸易网，实行生产专业化和在地区范围内扩大工业活动等方面，日本和俄国同别的现代以前的国家相比显然较为先进。日俄两国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最后几百年中，获得这些对一个现代以前的社会来说是相当先进的特征的。这两个国家是随着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逐渐上升，尤其突出的是通过提高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产量，但是也通过扩大其他农作物，通过生产供应市场的农村非农业的新产品和扩大城市就业机会具有这些特征的。我们在下面分别研究各个经济部门时，将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研究这些新格局是如何在这样一些国家出现的，到1870年，这些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估计只有英国产量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在开始阐述之前，有必要提一下这两个国家的某些主要不同点。首先，正如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日俄两国的自然特点的不同是造成两国在经济和政治上一些不同点的根本原因。居住在狭小岛国里的日本人有利用海洋的便利，长期以来，海洋是较廉价的运输和食物的天然提供者。此外，日本七

分之六的陆地面积是山地，因此，只有七分之一的土地是现成可以耕种和居住的土地。有利的土壤条件和气候以及靠近海岸线等因素都促使日本人精心使用这些少量的可耕地。

俄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它幅员辽阔。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它的人民和资源分布极广。但它无法利用沿海航运。尽管河流众多，但没有形成一个方便的天然运输网。结果，运输成了大难题——不但运输能力不足，而且运费又贵。由于土地多，劳力少，俄国就采用粗放的耕作方法，而且在农业资源方面，自然条件也很差。在北部年代较久的居民点，土地较为贫瘠，整个地区有许多地方布满了大块沼泽地。在南部新开发的定居区，虽然土地比北部肥沃得多，但由于俄国是大陆性气候，所以即使在这里，生长季节也很短。到处雨水不足。因而，农业生产率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

日本和俄国在经济上的第二个基本不同点是在生产单位的规模上。它们各自的生产单位的规模也互有差异（俄国比日本的差异更大），但是，日本的工农业生产单位一般说来规模较小。俄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庄园越来越大，使用农奴的人数常常达几百人，有时甚至达几千人。此外，到十九世纪，工厂的规模往往很大，尤其是雇佣分配来的农奴的工厂规模更大，其中有的工厂雇佣的工人达一千名以上。

日本和俄国的第三个不同点专门指1860年以前两国的经济与西欧初期的制造业和后来全面工业化的关系（参看第二章）。实际上，日本在这两个时期与西欧都无交往，另一方面，俄国在彼得一世的统治下，采用新的工厂组织和技术，并且继续发展制造业（速度时快时慢），一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

那十年里，俄国引进先进技术的规模达到了新高峰。到1860年，俄国已经在经过选择的一些部门发展了工业化生产。俄国人不仅积极与西欧进行外贸往来，而且其主要生产厂商还在观察和输入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方法，并与外国的科学团体保持联系。

增长结构

关于日本和俄国从十八世纪初叶到1860年经济总产量长期增长的情况，没有准确的数字可查。不过，可以作这样合理的设想：在这个时期，日本产量的年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一，而俄国的增长率略高于百分之一。不过，由于日本的人口大致是稳定的，而俄国的人口却增加得相当快，因此，很难看出哪个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增长得更快些。

尽管很难提供两国国民生产数量增加的确切估计数字，但是要叙述两国增长结构起作用的情况则并不难。它们增长率低（按照现代化社会的标准来衡量）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两国经济的所有部门——农业、工业、运输、服务业——都受到劳动密集型技术的束缚，这种技术限制了投入因素的单位产量迅速提高。此外，两国增长结构的要素又各不相同。

从内部来说，日本的幕府和藩的行政机关没有齐心协力地利用其财力来刺激经济的增长。德川幕府经济的主要收入是税收，这些税收相当于农民向将军和大名以及他们的家臣交付的产品价值的百分之三十或更多些，并主要用于城市消费。按现代标准来衡量，扣除当地必要的消费以后的这个盈余部分并没有用于扩大经济的生产能力；不仅没有用作私人

的或公共的投资，反而用来作为武士的消费，如同俄国用这些钱来供养领主一样。

德川时代应划分为两个大致相等的时期，在这两个时期盛行不同的增长结构。在第一个时期，经济中的盈余额的增长十分迅速，不仅满足了日益增长的人口更大的消费需要，而且还满足了仍在巩固其家臣在城市中心里的地位的那些统治者的越来越大的需要。在经济上确实存在越来越大的盈余额，其中大部分是以农民负担沉重赋税的方式被吮吸到城市里的。在德川时代的整个第二个时期，人口总数比较稳定，武士的城市人口和实际收入也比较稳定，这就意味着产量的增加部分主要归于直接生产者和商人。在第二个时期，盈余仍不断增加，这些盈余被重新用来进行私人投资和用作除武士以外的社会各阶层稍微提高了的消费。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俄国工业的增长结构却非常不同。在工业飞速增长之后，产量在长时间里增长得比较缓慢。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俄国政府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起了支配作用。这两个特点在现代时期和现代以前的时期都是存在的，不过要记住，在现代以前的时期，俄国工业在全国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同农业所占的份额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同商业相比也是不大的。为了说明这个总的格局，亚历山大·格申·克朗(Alexander Gershen Kron)提出了以下关于增长结构的假设，这个假设在俄国经济史的进程中的一些场合是值得注意的。

在以往的五百年中，俄国历史上占支配地位的主题是领土扩张，这与日本形成强烈的对照。在扩张的过程中，俄国政

府常常同比它先进和强大的西方国家进行交往和发生冲突。这些对抗迫使俄国领导人认识到，由于俄国经济落后，他们不可能达到目的。在这种形势下，俄国政府扮演了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的倡导者的角色。通过用强制手段和财政手段施加压力，俄国政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加速发展国内经济来支撑其对外政策的目标。这种推动力是造成俄国工业的发展时快时慢的原由：每当政府在军事上有迫切的需要时，就强制经济快速发展，因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在力量达到一定程度的均势时，就不那么需要进一步迅速增长了，政府的压力也就放松了。

在彼得一世时期，这种情形十分明显，他的经济政策同重商主义者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他关心交通运输手段，并着手建设一些运河和少数公路。他统一了度量衡制度，鼓励发展国内工业，引进外国技术和聘请外国专家，并给予专家们以高薪和优厚条件。但是也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彼得领导下的政府同西方或德川时代的日本相比，行使企业促进者的职能要多得多。工业的规模宏大，这表明政府的指挥能力很强。产量的构成反映了经济是按政府的要求发展的：（一）没有生产什么奢侈品；（二）大大发展制造重型武器的采矿和冶金工业；（三）增加用于纺织帆布和制作军服的亚麻和毛料的产量。因此，政府的行动偏重工业化而不强调商业化，这个早期的尝试为制定以后的政策树立了先例，而这种政策对现代化说来恰恰是十分重要的。

象在彼得一世时代所发生的雄心勃勃的对外政策同脆弱的经济之间的尖锐矛盾，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在克里米

亚战争中败北之前再也没有出现过。在这段时间里，俄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中等的，供应了正在迅速增加的人口的需求。随着人口的增加，俄国扩大了潜在的商品市场，并准许新并吞的人口稀少的领土实行殖民地化以促进地区分工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继续鼓励工厂的发展，农奴主象藩的行政长官一样，设法增加进益来支撑城市费用的不断增加。

农　业

到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和俄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产量很高，无疑，粮食是日本最重要的农作物。大米是日本最主要的粮食，一般种植在能灌溉的稻地里。日本的普通农民家庭只用手工农具和有机肥料（粪便和鱼干），耕种小块土地。农业技术虽然都是“传统技术”——即尚未受到现代科学和机器的影响——但并不原始。相当一部分农民是有文化的，其中有一些人能阅读广泛流传的有关农业管理的论著。此外，劳动密集型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包含几百年来所积累的知识。当然个人之间的差异确实存在。有些富裕农民拥有的土地超过一公顷，并不断增添雇工，不过这种农民人数并不多。日本的农民并不是农奴，虽然他们在迁移，转让土地，甚至在选择种什么农作物等方面都受到了一些限制。

俄国生产的粮食品种较多，包括产量颇大的裸麦、燕麦、小麦和大麦。许多粮食是由在领主土地上劳动的农奴生产的，形式是每周有三日或四日的强制劳动（徭役）。但大部分粮食则来自农奴用自己的时间所耕种的小块土地以及国家和皇室农民的小块土地。俄国农业的耕作方法比较原始：使用古老

的木犁等原始工具，很多村社实行利弊无定论的三圃制，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土地留作休耕地。此外，由于农村中实行平均主义原则，每户农民耕种的土地都是许多条地，分散在不同的地块和不同土质的地区，即使在同一地块，也是东一条西一条的。这种分地方式是土地生产率低的一个因素。凡是在农民改造了土地而不保证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的地方，定期重新分配土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役畜不足。但是即使如此，俄国使用役畜也比日本普遍。也不使用什么肥料，因为俄国农业的性质是大面积耕种。然而，这些相当原始的耕作方法并没有阻碍实现较高的总产量。贵族们之所以能够增加供应市场的农产品数量，主要是靠增加他们的领地和农奴人数。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农民的私人贸易也有了引人注目的增加，不过增加的幅度比日本要小。

尽管极少使用机械化农具和役畜，日本和俄国的粮食产量都很高——在日本，每公顷二点五吨（富饶的大阪一京都地区的产量比本洲北部平均高百分之五十）。这些产量与马来西亚、朝鲜和台湾1952—1963年的产量相差无几，大大超过目前菲律宾和印度的产量，但是却大大低于日本目前的产量水平，日本目前的产量达到了每公顷将近五吨。在德川时代末期，日本的农业是传统性的，劳动密集度高，按现代标准来衡量，达到的生产率水平是低的。然而，它既不是粗放的，也不是原始的，按亚洲标准来衡量，成绩是很大的。

1860年，俄国每公顷的粮食产量与人口密度较大的比利时、荷兰和英国相比还不到它们的一半。可是，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由于俄国的农业人口和播种面积大量增加（特别是在南

部的黑土地带），粮食总产量急剧上升。十九世纪中叶，由于百分之九十六的可耕地种植粮食和很大一部分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俄国生产的粮食，按人口总数平均计算，粮食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多，几乎为英国和荷兰的两倍。尽管这个数字是根据平均年产量计算的，而未考虑年产量的巨大波动和需要储存粮食以备歉收年份食用的问题，但它仍然表明，俄国同日本一样，按照他们普遍的生活标准来衡量，确实生产了足够的粮食来供养众多的农村人口，并且通过粮食不断从农村流入城市，供养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

日本的许多藩和俄国的许多地方政府生产的粮食，一般比它们的农村人口消耗的粮食至少多出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三十。那么这些可以销售的余粮到哪里去了呢？在日本，劳役一般是派得很少的，但是农民每年要向大名交收成税，贵族没有由他们直接耕种的领地，从这一点来说，日本的农民与解放后的西欧农奴差不多：他们的主要义务是财务上的。他们收获的大米大体上有三分之一要作为实物税交给藩政府，或者出售以便用现金交税。粮食市场相当大，因为作为实物税交纳的大量大米最终也进入藩范围内的市场或幕府的大城市里的市场，这是由于大名或武士要出售大米以换取现金。即使不把交纳的大米计算在内，进入市场贸易的农产品的比例仍很大：大米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蔬菜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经济作物占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地区差别尤其突出：在中央省份等地区，供应市场的农产品占很大比例，而在东北部等其它地区，城市的供应主要来自实物税。当然，假若把税收大米包括在内，日本的农产品就有很大的一部分（也许占一半）是通过

各种形式在市场上销售的。

在俄国，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有很大一部分也并非简单地是农民自愿交出的剩余产品。在俄国的许多地区，市场上销售的粮食有很大一部分是贵族地主提供的，为这些贵族地主服徭役的农奴少则十人，在少数情况下多达几万人。随着包括农民交纳的年度税（代役租）和贵族上交的人头税在内的化费不断增加，于是就需要向市场出售更多的产品，以便取得必要的现款。由于较富裕的农民越来越多地从事商品农业，以及人们在大城市附近经营菜园和从事经济作物的生产（尤其是用作纺织原料的经济作物），于是进入市场的农产品就进一步增加了。

简言之，在日本和俄国，关于农业生产和分配的决定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贵族阶层，他们有征收各项赋税，领取俸禄，收入地租和征用劳役的世袭权利；另一方面是农奴，他们在履行各种义务后还有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由于在农业生产和分配方面实行这两种制度，当地消费的粮食数量就大大减少了。在俄国，拿到市场上去卖的农产品也许要少些，不过其数量还是很可观的。

在日本和俄国的农业生产中，专门的经济作物的重要性仅次于粮食，在现代以前的最后一个世纪中，经济作物的产量增加得比粮食快。日本把新区改种棉花等作物，俄国把新区改种亚麻和大麻等作物。亚麻和大麻既是纺织品的原料，又是油脂（籽油）的来源，并且是俄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亚麻和大麻的出口值大于粮食的出口值。但是，在取消对粮食的出口限制和在卡塞琳女皇统治时期取得

了黑海港口之后，粮食出口额迅速增长，尤其是在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之后，粮食成了俄国的主要出口货物。从1856年到1860年，粮食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当然，日本没有仿效俄国为了向国外市场出口面扩大农作物的生产，因为日本的港口已经不对商务开放了。

俄国农业歉收的次数比日本多，十九世纪上半世纪，每十年就要发生一次严重歉收和两次部分歉收。从1700年到1868年，日本发生了三次长期的饥荒，但是由于普及优越的运输条件，改进生产技术（包括扩大二熟制）和发展农艺学，严重的歉收威胁减轻了。

工　业

现代以前的日本和俄国的工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在这两个国家如同在其他较城市化的现代以前的社会一样，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占支配地位。根据现有的数字（是稍微晚一点的几个时期的数字，但可能也是说明1860年情况的好材料），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占日本工业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占俄国工业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采矿业和冶金业在日本占比较次要的地位，虽然在1853年之后，它们确实有所发展。然而，这些部门在俄国的工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860年，它们的劳动力占工厂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在1887年它们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

在日本，典型的企业是小企业，不使用什么雇佣劳动力和机器，在形式上往往相当于农村的副业。只有少数以水力为动力的机器，蒸气动力还没有传入。佩里抵达之后，幕府和某些

大名曾经开办了一些“西方”企业，包括丝织厂和棉纺厂、军火工厂、造船厂和矿山。但是，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这些新办的企业还没有来得及巩固。

虽然俄国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实行“分料到户”制较为普遍，但到1860年，工业生产的工厂形式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十八世纪，俄国一些工厂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虽然在1800年兴建工厂的新浪潮以前，生产单位的平均规模一直很小。十九世纪中叶，纺织业一般水平的工厂雇佣一百二十五名工人，棉纺业和毛纺业百分之五到十的工厂雇佣五百名工人。到1866年，俄国有四十二家工厂雇佣的工人在一千名以上——其中光是棉纺业就占二十六家。

在1861年之前，俄国工厂的工人或者是被指派来工厂工作的农奴，或者是仍向其领主交纳代役租的自由雇工，或是自由工人。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部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力是被指派来的农奴，而且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他们在纺织业、甜菜制糖业、采矿业和冶金业一直占重要地位。不过，雇佣工人增加得比较快，到1860年，他们已占产业工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在棉纺业等某些工业部门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方面，俄国在现代以前的时期的末期大大超过日本。实际上，俄国的棉纺业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引进现代精纺机之后，已经可以同主要工业国家的棉纺业相比美了。不过，除了棉纺业和甜菜制糖业之外，俄国工厂在使用机械动力方面进展缓慢。到1860年，俄国工业的一般技术水平并非十分先进，虽则在发展的某些方面，技术提高得很快。

彼得一世制定的俄国工业化规划很强调采矿业和冶金业。到了十八世纪中叶，乌拉尔地区成了世界上金属主要产地之一。1800年，俄国铁的产量占世界首位，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俄国成了铁的主要出口国。但是，俄国没有跟上冶金业技术的发展，因此，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它的铁的产量降至第八位。俄国铁的产量增加了，但别国的产量增加得更快，到了1860年，英国铁的产量为俄国的十倍。

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冲击俄国金属工业的相对的停滞状态，对其他工厂工业的影响并没有那么严重。这个时期工业的突出成就是棉纺生产的发展和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设备。到1860年，棉纺厂达到一千二百家，雇用工人十五万以上。此外，从1842年到1860年，俄国大型机械化棉纺厂猛增了两倍，从不到二十家增加到近六十家，在城市或郊区雇用了四万多名工人。圣彼得堡的涅瓦工厂有一个时期有十六万支纱锭，而当时美国最大的工厂只有不到三万支纱锭。俄国还有庞大的毛纺业与亚麻和大麻纺织业，不过在1860年，它们在技术上远不如棉纺工业先进。1860年，俄国的甜菜制糖业是仅次于棉纺业的少数现代工业部门之一。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使用外国制造的现代化机器的大型甜菜制糖厂开始在大领主的庄园（主要在乌克兰）里建立起来了。这个工业部门提供了一个实例，说明由拥有土地的贵族变来的企业家利用指派来的农奴能够发展机械化的现代工业。虽然俄国的机器制造业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才开始建立的，但是到1860年，俄国生产的机器就与进口的机器一样多了。不过，俄国主要的机器制造厂大部分是外国人创办和所有的。

日本并没有因早期同首批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进行接触而在技术上有这样的发展。但即使这样，到了十九世纪，日本大多数乡村已从事某种工业——手工业活动了，而在城镇，工业生产已专业化了。制造丝织品和棉织品，包括供武士和富商穿的精美织品的工业高度发达。金属制品和陶器，包括精制的金属器皿和瓷器的生产很发达。如同在俄国一样，日本农业的手工工业，包括在本地销售的普通物品和供应远方城市市场的特殊产品，有了很大的发展。明治维新之前不久，日本引进了一些西洋式的工业设备，包括几项铸铁设备和炼铁高炉。到这时，现代工厂才首次出现。对于两国工业部门的不同点，应该根据这样的背景来考虑：即使在俄国，从事非机械化手工业的人要比在新型的现代企业里工作的人多得多；俄国手工业生产总值很可能超过其工厂的产值。

在日本和俄国，工业活动都极为分散。比如，大多数地区都生产布匹和含有酒精的饮料。一些专业化工业区的出现是因为生产所需的某些原料只有在某个地区才有或不易运输，例如俄国的采矿和冶金工业就在乌拉尔地区。这些专业化工业区还出现在大城市附近，便于满足大量需要，比如，东京平原的纺织品生产区和靠近莫斯科的北方中央工业地区。小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在两国农村到处可见，这表明它们在地理上分得很散。

两国的企业家一般都是商人。不过，日本甚至在明治维新之前，有些进步的藩主就提倡兴办垄断企业和新的制造厂，这些企业为培育有干劲的年青武士的企业管理才能提供了场所。在俄国，除商人以外，还有几部分人也进行企业活动，这些

人包括政府官员、贵族、外国人、有时还有农奴，特别重要的是还包括宗教少数派的教徒——分裂派教徒、犹太教教徒和阉割派教徒。俄国人民表现其较大的异质性的方式之一，就是进行企业活动。

其他部门

日本和俄国的人口中有许多人用部分时间或临时从事商业、建筑业和运输业，有些城市人口则固定从事这些行业。还有城市小商贩，赶定期集市的流动商人、小铺经营者和长途贩运大宗货物的资力雄厚的商人。两国商人和手工业者有代表性的经营方式是小型家庭企业。

日本的分配系统的最上层是大阪的商业金融家，他们收购税收大米和发放贷款给大名。其中有些人积累了巨额财富，但是由于他们同藩的贵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旦某一个大名碰到严重的财政困难，他们的财富也可能化为乌有（这是经常发生的）。在德川时代末期，批发商（问屋）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他们专门经营日本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日益兴旺的贸易，同样重要的是那些利用日益商业化的农业的本地商人。这两类商人在明治维新后继续存在，景况也比大阪的金融家要好，后者大多数跟着他们的主子一起消亡了。

俄国的富商往往专门经营外贸及向彼得堡和莫斯科供应商品。这些商人或他们的代表整年跑大型区际交易会，交易会为期两周或更长些，商品的成交额居全国之首。人们常说，以举办交易会作为进行贸易的手段，其成效即使在现代以前的社会也是不高的，但它们继续使俄罗斯帝国的贸易量得到增

长，因为在十八与十九世纪，商业普遍得到迅速发展。在其他方面，商业的经营同对一个较先进的现代以前的社会通常所抱的期望更加一致起来了。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在大城市里，商品交易会的重要性降低了；各种店铺取代了定期集市而成为城市交易中心；到了十九世纪初，全国许多地区的农村定期集市的数目逐步减少。

与日本不同，俄国在现代以前的时期是国际贸易的参加者，虽然这种贸易所起的作用远不如国内商业重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的对外贸易只占世界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五，然而在全世界进行对外贸易的国家中，俄国却排在第六位。

俄国的输出几乎总是超过输入的。它出口粮食和棉制品，主要是出口原料，进口原棉、食品和奢侈品。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茶叶的进口值为机器进口值的七倍。由于对外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俄国从对外贸易中得到的利益大为减少。在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几乎没有商船队。外国人既控制了船舶，又掌握了出入俄国主要港口，包括圣彼得堡、里加和敖德萨的贸易。

按照十九世纪的标准来衡量，日本的产品和人民都迅速向前发展了。日本人并不举办大规模的商品交易会，却卓有成效地发展了国内商业。对于运输来说，日本狭长的陆地周围漫长的海岸线，比从江户向四面八方伸展的主要陆路干线更为重要。俄国必须依靠又慢又贵的陆上运输，这是由于国家幅员辽阔造成的。虽然冬季可以用雪橇在雪上和冰上输送大量货物，而且运费略低，但是同日本方便的水上运输相比雪橇还是不行。

从十八世纪初叶起，俄国的运输系统实现了一些令人注目的改进。由于国家修建了一些连接几条主要河流的运河，并在以后进口了轮船，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河道网的用途，但在现代以前的时期，俄国河流和运河上主要的动力来源仍旧是牲口和人力。十九世纪初，还进行了一些试验，比如修建现代化公路，特别是连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两大都市的公路。不过，只有铁路才能以合理的运费，在合理的时间内长途运输大量的工业品和原料，可是政府在建筑铁路方面行动迟缓。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沙皇亲自坚持下才修建了圣彼得堡—莫斯科铁路，这条铁路是在一个名叫惠斯勒的美国工程师的监督下建成的。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俄国只有六百英里铁路线，比工业化国家要少得多，而且远远满足不了俄国本身的巨大需要。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铁路，国家无法把供应品运送给驻在克里米亚的军队，这就使俄国政府清楚地了解到现代运输网的重要性。

两国经济结构中必须注意的最后一个部门是货币。在这个时期，日本也好，俄国也好，都没有一个与现代银行系统相仿的金融机构。尽管如此，货币的使用范围还是大大扩大了。随着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典当铺老板和放债者多起来了，在日本，货币兑换商也多起来了，因为在日本流通的各种纸币达一千六百种之多。这些人专门发放高利消费贷款，在日本，他们向大名和武士提供短期商业贷款。俄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虽然没有真正的私人银行，但是早些时候已经开办了少数金融商号（例如，“俄国的罗斯蔡尔德”斯蒂格里兹商号），它们参加了一些工业企业筹集资金的活动。国家还创办了几家所

谓商业银行，但是，它们经营的业务更多的是作为储蓄和抵押银行以及国家财务的代理银行，而不是作为向工业和商业贷款的机构。

现代以前的日本或俄国都未利用有限公司的方法来筹集投资的资本，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才结束。1830年以后，为在俄国开办新公司筹集款项较为常见，从1835年到1860年建立了约二百家新的股份公司。1830年以后，圣彼得堡股票交易所开始经营政府证券和私人公司股票的业务。

国际比较

从现代经济未来增长的观点来看，同别的现代以前的国家相比，两国经济的某些方面是特别合适的。其一，关于日本，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国家的控制全面放松了。从理论上说，中央集权的德川封建政权在经济方面的限制是很严格的：各级都要执行许多命令，其经济政策的目的经常被认为是重商主义的。但实际上，随着德川时代一年一年过去，政府的控制不是那么严格了；人民迁移比较容易了；商人获得了较多的权力；各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自主权比较大了。所有这些都是很有希望的迹象，同幕府的经济地位下降有关。将军们（和许多大名）的开支日益增加，但税收的基础却没有相应的扩大。所以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给予稍微多一点的经济自由。

在俄国，国家的控制也有些放松。对买卖土地和对农民企业家的限制减少了，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权利扩大了。在帝国的少数地区，农奴得到了解放，更重要的是，许多农奴由服徭役转为交付代役租。贵族们发现对工业投资比较容易了。不

过，国家的管制以及往往是无限制的中央集权和贪污腐败现象所起的阻碍作用依然十分普遍。甚至还不断企图扩大它，特别是为了支持日益增加的军事预算。也许由于下降的是贵族们的经济地位而不是沙皇政府的经济地位，所以俄国政府放松控制不是那么明显。

其二，在这个时期的最后一个世纪，日俄两国农业产量的提高可能比较迅速。在日本，增产是传统技术得到改进的结果，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农业的剩余额。在俄国，农业产量的提高是由于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应用现有的耕作方法。农业增产促进了农产品出口的不断增加，也满足了比过去大得多的国内需要。

其三，在日俄两国大部分地区的城市和农村中，小规模的工业或手工业分布极广。这种分布状况同欧洲取消对手工业行会的限制与家庭手工业和"分料到户"制兴起时的情况很相似。别的现代以前的社会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农业产量不高，它们也没有需要进行长途商业活动的、分布很广的手工业生产。最早实现现代化的西欧国家曾经具有这些特点，虽则与此同时它们的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比较松。这些状况自然有利于欧洲较早实现现代化。

到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在中国某些先进省份的农村，手工业生产已经实行一定程度的专业化了，其他国家到后来才发生类似的变化。但是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中国没有象日本和俄国那样在质量上掀起发展工业的新高潮。此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人口增加的速

度至少同粮食产量提高的速度一样快。中国的领导人即使并未有力地维护国家对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控制，却可以没收得不到政府有关部门保护的财富。但是他们无法做到大大增加流入城市的财富的数量。作为在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进行现代化变革的后进国家，中国提供了一个大不相同的实例。虽然中国有庞大的国内贸易网，但是它却没有剩余农产品这样的财富，也无日本和俄国所有的分布很广的手工业生产。

最后一点意见：在变革时期的前夕，日本和俄国面临着类似的体制问题。日本在取消封建等级制和武士俸禄制之后以及俄国在废除农奴制之后，两国都需要保持不在当地消耗掉的大量剩余农产品。它们还需要将这些剩余农产品或由这些农产品换取的大笔收益作为投资之用。虽然增长缓慢，但武士的俸禄和农奴制是早期的增长结构的一部分。现在它们却成了现代经济增长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但是它们与在大多数现代以前的社会中存在的障碍不同，这些障碍可以用选在上层人物反抗能力最弱的时候迅速进行行政改革的方法来消除，这些上层人物长期习惯于奢侈的城市消费，长期依赖高度发展的市场规律。

第五章　社会的相互依赖

从1600年到1850年，日本和俄国在资源的增长和运用方面都达到了异常高的水平。人口数和货物量增加了，其流通程度也是空前的。到了1850年，农村和城市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人数激增。人数众多的有文化的上层人士已经习惯于担任行政管理工作。农民参加的活动愈来愈广泛，所以他们对与自己的家乡相距遥远的地区也有了了解。到处是规模更大的市场和城镇，并逐步连结成为日益扩展的商业和行政中心网。货物从农村运往附近的定期集市和交易会，然后再运往大小城镇。没有什么现代以前的社会能夸口拥有象日本的江户、大阪和京都或俄国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那样的大城市。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率上升了，表面上排外的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流动愈来愈频繁了。到1850年，日本和俄国的社会，不仅与其过去有显著的不同，而且与别的现代以前的社会也有显著的不同。

日俄两国在现代以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呢？到十九世纪初叶，它们在哪些重要方面是彼此相似的呢？在这几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各自的内部又有哪些连续性的因素呢？是否能从社会相互依赖的形式看出两国的基本相似点呢？这些相似点可能把日本和俄国与别的现代以前的社会区别开来，最终可能对变革时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人力资源

在人口和技能方面，日本和俄国也发生了类似的引人注目的变化。就象城市发展的情况一样，日本进入人口突然加速增长的时期比俄国早约一百年。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增长，日本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约三千万人。与此同时，俄国的人口总数也开始增加，其速度甚至比日本更快，到十八世纪快要结束时，已达到三千万人的水平。这时，两国的人口大致相等，各占世界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两国庞大的人口已经日益分化，其程度在现代以前的社会是罕见的：农民有了新的机会，可以靠手艺，做买卖和出卖劳动力获得非农业收入；商人和手工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增加；担任公务的贵族愈来愈官僚化。越来越高的识字率促使全国上下都认识到，只有提高技能，才能改善生活条件，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才有可能实现。

在其他方面，两国人口的发展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人数增加，一种是技能提高。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最后一个半世纪里，日本的人口总数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而俄国的人口则不断增加，其部分原因是俄国扩张了它的领土。然而，文化在日本全国的传播比在俄国快得多。从在广大人民中间传播技能这个角度来衡量，日本的资源更多地集中在提高人口的质量上，但这并非靠运用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而是由各种环境结合起来促成的。因此，在现代以前，俄国的发展可说是数量上的，而日本则是质量上的，虽然两国在

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从人口增长的情况可以看出，日本和俄国发展人力资源的时间是不同的。两国的人口不断增加，偶而剧增。在某几个世纪里，人口总数增加百分之五十或更多些；而在另几个世纪里则又出现相对的间歇期，这时的人口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二十。然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大约一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除了最后七十五年以外，日本的人口一直比俄国多。直到十八世纪，俄国的人口大约只有日本三千万人口的一半。此后，由于日本的人口几乎保持不变，俄国就走到前面去了，到1800年就拥有三千九百万人口，从此差距不断扩大。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罗斯帝国有六千万到七千万居民，比日本的人口多一倍。

对现代以前人口增长的原因和后果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促使人口增长的一个明显的因素是可利用的土地多。到1700年，当日本人对其主要岛屿上的几乎所有可耕地进行精耕细作时，俄国人正被迁移到居民稀少的地区里去。此外，俄国开垦边远地区的工作继续进行，俄罗斯帝国还由于得到已有人定居的地区而获得好处。然而，俄国虽然在其人口引人注目地增加的过程中扩张了大片领土，但它增加的人口大部分不能归因于吞并。也不能说大部分是在新扩张的领土上增加的。从表5.1中可以看出，俄国版图内的人数，从1719年第一次统计时到1857年第十次统计时猛增了两倍。甚至在俄国的中部，各个地区的人口最少增加百分之六十，最多增加百分之三百以上。

表 5.1　日本和俄国现代以前的人口

	1600	1700		1800	（以百万为单位）	
日　本	18	25	30	30	31	32
俄罗斯帝国	11	15	18	39	52	59
1719年俄国的领土		15	18	28	40	46

通过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行政改革（其中部分是由德川家康在1600年前后和由彼得一世在 1700 年前后开始进行的）取得国家一体化的新水平，无疑对人口的突然猛增起了作用。但是，后来两国的增长率为什么不一样呢？这也必须加以说明。看来与别的现代以前的社会相比，在德川时代的后半期，日本实行空前规模的人口控制。由于地区的差别，很难作概括性的叙述。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说日本人倾向于愿意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储蓄率。然而，俄国人则不那么实行人口控制，也许他们有办法养活较多的子女。由于农业增产（主要是通过扩大耕地面积），俄国人口的增长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

人口总数当然不足以衡量人力资源是否雄厚。一批毫无文化而又没有什么技能的人，是比不上一批数目相等但有各种各样专家的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技能的分布状况和社会集团的组成情况与人口数字一样说明问题。因此，在以下的探讨中，将考察各社会阶级中人口分布情况的变化以及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控制人口日益专业化的途径。

处于两国社会等级最高层的是担任公务的贵族，这里所指的是俄国的贵族和日本的武士。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曾

经相当自由地对本地区进行统治的一小批贵族（俄国的领主和日本的朝臣）被人数远为众多的、较少独立性的贵族和武士集团所取代，这些集团的一部分报酬是根据他们所作出的贡献获得的。作为高级军官和熟练的行政长官，这些新的集团成了政府增强对其他社会阶级成员的控制的中坚力量，也是实行这种控制的主要受益者。这些担任公务的贵族享受各种特权，在俄国，他们可以拥有农奴和庄园，在日本，他们领取固定的俸禄，此外，他们个人免税，被免去各种义务和不受体罚，因此他们积累了巨额财富，虽则他们中间财富的分配是很不均匀的。

俄国贵族的生活方式同大多数其他俄国人是很不相同的。许多贵族穿西欧时装，有的甚至经常用法语交谈。别的阶级没有什么人想模仿他们，也模仿不起。日本的武士也比其他日本人有较高的地位，一般说也有更多的财富。但同俄国的贵族不同的是，要求日本武士官吏遵守的行为准则，逐渐渗入到其它阶级的人的观念中去了。即使那些不必遵守这些准则的人，也表示钦佩和尊重武士的行为准则并视之为半乌托邦的理想。

由于日本上层人士的人数较多，所以以生活方式的渗透程度来衡量，日本各阶级之间的差距比较小。在十八世纪头三十多年里，日本可以恰当地称为担任公务的贵族家庭的成员比俄国几乎高出二十五倍(二百万对八万)。虽然上层人士的这个比例后来下降了，但是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二的俄国的上层人士，包括西部新吞并土地上人数多得不相称的大批贵族在内，从来没有达到日本的接近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到七的担

任公务的贵族人数。日本有人数可观的上层人士脱离了农村，变成了一支城市行政力量被熟练地加以利用，但他们失去了独立的收入来源。所有这些趋势在俄国也显而易见，但在形式上不是那么强烈。有些趋势被一些法令冲淡或倒转了，例如1762年颁布的法令免去了贵族担任公务的义务，因此反而鼓励贵族留居在他们本地的庄园里。两国更加依赖担任公务的贵族，在这方面是相似的。但是在上层人士的人数、他们作为其他阶级的表率的能力，以及在确定和履行上层人士的职责的方法等方面，两国则是不同的。

日俄两国均有两个人数不多，但正在成长的社会阶级，即商人和手工业工人。到了1800年，这两个阶级除了专业人员之外，还增加了大批兼职的和临时的成员，他们仍被官方登记为农民。经营商务的著名集团受到严格的管理。它们极少反抗准许其垄断某些产品和贸易领域的政府当局。被排除在垄断集团之外的人经营的规模一般较小，但是某些集团有时成功地扩大了经营规模，以致于对指导商业的规章制度提出异议，甚至促使这些规章制度改变。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农民受到的约束更多，他们被限制在获得垄断权的正式协会之外。

在积极经商的人口迅速增加和对他们实行严格的管理这两个方面，日本和俄国是相似的。一度依附于某一贵族家族的两国手工业工人和商人，逐渐变得直接按政府官员的要求行事了。在日本，按儒家的标准来衡量，政府与商人（商人在被认为是理想的社会阶级的等级制中被排在末位）接触是很快就会腐败的，阶级地位被隔绝的商人却获得了独立经营的某些关键性的有利条件。俄国继续实行集中管理，没有以同

样的规模把手工业工人和商人动员起来为国家的目的服务，相反国家可能对他们进行了有害的干涉。到十九世纪，两国日益发展的小规模商业大部分逃避了政府的管制。不过，政府对集中在城市里的商人和手工业工人仍然进行控制。

俄国政府对商业人口的直接影响受到三个方面的限制：一是没有要求富裕商人持久地承担义务（日本对商人也如此）；相反，有的商人为自己或子女找到了获得贵族的生活方式和头衔的机会；二是在俄国大城市中从事非农业活动的许多人是农奴和国家农民，他们的主人允许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在城市里挣钱，但要分享他们的一部分收益。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不是作为农民而是作为商人和手工业工人在莫斯科正式登记的人所占的比例才从以前的百分之十二的水准上升到接近于百分之三十；三是隶属于农奴主的俄国专职手工业工人到十九世纪仍然没有移居。虽然日本的商人和手工业工人在总人口中占较大的比重，但是日本的官员对他们依然保持比较牢固的直接控制。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几百年中，和其它阶级一样，农民中经商的人越来越多，职业专业化越来越强，这种现象在日本和俄国也是很明显的。俄国强制实行农奴制，日本划分明确的界限把各个阶级分隔开，这些都阻止不了农村中继续实行分工，也阻止不了富裕的和有进取心的农民获得新机会。不仅在农村以外受雇于运输部门和城市商业部门的机会越来越多，而且甚至在村子里，专门往遥远的市场贩运货物的人也增多了。在这两个国家，动员担任公务的贵族的新形式和逐步扩大的商业交往不仅使政府仍然可以对农民保持严密的控

制，而且可以使推动农民继续前进的理由更充分。

日本通过藩的行政官员，比俄国更注意对地方实行公正的控制，这大概是日本较少发生剧烈冲突的原因。俄国的贵族保持着相当大的特权，可以对农奴作出武断的决定，甚至达到了这样的极端：拆散农奴的家庭或将农奴送往监狱。尽管有些困难，日本的农民可以迁往城市而不需要持有规定在农村以外的地方逗留的期限的证件。他们还能够控制自己耕种的土地和耕种土地所花费的时间，不受应征入伍二十五年这种可怕的命运的威胁。所有这些因素似乎都更有力地推动农民去改善其条件。

在上面对社会阶梯的描述中，没有谈到约占日本人口百分之一点五的贱民，也没有谈到人数多得多的、大多数在地理上是自治的俄国少数民族。这几部分人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虽然俄国某些少数民族，象日本的贱民一样，也无法进入上层社会。分散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少数贱民对维持秩序并未造成严重的威胁，但是人数众多的非斯拉夫少数民族却不断地对俄国当局造成问题；俄国当局担心非斯拉夫人有与邻国结成联盟的危险，还担心再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有时，为了强求较大程度的同一性，他们要求皈依宗教和实行俄罗斯化。这些计划自然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形成显明对照的是，日本虽然被分割成许多藩，却保持了极大的同一性。

从理论上说，在这些实际上是闭关自守的社会中，在担任公务的贵族的指导下，农民不到处流动，又允许受管制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存在，这些本来都为生产的逐步扩大提供稳定的基础。但是实际上，日本达到的较大程度的稳定，其基础是上

层人士较多，手工业者和商人较多，村民有较大的自由，没有讨厌的少数民族。而人口和定居地区迅速扩大的俄国，却处于阶级关系比较动荡不定的局面。农民起义比较激烈，贵族之间和宫廷中的斗争使他们不能共同努力来解决地方上和地区性的问题。

由于职业训练大多数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所以日本广泛实行的长子继承权和值得称赞的养子制度意味着，某一职业的继承人对未来的任务较为熟悉。虽则缺乏足够的证据，但是日本城市里的官吏、商人和手工业工人可能比他们的俄国同行更胜任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较长的城市经历，有更多机会向模范学习。同样，在向农村地区传播技能和知识方面，日本也走在前面。总之，俄国只有极少数幸运儿才能从接触外来的知识中得到好处，而在日本，较多的基本技能和知识进一步深入民间。尽管有这些差别，但是两国都不断地提高人民的才能，使他们能更好地进行技术改造，在这方面，两国基本上是相类似的。

各社会阶级的成员不仅获得了较多的技能和知识，而且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虽则在十九世纪，这种长期的趋势在俄国可能中断了一个时期。当然，如同在别的现代以前的社会一样，可能是由于管理失当更加剧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荒。日本在1732—1733年、1783—1787年和1830—1834年先后发生过三次饥荒。不过，减轻饥荒的严重程度和减少饥荒的次数的办法是很多的。虽则大多数人依然居住在木制小屋里，主要靠五谷杂粮糊口，但两国都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习惯于居住在有数间房间的住宅和吃多样化的食品。对有些人

说来，激增的赋税使他们感到困难重重，但并没有影响大多数人改善生活条件。

通过对比1600年与1850年的状况可以看出日本和俄罗斯帝国人力资源的增长情况。在这个时期，与工业革命也没有发生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缺乏日本和俄国的那种劲头。甚至连中国在其他方面也不是那么生气勃勃，虽然它的人口有很大的增长。1600年，日本和俄国的人口加在一起总共只有三千万人左右，到了1850年，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1600年，两国农村的商人和手工业工人很少，担任公务的贵族刚刚露头，农民没有什么机会获得新的技能。到了1850年，全国到处都是商人和手工业工人，还出现了人数众多的专门从事行政工作的贵族，农民的水平也提高了，他们也象城市居民那样消费。在这二百五十年里，日本人口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七十五，并且他们的技能和知识大大地提高了。俄国的人口猛增了百分之五百多，部分原因是领土扩大了，并且它还学得了比较先进人民的特点，虽然这些特点并没有那么深入地渗到广大群众中去。按照现代以前的社会的标准来衡量，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和俄国的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技能都比较高。

这些相同点虽然重要，但必须记住，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一百五十年中，日本总人口和上层人士的人数实际上没有增加，而在同一时期，俄国相应的人数却不断增加。事实上，日本在进入十八世纪时遥遥领先；它的识字率不断提高，这表明日本在人口素质方面继续走在前头。虽然俄国人口增长迅速，但担任公务的贵族所占的比例从未象日本那样高。

居住方式

研究居住方式是确定上述人力资源对比的意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在日本和俄国，农村和城市是界线分明的，全体人口中有两三个突出的中心城市，它们是引人注目的消费中心。到了十八世纪末，两国都有几百个人口在三千人以上的城市，这些城市大部分被定为行政中心。在定居等级的最下层是中心村，那里住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不过，这些相似点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日本由于水路运输较方便，城市

表 5.2 1800年世界城市人口估计数

地区	总人口（以百万为单位）	城市人口①（以百万为单位）	城市人口（%）
欧洲（不包括俄罗斯帝国）	160	(20)	12—14
（英国和法国）②	(35)	(7)	(20)
北美洲和南美洲	31	(2)	5—8
非洲	107	(3)	2—4
俄罗斯帝国	39	3	8—9
日本	30	5	16—17
中国	300	18	6—7
亚洲（不包括日本和中国）	310	(12)	3—5
总计	950—1,000	60—66	6—7

① 城市人口的定义：每天或定期举行集市贸易的、人口在三千人以上的定居地的居民人数，加上人数少于三千人的、举行不定期的集市贸易，或者是行政中心，或者既举行不定期集市贸易又是行政中心的定居地的一半居民。

② 英国的城市人口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这个数字反映了1750年以后开始实现现代化时城市居民迅速增加。1789年法国的城市人口仍大大低于百分之二十，但到了1800年，城市人口也开始剧增。将这两个国家单独列出是因为它们在1800年之前已开始改革城市了。

人口比俄国约多一倍。在表 5.2 中可以看到，1800 年两国的城市人口超过世界的平均数，而日本又大大领先于俄国，城市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程度比俄国大得多。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日本和俄国进行了行政改革，乡村组织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对土地进行了仔细的测量，并且从乡村迁走了几乎所有具备独立权力来源的人（指武士），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容易开辟的土地税的来源。结果由于劳力脱离了家族关系和假家族关系，耕作的效率提高了，农村劳力转而搞副业生产。俄国的乡村成熟得较晚，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在1724年实行以村为单位向每个成年人征收划一的人头税；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十八世纪日益看重加强集体负责的地方行政管理。到了十八世纪中叶，俄国的村社实行定期平均分配土地，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挖掘潜力来应付不断加重的赋税义务。日本有时也采取这个做法，甚至有些从外地赚取现金的人也必须按规定的数额向村里交钱，并且依然受到乡村当局的监督。

除了乡村组织的这些变化之外，由于政府的规划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农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俄国的村庄通常规模较小和较分散，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到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有二十多万个村庄，但农村人口仅仅比日本六万五千个村庄的人口多一倍。由于执行了异常明确的计划，两国的村庄单位得到了加强。乡村当局将摊派到的交税额分配到各居民户。虽然由于地方上存在着农奴主，对俄国的乡村实行严格的行政管理所需的时间要长些，但是由于按农户的大小重新

分配土地的做法得到普及，俄国对整个乡村的控制要比日本严得多。

必须记住，俄国加强农奴制和开始实行重新分配村庄土地，就象日本把上层人士迁出农村地区和确保全村共同向贵族地主负责一样，都是现代以前先进的社会为继续发展农业商业化所采取的步骤。它们是进一步商业化的反应，同时又是促进商业化的因素。尽管控制乡村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日俄两国的农民有许多机会和刺激因素来增加他们的收入。乡村合并成小行政系统是以本地区商业一体化为前提的。日本和俄国在建立组织严密的村庄单位(在这些单位里，大多数人受到控制，纳税，并为共同利益而合作)方面获得的成功，证明了一种稳定的制度所取得的成就，在这种制度下，村庄有相当大的自治权，但这种自治权是受到精心限制的。

日本的三大中心城市和俄国的两个都城与不显眼的农村的居住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京都和莫斯科作为有十万或十万以上居民的大城市在好几个世纪里都是首屈一指的。不过，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中心城市的人口突然猛增，这标志着日本和俄国与过去彻底决裂了。江户、大阪和京都的人口加起来总共达到了将近一百八十万人。光是江户也许就和北京一样，成了世界上有一百万居民的两大城市之一。到1800年，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发展到约有五十万人，并继续增长，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加起来达到了约一百万人。俄国建立庞大的全国行政中心较为缓慢，在宫廷迁往圣彼得堡之后，这个新规划的城市在十八世纪增加了军政机构，人口逐步超过了莫斯科。在日本，居住在中心城市的城市居民所占的比例较大。尽管

两国的人口都已大量地集中在城市，但是日本能向其主要城市运进较多的资源，因此通过各个地区竞相仿效的新的消费方式发挥了有力的示范作用。

在德川家康和彼得一世强有力的领导下，两国转移了各自的全国中心（1600年以后不久移往江户和1700年以后不久移往圣彼得堡），这样就迎来了行政指导阻力减少和中心城市消费日益增加的新时代。过去的行政中心大阪——京都地区和莫斯科地区现在作为全国市场中心而繁荣起来了。大量的货物被运往江户和圣彼得堡，那里担任公务的贵族（在俄国还有宫廷）已习惯于大量消费。那时江户的武士人数超过四十万，而圣彼得堡的贵族人数到1811年仍只有二万五千人左右，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基本差异。日本全国各地的贵族每隔一年要到首都居住一年的制度，要求他们把大批扈从留在江户，并促使资源集中在这一城市里。

在日本，城市化在各级都进行得较为迅速。当俄国的人口略为超过日本时，它只有三四个城市拥有三万到十五万的人口，三十个城市拥有一万到三万的人口，而前一类城市日本有二十个，后一类城市大约有六十个。总的来说，日本有百分之十二的人口居住在万人以上的城市里，而俄罗斯帝国只有百分之四的人口住在这样的城市里。即使选择较低的截止点来计算城市人口总数，日本的城市人口看来仍比俄国大约多一倍。俄国城市人口到十八世纪中叶已经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它仍只达到日本的比率的一半多一点。1750年之前两国城市人口都显示了令人注目的增长，尽管两国社会继续保持活力，但在1860年之前的最后一个世纪中，城市人口的

比率变动不大。

两国的许多城市是以行政中心著称的。在日本，几乎所有万人以上的城市都是城堡市镇，至少有一百个较小的城堡市镇（其中武士居民所占的比例也较大）发挥着中小藩的中心的作用。一个藩通常大约有百分之十的人口居住在位于中心点的城堡市镇里。俄国由于在新并吞的领土上建立要塞城市，以及1775年增加的行政区划要求把地方居民点升格为县城，这就使俄国的行政中心增多了。县城比城堡市镇多一倍以上，但是俄国各行政中心配备的行政官员不多。由于俄国担任公务的贵族人数少得多，而且居住在城市里的贵族比较少，这就意味着俄国城市里大量消费者的核心比较小。

活跃的商业对繁荣一切城市，不论是行政城市还是非行政城市都是必不可少的。货物从农村经过各级居民点流向附近的定期集市（在俄国常常流向物资交易会），然后再运往各大小城市。到1800年，在俄国各级市场中心的最低层有一千四百个左右每周举行一次的集市和几千个一年一度的小型物资交易会；在日本，大约有一千六百个定期集市，大多是每十天举行一次或两次。在俄国，每年举行一次的大型物资交易会还成了货物交易的补充。相比之下，日本的小型物资交易会没有什么意义，而大型的物资交易会根本就不举办。俄国的居民点比较多，疆域比较辽阔，这就需要适当举办更多的市场和物资交易会，但是在居民稠密的日本，由于组织运输和商业的效率比较高，所以商品从为数较少的地方集散点流向数量远为众多的城市消费者的手里就必然比较方便。

日本从十三世纪起，俄国从十五世纪起，定期集市和物资

交易会迅速发展，这为全国商业一体化和大规模的城市化提供了基础。不过，到了十九世纪初，逐日从商店购货在两国已很普遍，因此定期集市开始衰落，至少在最先进的地区是如此。定期集市被替代是两国继续发展的一个迹象，表明通过逐日的商业活动直接向城市供应货物的效率提高了。

从1600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上面讨论人力资源的一节里表现得很明显的这两个社会的推动力，在居民点的变化过程中并没有减弱。村庄激增，内部组织和与新兴的地方市场和行政中心的关系发展了。通过商业往来，小小的定期集市和物资交易会同远方繁荣的城市结合起来了。在数百个地方行政城市的上面是全国性的行政中心。日本和俄国城市人口的增长是惊人的。日本最初总共只有大约一百万城市居民，俄国只有几十万城市居民，到了1860年，两国的城市居民都达到了五百五十万人左右。通过居民点城市化的特殊形式，可以看到日本的资源更为集中。

组织结构

这两个国家的人民是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呢？最重要的方式是作为生产、消费、娱乐、社交的主要单位的家族。两国都十分重视家族的传宗接代，家族一般是由最年长的男子领导的。为了促进整个家族的目标的实现，子女的婚姻由父母安排。即使作为家庭追求的理想，氏族和大家族的弱点在于，只有一个儿子在家延续血统的个别家系往往会遭到孤立。总之，日本和俄国都是宗法社会，在这些社会里，人们的大部分行为都是与家系有关的。

可以认为，家庭作为一个单位在日本比在俄国稳定，这有好几个理由：首先，在日本，由于着重优点，长子继承权就不那么盛行了，而在俄国，除了独子以外，一般不实行长子继承权。不过，长子继承权在日本武士中比在农民中更为普遍，而在俄国也力图说服贵族实行长子继承权。其次在日本，长子以下的儿子往往过继给缺少男性继承人的家族，这就提高了家庭计划的连续性。其三是祖先的神主牌加强了日本人的这种观念：他们的家族已经存在好几代了。与此相反，俄国在人口不断增加和全村定期重新分配田地的情况下，要保持家族的连续性就比较困难。此外，外来的思想给俄国带来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比较早，通过恋爱结合的婚姻和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破坏了上层人士原有的一些家庭形式。这种形式同日本发展的以家族为中心的儒家道德观念是不同的。家庭财产较长的连续性、地位的继承以及上层人士遵守的儒家道德，肯定有利于日本保持家庭生活的稳定。实际上，日本制订家庭经济长远规划的潜力也许是扼制生育更多子女的愿望的一个因素。

家长负责家庭成员的行动，而村长有权监督家长的品行。一个行政区——俄国的县，日本的藩或是由分封给长官或奉行的地区——往往有几万户。在日本，五人一邦或五户一组的单位要对其成员的不规矩的行为负责，而在俄国农奴主要管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并将他们的税款交给当局。可是，单个的居民点内的控制不足以弥合远方行政官员和家长之间在社会上的巨大隔阂。当地的神父和僧侣对个人品行给予一些直接的指导。日俄两国宗教人士的影响的差别在于，日本的宗教

团体早就放弃了大部分地产，并缺乏明确的僧侣等级制度，而在俄国，正教金字塔形的教士组织依然是重要的，教会的头头掌握着不少资金，在1764年以前还拥有大庄园和农奴。俄国的城市居民大约有百分之一到二属于教士家庭，这个比例比日本要高得多。

在日本和俄国，手工业者和商业生产者的团体也是关键性的组织中心。这些行会与有关协会一般是由政府发起成立的。两国的生产很分散，雇佣五名或十名以上工人的商业企业所占的比例很小。在一些协会中，较大企业的经营者被选为头头，这些协会的建立为国家提供了一种结构，国家通过它来进行控制，并给予有关商人和手工业者以特权和垄断权作为报答。随着贸易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管理严格了，贵族利益的优先权得到了承认。

尽管有这些基本的相似点，两国在贸易和手工业的组织和管理方面仍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别。日本大多数垄断组织集中在当地的城堡城市里，这样经营就可以多样化，并适合当地的需要。商人也许被认为是本地武士和大名的同盟者，他们共同努力来改善各藩在国内的经济地位，有时这种努力造成与幕府指定的垄断组织的斗争。与此相反，俄国商人和贵族的阶级利益遇到更多的抵制。商人为摆脱农奴制社会的限制进行斗争。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俄国的变化来得更快，因为官员们满足了进行斗争的商人的一些要求。

虽然如此，两国总的格局是商业利益同行政利益结合在一起，并吸收那些因经商而发迹的人为政府服务。两国基本上是封闭的阶级制度也许是它们在商人中间提倡干出成绩来

这种伦理观的主要原因。那些没有机会将其资本和儿孙的才干从商业方面抽出来谋求上层人士地位的商人，更有可能集中精力研究投资和取得企业家身份的长远的含意。日本和俄国的政府领导人通常是世袭的，这个事实也许使上层人士感到比较放心，使他们能比较灵活地去应付现代社会的挑战。鉴于商人和行政官员的这些条件作为迅速顺利地过渡到现代化社会的基础，比较封闭的阶级制度看来一般比开放的阶级制度要好。总之，在实行封闭的阶级制度和盛行新教徒伦理的环境中，会产生激进的今世苦行主义。

城乡行政和商业组织是家庭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个别家长在判断如何利用家庭的资源时受到许多方面的约束和指导。正如在别处一样，两国的城市行会、农村地主、邻里和村庄组织、教士、朋友和亲属都影响着个人的决定。但是在日本和俄国，对许多行为方式甚至进行进一步的限制，对资源的积累进行更广泛的指导，这种限制和指导扩大到社会各个遥远的角落。中央政权的代表取代地方自治政权是一个进行了许多世纪的过程，对所有组织都有很大的意义。取代者如果不是中央政权的代表，至少也是对资源积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断受中央指导的人。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或末叶，大名、农奴主和其他地方当局已经想出了新办法作为系统化地动员地方资源的方式的一部分。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日本和俄国在加强行政管理方面面临着三个问题：首先，在这种基本上是封妻荫子的社会里，怎样才能防止出身于高等贵族的低能儿滥用权力？虽然两国都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却想了一些办法使有

才能的人能跃过出身，为未来的行政官员提供先受教育、然后在政府机关里得到晋升的机会。日本在这方面大概比较成功，因为它没有将地方上很大的控制权留在不担任行政职务的贵族的手中。可是，俄国有一个有利条件，它有统一的全国性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使用有才能的人，包括那些不是出身贵族但有才能的人。俄国与日本不一样，日本的行政机关被分割成许多单独的而且往往是很不经济的小机关，官员只来自一个阶级即武士阶级。

第二个潜在的问题是中央难以保持牢固的控制。两国都无法达到现代化国家里所出现的那种中央集权。在日本，大多数人民由藩政府统治，而在俄国，几乎半数人口由负责税收和秩序的贵族统治。这些以地方为基地的担任公务的贵族和中央当局一致认为应更有效地征收地方上的资源，并在不损害长期生产率的情况下使地方资源更集中于大城市。

最后一个问题是两国军政组织的差别。在日本，武士们既是战士又是文职行政官员，不需要额外的士兵。可是在俄国，军队与政府是分开的，它们都从贵族招收人员，并争夺国家的岁入。频繁的战争促使俄国不断地努力加强陆海军。此外，俄国征募农奴服兵役过普通士兵的艰苦生活，凡是有办法的人都拼死拼活力图摆脱这种命运，与此相反，在日本，凡是经过作战训练的，哪怕是下层武士也有很高的威望，得到丰厚的报酬。此外，在俄国由于军事行动所造成的那种全国性和个人的严重问题在日本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因为日本有二百多年没有发生过战争。

从两国组织的对比中所得到的总的印象是，日本达到的

社会结构的格局极为稳定，并一直保持了一百五十年到二百五十年。稳定的家庭结构、受到严格管理的商业组织和能对平民的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大批武士工作人员，所有这些都呈现了一幅组织结构基本上无变化的图景，虽则小的调整当然也是有的。在这几个世纪里，俄国的组织变化很大。过不了几十年就制定新法规，从而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各权力系统看来矛盾百出。城市里的手工业者和雇工仍处于捉摸不定的状态。效忠于沙皇意味着，凭着沙皇公布的或真实的意图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下属的裁决提出异议。在日本，权力形式比较集中，而在俄国，家长、村长、农奴主、教士和地方官员都自称有权指导农民的行为。俄国组织松散的贵族散居在农村的庄园里，而在日本，高度有组织的武士却团结在城堡市镇内行政机构里，这种差别象征着两国在组织上的差异。两个社会都动员起来了，但日本动员的程度较高。

重新分布的过程

任何社会都有三个重新分布的过程：社会流动——人们在社会各阶级之间或在阶级内部的流动；移居——人们在地理上的流动；以及买卖、租金、高利贷、税收和福利——金钱或货物的流动。日本和俄国发生这些流动的情况为进行比较提供了进一步的材料。

虽然对变动职业限制较松，而要从一个阶级正式转到另一个阶级，限制较严，但是，在理论上两国的阶级是封闭的。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职业变动最大，农民不断地被吸引去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尽管有的农民又重新返回农村从事农业。对

于进入和离开担任公务的贵族的行列，限制要严得多。聪明能干的日本青年有可能过继给这个阶级的某一家庭，一位商人的女儿可能被选为新娘，武士家庭的次子或三子可能沦为平民的地位，但是由于日本中上层武士的排外性，这种情况是少有的例外。只有下层武士才会出现显著的流动。俄国的官吏并不全部是贵族，所以平民有机会通过担任公职上升到贵族的地位。此外，穷困潦倒的贵族有失去土地和农奴以及最终失掉贵族地位的危险。两国的根本差别在于，在理论上，俄国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地位高于农民，而日本的情况恰好相反，虽然在日本，这些阶级的富裕的成员的确享有农民所得不到的许多机会。在俄国，登记为城市居民的人是同农奴和国家农民分开的，这种做法使得那些有幸被列为城市居民的人不放弃城市居民的身份。而在日本，偶尔也尽力使新进入城市的人回乡干农活，这就使得为变成商人或手工业者而进行的斗争复杂化了。然而在俄国，那些想逃避务农的人遇到的障碍甚至更大，农民在城市里要带证件，并继续感到自己受农奴主的管束。在俄国的某些地区，有大批的人正式登记为农民，但实际上他们常常远离家乡从事非农业的活动，但是他们要登记为另一个阶级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与日本相比，俄国各阶级之间的流动似乎限制得更为严格，只有担任公务的贵族是例外。

另一方面，两国阶级内部的流动所遇到的障碍较小。由于商人们对农村土地进行投资障碍重重，对城市不动产的投资也往往如此，于是他们被迫放弃了为争取升入担任公务的贵族阶级所作的努力，而集中资金来积累家庭的商业财产。从

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某些商人家庭获得了巨额财富，其中一部分用作向担任公务的贵族的贷款。除了通过过继之外，武士阶级内部的流动是非常困难的。由于长子继承他们没有什么机会变动的俸禄，他们一般就履行与他们所得的薪俸大致相称的职责(只有担任某些职务，他们的薪俸才会因得到特别津贴而增加)。因此，注意力就放在将次子或次女过继给薪俸不过低的家庭。但是由于存在着许多量才录用的因素，这样，有才能的武士就有可能在全国各行政机关得到提升。如果说日本的武士只有一种主要收入来源，那么俄国的贵族得到现金和实物的来源繁多，比如说担任军政职务、乡村庄园里的私人农奴、城市里的不动产、甚至在工厂中劳动的农奴。俄国的贵族家庭比其他贵族有更多的机会改变其地位，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如上所述他们可以用种种手段来改变他们的收入，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政策和宫廷的亲信经常有变动。

农民中间求生存和争财富的竞争激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日本，由于武士离开农村、血统家族关系加强，以及销售量增加，就出现了人口流动的局面。俄国继续实行农奴制，所以农村没有产生类似的进程，不过，农民有更多的机会利用他们的劳动，有时利用他们的积蓄来改变他们家庭的地位。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最后一百年里，可以看到两国特别是日本的村民为了增加地产和从更加商业化的农业中获取利润进行的竞争日益激烈。

移居至少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人们向人口稀少的地区迁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迁移发生在十七世纪的日本，因为边缘地区的土地或新的水浇地可以耕种了。但是在这个小小

的国家里，新村庄一般只建立在距离过去的定居点不远的地方。从1600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没有出现过重大的人口重新分布的现象。与此相反，在这几个世纪里，俄罗斯帝国南部和东部的广大领土上有人定居了。先行的是士兵和小商贩，接着农奴制就扩展到帝国新夺取的地区。到了十八世纪，乌拉尔山区已经成了开矿和冶金的中心，更远的西伯利亚正成为同中国进行发达的贸易的路线和获得贵重的毛皮的来源，南部新开发的土壤肥沃的地区成了帝国著名的产粮区。甚至在美国人向西部地区和中国人向满洲大规模移民之前，俄国已在移民了。但农奴制的继续存在无疑地限制了向边疆地区移民所起的解放作用，但是冒险主义情绪在俄国的社会结构里留下了痕迹。

另一类移居是人们在一个地区内的经常性流动，往往是从这一类定居点移往那一类定居点。在日本和俄国，劳动力地区性的流动相当大，而在俄国，这种流动多为季节性的。从事某些流动职业的人——商人、运输工人、士兵——很可能改变居住地。强征农奴服兵役使得俄国移民人数更多。由于两国两三个主要城市一度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男子，并且主要处于工作年龄，所以男子到了一定的年龄显然就要进入和离开城市。

第三类移居是定期从一个地区迁往另一个地区。这种迁移是担任公务的贵族所特有的，许多贵族有两处住宅。他们在本地和全国行政中心之间的来往旅行起到了交流意见和习俗的作用，这对两个社会的一体化是十分重要的。迁入和迁出江户受严格的限制，既使规模很大，这也有利于日本的一体

化达到更高的程度。

担任公务的贵族和农民迁入江户和圣彼得堡等行政中心是受限制的。这些人必须证明来自特定地区，其中大多数人以后要回到原地去。日本当局最注意武士的迁移，而俄国人则对农民的迁移控制得较为严格。在现代以前时期的末期，上述两种情况没有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造成城市的不稳定和过激的地方主义。

市场销售和纳税形式的改变促进了阶级内部的流动。个体农民家庭越来越多地把资源投入市场雇佣劳动力和购买农业与手工业产品。有的村庄，甚至有的省份以特产著称，或者作为在某一条路线或某一条运河搞运输的劳动力来源，或者作为向城市移民的劳动力来源而出了名。同时，赋税变得更有规律，更可以预见，纳税额也增加了。

对日本和俄国的销售和赋税制度的重要性应进行一些对比。在日本，不带个人色彩的、管理良好的销售和税收再分配制度起着重要作用，它把二百五十个以上单独的行政区成功地结合在一起。这个制度有一套普遍遵守的规则支撑着市场规律，在幕府制度下，每个藩都努力要赶上别的藩，这种竞赛使市场繁荣了起来。在俄国，这种不带个人色彩的程度没有全部被接受。农奴主对其农奴所欠的税款要向政府负直接的责任。在俄国，相邻的贵族之间或两个地区的贵族之间可以进行私人接触，作为把两个地区的贵族联系起来的个人基础，可是在日本却不行，此外，日本不存在直接向个别贵族交付租金或服劳役的制度，所以它在农村更多地仅仅依靠两种再分配的形式——赋税和销售，以这两个支柱为基础的地方和全

国的一体化与俄国重视私人关系形成了对照。不过，在俄国，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农民的不带个人色彩的监督者，这一点不应忽视，其中包括农奴以及将近百分之五十由国家直接控制的农民。

在186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各种各样的再分配形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人们首先忠于封建领主而不是首先忠于家庭，这种情况有利于有高度组织性的集团的出现，它们之间的职责有着明显的界限。虽然在阶级内部流动的机会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但是人们广泛利用新的渠道。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率上升了，同时往大城市迁移则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销售的改进有助于实现全国的一体化和打破乡村的自给自足状态。在日本，大量资源流入城市对支撑高水平的城市化是必要的。在俄国，出口额的迅速增长对帝国的几乎所有地区都产生了影响。可是，两国的这些变化都未完全贯彻始终。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武士阶级内部的流动减弱了，虽然下层武士仍然有进有出。俄国农奴制的锁链束缚着农民。但总的印象是日益增加的流动、迁移和市场贸易都没有对维护两国的秩序产生引人注目的破坏作用。

人与人的关系

社会学家从人与人的关系这个角度对现代化社会和非现代化社会进行了比较，并且说，在现代化社会里看到的格局提高了个人为达到所追求的目的而建立相互关系的能力。比如说，依据才能选拔人才和把大部分共同的期望只限于某些对于生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职能上，这些都会使高度专业化的

生产或管理单位的生产率得到提高。虽然任何非现代化国家的人民都不会认为这些普遍的标准和某些职能模式是当然的，但是在1800年之前，这些标准和模式在日本和俄国比在大多数其它社会更为普遍。假若不把人与人的关系的这些方面看成是一分为二的，而是把它看成一个连续统一体，那么就可以按连续统一体的非现代化的目标将日本和俄国与别的社会进行比较来确定基本的类似点和不同点。

在一系列关系中可以发现现代以前的社会之间重要的不同点。这些关系中包括以下几对关系：地主和佃户、雇主和雇工、商人和消费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以及官员和官员。可以看到，在日本和俄国，所有这些关系的非个人色彩和特点越来越明显。在日本农村，生产单位中家族关系和假家族关系日益衰退的现象特别值得注意。与此相仿，俄国农奴制的继续存在掩盖不了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关系的非个人色彩的加深。尽管派国家农民去指定的工厂劳动的制度得到了加强，但俄国的雇工市场仍迅速扩大。两国商店和商业活动的增加是提高生产活动的专业化，特别是城市手工业的专业化，扩大买卖关系的一支巨大力量。行政惯例的改变和行政管理的机关化也使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与其他现代以前的社会比较，日本和俄国建立的各种关系是先进的。

即使在继承权和封闭的阶级作为明确的理想似乎堵塞了日本量才录用的做法时，人们也想出了特殊的办法。在武士中间实行一种过继给文职人员的制度，这种制度往往使有才华的年青武士得到某种地位，要是不过继，他们决不能获得这种地位。与此类似，通过贷款给大名而获得特别的任命和权力使

得有才能的商人能在藩政府，甚至在幕府获得职位。

如果将日本和俄国的目标和方向与其他国家的条件相比，看来可能得出稍为不同的结论。两国的个人主义都较淡薄。与其它现代以前的先进社会比较，就连个人主义思想相对来说也不存在；离家的人依然牢牢地从属于某一集团。对犯罪行为、拖欠赋税以及在俄国对潜逃的农奴，家族集体或整个村庄都要共同负责。集体主义精神很强，在日本甚至达到了有些职务由两个或三个共同负责的人轮流担任的程度。

这种集体主义结构的基础是，在俄国强调对沙皇，在日本强调对领主的无条件的忠诚。在日本，统治体系是直接的和毫不含糊的。从理论上说，武士作出的任何决定，必然是在当权者等级中地位在他们以下的所有人的集体决定，并且不能违反上级的决定。分明的权力界线使得无条件的忠诚成为一支可以迅速调动的起作用的力量。与此相反，在俄国农奴的脑海里，沙皇的意向和当地贵族的行动之间常常存在着距离。俄国贵族对待农奴的态度得到法律的几乎是无限的支持。虽然对遥远的往往是象征性的沙皇的效忠仍是一股强有力的力量，但是不能始终认为每项具体指示都是他下达的。

实际上，由于强调效忠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就受到了限制，个人主义淡薄可能是随后实现现代化的有利条件。先搞现代化的社会的特点是非常强调个人主义，但是强调个人主义并没有给晚搞现代化的社会带来同样的好处。从一种负责的倾向过渡到另一种不同的负责的倾向不仅大大减少了控制问题，而且也大大减少了怀疑和不信任等造成分裂的问题。农村的集体主义、直接的和毫不含糊的权力等级以及天皇和沙皇

的强有力的象征，这些都加强了在形形色色的人与人关系中认真负责的倾向。

国际比较

本节讨论的具体的重点是社会阶级的分布情况。除了由稀稀落落的和流动的放牧者或猎人和采集者们组成的那些小型社会之外，现代以前的社会里的大部分人是农民。大多数人住在农村，从事农业或家庭副业。个体农民参与生产活动通常主要在家庭范围之内进行，他们按照性别、年龄和农业季节以可预计的方式从事不同的活动。

为了进行比较，我们从农民社会里挑选出一些社会阶层，但我们既不挑选那些按部就班地进行农业活动的大多数人，也不挑选少数另外的主要生产者，例如渔民。相反，我们的重点将是剩下来的少数人口，这些人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与农业周期无关。他们包括上层人士、官员、士兵、教士、不参加农业劳动的地主、商人、手工业者、非农业雇工、仆役、为工厂和家庭劳动的农奴、不从事农业劳动的无业游民。在某一个社会里，这几类人不一定都有，而且也许还会有其他类别的人。然而，这份单子清楚地表明有哪几部分人不从事农业生产（或许种小块菜地者除外），但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获得和消费农产品。这几类人摆脱了农民的生活节奏，一般说来在地理上和社会上的流动性比较大。这几部分人人数虽少，但很重要，他们以各种方式形成了在过渡时期出现社会的现代部分的基础。

根据这几类人中的每一类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和这些非农业人口的总数可以区分各种社会。在1800年之前的

大型社会中，有些社会上层人士人数很少，只占不到百分之一。有些社会上层人士较多，至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有些官员、士兵、教士和不参加农业劳动的地主可能在习惯上属于被指定的上层人士。商人和手工业者人数的比例也差不多。户主的人数高达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这表明这些行业的发展达到了罕见的程度。非农业的雇工或农奴在总人口中至少也占百分之几的比例。总起来说，这几类人在各种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从百分之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对各类社会进行的对比还表明，在这些阶层中，有些阶层世世代代住在城里，有些则不是。官员、房产主、手工业者、商人等在不同程度上由于继承父业就一代代地住在城里。凡是通过考试挑选官员、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任何好冒险的和铤而走险的人都可经营商业和手工业以及移居不受限制的社会，至少作为一种理想来说，实行阶级开放以及在较低的和较高的社会阶层之间出现相当大的流动的条件是存在的。即使缺乏这些条件，阶级内部广泛的流动仍会发生，或者说，仍可以通过四通八达的职业渠道，使有才能的人得到提升。虽然所有这些阶层中住在城市里的人不成比例，但有闲的上层人士和不从事农业劳动的地主可以自由选择住在城市或农村，而不必由于他们工作的性质而被迫居住在某个地方。这些阶层在大大小小城市里的分布情况是进行社会对比的另一个基础。

在1800年，日本和俄国的人口加在一起占世界人口的十四分之一，城市人口大体上占世界城市人口的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两国上述几类非农业人口在它们的总人口中占百分之十到二十五。日本的城市人口比俄国多一倍，非农业人口大

概也比俄国多将近一倍，其部分原因是日本城市里的上层人士比俄国多得多。不过这些明星的差异不应该掩盖两国的重要相似点。

从1600年到1860年，日本和俄国各社会阶级的分布情况发生了许多平行的变化，这一点已经谈过了。虽则人数众多的高度城市化的上层人士最初出现在日本，但从十八世纪初叶起，俄国贵族的人数迅速增加，特别是越来越多地到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居住的富裕贵族的人数迅速增加。到了十九世纪，两国代代相传的上层人士在一、两个大城市里拥有豪华的府邸，同时在地方上还有房屋。约有百分之二十的武士，包括所有的大名居住在江户或者定期到江户去住，一次至少住上一年。俄国贵族在地理上的流动常常采取到农村庄园度夏的形式，去时还带上一批家奴。为了维持江户、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豪华的生活方式，大量商品运往市场，这是那些对地方资源拥有最大控制权的人不断地定期到这些城市去居住的必然结果。两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存在着人数众多的流动的担任公务的贵族，他们对地方资源的控制是无可争议的，他们经常一起来到一、两个全国中心城市，在那里他们直接隶属于也控制着大片土地的中央行政当局。两国的相似点包括：少数城市的生活与全国其他地方的生活差别悬殊；实行交替居住的制度，阶级比较不开放，以及上层人士的文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些人士在行政管理上经验丰富，但是他们依赖那些他们有权以比较有效的方式进行治理的地方的支持。

大多数现代以前的社会的城市化程度要低得多。即使在十六世纪的日本和俄国，如在城市人口至少占百分之五的国

家里，早期依赖行政上的集中的状态往往还没有转变为主要是商业上集中，城市里的商人、手工业者和雇工的人数相应增加的状态。换句话说，在十九世纪初，日本和俄国同社会阶级的规模和分布状况不那么复杂的许多社会马上就可以区别开来。

比日本和俄国大致要先进一个世纪的一个社会是英国。我们所说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日本和俄国的发展情况同伦敦从1600年到1750年的发展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伦敦作为越来越大的消费中心吸引大批英国有钱的人移居到那里去，这些人继续得到分散在各地的庄园的支持。正如E. A. 里格利写道："伦敦发展的示范作用对其他地方的变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欧洲以外，至少还有另一个社会已经完成了很大的商业发展，城市化水平至少达到百分之六，社会阶级相应地多样化。中国是现代以前的先进社会的特殊例子之一。到1800年，中国约拥有世界城市人口和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可是，在许多方面中国与日本和俄国不同。首先，中国的阶级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虽然只有考试及第的人才能进入中国有学术称号的上层人士的行列，但是这个阶层的成员是流动的。其次，上层人士绝大多数居住在农村，这是异乎寻常的。除了进城赶考和少数被选中担任官职的人在外地做官之外，他们通常都留在本人的出生地。有些地方上的地主乐意住在城里，但是这些城镇大多数是附近的县城。中国没有人数众多的、世世代代住在城里的上层人士。同样，中国没有象日本那样的封建领主或俄国那样的贵族来动员城市里的其他社会阶层。换言之，中国没有一支特殊的力量来推动象在日本或俄

国可以见到的一系列客观条件。

在进行进一步的比较之前，我们只能假设，在社会动员方面，日本和俄国与其它现代以前的社会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我们在把1800年以前的所有社会按城市的发展划分不同的阶段时，发现出现城市以前的最简单的社会已变成主要依靠税收和租金的、拥有日益复杂的行政中心网的社会，接着这些社会最终又变成商业一体化的社会。日本到十七世纪初，俄国大约到十八世纪初都已进入先进的商业一体化社会的行列。不过，两国的推动力从此加速了。由德川家康和彼得一世提出的，然后在以后的一个世纪中正式制定的对武士和贵族的新要求，促使两国发生了其它惹人注目的、实质上是相似的变化。人力资源、居住方式、组织结构、重新分布的过程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特点等等的变化，都是现代以前这种最后的变革的一部分。

就现代化变革时期之前社会动员的程度而言，日本和俄国在西欧以外是独一无二的。数万名武士家长和他们的一些家属进入和离开江户，同时他们的地区在大名手下的人员的严密监督下向大阪和江户运送货物，用得到的钱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同样，成千上万的农奴主和他们的家属带着大批农奴，至少在冬季的几个月里住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在夏季，他们回去亲自监督本地庄园里的生产活动，庄园是他们的经济来源。在俄国出现文职官员，其中包括不属于贵族的官员的同时，日本城市中的行政机构也得到了加强。在两国，中央和各省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这种相互渗透很可能对农村中大多数人所处的情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六章 知识与教育

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和俄国在应用正规教育机构和不靠人力的传播系统代替非正规的和以家庭为基础的传授知识和价值标准的手段方面，都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和日益迅速的进展。这些进展有很大一部分发生在私人办的教育机构里。尽管如此，重大的主动行动是两国的政府当局采取的，特别是在正规教育方面。他们还通过示范或法令为教育内容和新知识的产生制定了明确的方针。

日本早在十七世纪，俄国到十八世纪中叶，宗教当局已经不再独立采取任何重大主动行动来限制或控制教育了。教育很早就世俗化的这个特点，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没有的，更不必说绝大多数搞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了。这个特点对日本和俄国随后的现代化也许是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三个具体的教育领域——上层人士的教育、平民教育和出版业——日本和俄国所经历的发展在性质上颇为相似，但在程度上存在着惊人的差别，日本在每一个方面都要先进得多。具体说来：

上层人士的教育：两国政治领导人认为，正规教育主要是训练地方一级或地区（特别是日本）和中央一级官员必需具备的技能和价值标准。到了十九世纪，受过正规教育被认为是政治领导者应具备的，而实际上是必备的条件。虽则日本在强

调正规教育的重要性方面比俄国早得多，并且日本上层人士的平均文化水平大概也高得多，但是尽管如此，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两国都达到了上层人士受过良好教育和全部有文化的目标。

平民教育：十九世纪上半叶，日本和俄国为平民设立的学校成倍增加。但是，日本增加的速度要比俄国高出许多。在日本，估计全国男子识字率超过百分之四十，而俄国的识字率虽然不断提高，但仍然很低。

出版业：为了适应有文化的人不断增加的形势，两国在现代以前的时期的末期建立了各种新的出版机构。由于日本平民的识字率大大高于俄国，所以日本出版普及读物的数量，因此也是出版物的总数遥遥领先于俄国。

最后一点，日本和俄国都缺乏特别适合探索现代科学的本国文化传统。不过，它们也没有能反对进行这种探索的上层宗教人士。两国的工艺和技术一向是很发达的，这为它们顺利地从西方引进实用知识提供了基础。由于俄国与其边境外的国家接触较早，而且密切得多，所以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它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科学和技术的过程中自然已远远地走到日本的前面去了。

教育的世俗化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一代一代传授知识绝大部分是在家庭内以非正规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一点上，日本和俄国与别的现代以前的社会没有什么差别。即使在较为流动的城市环境中，学徒们也一向是在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家里学习技

能和价值标准的。虽然两国的教育主要是在家庭里进行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到这个时期末期，家庭之外的正规教育制度迅速发展起来了。在这一节里，我们将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正规教育方面，这特别是由于单凭家庭教育不可能为达到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全国性的管理和协调水平提供基础。

但是在讨论正规教育的水平和规模之前，有必要谈一谈两国如何看待正规教育这个较为根本性的问题。它的目标是什么？怎样达到这些目标？犹如在别的现代以前的社会里一样，这里的中心问题是宗教的和世俗的教育概念之间的冲突。一个极端可能认为，教育纯粹是使个人在精神上得到拯救的手段，教会是唯一合适的权威。另一个极端可能仅仅是从政治上的用途来看待教育的，认为应由政治当局直接负责教育内容。从所有现代以前的社会的情况来看，日本和俄国是特殊的，因为到十九世纪，它们已经建立了高度世俗化的、正规的上层人士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当局经办和控制的。

两国教育的世俗化是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进行的。在此之前，日本的佛教僧侣和俄国的东正教教士垄断了高等学问的主要源泉；文化和学术传统都保存在庙宇和修道院内，并在那里发展。在十七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人企图在这些机构以外传播知识。两国对正规教育都没有什么概念。

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日本和俄国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两国与别的现代以前的社会有了区别。教会作为独立办正规教育的一支主要力量，它的重要性削弱了。结果政治当局就能放手鼓励和控制上层人士和平民的教育。

两国这种类似的变化有着重大的意义，值得加以比较仔细的分析，因为这同最先实行现代化的国家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十七世纪前半叶，日本确立新的儒家思想为官方倡导的思想，这为日本教育的世俗化及其在以后两个世纪里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新的儒家思想是由幕府和藩共同确立的。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教育被认为是训练修身治国的艺术，它包括阅读经典著作。因此，从中国传入的这个传统在日本确立了教育必定有益于社会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仅支配着上层人士的教育，而且也支配着平民的教育。

在西欧模式的强烈影响下，十八世纪俄国的教育受到了世俗当局的积极推动和控制。当时俄国政府正设法对贵族阶级进行正规的和系统的训练。正如在日本一样，教育在俄国受到重视主要是由于它在政治上有用处。儒家强调，教育的固有特点是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但与此相反，俄国关心的根本问题是教育能不能有助于增加其军事力量使其与外国敌手并驾齐驱。

日本和俄国的相似之处不仅在于两国的政治当局都大力推动教育的发展，而且相对来说，宗教机构不反对这种进行政治控制的主张，其原因大概是两国对西方基督教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政教两重性没有什么概念。俄国的东正教象它所属的拜占庭正教一样，是崇拜专制主义的，它强调教会与政府的共同利害关系，实际上是强调两者的相互关系。同样，在日本，佛教自从六世纪由中国传入的时候起，就被认为是法宝和起团结作用的力量，是政体的一个重要部分。日本本国的宗教

惯例集中体现为神道，它在乡村一级起了类似的团结作用，为未来的民族象征提供了基础。

因此，两国教会所起的作用是给予政府以重要的民族主义的支持，而无论在政治上抑或在传播价值标准方面都没有构成独立的威胁。教士成了负责管理正规教育，特别是平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他们不仅以传道者的身份，而且也以受过教育的人的身份行使这个职能。

上层人士的教育

日本和俄国的政治当局因而没有受到宗教领袖在教育方面采取任何独立的主动行动的威胁。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发展教育机构来对上层人士进行思想灌输和实际训练。两国的政治当局特意作出努力，其目标是训练担任公务的贵族。因此，到了现代以前的时期的末期，一切有可能从事公务生涯的上层阶级成员都全面掌握了文化，并为了在政府机关里工作而受过必要的技能训练。在过渡时期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先例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外，特别是在日本，军事技能的训练被认为是上层人士的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两国实现使上层阶级具有文化和受过良好训练的目标在时间和方法上是不同的。日本最初对上层阶级实行正规教育的时间比俄国要早大约一个世纪，从德川时代初期起，幕府和一些藩就对其家臣进行正规教育。但是直到德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这类教育才普遍到武士阶级；各藩官办的学校在1750年只有三十一所，到了明治维新时代猛增到二百一十九所。在同一时期，私立院校（学生班组）中由私人办的武士教

育获得了惊人的发展。

俄国对贵族阶级的正规教育是彼得一世在十八世纪初叶首先发起的，到了十八世纪中叶，伊利萨白又作出了新的努力。国家逐步地取得了权力，规定担任公务的贵族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受过正规教育。最初重点放在高等技术学院上，作为吸收西方知识的一种手段。但是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建立了设有各种专业的各类学校。与此同时，开办了新的神学院对教士进行"现代的"经典教育。

应当强调指出，在俄国，所有这些学校都是按照西欧教育机构的模式办起来的。教育思想，甚至于许多教师都是从西方——通常是从德国——传入和聘请的，这就使俄国的知识分子到了十八世纪末彻底成了欧洲型的。结果之一是在变革时期，俄国所面临的转变问题比日本要少些。

俄国按外国模式办教育的结果之一是削弱了上层人士与其他阶级之间的联系。当上层人士成为西方影响的孤岛时，各社会阶级的价值标准和观点出现了分歧。与此相反，西方学识在日本是由世俗学者，一般是武士或博学之士加以发展的，这些人都是为政治当局服务的或者是希望为政治当局服务的。因而，西方影响在日本的传播并没有威胁到社会的团结。

尽管日本的教育思想受到了中国儒家模式的极大影响，但是在德川时代，日本上层人士的教育是在没有外国榜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模式经过改造，使其适合于日本社会的需要，即特别强调效忠、尚武精神和封建社会固有的有来有往的义务。教育将不仅是治国艺术的教育，而且也是纪

律和服从的教育。由于日本独特地强调这些方面，所以其他阶级很容易开展正规学校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武士逐渐成为所有阶级的理想的、合乎伦理的典范，在俄国上层人士和平民教育之间出现的隔阂不仅被避免了，而且被积极地弥合了。

日本和俄国在上层人士的教育方面的另一个差别是，日本的武士比较愿意接受受教育的机会。武士们比俄国的贵族更渴望运用教育计划，这种情况在德川时代末期尤其明显，当时受教育已经成为武士有限制的流动的重要渠道，对较低层的武士来说，尤其如此。在俄国，使教育成为担任公务的贵族必须具备的条件的最初努力遇到了怀疑和抵制，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日本，文化传统已在贵族阶级中深深扎根。但俄国的贵族一旦认识到教育作为必要条件远远不是削弱俄国贵族的措施，而且实际上反而会使它得到加强，他们最初的抵制很快就消失了，正规教育被认为是上层人士必要的和必然的条件之一。因而，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和俄国有了一个重要的相似点，即它们的上层人士在基本技能和处理实际事务方面都受过完善的和统一的教育。

平民教育

在平民教育方面，日本远远超过俄国。两国的平民阶级在阅读、写作和算术等基本技能的正规教育的规模上是无法比拟的。到了明治维新时期，估计有百分之四十的男子和百分之十的女子有了某种程度的文化。在城市里，这些数目还要高得多，到德川时代末期，据估计江户有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有了文化。

日本的识字率之所以特别高，最直接的原因似乎是上层人士对在平民中间普及教育没有任何敌意。恰恰相反，上层人士明确认识到，受教育的人越多越好，这同俄国普遍对平民教育抱怀疑态度的情况有着明显的差别。日本的上层人士抱这种态度的部分原因也许是，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教育被认为主要是伦理教育；事实上，平民教育大多侧重于讲授儒家伦理和佛教经义。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对平民进行教育的学校主要是寺庙办的私塾（按字意为"寺庙学堂"，起源于早期的佛教寺庙学堂，虽则到了德川时代末期，学堂已与宗教机构本身毫无关系了）。寺庙私塾是在1800年之后发展的。

在日本的德川时代，平民教育得到了发展，政治当局也给予鼓励，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它加强了上层人士与平民之间在价值标准上越来越一致的趋势。到了德川时代末期，儒家关于秩序和阶级的观念已经通过所有阶级的教育传播开来了，从而为建立现代国家创造了非常坚实的伦理基础。同这种力量相比，在教育制度中普遍缺乏任何现代科学的训练的现象很可能只是一个次要的不利条件。与此相反，在俄国，上层人士和平民的价值标准却继续存在着差别，直到二十世纪，这个差别才得到弥合。

俄国农奴的文化程度几乎等于零。但是，这并不是说，俄国人除了上层人士以外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莫斯科大学从它在十八世纪中叶成立之日起就有一部分是为平民开设的，许多平民受过这种教育后就有可能进入上层阶级。此外，农奴常常被训练成庄园总管、工匠、创作者等，这就为少数农民提供了得到提升的渠道。虽则农村的文化水平非常低，但是从

十八世纪起俄国城镇的文化水平开始迅速提高，木版印刷的简单读物很受欢迎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得到这样提升的人在俄国平民总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不属于上层人士的人受教育的机会确实存在，这种机会为进一步的扩大提供了基础。

文化与出版

在日本，语言本身对学习文化造成了某种障碍，而在俄国，这些障碍在程度上要轻些。它所造成的困难要求两国在搞现代化的年代中继续加以注意。日本的文字异常复杂，这对日本人是一个负担，它是从中国借用来的表意文字与注音符号掺杂在一起的混合物。甚至在当今的日本，虽说书法已大大简化和标准化了，但是日本儿童要掌握本国语言的阅读和书写要比包括俄国儿童在内的西方儿童多化一至三倍的时间。

俄文的字母表很简单，所以俄国人在文字上没有遇到特殊的问题。不过，他们感到苦恼的是，从帝国的整体来说，语言种类繁多，教会传统的斯拉夫书面文字和俄国口语之间的差异日益扩大。即使这样，在现代以前的时期，少数民族的语言问题相对来说并不那么突出。在十八世纪创造了标准的现代俄语书面语之后，大多数人的书面文字和口语结合起来了。

日本文字难学看来并没有成为传播文化的重大障碍。首先，日本与东亚文化区的其他国家一样，无限尊重文字和学术成就。人们可以进一步推测，正是由于日本的文字难学，才使它具有巨大的魅力，因而吸引人们去掌握它，同时使得人们要

学习文化必须遵守一定的纪律，要有一定程度的耐心，这无疑对社会的安定起着积极的作用。书法尤其是一种高度优雅的艺术传统，因为在现代以前的时代，所有的艺术作品均与书面文字密切有关。有文化的人在日本远比在俄国有更大的威望。

尽管日本人以木版印刷佛经，但其经验差不多比俄国人落后十个世纪，但是两国到十六世纪后期都开始出现了正规的出版业。十六世纪九十年代活字从朝鲜传入日本，这是出版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意义与俄国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从中欧传入活字一样。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这与日本文字复杂得多这一点有关），日本人后来放弃活字印刷而恢复了木版印刷，但是为了满足识字的人越来越多的城市各阶级的需要，出版业继续发展，速度并未减慢。

在同一时期，俄国的印刷业也不断发展，但速度比日本要慢得多。俄国在引进印刷术后，出版书籍的种类几乎有两个世纪没有增加，虽则此后到了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激增到每年平均四万种左右。在同一时期，日本出版的书籍每年超过三千种。这些数字表明在文化和出版业的成就方面日本和俄国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距。

两国文化的普及使得政府能够利用它来传达官方的信息。到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的所有法律都已出版了，印刷成了政府传达信息的主要方式，而非官方的印刷品则通过检查和管制受到了有效的控制。日本的法律实际上没有出版，但这个事实并不那末重要，因为日本广泛使用公共告示牌来传达幕府的和领地当局的旨意。这些告示牌清楚地说明，德川时

代的日本政治制度越来越依赖书面文字。

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两国学术著作的出版工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外国书籍的翻译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由于关系比较密切，语言接近障碍小以及早在彼得一世之前就已经实行这样的政策，所以俄国在通过翻译系统地传入西方知识这一方面远远走在日本的前面。实际上，到了1800年，西欧大多数当代文学名著以及古典著作已经有了俄文译文，它们对俄国的文学和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日本尽管直到许久以后才翻译西方著作，而且语言上的困难比俄国大得多，但有关西方的译本和原著在1868年之前的几十年里已大量增加。例如福泽谕吉的《西方的状况》一书1867年初版据说就销售了十五万册。

科学与技术

在十八世纪，日本和俄国开始急起直追西方科学在前两个世纪里所取得的进展。两国看来都没有为本国的试验和观察技术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而这些技术对科学革命极为重要。俄国的宗教文化主要侧重于精神方面，没有有影响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传统，使得天主教教会不能在某些时候赞助进行科学探索。日本人在宗教信仰方面总的说来比俄国人更侧重于人世间的生活，但是支配德川时代知识界的儒家思想则主要关注人的关系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因而对探究物质世界同样没有进行什么公开的鼓励。

尽管这种认识论的传统不利于实验科学的发展，但是日本和俄国都始终对技术，即对事物的应用而不是对事物的基

本原理表现出异常浓厚的兴趣。产生这种兴趣的基础是两国有悠久的工艺传统，虽然到十九世纪，日本的手工业技艺总的水平似乎比俄国高超得多。到1700年，俄国已经铸造出世界上最大的钟和大炮，而日本自从中世纪起已经在刀剑制作、灌溉、勘探和建筑城堡等方面发展了极先进的技术。

俄国在彼得一世的统治下，在1724年按照中欧和西欧各国科学院的样子成立了科学院，开始发展现代科学。从此，俄国的科学主要由政府直接管理，并完全按西方的方式进行工作，这就使得俄国比日本要有利得多。俄国科学院最初的成员大多为德国人，直到十九世纪才开始出现本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到了十九世纪的后半叶，俄国拥有为数不多，但极为先进的科学机构，其成员都是西方科学界有充分资格的成员。俄国产生了好几个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仅举两人为例：十八世纪物理化学之父罗蒙诺索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除了科学院之外，俄国还拥有供研究用的图书馆、几所结构最新型的大学、博物馆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台。

日本追赶现代科学的过程，可能大体上与俄国人开始于同一个时候，它于1720年放宽了禁止进口与耶稣会有关的书籍的规定，耶稣会是关于西方科学的主要情报来源。但是这个进程仍然极其缓慢。不仅要克服语言上的巨大障碍，而且日本的“荷兰学识”的实践者得不到象在俄国所享有的那种政府有组织的支持。俄国人被允许雇用著名的西方科学家，而日本人却只能从驻长崎的消息并不总是很灵通的荷兰商人和医生零星的讲述中以及从他们带来的书籍中进行学习。但是在德川时代的最后一个世纪里，日本关于西方科学的知识慢

慢地有所增长，各种障碍也逐步地被扫除。同样重要的是，在手工业和其他行业内部"秘密传播"知识的传统打破了，这种传统妨碍自由交换情报，而要发展现代科学知识，自由交换情报是必要的。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日本人开始朝着俄国人在十八世纪所遵循的方向前进。官方对科学研究的赞助增加了，外国专家受到了欢迎。同过去一样，日本人压倒一切的兴趣在于西方知识的实用方面，而不在于基本原理，因此最早发展的领域是射击技术、绘图法和医学。随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及其后受过良好训练的西方专家的到来，几乎所有这些成就不久就过时了；但是这些早期的经验树立了国家鼓励发展科学和愿意向国外求教的先例，使得日本人有可能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建立了西方式的科学机构。

国际比较

虽则日本和俄国的教育在数量上取得的全面成就有重要的差别，但两国有两个共同特征使它们与大多数其他搞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存在着差异。首先，在两国，政界上层人士必须要受过正规教育。日本完成这项任务较早，遭到的抵抗也比俄国少，但是到了现代以前的时期的末期，两国统治阶级的文化水平都很高。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欧洲之外是否有任何国家达到了这样的水平，这是值得怀疑的，中国是唯一的例外。

其次，日本和俄国都不存在教会和政府为了争夺对正规教育的控制权而出现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天主教和

新教国家普遍存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学术传统的普遍世俗化特别有益，因为这意味着不会出现什么受威胁的上层宗教人士反对传入现代知识的情况。日本和俄国的政府在办正规教育方面既轻松又热情，这样的有利条件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和少数非欧洲国家都有的。

在其它搞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中，东亚文化圈的国家同日本和俄国在这些方面最相似，特别是中国。实际上，可以说中国甚至比日本，肯定比俄国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多少世纪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由世俗上层阶级统治的，这个阶级实际上是根据通过文官考试取得的教育成绩划定的。在十九世纪之前，甚至在平民教育领域，中国看来也远远走在俄国的前面，虽则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开始大大地落在日本的后面。

中国的主要不同点看来不在于传统社会中所提供的教育的类型或水平，而在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同现代化国家的人民交往时变化的方向。中国的考试制度远远没有象日本和俄国上层人士的教育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一个世纪里的那种蓬勃发展的特点，而是僵化为抵制转变的固步自封和因循守旧。中国考试制度长期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人不如日本人和俄国人那么热衷于试验上层人士教育的新体制。在平民教育方面，中国在十九世纪看来同样没有取得进展，而是停滞不前。这说明正当日本和俄国的平民教育开始提高时，中国平民中间对文化的要求却进入了停滞时期。

第七章　结论：过去的遗产

从我们对日本和俄国过去的遗产进行的讨论中，可以得出一个不言而喻的主要结论：在很大的程度上，两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在它们现代以前的社会中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并非一切不言而喻的事情都是不相干的。虽然我们在某种意义上都认为，未来与过去密切相关，但这里要加上两个因素。其一是，引进现代化的因素是特殊情况，并不是日本和俄国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其次，是历史上的重要因素对面临现代化问题的所有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来说很少是适用的。一切现代化都是历史遗产的急剧转化，但是大多数进入现代化过程较晚的国家如果真要避开现代化的中间状态，看来就要进行双重的转化。对大多数国家来说，第一次转化是前提，人们发现，这些前提在日本和俄国是现成的。第二次转化如果发生的话，将建立在已经发生的第一次转化上面。

正如英国和法国十八世纪以前的历史经验导致本国的现代化一样，那些进入现代化过程比较晚的国家的经验也为它们提供了某些比较有利的条件。详细列举有利于未来的现代化的前提不是本书研究的范围。然而我们还是试图详细说明日本和俄国具有的使它们有别于其他现代以前的社会的有利条件。对日本和俄国的相似点以及两国与别国的不同情况进

行比较可以作为研究现代化的前提的起点。

从随后的变革时期的观点来考察，日本和俄国在现代以前的经验使得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易于接受崭新的外来影响。这些经验为两国接受拥有众多人口的，在俄国则是在辽阔的土地上拥有众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系统的领导作了思想准备；这些经验使它们习惯于从当前的生产中积累额外的节余；它们显示了输送大量资源进入城市的益处；最后，这些经验使它们熟悉教育机构，建立教育机构的目的是为了使日益增长的知识和复杂的价值标准体系长久保存下去。此外，两国政府的状况是，它们并没有被与现代化国家的人民的交往所淹没。因此，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两国社会内部的这些发展，为急剧扩大协调和控制提供了基础，这个基础比较不容易发生其他随之而来的变化。这些发展的结果是使人民的技能、态度和经验比较适应在现代化开始时遇到的新要求。

在大多数参加现代化过程比较晚的其它国家里，这些前提大部分或根本不存在，我们认为这些条件对继之而来的现代化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有些国家没有经历过独立自主地借鉴外国模式的时期，相反，继续对自已根深蒂固的信念感到非常骄傲，它们认为这种信念比一切外来影响都优越。有些国家不了解用复杂的管理制度进行独立的统治，或者只在名义上有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而事实上并没有深入到农村中去，或者没有控制全国大量的产品。有些国家没有高水平的商业化生产和专门供应远方市场的农村手工业。有些国家没有被迫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以满足中心城市的需要，它们不象日本和俄国那样必须供养流动于地方与城市之间的上层人

士。有些国家缺乏能为日益官僚化的行政机构培养人员的教育制度。我们把那些看来对日本和俄国随后的现代化有用的，但为大多数非现代化社会所没有的因素挑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了解在过渡时期为了弥补欠缺的因素而必须做些什么事情。

在实行现代化很缓慢的后进国家中，中国显得很突出，它早就具有在日本和俄国现代以前的经验中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某些特点。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进行国际比较时特别注意解释中国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上面我们分五点讨论了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对于其中的每一点，我们都曾请读者注意中国所不具备的日本和俄国特有的相似点。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十八世纪以前，中国政治统一的方式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虽然日本和俄国基本上是封闭的阶级关系可能促进了择优的伦理观，但是中国开放的阶级制度使得择优的伦理观得到高度的发展。除了已经提到的一些因素外，中国在现代以前的发展遇到了独一无二的重大问题。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人口为日本和俄国的八倍至十四倍，而且地区差别很大，商业中心很多。这种多样性使得人们在本地区之外有更多机会获得成功，但这也妨碍了新模式的渗入。中央对这样广大的地区和众多的人口控制得过死，很可能削弱了协调，窒息了首创精神，而当时在日本和俄国是相反的势力占优势。

国际环境

对俄国和日本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两国广泛地借鉴有

影响的外国模式而又不失掉民族特性的历史经验，对促进接受现代知识具有重大意义。虽则莫斯科公国和德川政权基本上是敌视现代化国家的(德川政权一直到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很久还是这样)，但两国领导者完全了解而且并不反对他们历史上大规模借鉴外国经验的先例。拜占庭和中国的影响无所不在，对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到了现代，俄国和日本都转向西方以促进科学技术的新发展，起初是作为保护他们传统的制度的一种手段，只是到了后来才作为对他们的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的一个基础。

有意义的是，欧洲国家也同样受外国的影响。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特点是求知欲强，重新发现这种传统的倾向是开创现代时期重要的第一步。非现代化各国的人民眼界狭窄，认为可能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只看到眼前的事情。首先实现现代化的各国人民的眼界是逐步扩大的，但进入现代化过程比较晚的国家的眼界是突然打开的。它们的眼前立即出现了一盒宝，一个货真价实的潘多拉盒子(这是希腊神话，宙斯命潘多拉带着一个盒子下凡，潘多拉私自打开盒子，于是盒里面的疾病、罪恶、疯狂等祸害都跑出来散布在世上——译注)。

其他社会的领导者不那么愿意借鉴外国的模式。中国是抵制科技革命影响的一个突出例子。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既得利益。当他们面对十九世纪强国的专业技术知识时，他们受到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民族优越感。对他们说来，中国文化的完整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比中国权力的完整性更为重要。

同样，奥斯曼帝国的领导者也不愿意借鉴欧洲的经验。奥

斯曼治国的成功经验使伊斯兰教更厌恶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改革。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这种治国的本领扩大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地位。它征服了信基督教国家的人民，而这些人民被认为是生来就次于穆斯林的异教徒。后来，政界和知识界的领导人逐步地克服了这种固有的优越感并对现代的西方感到好奇，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具有现代头脑的领导人才在土耳其完全取得支配地位。

回顾一下过去半个世纪里日本和俄国存在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外国人产生猜疑的时刻，我们注意到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准备大规模借鉴外国的经验，不过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并按照他们自己的速度。早在七世纪，日本就开始前所未有地努力按照中国的模式来改革它的制度，但到现代以前的时代结束时，它却给自己判了单独监禁的徒刑。俄国却相应地广泛借鉴拜占庭的经验，彼得一世确立了他的时代的现代行政程序。在过渡时期里，旧的剧本在现代的伪装下重新演出，日本开始时出现了大规模借鉴外国经验的新浪潮，而结局是号召在日本称霸的情况下实现东亚“共荣”，俄国在革命后改变了向国外借鉴的方针，而谋求自给自足和发展独立的社会主义集团。

政治结构

巩固和统一行政机构的政策在日本和俄国同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也许甚至比早实现现代化的西方社会更深刻。日本和俄国作为独立和完整的国家有长久的历史连续性，到了十九世纪，两国政府已有很强的能力在地区范围和全国范围

动员技能和资源。统治王朝的作用由于拥有神秘的神授的权利而得到了加强，但是由于日本的行政权实际上委托给了他人，因此天皇的灵气主要到将来统一时才能发挥作用。德川时代日本的封建割据并没有掩盖走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中央集权的重大进展，在集权过程中大批行政官员在实际的行政管理方面取得了经验。在日本和俄国，稳定的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没有遭到自主的利益集团的重大挑战。在这两个社会中，重要的地区权力中心依然存在，但是这些地区结构里存在着统一的和完整的政治等级制度这一事实说明，有可能及早实行有效的统一。首先，在日本和俄国，超越家庭利益或地方利益而效忠于统治集团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相对说来尚未现代化的社会中，一般不存在这种首先效忠外部势力的情况。在现代以前，只有出现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或者在实际上使用权力时，才能使比较遥远的利益置于较为地方性的，归根到底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利害关系之上。在现代以前的世界里，具有日本和俄国所表现的能力的政治结构是罕见的，如要了解君主在世俗的和越来越职业化的行政机构的协助下促进中央统治的类似局面，看一看现代欧洲早期的专制主义大概是最合适的了。不过，这些欧洲的政治制度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也很可能不象日本和俄国那样集中和具有独立的合法地位。但是无论如何，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需那么集中，因为它们的变革所经历的时间较长，这也是事实。英国或许甚至需要某些自由放任的特点，而这对实现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将是有害的。

欧洲的君主不得不与地方当局进行斗争，甚至常常要与

教会势力斗争，在斗争中他们同乡村贵族和城市商人利益集团结成联盟，而这些利益集团很快又成为限制他们权力的新势力。在日本，佛教寺庙按习惯拥有的权力被十六世纪后期领导人进行统一的努力打破了，而在俄国，东正教按习惯拥有的权力被君主的神授权利所吞没。虽则商业和商人的力量在日本相当大，但根据儒家和武士的价值标准，它们从没有独立的或法律上的权利。而在专制的俄国，这些力量依靠国家的保护。结果是，日本和俄国的政府相对来说都没有受到特权阶层的限制，并能根据他们的理解实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到了十九世纪，他们还能达到高度的一致性而不必采取严厉的高压手段。

中国尤其在最后几个朝代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虽说如此，在好几个方面，中国对分配权力和资源的控制不象日本或俄国那样严格。征收税收没有恰当的政府方针作指导，中央政府的控制没有深入到乡村一级，官僚体制没有跟着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剧增而进行修改。中国的行政制度还被认为是循环性的，因此到十九世纪末，中国陷入了混乱状态，这种状态意味着有必要进行经过时间考验的改革，以便重新恢复有效的政府。中国幅员辽阔，行政结构比较分散，这也限制了对外国的威胁的认识和外国威胁的影响。

在过渡时期，日本和俄国的政府对整个村庄保持着严密的控制，同时削弱地区势力，加强中央权力。这些过渡性的政治控制措施的根子可以追溯到现代以前时期稳定的乡村自治机构，这些机构听命于外界的指示，服从国家的各种权力，这些权力集中在地区和中央一级，并能转变成为更加高度集中

的国家权力。从这些经验中可以得出的教训是，一个国家成功地从分散的乡村自治制度和地方自给自足状态转变成为权力较集中的制度，这对它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宝贵的基础。大多数国家不得不作出巨大努力来实行统一，并把控制和协调的新方法扩大到地方一级。根据新的需要实行的这种程度的协调和控制，首先必须促使以前比较分散的形式消亡，然后再使自己幸存下来。

经济的增长

按现代以前的标准来衡量，日本和俄国在生产和积累上还有某些共同特点。两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农业产量很高而且越来越高，虽则在俄国，这点并不表明亩产有很大的提高。在日本，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数字的不断增长是由于土地单位生产率高以及人口长期稳定。地区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业以外各业的发展，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全面增长的因素。在俄国，土地产量较低，但是人口密度也小得多。象在日本那样，越来越多的产品汇集起来使得国内贸易有了很大的增长，但与日本不同的是，这些产品也用来进行对外贸易。

为进行远距离贸易而积累货物在日俄两国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在俄国，大多数国内贸易是由贵族或者直接由农民经营的，在日本，则由手工业者和商人经营，他们满足以城市为基地的武士的需要以交换后者的大米或货币俸禄；或者直接由农民经营。与别的现代以前的国家相比，日俄两国有大批农产品涌入市场。在现代以前的时期，农产品从农村外流达

到这样高度的速度，部分原因是由于动员了上层人士（贵族或武士）和商人团体重新组织地方上的商业流通，去更积极地参与经营这类商业以及激励农民直接参与商业活动。赋税和城市费用的提高促使人们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从农村吸取大量剩余农产品。

在日本和俄国逐渐形成的商业方法，同以往在英国和法国出现的方法颇为相似。比如说，在日本和俄国较为城市化的地区，小型定期集市开始衰落，这与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在英国和法国出现的现象相同。在其他国家，尤如在中国，商业流通直到过渡时期才开始绕过集市贸易中心。

此外，新的工厂和手工业企业在农村居民点和小城镇的出现，表明大约从十八世纪中叶和末叶起，日本和俄国的手工业活动和最早的工业形式进入到分散经营的阶段。人们又可以看到，英国和法国在现代以前的时期的末期，也有一个类似的阶段，不过它开始的时间要稍早些。商业发展的势头很可能使得地方手工业能为大得多的市场服务。进入现代化过程比较晚的其他社会看来缺乏这股劲头。

社会的相互依赖

从社会一体化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到演变性发展结构最明显的迹象。到目前为止，在这些方面中，最受注意的是居住方式。

现代以前的国家有的是小规模的实体，没有任何城市；有的是有行政中心网，但是没有单独举行定期集市的居民区的社会；有的是拥有密集的城市和小规模市场网的规模巨大的

社会。比较一下这些城市网发展的速度就可以看出，日本和俄国的势头是罕见的，两国在一千年中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的发展是惊人地相似的。日本最初建立城市的时间和最初发展定期集市的时间都比俄国早大约两个世纪，前者分别是在七世纪和九世纪，后者分别是在十三世纪与十五世纪。不过，在最后几个世纪里，俄国现代以前的城市和市场网完成得比较迅速。由于圣彼得堡的发展比江户的发展只晚了一百年，所以日本的领先地位缩小到只有一个世纪，到了1800年，随着先进地区日常商业逐渐开始替代定期集市，两国在这方面几乎不相上下了。

到了十八世纪末叶，日本和俄国成了两个最大的社会，它们：(一)超过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平均水平；(二)农村与城市尖锐分化；(三)拥有人数众多的、流动的上层人士。西欧国家的人口没有那么多，而人口比较多的国家又缺乏其他三个特点。与这些居住方式有关的是存在着特殊的担任公务的贵族，比较有技能的人们以及按成就大小划线的不带个人色彩的关系。

在这些方面，日本和俄国又与英国和法国相似，但与中国和城市化程度较中国低的半个世界不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三个世纪里，日本和俄国在社会相互依赖的许多方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劲头。它们超过了中国，中国一直到十六世纪在城市的发展方面大概领先于世界各国。日俄两国逐显示出在英国和法国见到过的迅速变化的许多迹象。作为世界最大城市的新江户城的崛起和作为欧洲最重要城市之一的新圣彼得堡城的兴起标志着同以往的居住方式的决裂。

在十八世纪末叶的社会中，日本和俄国的人口集中于城市的程度是异乎寻常的。在日本，大批武士被要求交替地在全国行政中心和他们在地方上的城堡城镇里居住。在俄国，县一级地区实行统一管理时，贵族可以自由地移往全国两个中心城市。人数众多的流动的上层人士在俄国出现得比日本晚些，但他们的出现同样是以供养远方城市的强大能力作为基础的。它反过来又促使最大城市的典型方式扩大到全国。人数众多的流动的上层人士的存在，证明两国的发展达到了先进的阶段，它们进行控制和协调的能力特别强。

作为日俄两国明显的相似点挑选出来的社会相互依赖方面的许多因素，需要有流动的担任公务的贵族的存在。通过对消费品的需求，大城市兴旺繁荣起来了，为了满足它们的要求，农村中农产品的外流量增加了。在全国的中心和各地区，这些上层人物形成了新的社会条件。中国等其他社会则缺乏这种规模的经过训练的和动员起来的上层人士。实际上，在城市居民和上层人士所占的比例以及武士提供有训练的服务等方面，俄国从未超过日本。

知识与教育

日本和俄国在教育的各个方面也都很突出。两国最初开办新的学校是作为扩大对担任公务的贵族进行教育的一种努力。随着量才录用制度的发展，人们期望担任公务的贵族表现他们的才干，首先得有文化，然后以特定的方式继续他们的学业。就俄国而言，对科学和文化作出的宝贵的贡献证明，到十九世纪中叶，受教育在上层人士中间已很普遍。就日本而

言，学校教育已扩大到其他社会阶级，结果是识字率特别高。虽然在俄国最惊人的变化发生在最高一级教育单位，如建立研究院制度，而在日本，由于扩大乡村学校，最惊人的变化发生在最低层，但是两国都非常富于革新精神。

在实现现代化较早的国家中间，教育的重大发展也发生在现代化之前。与此相反，在中国（在那里，长期以来，要进入考取功名的上层人士的行列，必须进行多年的研究），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没有改进，可能民众教育还相应地下降了，这些看来是在与西方现代化国家往来之前的最后几个世纪的特点。

我们采取两个途径来对我们所作的比较得出结论。第一个途径是论述整个社会的控制问题。日本和俄国比较善于接受外国的模式，协调和控制的基础不是那么脆弱，这两种情况被认为与独特的社会控制结构有关。俄国人和日本人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政治隔离办法。与所有相对来说非现代化的社会一样，它们各自在分配权力和责任方面都极为分散，地方一级的生活喜欢集中力量来使当地的自给自足的程度保持在最大限度。但两国也设法建立了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中央一级协调和控制的手段相对来说既不受亲属结构变化的影响，也不受乡村结构变化的影响。就日本人而言，这种制度是"封建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中间没有拥有土地的诸侯，而中间有诸侯正是其他封建制度的特点，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一般地直接效忠于远方著名的单一的封建君主。就俄国人而言，这种制度是中央行政管理网，它不是由中层的诸侯而是由半专业性的起作用的人物组成的，人们集中地直接效忠于制度本

身而不是效忠于中层的诸侯。这两种行政管理制度由于人们压倒一切地效忠于国家并以国家为中心而得到加强，国家如果要迅速有效地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不断提高对协调和控制的要求。首先，两国的制度都明显地不因家族和村庄中权力的作用的不断变化而受影响，随着现代化的方向的变化，家庭和村庄中的权力的作用总是不断变化的。最后，在日本和较小程度上在俄国，领导人看来是理解这些条件的，并且明显地利用了这些条件。

在非现代化社会的历史上，控制结构的这种状况是极为少见的。在大多数非现代化社会里，对家族和村庄的效忠仅仅是一环接一环地集中到比较靠近中心的焦点，如果确实出现过这种现象的话。所有这样的制度都特别容易受对家庭和村庄进行协调和控制的模式的侵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家族和村庄本身总是分崩离析的。缺乏这些便于中央集权的条件的所有进入现代化过程比较晚的国家，都要革命性地（这是针对它们以前存在的社会结构来说的）建立急剧加强协调和控制的基础。恰恰是这种政治一体化看来目前正在中国成功地实现，而大多数其他搞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还远远没有作到这一点。日本和俄国的经验之所以这样具有启发性恰恰是因为它们指明了一系列的条件，别的搞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没有一个达到了这些条件，或者说不经过过渡时期就不可能达到这些条件。过渡时期本身看来具有实现现代化的特殊作用。

我们得出结论的第二个途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实现现代化有利的某些前提上，这个途径基于这样一种概念：在现

代以前的社会，生产技术、商业、城市以及有技能和有文化的人们一般是沿着进化的直线道路发展的。到十九世纪，在日本和俄国所见到的从农村抽取资源的能力、动员起来的上层人士的发展以及教育的改革，都是两国许多世纪以来变化的顶点。直到十六世纪，两国在商业化、城市化和提高文化方面并不显得十分突出，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它们也许比任何别的非现代化社会更接近于西欧的水准。两国进行现代化变革的能力产生于各种各样的前提，而这些前提是到了十九世纪在日本和俄国可以看到的现代以前的先进社会的标志。

第二部分 变革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和俄国经历了从现代以前的社会进入到现代化社会的根本性变革。本书在讨论这个漫长而复杂的时期时，主要考虑两国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达到目标的。为了进行对比，还有必要说明为什么在别的国家没有发生类似的变革的原因。同其他国家相比，两国在过渡时期的经验是相似的。我们还试图根据这些相似点扼要地探讨日本和俄国所特有的过程和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尽管识别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也即实现现代化应该做些什么，不象在第一部分中识别现代化的前提那样新颖，但对日本和俄国的变革进行的比较研究应该为研究现代化过程的新方法提供基础。

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概念作出发点，即认为在现代化开始的前夕，各社会所具备的现代化的前提在程度上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前提较为成熟的社会就能够更好地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条件，尤其是分配和控制的条件。除了指明日本和俄国在这个时期具有重要的相似点之外，阐明这些相似点与处于现代以前的时期的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弄明白在其它国家不具备这些前提中的某些前提，或者这些前提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运用别的方法或以别的形式来实现这些前提，这也是适宜的。

从对现代化的前提和要求二者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概念出发，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两个基本的革新过程在变革时期起作用：一是转化，即改造在现代以前的时期已经存在的特质；二是借鉴，即按照别的社会的模式建立新的制度和价值标准。任何大规模变革的具体例子很可能都同时包含这两个过程。转化是对新形式的或借用的模式而言的，而借鉴则发生在现有的模式的基础上。在已具备现代化主要前提的国家，如在日本和俄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转化。而缺乏某些前提的国家，转化的机会就比较少，而借鉴的必要性就相应地增加了。日本和俄国的例子具有指导意义，因为现代以前的模式的实质性因素可以转化为或作为过渡到现代化的基础。两国的历史同不具备这些前提的国家的关系可能比较少，但是作为说明转化和借鉴的相互关系的复杂性的一个例子，研究这两个进入现代化过程比较晚的国家进行变革的前提和要求两者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国家还是有益的。

虽说迄今一直强调同过去保持连续性，但应该记住，一般说来现代化并不是经过社会关系的突然革命实现的。最惹人注目的变革主要不是起因于现有关系的转化，而是由于建立了新的关系。新的关系的建立改变了旧的关系起作用的环境，这个事实常常对现有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农场的最革命性的变化通常并不是由于家庭关系直接转化所引起的，而主要是由于采取新的就业形式，一般就是城市就业所引起的。人们看到，在这些新环境中工作的机会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摆脱旧式依赖关系，从而打破了长辈们控制他们的行为的能力。较为客观地存在的、供选择的就业形式是革

命性的力量，而某一个农场的一小块土地上的工作条件的直接转化却不是革命性力量。

除了政府外，这种新结构的发展在社会行为的一切领域都是适用的。在政府里，关系必须是从旧到新的直接转化。至于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动员，政府必须采取一种新型的中央协调和控制。因而，在进行现代化的状况下，一个具有内在的革命倾向的典型领域就是政府这个领域。走向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有力达到新的社会过程所需要的那种程度的组织状态是很少的，更谈不上在政府领域本身达到实现革命化所需要的那种程度的组织状态了，除非失去稳定和控制。在这一点上，日本和俄国的经验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社会控制的问题在日本具有异常大的连续性，这个问题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也有特殊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以后几章中讨论变革时期一再出现的主题之一。

第八章　国际环境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最早进行科学和技术革命的西方国家的广泛影响，对日本和俄国是重大挑战。它们对付这种挑战的办法是广泛学习西方在制度方面的榜样。由明治维新（1868年）和大改革（1860年）开始的革命性变革，标志着日本和俄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开始。

日本和俄国在十九世纪对付西方军事挑战的方式、它们试图按照欧洲的榜样重新建立价值标准和制度的过程、它们认为德国和奥地利的制度特别适合它们的需要这种想法、以及它们广泛依赖西方技术的做法，有着一些十分相似的地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头里，这两个国家还认为，国际体制实质上是敌视它们的利益的，它们倾向于结交同样持异见的德国，并从德国得到援助——俄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尤其是这样，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是这样的。

但是，日本和俄国所参加的战争，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却是惊人地不同的。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是战胜国，因而国威大振，它在国内进行谨慎的改革，在国外进行扩张的政策得到了认可。然而在1905年和1917年，俄国都遭到失败，每次失败以后都爆发革命。1917年10月至11月的革命，从它试图实现变革这一点来说，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要激进。与此相反，在这个阶段，日本的上层领导保持了引

人注目的连续性。结果，尤其在那些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影响的人看来，日本和俄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是对抗性的，前者是“资本主义的”(或者说，后来是“法西斯主义的”)，后者是社会主义的。

西方对日俄两国国内改革的影响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的失败，其后果与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对外贸易而得到满足(1853—1854)这件事是相似的，这打乱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俄国在几年之内就通过了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借用了十七世纪以后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方体制。在俄国，变化不是那么突然，改革不是那么激烈，因为它的体制和价值标准从彼得一世时代起就已以西方为榜样了。日本进行的改革要激进得多，因为它离西方军事力量的中心比较远，它的东亚邻国较弱，以及不存在直接的军事威胁。

这两个国家在技术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面前处于屈辱地位。这种屈辱的时机、性质和后果，在形式上非常相似，但在实质内容上却十分不同。从十八世纪初叶起，使国内体制适合西方制定的行动准则的过程一直是俄国的国策，因此，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已经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参与国。俄国在击败拿破仑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在1830年和1848年西欧进行革命期间所保持的相对的稳定，都使它产生了力量和自信感，因此，主张维持现状的官僚和知名人士的影响自然超过了潜在的改良派的影响。从俄国的国际地位来看，它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只是一个比较小的挫折。虽然如此，这

还是表明了俄国的虚弱，结果，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得有利于那些要求按西方的路线对俄国的体制作比较彻底的改组的人。在十九世纪前半叶曾为争取改革而进行斗争但成效不大的那些势力，没有采取政治暴力，只利用现行的体制和程序，就控制了政治舞台。

1854年日本在军事上没有遭到失败，但是，由于摇摇欲坠的幕府未能阻止日本开放对外贸易，德川的统治终于在1868年垮了台。新政府由年轻的武士们控制，他们懂得，如果日本在技术上比不上西方，那么它就会受西方的摆布。他们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就致力于迅速加强日本的国力。日本的改革与连续性决裂的程度比俄国大，因为日本在此之前受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微不足道的。然而，虽然明治的决定只执行了几年，但是在日本的港口于1859年开放以后，根据德川政权最后十年中事态的发展，作出这一决定是人们预料之中的。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幕府和好几个藩一批批地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他们雇用了一些外国专家。他们利用派到西方去批准条约的使团作为向外国学习的使节。幕府在它的最后几年里，转向法兰西第二帝国，要求它提供军事、技术和组织上的援助。

这两个国家都指望以欧洲的榜样作为改革的基础，用这种办法来对付比较发达的西方的挑战。俄国已习惯于走这条改革的道路。而对于日本，这种经历只有在一千年以前与中国的关系中才有过它的先例。对于俄国来说，比较近的先例是彼得一世开创的，也就是派遣政府使节去探究那些被认为最适合俄国具体需要的外国模式。日本接近欧洲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它对它以前同中国的关系记忆犹新。

然而，在明治时代日本抛弃了中国，这是由于十八世纪文化上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日本对它的历史和传统越来越感到关心，使其国民自觉意识到，从七世纪起，日本发展的方向就与中国大不相同。但是，那些鼓吹实行中央集权制和建立比较开放的社会（“能人统治”的社会）的人，可以举出中国和西方的例子来说明，日本与任何人都是步调不一致的。

在体制方面，俄国和日本主要以中欧为榜样。德意志和奥地利官僚帝国的制度，看来比法国或英国的制度更适合俄国和日本。作为在欧洲范围内“实行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德奥两国在中央集中控制的基础上发展了军事力量。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已作为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赫然耸现在欧洲，它的成功使它享有独一无二的威望，成为别国仿效的最合适的榜样。俄国1861年的农奴解放法的条文，主要是根据奥地利1848年土地改革的经验制订的；1864年的司法改革是按照欧洲普遍的法学原则进行的；1874年的军队改革是按照德国的先例进行的。威特和他的同事们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起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包括确立权力有限的议会制政府形式的1905年十月宣言——主要是学奥地利的榜样。

日本利用西方体制的范围比俄国广泛。它运用美国的专门知识进行早期的教育改革和开发北部，向北海道移民，使北海道成为坚决顶住俄国压力的界线。在计划建立集中控制的银行业时，采纳了法国的意见。在海军和海运方面，以及在工业和铁路部门，英国的影响占优势。但是在建立军事和政治制度方面，日本的领导人也发现德国和奥地利的模式特别合他们的心意。和俄国的领导人一样，他们也试图使这些模式

适合他们自己的社会和传统，但是最后结果很少能达到外国顾问们的期望。

这两个国家都广泛地依靠外国人，但是它们雇佣外国人的方式都是截然不同的。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吸收西方顾问是很容易的，其中许多人成了俄国的公民和永久性居民。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有无数的外国人以政府的和私人的身分到俄国的行政部门工作。许多高级官员也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日耳曼人和来自芬兰的瑞典人，他们虽然是俄罗斯帝国的公民，但是他们受的教育和世界观却是中欧的。这种广义的西方人不仅担任顾问，而且长期在政府中担任最高级的职务。据估计，从1700年到1917年，在政府中担任最高职务的大约二千九百个人中，有九百多人的姓名表明他们是西欧人和中欧人。

日本没有发生类似现象。那里不存在吸收欧洲人的问题，而是期望和鼓励外国雇员在完成其任务以后离开。在明治时代，日本大约雇佣了二千名外国人，主要是在1870年以后的头三十年中雇佣的。除了军事部门外，各国顾问主要使用英语。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部分顾问都是民间雇佣的。一般说，他们呆的时间比较短，他们从未取得日本的国籍，因为日本人把他们的专门知识迅速变成日本自己的了。这个经验再次着重说明了岛国偏狭性和同种性在日本经验中的重要地位。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数以千计被派往国外留学的日本人，远比他们重要。这种留学的潮流开头是猛烈地涌向美国和英国的，但是德语和德国的经验逐渐变得更为重要了。

这两个国家在这个变革阶段还大量依赖西方的技术。在

此之前，俄国发展现代工业大约已经有两个世纪；在十八世纪，它们某些领域已经相当先进了，但是到十九世纪中叶，它就比不上西方了。采矿和金属加工技术、电气和化学工业所用的机器，大部分是由外国企业家带来的，这些外国企业家还提供了最初的管理技术。然而，俄国的企业家在国家的支持下，保留着对这些事态发展的控制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这种新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俄国人掌握了。

日本最初依赖外国技术的程度，远比俄国来得大，因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日本人实际上还不知道什么叫现代工业，他们必须修建完整的工厂。在开始阶段，日本几乎全部依靠西方，但是日本的学习进程比俄国快，到1914年，日本人掌管生产和管理的程度就比俄国人高。到1900年，俄国的工业投资大约有三分之一，银行的资金差不多有一半是外国人的，与此相反，西方资本对日本工业化所起的作用就比较小。

帝国主义时代

在十九世纪，有些人认为，在战争中取胜比在市政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更能证明现代化的成果。日本和俄国都把发展陆军和海军放在非常优先的地位。由于实行军国主义化，两国人民的赋税负担是沉重的，也是差不多的。两国各自面临的挑战，有一部分是由于它们意识到两国的利益互相冲突这一事实造成的。在十九世纪的同时代人看来，俄国和日本作为竞争者，相差悬殊。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俄国扩大了它的辽阔领土，从中国夺得了阿穆尔和滨海省（1858—1860），得到了高加索（1859年）、布哈拉和契瓦两个汗国（1864—1865），

从中国获得了修建横贯满洲的中东铁路的权利(1896年)，两年以后，即1898年，获得了修建将南满铁路与旅顺连接起来的铁路的权利。旅顺是它从中国租借来作为海军基地的。下一步就是同日本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

从日本方面来说，它一直在扩大它的领土：并吞琉球群岛(1874年)和小笠原群岛(1875年)，以及通过边界条约的谈判(1875年)，得到了千岛群岛，而把萨哈林岛划归俄国。1876年，日本用炮舰政策迫使朝鲜开放贸易，这同西方原来对付日本的方法如出一辙。1895年，日本打败中国，并吞台湾之后，被欧洲国家承认为现代国家。到1894年，日本终于结束了它曾同西方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地位，但是由于俄国、德国和法国的非难和"三国的干涉"，它没有能保持住它在战争中获得的在旅顺和大连的利益，这使它感到怨恨不已。此后不久，俄国得到了南满的租借权。在1900年中国的义和团之乱以后，俄国军队占领了整个满洲，并威胁朝鲜。1902年，日本与英国结盟，这标志着它第一次被承认是一个欧洲国家的伙伴，并使得日本的领导人们可以把注意力转到俄国在满洲和朝鲜的威胁上。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隔黄海相望的日俄两国在实力方面的差距，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日本的面积和人口只及俄国的一小部分，日本面积为十六万五千平方英里，人口四千六百万，而俄国的面积为八百六十六万平方英里，人口一亿二千九百万。日本的主权受到它同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限制，这些条约规定西方列强的公民享有治外法权。即使按照1894年作出的安排，日本对进出口商品征收的税

也受到限制，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911年。但是，日俄战争是在日本领海附近打的，日本人的装备比较好，日本军队指挥比较得当，目的比较明确，这些因素弥补其它方面的不利条件绰绰有余。在日本对旅顺发动第一次进攻(1904年2月)以后的十六个月内，日本击败了俄国军队，并击沉了俄国海军的大批军舰。根据1905年签订的朴次茅斯条约的规定，日本得到了萨哈林岛的南半部和俄国在南满的利益，而且对朝鲜可以放手干了。五年以后，日本并吞了朝鲜。

战争对日俄两国国内的影响，反映了战争结果的性质。在日本，战争的胜利证明了优先加强国力的政策是正确的，从而鼓舞了主张日本在亚洲大陆发挥有力的作用的倾向。在俄国，这次失败的影响同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的影响差不多，战争中政府经不住外国的考验，于是主张维持现行秩序的势力削弱了。这次的主要教训又是以下两点：俄国赶不上它的对手；如果俄国不作极大的努力来实现工业化，不改革教育，不改善公共福利，那么它还将遭到更惨重的失败。在大多数日本人看来，战胜俄国，就象在此之前战胜中国一样，证明了建立现代制度，尤其是实行宪政的效果是好的。在俄国，受过教育的公众认识到有此必要，但是沙皇及其许多主要官员则没有认识到这一点。1905年的失败比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遭到的失败更直接更猛烈地导致革命，而要使这场革命了结，只有在政治上作出让步。然而让步是有限的，没有几年，这些让步在很大程度上就被取消了。俄国许诺实行宪政从来没有象日本领导人那样自愿或全面，无疑，一部分原因是俄国落后于西方从来没有这样明显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的影响，尤其是对俄国的影响要深刻得多，但是影响的方式又是非常不同的。这两个国家都把德国当作主要敌人，但它们不是作为盟国同德国作战的，而且它们同德国作战的原因也很不相同。日本领导人把欧洲的战争看作是他们排挤德国势力及在东亚占优势的机会，他们的这种策略是成功的。他们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中，试图巩固他们对满洲和中国的租借地的控制。在俄罗斯帝国在1917年被推翻以后，他们情不自禁地再次向北推进。但是具有更为长远重要性的是，日本得以利用欧洲国家忙于战争，无法同它竞争的机会来发展经济，使工业得到引人注目的增长，同时加快了社会改革。然而，随着明治天皇的逝世(1912年)和第一代搞现代化的领导人的亡故，日本不再有能起同样团结作用的行政领导核心了。日本开始分裂为文官、军人、政党和商业—工业利益集团了。

给日本带来繁荣的战争，导致俄国帝制的垮台。当陆军中的一些人于1917年初在圣彼得堡叛变时，沙皇接受了退位的劝告。随之上台的临时政府在其执政的九个月中，按照欧洲自由主义的模式，通过了一系列的改革法令。但是它决心用已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军队和在帝国被推翻之后保留下来的官僚机构继续进行战争，这种做法促使临时政府被推翻。由于在1917年里情况变得越来越混乱，在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就抓住机会夺取了政权。造成帝国崩溃，此后不久又造成临时政府垮台的原因主要是战争还是国内问题，人们对此看法不一。但是没有什么人否认，战争造成的极度紧张是爆发革命的关键因素。

欧洲秩序的瓦解，使俄国和日本有新的机会来奉行独立的政策，虽然它们实行这种政策的目的和结果是异常不同的。这次战争大大削弱了欧洲各国政府在东亚的势力，它们的势力由美国取而代之。在以后的二十年里，日本的政策主要是它为适应这些新情况所作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日本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最后，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看来威胁着日本在满洲的利益，促使日本军部鼓吹并实施向亚洲大陆推进的政策。

俄国新的领导人也认为，欧洲秩序的崩溃是他们奉行新政策的好机会，列宁在1917年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受国际环境的强烈影响。不仅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起源于西欧，同世界范围的社会发展有关，而且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把俄国的事件同整个欧洲的危机直接联系了起来。他相信在俄国进行革命是可能的，他的这种认识是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即俄国的革命将是由战争引起的整个欧洲的革命的一部分。最后当俄国的革命获得成功，而其它地方的革命没有实现时，列宁得出结论说，至少"资产阶级"国家的无产阶级没有让他们的政府对俄国的反革命干涉得逞。这个问题很快就成了学术问题，但有意义的是，如果列宁不认为俄国的革命是得到那些他认为比俄国处于更高发展阶段的国家支持的整个欧洲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那么他很可能不会着手去推翻临时政府。

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

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里，日俄两国同国际环境的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它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苏联是在比较孤立于

外部世界的状态中发展的，其部分原因是它的传统的政治伙伴和贸易伙伴排斥它，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必须先把国内整顿好。它首先要克服战争、革命和内乱造成的毁坏，然后才能再次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竞争。另一方面，日本在战争结束以后成了国际事务中远为有力得多的参加者。苏联的对外贸易额在1917年以后急剧下降，而且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里没有重新达到战前的数额；而日本的对外贸易即使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年头里也继续迅速扩大。根据和约的规定，日本作为托管国获得了德国在太平洋的领土，取得了（一直到1922年）德国在中国胶东半岛的权利，而且作为五强之一，获得了在国联理事会中的永久性席位。然而，俄国由于战争失去了大片领土，并且没有参加国联的建立。

虽然日俄两国有这些不同之处，但是在这个时期里，显然也有一些类似的因素。这两个国家都继续广泛依靠外国技术来发展它们的经济。日本主要由私人引进外国技术，因为私人企业要改善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与此相反，俄国引进外国技术是国家的一项政策。苏联在五年计划期间增长得最快的工业部门，都主要依靠美国、德国和英国的技术，这些技术主要是通过苏联国营企业同外国个别公司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得到的。

俄国和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都继续奉行以德国模式来发展经济的方针。对俄国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革命成功以后的头几年里，俄国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德国最有可能走在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各国的最前面，大部分俄国经济学家和工程师是按照德国的传统训练出来的。实际上，德

语是新一代苏联技术人员所熟悉的主要外国语。德国在战争时期制订经济计划的经验，对列宁及其继任者的经济观点也有很大影响。其它国家对俄、德两国的排挤，进一步促使俄国倒向德国，使得它们互相谋求对方的支持。1922年拉巴洛条约的签订，是这种共同利益的生动表现。这项条约签订以后，俄国和德国的贸易迅速增加。在这几年里，俄德两国还根据协议，在军事方面秘密进行合作。根据这些协议的规定，德国可以在俄国的土地上研制武器，从而逃避裁军的义务，作为报答，德国让俄国人分享它的军事技术。

在这个时期，日本人民大众的文化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在学术、医药和技术领域，德国的影响仍然很大。日本和德国在和约中也都遭到挫折，日本遭到挫折是因为日本想申明种族平等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德国遭到挫折则是因为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很苛刻。1922年，英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结束了同日本的联盟，并且同美国一道限制日本的海军力量。从此以后，美国和英国就成了日本在亚洲取得领导地位的主要障碍。两年以后，美国通过了排斥东方人的法案，大大削弱了日本国内亲西方集团的地位。尽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和德国的国内政治制度很不相同，但是在这两个国家，与军方关系密切的“激进的右翼”也都得了势。在日德两国，传统的政党逐渐失掉威信，新建立的制度期望动员全部国力，以达到用武力解决国际问题的预期目的。虽然上述事态基本上是分别地、平行地发生的，但是它们的根源同属于类似的环境，而且至少在两国于1936年签订的反共产国际条约中得到了象征性的共同反映。这项条约不仅反映出日本和德国与共

产主义势不两立，而且也比较笼统地反映出它们对当时的国际秩序感到不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日本和俄国的交往只限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现在两国也都互相施加重要影响，而且其程度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日本的领导人认为，俄国的内战是他们的国家在东亚加强地位的好机会。在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使日本的地位保不住之前，他们从1918年到1922年在西伯利亚驻扎着一支远征军。后来日本撤军，两国在1925年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没有过几年，由于日本向满洲扩张，日本和俄国在政治上又发生了对抗。不过日本在对苏联的远东部分进行军事威胁的同时，没有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施加影响，所以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取得的重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引起苏联的注意。

苏联对日本则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苏联发展的例子，对日本激进批评者的思想产生重大的影响。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在整个二十年代，马列主义在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虽然如此，共产主义并没有在日本深深扎根，由于宗派斗争和警察的镇压，这个运动在三十年代就慢慢衰落下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最迫切的需要是保证国家安全，事实证明，这比过去二十年的斗争更重要。苏联除了同纳粹德国缔结条约以外，还对日本采取安抚措施，尽管1938年和1939年在满洲与苏联的边界的一些地方发生过两起严重冲突。1941年，俄国和日本签订了保守中立的条约，为的是在它们集中力量于其它方向的时候，保护它们在东亚的共同边界。

当日本在1945年准备投降时，它曾希望苏联在日本同它的对手英国和美国之间进行调解，但是，俄国人不但不调解，反而对日本宣战。虽然如此，两国间激烈的敌对行动，只在1945年进行了一个星期。

国际比较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受到西欧国家的深刻影响，西欧国家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成就发挥着卓越的作用，虽然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严重地削弱了和分裂了，但是在1945年以前，它仍占有重要地位。这种领导作用对其它国家的人民是一种挑战。在北美、南美和大洋洲的欧洲人的后裔，接收了数量空前的来自欧洲的移民，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欧洲人的后裔到二十世纪中叶在工业生产率方面已经赶上和超过了欧洲。许多亚洲国家的人民和大部分非洲人受欧洲的统治，继续处于殖民地的地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结束。奥斯曼、中国和波斯等国虽然在西方的压力下削弱了，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们仍然是独立的国家，并在1918年以后开始实行现代改革计划。暹罗和阿富汗抵消了对手的压力，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由。只有俄国和日本响应比较现代化的西方的挑战，对它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挤进了工业和军事大国的前列。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蒙受的耻辱、日本因佩里迫使它“开放”门户而蒙受的耻辱，使得这两个国家比较孤立的和与世隔绝的上层人士瓦解了。俄国的失败使得那些鼓吹改革体

制的人们处于当权地位，而日本的丢脸导致德川政府被推翻，由上层的武士取而代之，这些人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作为加强国力的一种手段。这两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都是为了作出反应，或者说为了防御，但是它们的步子都大大超出了它们的领导人最初认为是合适的或必要的程度。这方面的成功，使得日本和俄国有可能同早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合力，把它们的注意力放到不那么发达的邻国身上。俄国对削弱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是起了作用的；日本在"开放"和封闭朝鲜以及在1895年以后压迫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这些事件都是在西方技术和帝国主义占支配地位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从1839年到1895年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因而受到严重破坏，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它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差一点被灭亡。英国完成了它对印度次大陆的控制，荷兰完成了它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控制。在十九世纪末，非洲也被欧洲列强瓜分了。日本对这些事件的反应特别强烈。日本的领导人认为，他们的国家的独立受到了威胁；他们认为，他们的对手由于推行殖民主义而变得更加强大。他们一心想赶紧攫取那些可能还没有被瓜分掉的地区。日本作出这种反应是国际环境造成的。

同样的环境也促使日本和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在联盟体系中扮演相反的角色。俄国在英国和日本结盟之前就已经进入了满洲，但是在日本于1905年战胜俄国以后，这些紧张关系由于俄国和日本签订以1916年两国结盟为顶点的一系列协定，而逐步得到解决。由于日本力量的增强，以及它逐渐采取同美国敌对的态度，促使英国设法同华盛顿

签订一系列的条约来代替日英联盟。这个结构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它没有让俄国参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的联盟体系以及促成这种体系的大多数帝国。日本在俄国不与它结盟的情况下，试图巩固它自己在东北亚的安全，在英国不同它结盟的情况下，在中华民国试验单方面的策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和俄国都感到，国际环境对它们是不友好的。俄国人被排除在各种国际理事会之外。日本人发现，现在人们以非难的眼光看待他们最近才建立的控制地区。这两个国家都试图促进它们在中国的利益。俄国人用建立共产党和帮助国民党政府的办法来促进他们在中国的利益，而日本人则用支持反国民党的军阀的办法来促进他们在中国的利益。1925年，日本和俄国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军方领导人却都在准备进行战争。日本的强硬路线派认为，"1936年的危机"是苏联的经济计划在军事上开花结果，保证它能占优势的日子。

日本和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事实上被一种处于孤立和二等地位的心理所支配，这与西方大部分地方多国结合在一起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种气氛中，早先发展的工业、"先进国家"集团成员的巩固地位，以及原料的充足来源，这些因素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曾经不得不为打入国际秩序而奋斗的德国，提供了一些例子，这些例子或许有助于说明德国的制度为什么对日本和俄国有吸引力。但是即使如此，德国由于其地理位置在欧洲的中部，具有国际意识，知识先进，所以不那么害怕外部世界的威胁，而日本和俄国在思想上的特点就是害怕外部世界的威胁。美国既安全，又不缺原料，

因此与日本和俄国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对照。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周围的掠夺性国家对它的威胁，远比日本或俄国经历过的威胁要大，它的内聚力也不是那么大。它连续遭到灾难，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它早就消失了，这些都反映了这种敌对的环境。中国的国际环境也比日本不利。西方列强到中国来的时间更早，它们的胃口更大，它们对中国边缘省分的控制更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中国来说，事实证明这些国家中最令人厌恶的是俄国和日本。俄国对中国北部有领土野心。日本则把权力通过商业和制造特权获得的新的利益，统统写进1895年缔结的下关和平条约里，然后再进而发展其领土野心。

在世界上受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广大地区里，其它国家独立作出的政治反应是有限的，已经发展起来的现代部分一般是作为帝国主义国家本身的补充，并受它们的抑制。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种制度第一次出现紧张局面，此后，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由于西方反帝气氛日益浓厚而得到好处。

在世界上发生经济大萧条以后，欧洲国家的影响逐渐削弱，因此人们认为，在欠发达国家中，苏联和日本最可能成为达到先进发展水平的后补者。事实再次证明，世界大战对制度的生命力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苏联取得了胜利，在以后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必须对它自己的制度进行改革。日本失败了，并且经历了在外国指导下的另一次全面改革。这两个国家都经受住了考验，作为实行现代化的社会，它们的国际地位提高了。

因此，日本和俄国实行变革的国际环境，其特点是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影响日益扩大。随着这种影响而来的是，需要不断加强军备，参加帝国主义时代后期各种变化不定的联盟，因为日本和俄国都在为摆脱在国际竞争中起步晚的不利条件而奋斗。它们为在其周围国家取得一席地位而斗争，它们在斗争中发现，比较起来说，它们受到资金不足的限制，有意要求得到优惠地位，这项政策使它们同西方世界资金比较雄厚的贸易大国发生冲突。日本和俄国的特点是，它们的领导人学习西方拼命保卫主权的榜样，迅速得出这样的结论：应当把军事上的需要及其所需的支援力量放在特殊的优先地位。这两个国家除了竞相争取外国的好感和保护以外，迅速成为与早已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结成的联盟中的中坚力量。它们都谋求通过增加对周围国家的卷入来促进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安全。

第九章　政治结构

在日本和俄国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政治历史中，危机、革命性变革，以及改变旧格局以适应新的需要等主题占支配地位。当两国政府对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的开支实行控制时，两国的制度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批机构建立起来了，有的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的是学外国的榜样建立的。所有这些变化进行之快，令人头晕目眩，它们使社会生活的方式变得几乎无法认出来了。

政治生活发生了变革。在俄国，专制制度起先变成欧洲式的显赫的君主政体，然后又成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日本在1870年以后的头二十年中则从封建割据的、分散的王国发展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的国家。虽然这些新的制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采取的形式是危险的和不稳定的，但是到了1941年，当代政治秩序的所有主要因素，不论在俄国还是在日本，都已存在。在这两个国家，进行变革的形式很不相同，有时似乎难以找到任何相似之处。但是，不应当让重大的不同之处掩盖某些基本的相似之点。

日本的变革时期是从1868年开始的，当时进行了称作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这些改革最终涉及到国民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其口号是"富国强兵"，目的是取得同西方列强同等的地位。由于日本以前同西方的交往不如俄国

深，因此这些改革中的某些改革——采用公历，向西方派留学生，推广新的服式——同彼得大帝很久以前实行的改革差不多，但是与同时期的俄国“大改革时期”（1861—1873）相比比较合适。

明治维新的范围可以通过列举1868年“宪章誓约”(Charter Oath)中公布的意图来说明，这个文件的内容很全面，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行改革时又援引它作为依据。此文件分五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政治上的集中。好几百块贵族领地不久就被置于中央统治之下，并被合并成七十五个县，后来又被合并成五十个县。封建领主拿着养老金隐退了。誓约中答应成立“议事会”，保证国家事务将在取得某种总的一致意见以后作出决定。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平等。全体日本人都得到保证，他们将有机会实现他们的“愿望”。很快调整了社会阶级界线，废除了武士，用平民军队来代替它，并使平民有机会受教育。农民有了称呼，并得到了对他们的土地的所有权。日本向“全世界”寻求知识，不久，数以百计的学生被派往国外，大批外国教师被请到日本来。政府领导人出使西方进行观摩。最后，往昔“荒唐的习俗”将被废除，封建自治制度下不切合实际的作法将被取消，封建阶级的效率不高和节约法令实行不力的现象将被终止。

俄国的“大改革”不是那么面面俱到，并且不那么富有革新精神。但是从1861年到1864年农奴全部被解放了，象日本那样，成立了新的地方议会（缙绅会议)。对法院审判制度作了全面改革，实行陪审团制度，为了使新的司法机构得以运转，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出现了。军事体制以德国为榜样进行了

改革。还建立了管理高等教育的新的规章制度以及颁布了鼓励和控制传播新闻和消息的新措施。明治国会的成立只比俄国的杜马早十六年。

明治维新，就其影响来说，超过俄国同一时期的改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治维新是"革命性的"。俄国在进行这些改革之前，已经实行了一个多世纪模仿西方的措施，因此它只要在现行格局中增加一些新制度就行了。所以，以前的许多做法虽然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是还是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加强。明治时代的那些以宪法、教育法令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民法典为主的法律构成了一个整体，其中大多数法律一直实行到1945年。俄国从1861年到1917年也企图制订一套执行时间差不多长的、同样与起主要作用的政治传统相一致的法律，但是事实证明，这些企图未能实现。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俄两国的改革派领导人忙于试验实行宪法和议会制度，在俄国，这些试验具有反对当时的政权的性质，而在日本，它们大部分是支持现行制度的。日本的那一套法律越来越有力量，而且随着教育的巩固，变得越来越神圣不可侵犯了。而俄国想制订的那一套法律，则受到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批评。

十月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制度的形式和政治的社会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革命不仅对俄国的历史，而且对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头等重要的事件，因为它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此过程中树立了一个其它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学习的榜样。一个新的领导集团出现了，它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唯意志论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它为了干

预现代化的进程，成为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所进行的活动是正确的。这个领导集团是通过法律来行使权力的，这些法律从表面上说，与俄国以前实行的法律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因此同西欧发达国家的法律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十月革命使俄国和日本以后的发展截然不同。

尽管日本和俄国从此分道扬镳，但是这两国的政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都一心一意解决建立新的权力中心的问题。到那个时候，在历时半个世纪的明治时代支配日本生活的寡头统治已经结束，留下对立的利益集团互相争夺权力。在这个斗争中，最终是军方获得了胜利。与此同时，俄国的革命在法律上解决了权力问题，但没有在事实上解决权力问题。斯大林及其重新组成的共产党上升到极权主义的权力顶峰，这至少可以说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作的努力。然而，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俄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这些解决办法，其寿命都不比制订这些解决办法的人的寿命长多少。

不断变化的情况和共同的反应

在整个变革时期，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某些普遍的情况，任何执政的政府都必须对这些情况作出反应。首先，如前所述，这两个国家都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国际环境，在这种国际环境中，要保持孤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卷入全球事务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形势下，整个变革时期两国的军事预算都是很庞大的，这种预算使各政府掌握了经济杠杆，并可以要求人们效忠于它们，而在其它情况下，人们可能是不效忠于它们的。

第二个情况规定了两国政府的活动范围，那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兴起及其社会后果。这些力量加在一起，大大地扩大了税收的基础，并使这两个国家的全国人民都在政府政策的直接管束之下。由于人口在地理上更加集中，就有可能，甚至有必要加强控制。客观形势也要求人们更加广泛地参加政府作出决定，而领导人则希望人们支持政府的决定。在俄国，先是临时政府，然后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宣布举行普选，日本在1925年举行(男子)普选，这些普选仅仅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

随着工业的兴起，现代技术得到了发展，铁路和邮政、电报、电话等通信系统中应用现代技术也多起来了。这两个国家都大力依靠铁路运输，但是由于日本的领土面积小，所以它的铁路运输网比较好。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内电报的数量和电话机的数量方面，日本的通讯系统到1914年比俄国先进。日本的发展速度很快，到1939年，它拥有的电话机约为苏联的三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电报数量为苏联的两倍。收音机的拥有量和乘汽车旅行的人数都出现了类似的、越来越大的差距。

在这两个国家安排工作的轻重缓急时，地理因素当然都始终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变革时期，在俄国统治的广大地区，人口的差异比日本大得多，因此，它更加需要扩大通讯网来作为统一全国的手段。日本由于通讯技术发展速度比较快，政府似乎不那么需要用行政性的政策来实现国家统一的目的。然而在一代多人的时期里，明治时代的领导人把国家的统一和加强国民的意识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与此同时，苏联却有意用通

讯、行政管理、教育和发展经济等作为达到国家统一的手段。

在这两个国家中任何一届政府都必须考虑的第四个情况是，各级管理机构的规模迅速扩大，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正如工业企业的扩大和复杂化一样，人口的增长和集中也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俄国政府很快就遇到这种局面，因为早在1900年，国家预算（按人口平均计算）就比日本高百分之七十。尽管如此，这两个国家中大工业联合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增长，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促使它们采取复杂的管理形式，而在俄国将这些企业收归国有以后，这种推动力进一步加速了。

在预见和计划这些变革的过程中，日俄两国政府在治理社会方面作出了特别优异的成绩。按照当时的标准（当时还未有过制订国民计划的真正的先例）来衡量，光是这个因素就使日本和俄国不同于大多数其它国家。两国政府认为，进行这些改革是合乎需要的，它们竭尽全力来加速这些改革的实现。即使在求助于意识形态，不那么注意这些事态的某些发展时，国家活动的目标也是促进这些改革所推动的合理化生活。

在某些活动中，中央政府本身发挥了中心的，而且往往是支配的作用。虽然两国政府进行指导的方式和范围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1917年以后更是这样，但是两国社会基本上都同意这样一种思想，认为政府应当监督和指导发展过程。日本由于资源和技术力量不足，需要由中央进行指导。在明治时代初期，国家建立了水泥、玻璃和机床等工业。它还向私营企业提供信贷、补助和技术援助，在1884年通过了发展工业的十年计划。政府提倡个人可以自由拥有土地，这也是国家指导的一

个方面。在俄国，国家解放了全部农奴，后来在斯托雷平的那个部的领导下，它还提出将土地所有制变为私有制。虽然在明治时代的头几年，日本也进行了同样全面彻底的改革，但是俄国政府却坚持试图改变社会的结构，而且在范围与所作的努力方面，往往看起来超过日本的政策。日本的经济格局一经确立，国家就不再采取措施来控制佃户和工厂的情况了，这大概是因为国家不愿意打乱随着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社会力量的平衡。与此相反，俄国政府变得更加积极了，1917年以后——尤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9—1932)——着手消灭全国各阶层，特别是拥有土地的农民的财产基础，以有利于它所保护的那几部分人。

在这两个国家，人们想到作了这些努力以后，日本和苏联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欧洲和北美比较先进的国家的日子更近了，因而可以认为，进行这些努力是正确的。由于作了这种努力，两国在整个变革时期的政治经历就一致了。它们的共同目标是争取国家平等和加强实力，这大概比任何其它因素都更突出，这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几代人的时期里政府制订决策过程的最显著特点。

然而，俄国和日本政府愿意发挥领导作用这个事实，并没有使它们与大多数其它晚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倒是两国政府能够产生一个官僚机构，而这个官僚机构能够领导这种改革，而不使这种改革窒息这一点，使它们与众不同。在帝俄和日本的明治时代，政府领导人同主要企业家和工业家密切合作，在更换领导人和分配领导职务时没有遇到什么阻拦。因此，两国政府很少做力不从心的事情。相对来说，一直

没有因发生丑闻而受到严厉谴责，至少在发展经济的领域里是这样。俄国政府在进行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把一切工作都揽到自己身上，这种做法在管理上产生了严重问题。但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个新的、效率相当高的管理人员阶级成长起来了。

领 导 层

在整个变革时期，俄国和日本的领导集团以精力充沛和目标一致著称。在日本，领导的这种特点在明治时代实行寡头独裁的政府及其所领导的最初几代官员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革命以后的俄国，由于现代的学校和党组织开始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管理人材，这个特点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这两个国家，由民选代表参加的正式机构——国会、杜马和苏维埃——对于决策所起的作用，不如上层管理人员（在苏联则是党）的意见重要。在俄国，个人的坚强领导所起的作用胜过日本。然而在这两个国家都存在着对上级——天皇、沙皇，后来是党——表示顺服和效忠的表现，通过公认的和有力的机构操纵政治生活的统一的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得到了肯定。

在日本和俄国的政治生活的演变中，最主要的决策是使各自的帝政遗产适应在社会和制度经过改革后出现的新需要。在日本，明治时代的领导人是在要求恢复皇权的号召下上台的，他们致力于恢复天皇的职能。他们实现这个目标是靠提请人们注意天皇是国家统一的象征，是靠把宫廷从京都迁到东京，使这个新的首都合法化，并使宗教礼仪的职能和行政管理的职能统一起来。但是，虽然公开宣布实行“开明的君主统

治”(明治)，但这位君主却没有进行统治。以他的名义就足以使他的政府的大胆行动具有合法性，如果不以他的名义，那些行动就没有合法性，宪法是他白白赠送给他的人民的礼物。与此同时，天皇的职能仍然是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但不是与任何具体的政治行动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这个时期结束。

与此相反，俄国的沙皇仍进行统治，但是他这样做时，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的作用减弱了。国家的一切法令，包括1905年成立杜马的十月宣言，都是由他颁布的。但后来，杜马的成员带头要他退位。这种集象征性作用和行政作用于一身的做法，经过革命并没有完全被打破。不论列宁本人怀有什么样的意图，但是内战时期的各种要求、为开动社会机器所需的少数受过训练的布尔什维克，以及他个人的威信，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俄国专制传统的某些因素，在革命以后的年代里继续存在。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斯大林又重新把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并使之成为制度的核心，在许多年里，这个制度将一切政治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然而，这种权力是个人攫取的，而不是制度规定的，因此拥有这种权力的人时时要保卫他的权力，以免遭到实际的和假设的危险。由于同样的原因，接班的问题在苏联仍然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日本则不是这样。

由于政府变得更加复杂，高层领导人的重要性迅速提高。这两个国家面临的问题是鼓励优秀人材成长和多样化，同时保持高度的统一和国内和睦。从 1860 年到 1941 年这段时间从整个来看，可以说日本在十九世纪末期非常充分地实现了

这些理想，俄国在1917年以后非常接近于实现这些理想，以后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只是在用了巨大的力量以后才接近于实现这些理想。

不论日本政府的正式结构是什么样的，实际上，它是有才华的领导人的寡头统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首相的职务是很崇高的，但是担任首相的人却是这种寡头统治的一部分。这个集团的共性的基础在于，其成员都是来自同一个地区（萨摩藩和长洲藩），他们年龄相近（在明治维新时代大部分是年青人），他们都是低级武士出身，他们都记着明治时代初期那些英勇的时光，他们都意识到自己是拥有特权的和有经验的优秀人材。

同在这些年头里，俄国不能夸耀说，它有这样一个集团。在日本，废除封建贵族统治以后，老的特权形式也就废除了，但是帝俄末期的政治家们，却包括地主、朝臣、职业官僚，甚至还有一名铁路专家。"政治"成了协调这个集团内部的不同利益、并使它们符合沙皇的意志这样一种任务。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是共产党）的兴起，而在很大的程度上由于这个党的性质，俄国的生活中出现了一批更加富有共性和更加有纪律的优秀人材。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开展的大规模教育运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列宁关于党的纪律和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更不用说定期进行清洗了，这种清洗往往十分残酷地将持不同意见的分子清除出党。就这样，逐渐铸造出一批富有共性的、精悍的和有战斗力的上层人士，他们完全控制了苏联的政治。

在这两个国家，上层人士得到了工业部门和从事日益扩

大的各种专业的具有同样思想的男男女女的支持，这些人人数众多，而且越来越多，他们都是全国各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在俄国，这个集团的主要人物被有步骤地吸收入共产党，从而使党与各界的联系更加密切了。这些人参予党的事务和他们的专业的事务，使他们起到桥梁作用，把党的政策带到各自的领域和单位，并把这些单位的情况传给党。然而，在明治时代，日本工业和专业生活中的著名人士通过家庭和友谊与政界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整个国家领导层中，他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此后，新的教育机构的毕业生成了公私生活各部门的异常富有共性的上层人物了。

这两个国家的领导结构从继续实行的任命制度中得到力量。任命制度保证各级之间联系密切，保证功劳与奖励之间保持适当的关系。但是，如果这种制度在俄国有助于培养忠诚的话，那么那里普遍存在的不稳定局面，使得即使处于这个制度顶端的下属也不敢冒险，而在日本，私人关系和任命制度使得实行寡头统治的政府，能够从全国各地吸收有才能的人，而又不损害他们的积极性。对于日俄两国来说，"到大树底下乘凉"这句日本格言包含着一条真理，有抱负的领导人如果忽视这条真理，那他们就是没有头脑的。

利益集团

在日本和俄国，国家领导人必须与之合作的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在变革时期渐渐地变得更为复杂了。重要的利益集团不仅增多了，而且组织得更好了。然而除了军队以外，日本的利益集团并没有发扬一种强大的和排他的团结精神，它们

的兴起也没有打乱当时盛行的权力的格局。可是，在这个中间阶段，利益集团数量的增加和力量的增强，确实就在原来的寡头统治从舞台上消失时使得解决冲突的问题增多了。据说，在这两个国家中，利益集团在二十世纪变得“政府化了”。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并不十分确切。而是应当说，在日本和俄国，不让任何纯粹“私人利益”合法化的国家价值标准，有一部分仍然是有生命力的。在整个这个阶段，社会内部一切各别的利益集团，都感到不得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使自己合法化。

这种现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那就是这两个国家的政党的行为。在这两个国家，政党是先于议会（国会和杜马）出现的。它们在议会里初次露面之前，多年来都是半合法或非正式地存在的。以为实行有效的议会代表制会带来统一这种过分的期望，使它们倾向于在政治上采取投机的和极权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日本仅仅是慢慢克服的，在俄国则从未克服过。在俄国，事实证明，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几乎没有行使行政领导的能力。在日本，府议会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增选当地上层人士和财阀统治集团的代表为议员，并为各政党取得有限的国会选举权作准备。在这两个国家，只有那些愿意与政府建立工作联盟的集团，才能对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二十世纪的政党就不可避免地在结构和方向上变得更官僚化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和俄国的政党的命运出现了差异。俄国共产党废除了议会制度，把整个苏维埃国家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而日本的政党在议会结构内所承担

的责任和获得的权力也大得多了。然而这种局面在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持续很久。日本出现了军部，苏联出现了“个人崇拜”，它们强制执行了比政党能够实行的更为果断的政策。

议会制度相对削弱的一个原因，特别在俄国，是由于行政机构的反对。这些机构比政党要有经验得多，它们迅速扩大，并充分体现了按功劳提升的原则。俄国革命在它的乌托邦时期是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但是在没有其它社会力量的情况下，国家机器（还有许多所谓权势分子的旧官僚）在二十年代再次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了。在日本，政府内部存在的、由制度规定的高度的忠诚，保证那个机构在国民的生活中发挥突出的作用。两国政府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政党——因而也就这样看待大多数其它利益集团，并设法通过它们所掌握的控制工具来对政党和其他利益集团进行监督。

即使如此，两国政府都没有作为完全独立的力量行事。在三十年代，两国政府完全政治化了，因为在俄国，由于政治原因而被任命的人代替了其它人员，而在日本，则是因为各政党设法得到有经验的官员的领导这种倾向日益强烈。文职行政人员作为政治角色，可以代表政权施加巨大的影响，但是作为集团，他们既不想，也不能采取独立的立场。此外，政府的政治化使得行政工作的水平显著下降，因为在决定提升某人时，强调的不是工作成绩，而是其它因素。

日本和俄国的利益集团的演变，有一个明显的相似点，那就是工会没有起什么作用，而工业集团的力量很大。日本的工会运动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开展了，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没有吸收大量工人为会员。只是到了1923

年，工会才变得合法，到那时它开始逐步扩大，到1936年大约已有五十万会员，这是战前的最高水平。即使这个数字也只占日本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左右。俄国的工会在1905年革命期间出了名，在此之前几十年，劳工组织中激进的和非法的集团和着眼于劳工的政党就已经开始工作了。直到1917年2月之前，工会的活动是受限制的，但是此后，工会作为对主要是革命前的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保持无产阶级压力的一种手段而得到鼓励。列宁甚至对劳工这么一点儿自主也表示怀疑，在以工会为基础的“工人反对派”运动实际上被镇压之前很久，他就说这一运动是无政府主义的。大量工人从未真正把自己看成是城市无产阶级的一员，而事实上，长期以来他们把一只脚留在他们的村子里。这一事实也损害了俄国和日本的工会运动。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两国经济部门的工业家和其它经理人员，在制订国家政策的过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然而，由于日本和俄国的政治制度的发展道路不同，在日本，这种影响是从独立地位施加的，而在俄国，这种影响越来越通过国家和由国家施加的。在这两个国家，工业界的领导成员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观点，很重视与政府建立密切关系。在日本，由于大工业和贸易集团的头头与明治时代新领导之间存在着把他们密切联系起来的纽带，这种关系早就建立了。三井和三菱等公司之间的竞争，有时成为政府内部斗争的一个方面。在革命前的俄国也并不是一点没有这种关系，在那里，各方面的工业家都指望政府保护他们。俄国的工业集团由于不能直接掌握政权，所以对新的杜马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在杜马里，他们的

党，即十月党人，在1917年以前的年头里起着突出的作用。但是，俄国的工业家们即使在议会活动中，也并没有放弃通过与政府进行密切协作来更加直接地影响政府的希望，他们最先通过自己的全国性组织要求制订国民经济计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两国工业界代表人物的势力增强了，当然其路线是与两国的政治制度相称的。在日本，大联合企业（财阀）迅速壮大，在新的政治气候中，它们与政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就象它们早些时候与政府官员建立联系一样。在俄国，在政治控制领先于生产的过渡时期以后，工业增长又一次成为最优先考虑的事情。现在，苏联政府本身支持和指导工业利益，把工业部门的经理人员放在有力的，然而更加从属的地位。因此，两国工业界代表人物的重要性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达到了顶点。在日本，他们是独立的工业家，而在俄国，他们是与党有关系的经理人员，其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融合在一起的。

在变革时期，日本与俄国的政治生活的对比，很少有什么其他领域比军队的作用更明显了。在这两个国家，军队消耗了很大一部分国家预算——从1860年到1913年，两国的军事预算占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一到百分之四十八——以及大量的本国资源，在俄国尤其是这样。为了利用现代技术的潜力，陆军和海军成了科学和技术的资助者。为了将农民训练成为士兵，陆军与海军有必要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俄国从彼得一世和更早的时候起，所有这些职能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由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建立起来的武装部队，坚决服从政府当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917年以后，新的革

命政权继承了这一传统。只有在国家本身发生混乱时——就象1905年的骚乱和科尔尼洛夫将军在1917年夏季发动未遂政变时那样，这种从属性才遭到削弱，以后只在短时期内遭到过削弱。

日本的军队在结构和外表上与俄国军队相似，这主要是因为这两支军队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按照同样的德国原则进行改造的。然而，就俄国军队而言，外国的模式是经过修改的，使得军官团仍然处于显然从属于政治领导人的地位，很少追求一种比较独立的地位。日本军队与俄国军队不同，日本军队享受宪法规定的直接接近天皇的特权。此外，日本的军官形成了一个阶层，由于所受的训练和观点不同，这个阶层越来越脱离其它利益集团。随着政治生活变得更加多样化，军队内部各个集团不仅把军队看成是国家的保卫者，而且把它看成是作为国家基础的原则的唯一维护者。他们法定执行"超政治"的任务，但他们同时又不承认在政治上约束军队是合法的，最后他们使国民生活的许多方面军事化。在整个这段时期，日本全体内阁官员中大约有百分之二十八来自军队，在三十年代，交替的权力中心的势力已相当不平衡，使军官们最后有可能露头成为这个国家最强大的利益集团。从满洲事件(1931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他们的活动已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

集体主义的传统和意识形态

如果说日本和俄国的社会在变革最剧烈的时期没有完全分裂为互相抗争的利益集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的

集体主义传统的力量，这些传统把社会的整体利益置于局部利益之上，不论这些局部是集团还是个人。与这种情况有关的是家长式统治的或等级制统治的形式或组织长期存在，在两国的社会里，这些形式或组织曾长期与集体主义道德同时并存。

这些原则起源于乡村。这两个社会一方面发展乡村成为建立新社会的课堂，一方面使乡村在变革中继续成为稳定的源泉。结果，它们同时沿着上述两个方向前进。因此，日本的乡村彼此合并，并被置于新选举产生的议事会（1878—1888）的领导之下。但是，由于日本乡村人口中最初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有选举权，由于向主张地方上的事务由集体负责的普遍观念以及体现这种观念的传统惯例作了许多让步，所以老的观念通过新的立法永久化了。

俄国的村社和它们所培育的态度，通过从1861年到1866年实行的农奴解放法令永久化了。经过两代人以后，斯托雷平实行的改革试图破坏村社制度的基础，而主张实行土地个人所有制。这种趋势一直继续到革命时期，只是到1929至1932年斯大林发动集体化运动时才被彻底改变。斯大林搞的集体农庄，不论在建立的过程中在人的方面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也不论它们在经济上有多么显著的弱点，还是收到了恢复集体主义传统、并使它为苏联的政策服务的效果。因此，一直到这个时期结束，从乡村迁往城市的大多数移民带来的观点，是村社的政治观点，而不是“现代的”个体农民的政治观点。

作决定时既按照集体主义的原则，又按照等级制的原则，这种结合反映在日本和俄国的许多组织所采取的程序上。在

日本的企业和政府中，请示报告的做法表现了这些程序，而在俄国，“民主集中制”体现了这些概念。按照请示报告制度，在起草政策性文件时，文件在公布之前要自下而上地经各级行政机构逐级批准。它保证对最后的声明取得高度的一致，然后由最高级的官员发表。民主集中制作为共产党开会的指导程序，要求在作出决定以前进行辩论，但是决定本身必须是集体的决定，那就是说决定是一致作出的，持不同意见的人得服从大多数人的立场。到变革时期末期，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行政和工业机构普遍采取这种程序，虽然斯大林的崛起意味着，在苏联，国家的最高决策是按照他的意见作出的，而不是在经过辩论以后作出的。

集体主义的和等级制的传统也表现在两国的意识形态上。到了这个时期，这种意识形态变得更强烈了，它强调在处理全国性问题时保持统一和进行集体努力的重要性。当然，那些在外国军事压力的威胁下实行现代化的国家有这种信念是可以预计到的。但是在日本和俄国，这种信念在它们有了议会经验以后依然存在，并且进而渗透到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俄国的共产主义这样在其它方面互不相同的意识形态中。俄国的共产主义首先是代表城市工人的，而日本的军国主义则强烈地着眼于农民的利益。对共产党来说，历史是朝着未来的目标前进的，而对日本主张促进农民利益的人来说，它却离开了现代以前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两国的行动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但是它们在三十年代都非常强调那种献身于民族主义目标，甚至于救世目标的集体主义道德，尽管这种道德观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日本传统思想的狭隘

地方主义是对立的。

这些意识形态形成了日本和苏联的政治生活的核心，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十年里。有广泛影响的舆论工具、军队、民间组织和教育机构都提倡这种意识形态，而俄国比日本提倡得更为有力和专心致志。在日本，从未要求大部分城市知识分子和工人对促进农民利益论和军国主义采取被动地表示赞同的态度。这种意识形态不仅表明各自的政府所采取的具体政策是正确的，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制订这些政策的手段是合理的。

不同意见、反对意见和危机

日本和俄国的集体主义传统虽然很有影响，但是它们的影响并没有防止冲突事件，甚至大规模的暴力行动的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两个国家至少有一次实行了新的法院审判制度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它们甚至试验过（最后放弃了）英国式的陪审团制度。建立正规的司法机构的好处不应低估，但是它们并没有防止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两国政治制度的大部分关键性变革，即使不是由国内动乱造成的，也会产生国内动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这两个国家经常发生企图行刺的事件，而在此之前行刺事件并不是经常发生的。在日本，这些事件在最初的十年（1868—1878）和最后的十年（1931—1941）中达到了最高峰。在最初的十年中，明治时代的许多领导人被暗杀了，最强有力的寡头统治者大久保被刺死。在最后十年中，政界和工业界的一些领导人成了军事和法西斯

阴谋的牺牲品。在革命前的俄国，暴力是针对皇帝及接近皇帝的大臣们的。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炸弹炸死，在1903年以后的年头里，一些地位很高的领导人遭到谋杀。日本的选举与两国工厂的恶劣条件造成1890年以后一代人的动乱。日俄战争在战败的俄国引起了革命，在日本则引起了暴乱，在这些暴乱中，有一千名警察和示威者在东京受伤。

为了防止发生骚乱，两国政府采用西欧的技术来扼杀言论。俄国在整个时期——除了1905年到1914年这段间歇时间之外——实行了新闻检查制度，日本在1875年第一次实行新闻检查。俄国政府还经常宣布实施戒严，而日本政府则应用一些法律，例如1887年的和平保护法，对政治活动进行控制。在这些年头里，两国还重新编成集中控制的警察部队。俄国在1917年以前很久就镇压了布尔什维克等激进党，而在1917年以后，新政权开展的反非布尔什维克分子的运动甚至还要严厉。这些正规保安部队的任务是确保学校、军队和企业对“危险的思想”进行监视。左翼团体尤其感到它们受到镇压的冲击。日本在1935年逮捕了一万四千名共产党人；俄国在1921年初步开始了根除老左派的活动，这一活动在三十年代的大规模清洗时达到了高潮。

在这两个国家都发生了暴力行动，但是在俄国和以后的苏联比在日本发生得频繁得多。1905年的革命使各方都流了血，在这次革命十五年以后，发生了内战，这次内战是二十世纪破坏性最严重的内战之一。此外，俄国运用暴力作为国家的政策，运用程度之高大概是独一无二的。沙皇政府从1902年到1905年鼓励各地进行大屠杀的事实证实了这种政策，就

象在集体化运动中几百万农民遭到杀害的事实和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的清洗恐怖时期证实了这种政策一样。主张搞现代化的人利用暴力手段尤其明显。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农业集体化和急行军式的工业化，仅仅是说明这种普遍现象的两个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例子。

日本国内冲突的程度总的来说大大低于俄国和后来的苏联，这至少可以归诸于三个因素。第一，由于日本社会不存在众多的少数民族和维新政府废除了老的上层武士，所以利益集团互相冲突的范围比较窄。日本1877年的萨摩叛乱是武士们为了维护权力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另一方面，俄国的政界一直到1917年都感到乡村的贵族为了重新取得失去的特权所进行的猖狂的分裂活动。

第二，日本的政治实践对妥协的重视程度比俄国高得多，在整个变革时期，俄国所有政党和派系都特别强烈地迫切要求采取极权主义的解决办法。这种很难衡量的不同态度，可能是由这两个国家早先的条件决定的。日本人长期以来享受着孤立的安全，而俄国人则总是必须结成统一战线来对付外界的威胁。

第三，从1860年到1941年，日本生活中的一些暴力行动，与其说是平息了，不如说是通过与外国的战争和殖民剥削转移到外国去了。在征服朝鲜和进入满洲以后，扩张了的日本帝国国内，在心理和社会方面影响日本国内生活的紧张状态有很大一部分得到了缓和。如果没有这样多的暴力行动被吸引到日本在亚洲的冒险行动上去的话，那么日本国内暴力行动的程度本来很可能会高得多。

国际比较

各国政府在发展的过渡阶段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使这样一些领导人和优秀分子执政，这些人立志用得到全国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积极支持的政府政策来改革经济和社会结构。领导的形式可能是不同的；改革经济和社会的具体方式必定按各国情况而不同；可以用各种各样可行的方法来动员公众支持变革。但是，不论用这种或那种手段，都必须首先实现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过程，然后才可以公正地说，某一个社会已经踏上了现代化的门槛。

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得较早的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和美国——没有在发展中受到来自边界以外的巨大压力而完成了所有这些过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经验要更为普遍得多，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发现，它们处于一个争夺极其激烈的国际环境中，对于这种国际环境，它们准备不足，不能独立进行计划。许多这样的国家现在正开始通过地区性的或意识形态的政治结盟和联盟的办法来发展经济；其它国家曾经丧失过，并可以想象可能再次丧失政治上的独立。日本和俄国介于这两类国家之间而处于中间的地位，这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正如当代收入低的国家一样，日本和俄国是被迫进入发展的过渡阶段的——作为在面临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特性的一种手段。但是它们的这种努力是成功的，它们能够将早期的"超级大国"施加的压力，变成进行变革的积极的促进因素和国家的统一，就表明了这一点。日本和俄国把德国的政治方法和经验理想化，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当时只有

德国引人注目地完成了同样的任务。与此类似，在这个时期，两国舆论界的领导人物特别看不起中国、奥斯曼土耳其和波斯等老大帝国，因为它们看来没有能力继续掌握它们自己的命运。

将日本和俄国的政治制度与发达得较早的国家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时的政治制度作比较时，不同之处和相似之处都很突出：俄国抛弃了欧洲的发展形式，在1917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国家，日本逐渐建立了寡头统治与宪政的混合体。然而，如果怕夸大俄国与发达得较早的国家之间的差别，那么最好先回顾一下，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政体在进行最初的变革的前夕，都采取了革命的形式，就象中国现在所做的一样。日本和俄国持续进行巨大的努力，使它们牢固的集体主义传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的需要，在这一方面，它们与发达得较早的国家比较起来显得十分突出。虽然在斯大林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日本的军国主义之间存在着种种十分明显的不同，但是它们都毫不妥协地敌视个人主义，肯定集体劳动的民族遗产，都以它们各自的国家新兴的社会秩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作为基础。一种有意识地明确表达出来的民族意识形态，在动员美国、法国和其它发达得较早的国家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实际上，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与德国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成了渴望实现现代化的其它国家，包括本书研究的两个国家学习的榜样。但是，正是在这些进入现代化过程稍微晚一些的国家，由于有必要肯定其国家当前是“落后的”，而又预期将来会有光辉灿烂的前途，所以意识形态才长期成为整个过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用另一

种说法来说，在宣传为未来的利益作出牺牲光荣这一点上，日本和俄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比包括德国在内的任何发达得比较早的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来得成功。事实证明，毛泽东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促进中国实现同样的目标方面也许是同样成功的。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建立的军人政权，没有一个接近于实现这个目标。在变革时期，日本和俄国的制度实行和宣传非消费社会的好处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可能中国是个例外。

在体制上，两国的意识形态认为，国家指导实现现代化过程的程度，有必要比任何发达得较早的国家更高。日本政府，尤其是俄国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十七世纪西欧的巴罗克王朝达到过的水平。凡是进行政治变革的国家，无不普遍使用高压统治和暴力，甚至发动内战，日本和俄国也不例外。比较的说法要比猜测好一些，但是在这方面，看来二十世纪的俄国超过了所有以前的例子。

在俄国和日本的牺牲品中有多元论因素，这些因素在西欧和北美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保存了下来。日本和俄国的工会的战斗力弱得多；各种专业与国家机关结合得更加紧密；互相竞争的政党，远不如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发达起来的所有西欧和北美国家那样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代替这些政党的，是压倒一切地强调形成一个管理所有领域的单一的全国上层人物集团。诚然，日本的军队，和德国的军队一样，在上层人物中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在俄国或以后的苏联，军队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说苏联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上层人物集团所作的努力远远超过日本，那么，在二十世纪的

大国中，看来可能只有中国在1949年以后采取了与这两个国家同样有力的和成功的措施，建立一个具有共性的领导人物集团。凯末尔在土耳其没有能实现这个目标，可能就是这个国家发展速度比较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代技术使通讯系统得到改善，这是日本和俄国进行政治变革的有利条件。那些比它们早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没有这个有利条件。尽管众所周知俄国的道路是非常糟糕的，但是在1917年，要在主要中心城市之间传送一个信息或走动却比革命时期的英国、美国或法国来得容易。在整个变革时期，日本有文化的人的比率较高，阅读能力特别普遍，这就保证这个国家的国民谈论国事的基础，比发达较早的国家在历史上类似的时期可能达到的基础来得广泛。毋须夸大通讯的重要性就很容易看出，它们在今天的新兴国家中所起的作用将是十分不同的。一方面，这些国家拥有强大的宣传和控制工具，但是在另一方面，从边界以外潮水般发来的消息可能使它们丧失自己的特性。

第十章 经济结构和经济的增长

在变革时期初期，日本和俄国的经济都是欠发达的，都不是现代经济，虽然俄国由于同西欧资本和技术的关系较长，较密切，工业较发达，对外贸易额较大。在1860年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两个国家主要是进行行政改革，为以后的变革创造条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工业发展的速度加快了。日本在1895年和 1905 年同外国进行的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加快了工业增长的速度。而俄国工业的增长被战争和革命打断了。这两个国家现代以前的经济，都以提供剩余农产品来支援工业化运动，日本靠对当时耕种的土地加强精耕细作，俄国靠扩大播种面积。虽然俄国发展“强制经济”，而日本保持市场经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其它对比也值得注意)，但是最惊人的相似之处是，有证据证明，它们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变革时期结束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是差不多的。

表10.1中的数据表明了日本和俄国从1860年到1940年进行经济大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尽管很难完全相信计算出来的1900年以前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但是整个这段时期日本经济的年增长率很可能略高于百分之二。1900年以后的数据比较可靠，表10.1中是把它们分开来标明的。从1902 年到 1940年，日本的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四。换一句话说，在二

十世纪的头四十年里，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差不多增加了三倍，考虑到日本的人口增长率很少超过百分之一，这个数字是很可观的。

从1860年到1913年，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二点五。然而，连年的战争、战败、革命、内战和外国干涉，使俄国的增长率急剧下降。在新经济政策(1921—1928)时期实行恢复计划以后，俄国1928年的全国产量，只比1913年的全国产量增加百分之十三多一点，换句话说，在这十五年里，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零点八。在从1928年至1940年的结构大改革时期，对增长率的统计方法存在着严重问题；年增长率可以是百分之五点一，也可以是百分之九点三，这要看用什么统计加权制来统计。如果用的是百分之五点一，那么从1900年到1940年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点七，这就是说，产量几乎增加了两倍。如果用的是百分之九点三，那么俄国的增长率证明与日本的增长率差不多，即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九，或者说，在这段时期里，增加了三倍多。但是，由于俄国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一点五，因此，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增长速度就低于日本，最多与日本相等。

产品供应性质的变化是证明结构改革的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到1940年，制造业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部门，占产品净值的百分之五十三。服务业和农业的产值远为低得多。与明治时代1887年的数字相比，差别是明显的。在就业的结构方面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变化。例如，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急剧下降，虽然它仍然是就业（和就业不足）的最大源泉。俄国和日本一样，制造业到1940年也成了主要部门，占产品净值

的百分之四十五。俄国的服务业和农业的产值也比较低。就业结构的情况也与日本差不多。

因此，俄国在1940年表现出来的总的改革格局，与日本的格局差不多。制造业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比农业或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大。1940年俄国制造业的比重比日本小，而在1900年(如果这些数字可以相信的话)，情况正好相反——这表明，在这些年头里，日本制造业发展得比俄国快。在1940年，这两个国家的农业仍然是雇佣劳动力最多的部门，虽然自 1900 年起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大大下降了。在 1940 年，日俄两国农业和制造业就业人数的百分比，比这两个部门产量的百分比更加接近。这些百分比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这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比俄国大，日本每个制造业工人的产值，几乎为每个农业工人的产值的五倍，而俄国的比例为三比一。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另一个显著差别，表现在进行结构改革的时间上。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日本农业的相对重要性下降得相当快。而在俄国，农业的作用在1928年以前却下降得非常缓慢，1928年以后，它急剧下降到表10.1中所示的水平。从1928年到1940年，俄国的重点从农业转移的速度，如果与除日本以外的其它国家作比较的话，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在明治时代，日本的结构改革进行得很快。但是，农业比重发生相应的变化，其它工业化国家花了三十五年或更长的时间，而俄国只在 1928 年以后花了十二年时间。

日本和俄国提高它们投资数额的能力也是值得注意的。1937年，如表10.1所示，日本国内资本积累总额占国民生产总

表 10.1 经济数据比较(%)

	日		本	俄	国
	1889—1902		1902—1940	1860—1900	1900—1940
1. 国民生产总值:					
平均年增长率	2.8		3.4	2.5	2.7或3.9①
	1887	1902	1940	1900	1940
2. 按原来的生产部门分的国民生产总值:					
农　业	41	40	16	55	29
制造业②	20	25	53	33	45
服务业	39	35	31	12	26
	1887	1902	1940	1900	1940
3. 劳动力的比重:					
农　业	73	66	44	77	54
制造业	13	17	31	12	28
服务业	14	17	25	11	18
	1887	1902	1937		1937
4. 按最终用途分的国民生产总值:					
消　费	80	77	65	NA③	63
资本积累总额	13	13	24	NA	26
行政管理	7	10	11	NA	11

① 如要了解对指数问题的简短论述，请参看正文。

② 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

③ 缺革命前按用途分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

值的百分之二十四。与明治时代比较，将近增加一倍。俄国1937年的投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六，毫无疑问，这比革命以前的几十年有很大的增加，遗憾得很，我们没有俄国革命前几十年的投资总额的数字。虽然西方国家的投资比例也不是没有达到过百分之二十以上，但是，在按人口平

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和苏联1937年相似的水平上，没有过一个西方国家把将近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二十的资本用于投资。

与两国经济增长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对外贸易。在整个变革时期，日本的出口额不断提高，到1937年至1940年这个阶段，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这种猛增是与过去形成最鲜明的对照之一，因为在明治以前，日本的经济是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俄国的情况与日本相当不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俄国的对外贸易额是增加的，但是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了。1913年，俄国的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十以上，但是到三十年代末，出口额下降到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百分之一。

日本和俄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也反映在现代化运输系统、财政机构和工业组织的发展上。但是，尽管取得了这些相当大的成绩，如果把1940年两国的经济说成是“发达的”或“成熟的”，那是错误的。诚然，这些形容词是一些含糊的词，但是如果用这些词来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不久美国和西欧的经济，那可能比较说得过去。日本的经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日益发展的收入高的现代经济，它应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另一部分是收入低的传统经济，它雇佣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其生产率比前一部分低得多。将近一半的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生产。许多服务行业属于“传统”经济的范围。即使在制造业中，小企业继续雇佣相当数量的劳动力。俄国的经济也是两重性的，它有一些现代工业部门，但是农业部门很大，十分落后。1928年以后，由于投入和产出的结构发生很大变

化，工业股本大量增加，因此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就大多数情况来说，生产效率和质量水平是低的。虽然借鉴了现代方法，但是还没有掌握。

所有这些情况都有助于说明日本和俄国在1940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低的原因。如果同西方发展得比较均匀的经济比较，它们仍然是落后的。

增长阶段

在进行比较之前，先简要地和相当纲要式地按年代来说明一下日本和俄国在整个变革时期经济增长的情况或许是有益的。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的制造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而日本的制造业则刚刚开始建设。然而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1900年，两国工业化的速度加快了。此后，两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就不同了。从1900年到1940年，日本的经济长期来都是增长的，只有在1900年、1931年和1940年处于低潮。而在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使经济增长的速度严重下降了，在此以后又经历了十年的混乱。然而由于实行五年计划，1928年开始了新的增长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两个国家在实行变革的年头里工业增长的全貌可以从表10.2中看出。

日本的工业化在明治时代从1868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犹犹豫豫地开始了。经济没有什么增长，然而为了加强统一，对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把封建地方主义的某些方面压下去了。这些都有助于为以后取得惊人的增长准备了条件。

表 10.2 经过选择的几个阶段的工业产量平均年增长率(%)

日本	俄国
1887—1902:5.5	1860—1885:4.0
1902—1931:6.1	1885—1900:6.7
1931—1940:8.9	1900—1913:3.6
	1913—1928:0.5
	1928—1940:9.8或16.1①

① 如要了解对指数问题的简短论述，请参看正文。

日本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大体上开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并一直持续到大约1900年。产量全面增长的速度加快了——如表10.1所示，平均约为百分之二点八。虽然这比日本后来的增长率低，但是它已经是十分可观的了——等于德国从1870年到1913年的增长率，但是低于美国，美国的增长率最高，达百分之四点三。农业产量也增加了，年增长率大约为百分之一点七，它不但为不断增加的城市劳动力提供粮食，而且还提供供出口的丝和茶叶。工业产量以每年百分之五点五的速度上升，这在当时是属于世界上最高的。最值得注意的是棉纺工业开始发展，对棉纺工业的投资大大增加。国内资本积累总额每年增加百分之三点九。然而，由于投资货物的价格与其它货物的价格比较起来下跌了，所以按当时的价格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投资部分的比例，从1887年到1902年仍为百分之十三。日本增加投资主要是增加对公营部门的投资。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系统在这些年里大大地得到了发展和改进。在这些年里，日本还在世界贸易舞台上出现了。从1887年到1902年，日本进出口贸易总额差不多每年增

加百分之九。

和日本一样，俄国在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段时间里，体制的改革比经济的增长更值得注意。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重大制度改革——废除农奴制——对实行工业化的直接效果是相当不好的。从1860年到1870年的十年里，工业产量的确增加了，但年增长率仅为百分之二。由于解放农奴所采取的方式，劳动力的流动继续受到限制，农业技术没有得到刺激，有效的国内市场的开发没有得到鼓励。但是，体制的改革为将来的增加奠定了基础，这与日本的情况又是一样的。还修筑了许多铁路。1860年，俄国的铁路总长为一千英里，到1885年超过一万六千英里。整个说来，从1860到1885年，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估计大约为百分之二。农业产量的年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一点五。工业产量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四。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1900年，俄国的工业化突飞猛进。在俄国政府的领导下，在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外国资本非常积极的参与下，俄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俄国铁路网的进一步扩大，具有特殊重要意义。铁路路轨英里数从1885年到1900年增加了一倍多。铁路网的扩大对工业的布局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例如，由于修筑了铁路，就有可能把俄国西南地区的铁矿砂和炼焦煤的产地连接起来。当时，西南地区正发展成为俄国的主要冶金基地。此外，铁路网的扩大对于提高市场在农业中的作用是一个关键因素。

这个时期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数字表明，它的年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三，农业的年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二。从1885

年到1900年，工业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六点七，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十年中，则高达百分之七。在这十年中，棉纱和食糖的产量翻了一番，煤和石油的产量差不多增加了两倍，钢铁的产量增加了两倍多。

二十世纪头四十年是日俄两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1940年以后，两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出现了差异。但是到三十年代，日本和俄国的工业化水平，从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产量和就业的结构，以及总产量中用于消费、资本积累、行政管理和国防部分的比重这些角度来看，仍然是颇为相似的。

从1900年到1940年，日本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这种可以称为"加快的趋势"的现象，在1950年以后变得特别明显。对于日本来说，从1900年到1931年是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三十年里，产量提高的速度比十九世纪末期更快。但是在这几十年里，可以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达到顶点的高度繁荣，和二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的衰退。在这些年头里，经济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变化之一是，相对来说，初级产品部门衰退了，从广义说，是传统的经济衰退了。由于这种衰退，形成了"结构差异"，在这种经济形势下，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存在的鸿沟越来越深了。它的社会后果是日本分裂成了两个阵营：一个越来越富裕，越来越进步，另一个贫穷，更加落后。从1902年到1931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提高百分之二点七，而农业的增长率很低，每年只提高百分之零点六，工业的增长率很高，每年提高百分之六点一。在出口方面，日本越来越转向纺织品，特别是棉花的出口。实际上，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繁荣时

期，它在非洲和亚洲的市场上成功地取代了一些欧洲生产者。在这些年头里，与被日本侵占的日益扩大的地区的经济关系也变得更为重要了。朝鲜和台湾成了日本进口大米和食糖的主要来源，也成了日本投资的主要接受国。

日本现代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包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投资额的增加，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了。在三十年代这十年里，日本的经济发展神速。国民生产总值每年提高百分之五点六。然而，农业的衰退变得严重起来了，这种衰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苦难，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局势。与这些经济因素密切相连的是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它们终于使日本发动侵略和战争。由于日本与欧洲和美国的联系越来越少，这个帝国所侵占的地区也就越来越成为其贸易和投资的对象了。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工业的发展，由于1900年开始的欧洲经济大衰退而停止了。从1900年到1905年，除了战争以外，俄国还发生了许多次农民骚乱，在这几年里，俄国的工业没有什么发展。然而从1906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工业增长很快，年增长率达百分之五点四。有意义的是，工业增长的这种恢复，并不是在俄国政府的领导下取得的——这是俄国经济中出现的某种新因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俄国的经济似乎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企业家在工业和金融方面的活动已经成熟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俄国首次正在成为整个欧洲经济的一部分。虽然按人口平均计算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远远落后于主要工业国，但是它的工业总产量已居世界第五位，象石油和木材这些工业原料的产量仅

次于美国。

1917年11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从1918年到1921年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和内战，在此期间，政府实行了集中控制。内战结束后，这些控制放松了，在这种形势下，俄国的经济才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在这中间，它的大多数企业和管理人材遭到了严重的摧残。然而到1928年，俄国的经济重新达到，并且略微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比1913年提高百分之十三，农业产量提高百分之十六，工业产量提高百分之八。自然，这些数字包含的平均年增长率是很低的，分别为百分之零点八、一和零点五。

苏联从1928年起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着手实行加速工业化的计划。它推行集中的计划和控制，并对农业实行集体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实行计划的十二年里，俄国的经济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不仅产量大幅度增加，而且经济结构变化的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对现代经济部门的投入引人注目地增加了。例如，非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每年大约增加百分之六，为人口增长率的五倍。为了完成这种变革，有两千多万人由农村地区迁入城市——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从1928年的百分之十八，上升到1940年的百分之三十二。投资额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的高度，每年投入到经济中去的固定资本从百分之九增加到百分之十一，其中百分之四十投入到工业部门，这主要是为了提高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能力。生产资料在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从1928年的百分之四十增加到1940年的百分之六十一。钢铁和煤炭等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三倍或三倍以上。完全新的工业，象重化学工业和制铝工

业以及完全新的地区性联合企业形成了。然而，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几年即从 1937 到 1940 年，俄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显著地慢下来了。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备战（生产军事装备而不生产资本设备），一部分是由于斯大林进行的清洗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如前所述，由于对结构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价格相应的变动，要衡量俄国从 1928 到 1940 年产量提高的幅度就复杂了。据理查德·穆尔斯廷计算，按1937 年生产的全部产品计算，苏联的生产能力从 1928 到 1940 年每年提高百分之九点三。然而，如果以 1928 年的生产总值为标准，那么增长率可以算成为百分之五点一。这两个百分比虽然都是高的，但差别很大。在这些年里，农业实际上没有增长，农作物产量的提高，被牲畜产量的下降抵消了。因为在实行集体化时期，农民们把牲畜宰了。但是工业产量引人注目地增加了。然而，在这里，衡量标准受到所用的加权制度的重大影响，年增长率既可算成百分之九点八，也可算成百分之十六点一。

增长结构

很难对变革年代在日本和俄国的经济中起作用的经济增长结构，作一个前后一致的和简明的分析。这个时期很长——它又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一点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说过了——而且两国国内的增长结构也是有变化的。此外，增长结构的诸因素不容易划分。下面讨论这些增长结构中五个不同的要素，我们不是严格按年代来讨论，同时也没有忘记，这些要素的界限不是很明确，往往是重迭的。

政府的直接作用

在整个变革时期，国家的直接作用在俄国比在日本更为重要。在日本和革命前的俄国，政府直接控制的力量是有限的，政府可以以倡导者的身分，提供津贴和特许权，进行监督，给予优惠，区别对待，但是它必须在市场的范围内，以经济手段起作用。国家并不直接颁布法令来控制经济，后来苏俄在实行计划时期是用这种办法来控制经济的。然而，在日本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政府的直接作用决不是不重要的。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它对促进现代经济的发展所起的直接作用是巨大的。即使如此，在二十世纪，除了在三十年代实行军事管制时期以外，政府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更多地采取间接的姿态。

在实行工业化初期的年头里，日本政府的行动受到一些因素的约束，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制订计划的方式。一个因素是时间。和俄国一样，政权问题，以及在对外政策和军事上的考虑，是明治时代经济政策的关键因素。人们认为，为了维护日本的独立，以现代经济为基础使国力有相当大的增强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不能相当快地使国力增强，那么外国人可能会认为，对日本进行殖民剥削的时机也成熟了。在国内，时间也同样是宝贵的，因为在国内，无所作为也可能使反对派，即那些受明治维新消极影响的人有机会重新聚集起来。只有迅速实行新计划，才能使明治政府维持政权。第二个约束因素是，日本在世界大家庭中所处的地位有点特殊，因而受到了限制。日本由于同西方列强订有条约而丧失了关

税自主权，因此它不能实行保护关税来帮助其正在发展的工业。它必须直接采取行动。以1884年“工业备忘录”为标志的政府计划，考虑了这些问题，并确定了一套为期十年的生产指标。

政府的行动采取对工业部门进行直接投资的形式。一直到大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这些投资一般超过私营部门的投资额。在明治时代初期，有经验的企业家来源有限，因而在一些领域，政府自己着手创办工业企业，但是不久，政府开始把那些日本的条件比较有利的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和那些私人企业即使面临外国的竞争也能生存下去的工业交给私人去办。此后，国家主要关心那些私营部门无法解决的妨碍经济发展的环节。政府积极提高社会经常费的数量和质量，自然它对提高日本的军事能力负完全的责任。实际上，在明治时代，中央政府积累的资本，有很大一部分用途可以通过计算公共工程，尤其是铁路和军事工程的开支总数来说明。建筑工程——筑路，改善港口设施和建造政府建筑物——消耗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大，占积累的公共资本的三分之二以上，如果加上与地震和台风等自然灾害有关的重建经费，那就可能占政府投资开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即使在私营部门，建筑工程和耐用设备这两方面的投资额也大体上相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后，对设备的投资额开始大起来了。

俄国在整个变革过程中，尤其是在沙皇政权统治下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十年里，以及在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从1928年到1940年实行计划的时期，政府的直接作用显得很突

出。这两段时间很切合上面谈到的俄国经济在国家领导下增长的总的格局。在这两段时间里，很难完全区别政府的直接活动和间接活动。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财政大臣威特伯爵强有力的领导下，俄国政府实行了一项有力地刺激工业发展的计划。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扩大修建铁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铁路大多数是私营公司在获得政府的特许权后修建的。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政府的政策变为由政府直接修建新铁路，购进许多私营铁路，并对仍然是私营的铁路进行严格的监督。如在前面所提到的，光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铁路的总英里数差不多增加一倍。威特本人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指导铁路的修建工作，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工作主要是由他负责的，这条铁路从1892年开始修建，到1904年建成。用阿尔贝特·希尔施曼的术语来说，铁路系统的扩大，具有"向前联系"和"向后联系"的作用。"向前联系"是指工业部门由于运输系统的改善而得到好处。"向后联系"是指由于修建铁路，对工业品的需求量增加了。

铁路计划的影响，由于政府实行一些其它计划而扩大了。这些计划包括：作为鼓励私营工业的一种手段，为本国产品支付最高价格；订货事先付款，其作用等于是政府直接投资；征收极高的关税来保护国内的产品，1891年的关税率就是一个例子。政府还实行吸引外国投资的政策。在这方面，它采取措施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和金本位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强迫出口粮食（是靠政府对农民施加很大财政压力来实现的）和保持国际收支顺差才做到的。

在1900年以后，作为沙俄经济增长结构的一个要素，政府的直接作用的重要性下降了。虽然在共产党于1917年执政以后政府的作用又增大了，但是在 1928 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之前，它 并没有达到现在与苏联经济模式有联系的高度。到实行计划经济时，至少从外表看，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是全面的。实际 上，中央政权的控制不可能是完全有效的。虽然如此，可以说，计划时期的特点是政府实行直接的集中管理，与实行军事管制差不多。实际上，它是一种“强制经济”。产量的水平，以及中间流通（从生产者到生产者）的水平和投入私营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多少，都是中央按照一套正规的经济计划确定的，并 由一个中央管理机构控制。农业实行了集体化。经济增长结构变成了这样一种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政府不仅通过实施高投资率和积蓄率来动员 资 源，而 且 把 它们——人力和物力——引导到增长率高的部门。政府企图提高人力和物力的质量，改 进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全面的和具体的应用，从而也对增长结构产生了影响。

政府的间接作用

中央政府还可以对经济发挥许多间接的影响，尤 其是日本。在那里，政界领导人与工商业者往往成为盟友，为了追求共同的目标，偶尔也成为合伙人。

政府的直接活动和间接活动的分界线——就象政府直接投资和政府提供信贷之间的分界线一样——往往是模糊不清的。然而，一些极其重要的活动显然是属于间接活动的范畴。这些活动之一是建立体制，从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

四十年代建立的一些体制，有利于日本和俄国发展工业，提高它们吸收外国技术和组织形式的能力。

前面提到的明治时代初期的体制改革就是例子。政府废除了德川武士社会限制地位的不合理体制，实行人人都有就业、居住和耕种的自由，废除了限制在国内外旅行和通信的规定，这些都是重要的步骤。颁发土地证以后，土地就可以转让了，政府废除了德川时代现代前的、不统一的土地税，代之以根据土地价值用货币纳税的制度。有了这些可靠的收入以后，政府就能用发给年俸的办法来减少武士们的不满。它还能开始实行通讯和教育方面耗资巨大的现代化计划。在征兵和教育方面实行的相同措施对未来的劳动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货币和银行制度的改革也是一件放在很优先的地位的事情。1872 年的全国银行法标志着现代银行制度的正式开始实行。1874 年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十一年以后，日本中央银行成立了。由于日本没有资本市场，政府就通过专门的银行机构，向工业部门发放中期和长期信贷。还建立了政府对出口商品进行检查和质量控制的制度。这种制度也适用于生丝，使生丝成了日本出口量最大的货物。

在明治时代以后，政府建立体制的工作就不是那么普遍了，虽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仍有一些活动。在经济情况不稳定的时期，政府和工商界共同努力来抑制竞争，办法是对产量和价格、市场的分配及销售数额进行控制。这种由政府发起的卡特尔确立了“管理指导”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是十分重要的。

在俄国，就象在日本一样，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也是体制大改革时期。虽然废除农奴制一事就其最终对俄国经济增长结构产生的影响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是政府进行的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改革并不是只有这一项。建立缙绅会议(1864年)就是在包括教育、医药、筑路、保险和食品储备等等的活动中分散政府权力的表现。虽然这些地方政府机构没有收税和行政管理的充分权力，至多只是中央政府的小伙伴，但是它们的建立确实使中央的控制放松了，并且创造了有利于扩大经济活动的环境。缙绅会议改革以后，对市政府进行了改革(1870年)，在这项改革中，城市建立了许多原则和做法，在改革缙绅会议时，区和省已经建立了这些原则和做法。这项改革允许在纳税方面合格的选民选举市镇委员会。因此，商人和工业家们的影响扩大了，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法律制度进行非常成功的改革(1864年)以后，建立了独立的法院系统，并建立了法院公开审判，而不是由行政机构秘密审理法律纠纷的制度。建立可靠的法律程序，对于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于私营部门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军队的改革(1874年)也有重要意义，这项改革使服役年限从二十六年减为六年，扩大了服役的义务，并开始对全体新入伍者实行初等教育。这项改革有助于增加工业劳动力的人数和提高他们的质量。最后，对经济和财政进行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建立了单一的国库；公布年度预算，在1866年建立了国家银行，在货币、信贷和财政方面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以及建立以农业和工业为对象的其它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尤其是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时期开始以后，重点在于政府直接而不是间接参与经济事务。然而

在强制经济中，政府不仅命令企业依从它的经济计划，这些计划对于负责的经济代理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还采取一系列间接的方法来使企业实行政府认为有助于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指标的措施。根据完成计划情况的好坏对工人和经理们实行经济奖惩制度。为了鼓励经理人员并扩大其来源，对于担任高级行政和管理职务的人，在物质上可以予以照顾（住房和食品的特殊供应等）。为了实现经济目标，开展了广泛的政治运动来取得人民的支持。此外，通过大大扩大教育和训练，并通过促进科技的计划来提高人力物力的质量。

非政府体制

私营部门的体制改革和发展，对日俄两国的经济增长结构也有很大的影响。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市场规律在这两个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而对于日本来说，市场规律在整个变革时期仍然是重要的。

在明治时代初期，问题是开始建立一些现代化工业。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任务是独立地扩大这些工业。经济渐渐地越来越受市场信号、资本的利润率和利润动机的影响。由于农业和传统经济的衰退，以及政府的影响变得更为间接，对现代工业的私人投资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从1900到1945年，由于出现了"加快的趋势"，经济增长的形式只要列举共同构成一种具体形式的若干特点，就能非常容易地加以说明。首先，国民生产总值从1901到1917年增长百分之三，从1931到1937年增长百分之六，但是从1917到1931年，增长率下降到百分之二点七五。这些长期的升降，在私人投资的增长

率方面比在总产量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称为“投资的突飞猛进”。由于在革新方面进行投资，所以投资的每一次突飞猛进，都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每次猛增也都集中在某些工业部门：第一次猛增(1901—1917)集中在棉纺工业，特别是纺织联合企业。第二次猛增(1931—1937)集中在重工业和与军火有关的工业。在这些年头里，投资的猛增使投资率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二左右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作为一个民族，日本人愿意节省的数目越来越大。

此外，本世纪日本经济增长结构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投资不时突然增加。随着这种突然增加而来的是新工业的建立、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由于在技术革新方面连续进行投资，从外国引进的效率更高的技术得以推广，反过来又导致出现加速的趋势。按人口平均的收入也增加了，因而市场扩大了，反过来又促使经济发展得更快。按人口平均的收入的不断增加，也使人力资源的质量(教育水平提高，伙食改善)得到改进，并使家庭的储蓄率提高了。在二十世纪，体制的改革，加上采用可以称之为“边工作边学习”的方法，使得使用有关的未被采用的技术的范围不断扩大。日本工人对工资的差别很敏感，因此现代工业部门就很容易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吸收劳动力。日本劳动力的流动性是很大的：随着现代工业部门工资的提高(由于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就流入现代工业部门。实际上，日本具有通常称为“廉价劳动力”的有利条件。在传统的经济部门，生产率和工资都赶不上，因此在这里，要素比例妨碍了技术的进步。

在二十世纪，日本产生了两个具有长远意义的其它非政府的体制，即财阀和终身雇用制。虽然最著名的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是在明治时代形成的，但是这些财团的力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它们力量的基础主要是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里工业化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可以说，财阀的主要活动，在十九世纪是在商业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是在工业部门，特别集中在采煤、造船、工程和玻璃工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则在金融业。这样说可能把问题说得过于简单了。财阀们率先发展技术先进的工业。他们是主要革新者和西方技术的主要引进者。他们使收入较低的日本有可能发展大规模的经济。由于他们经营项目繁多，使得他们有可能实行所谓"联合投资"，即同时发展辅助工业。财阀们还努力节省在当时确实很稀少的因素，即有能力经营现代企业的人材。他们非常善于通过经营联营银行来动用这个稀少的资本。鉴于当时的问题是使经济增长，而不是（象今天那样）实行经济民主，某种大企业就在日本发展起来了，这在其它地方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对于日本的具体情况却是很合适的。

终身雇用制是日本另一个独特的创造，从1900到1920年，这一制度出了名。它与十九世纪工业劳动力的情况是不相同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挖走工人是很普遍的，流动率极高。但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尤其是在大企业里，是被终身雇佣的，企业很注意非现金的福利，如住房、商店和医疗等。实行这种制度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企业想暗中破坏强大的、讨厌的地区劳工招募人员，结果劳工市场产

生分裂，这对大制造商来说却非常方便。另一个原因是，实行终身雇用制使企业家有一支没有必要与技术和组织方面的进步，包括那种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和组织的进步相对抗的劳动力。终身雇用制还创造了一种企业愿意投资的，特别是通过在职训练进行投资的劳动力。然而实行这种制度主要限于现代化大工业，临时工始终是存在的，当经济情况恶化时，可以将他们解雇。

俄国在共产党执政之前，政府直接和间接地对市场施加影响。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大改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私营部门的企业数量开始增多，力量开始增强。即使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政府的直接作用达到顶峰时，这些企业也扩大了。从1861到1873年，成立了三百五十多家新公司，而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差不多成立了七百家。私营银行也积极发展了，到1900年，有四十家商业银行及其约二百家分行在营业。外国的信贷使国内发放的信贷大为增加。最初，外国的信贷主要是在政府作了放款保证以后获得的。然而，随着对俄国经济的信心的增长——在1897年宣布可以十足兑换金本位货币——外国对俄国私营工业勿需保证的投资的重要性提高了。

在1900年以后，俄国私营经济的体制发生了几项变化。第一，卡特尔的发展很显著。它们的兴起主要是作为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经济衰退危机的一种反应，它们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共同控制市场销售来限制竞争。有人争辩说，它们趋向于限制生产而不是鼓励生产。因此不能说，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日本财阀及其为了多种目的而进行的活动所产

生的影响一样积极。第二，在政府对经济的直接作用减弱以后，卡特尔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银行了。俄国的私营银行原来是按照英国的方式而不是按照德国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也就是说，它们基本上是储蓄和短期信贷银行，而不是投资银行。但是，随着政府投资作用的减少，俄国的银行就乘虚而入。圣彼得堡的银行是以德国投资银行为模式组织起来的，在战争爆发时，十二家合股银行(其中九家设在圣彼得堡)的资本，占银行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它们支配着大工业的活动，以及俄国与外国的金融关系。第三，在二十世纪初以后，企业家的地位越来越变得俄罗斯化了。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1900年，外国资本和经营管理人员曾是俄国工业的动力。但是，在1900年以后，对俄国工业的投资越来越多地通过俄国的银行进行，外国人可以向俄国的银行投资，但不能控制它们。俄国的银行和辛迪加甚至开始在西欧交易所发行纯粹是俄国的公司的股票。在早先由外国经理控制的公司中，俄国经理开始担任更重要的职位。

在苏联人掌权以后，以及在计划经济时期开始以后，非政府的经济组织形式变得没有什么重要性了。严格地说，集体农庄是非政府组织，虽然我们在分析时最好把它们看作是政府组织。然而，日本的财阀和终身雇用制的许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面，也可以在苏联的经济机构中找到。联合投资、规模大、谨慎地使用为数不多的经营管理人材以及鼓励进行在职训练等，也是俄国经济增长规律的因素。其它因素——例如成功地促进国内技术的提高——则不是。

农业与经济的增长

在明治年代，农业部门对于日本经济的增长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由于没有大量输入资本，现代经济最初的建立以及以后的发展，都依靠加快发展传统经济，现代前经济是能够实现这种发展的。然而，农业部门扩大生产的能力是有限的，在二十世纪初叶，它的增长率开始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它的重要性急剧下降。此后，出现了新的增长结构。

虽然对数据有争议，但是，在明治时代，农业产量显然有相当大的增加。农业能为经济提供它的主要出口货蚕丝与茶叶，借以为进口外国机器和专门知识提供资金；为日益增加的人口提供商品；提供不断增加的非农业劳动力；以及为早期的工业品提供市场。产量增加的速度比在此之前的德川时代来得快，这不是靠应用西方技术，而是靠更加密集地广泛使用最好的传统耕作方法。政府在推广本国最好的技术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把老农派往全国各地，建立了试验站，对传统技术进行现代的科学分析。通过改革土地登记制度和实行可以预计的土地税，改进了刺激的方法。整个国家最终达到了非常接近于“最好的做法”的水平。到二十世纪初叶达到这个程度时，日本的制造业已有三百多万工人；纺织品和类似的制成品迅速取得了进步。同时，日本还在制订供选择的实现盈余的办法。

农业对于俄国经济的增长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这不是靠提高产量，而是靠增加出口。农业产量的增加略快于人口的增加(百分之一点七比百分之一点五)。由于城市人口增

加得不相称(1861年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1897年占百分之十五)，农村成了重要因素。它的主要贡献是提供出口粮食，使俄国的对外贸易有了顺差，并有助于吸引外国投资。1900年粮食产量比1860年大约增加一倍，而出口粮食的数量增加了四倍。在1860年，粮食产品在出口总额中占百分之四十，而到1900年，差不多达到百分之七十。生产率的这些新水平，只有在沙皇政府的无情压力下才能达到。沙皇政府把出口放在第一位，却没有建立国内市场。1861年解放农奴以后，农民拥有的土地不足，他们要支付不堪负担的赎金，用公社代替原先农奴主的政权和财权。拥有土地的贵族没有做任何改良土地的事情，农民们渴望得到土地。由于要支付很高的赎金，限制了对农业进行再投资的能力。农奴解放以后，公社得到加强，这也使落后的技术和流动性受限制的状况长期继续下去。

在二十世纪初以后，由于农民起义日益高涨，政府改变了对农民公社的政策。1906年斯托雷平实行的改革，鼓励私人建立联合大农场。在俄国革命之前的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农民离开公社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农场。俄国政权的意图是想鼓励一批富裕的、生产能力强的农民成长壮大起来，这些农民将在政治上支持政权，出售很大一部分产品，并建立起农业设备和消费品的国内市场。斯托雷平的农场的寿命不长，但确实在这些方面作出了贡献。

1928年以后的年头构成了农业在俄国经济增长结构中起相当大的作用的第三个阶段。这些年头是实行中央计划和集体化的年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十年里，农业产量并没有增加，但是即使如此，从苏联工业化运动的全局来看，

集体化并没有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经济增长结构中的农业政策，与日本明治时代的农业政策相似，因为实行这种农业政策都是作为将农村人口输送到城市工业区的一种手段；为了提供食品来养活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为工业提供原料；为了提供出口商品，以便为进口工业设备提供资金；如果可能，为了大大提高生产率，以便既能实现所有这些目标，又不降低国内人民的消费水平。

最后这个目标显然没有达到。但是第一个目标达到了，其它目标也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些目标之所以能够达到，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虽然集体农庄本身并不是提高产量的有效工具，但是集体农庄的组织机构却使它成为当局征集相当大一部分农产品的有效手段。因此，从1928年到三十年代末，农产品的销售量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五，粮食产品的销售量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二，虽然农业产量并没有增加。销售量的这种提高，对工业化计划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同时，从1928到1938年，城市人口翻了一番。然而，谷物的出口量大大增加了，在三十年代初期尤其如此，结果，城市按人口计算的食品消费水平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以上。农村在人这一方面付出的代价还要高。最后，1928年以后的时期的数字表明，棉花和其它纤维作物、羊毛和烟草等非食用品的销售量比食品的销售量提高得快一些。这种提高反映了重视向工业提供农业原料的现象。

外国技术

从西方工业化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对于日本和俄国经济

的增长是极其重要的。在日本，引进和推广西方技术的工作，从明治时代初期起就受到特别的注意。制订了训练计划，从外国请来了技术人员，并派日本人到外国去学习。在建设新工业和筹措经常费资本的过程中，进口了体现先进技术的现代化机器。此外，在整个二十世纪，由于自发投资猛增——日本经济增长结构的关键因素——日本的经济一浪接一浪地引进和推广了有形和无形的外国技术。应当着重指出，日本人并不善于发明新技术，但是他们却非常善于改造，甚至提高西方技术，使之适合他们自己的需要。改进工程学或价值工程学在日本成了一门艺术。

引进外国技术的过程有三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在变革时期建立起来的一些制度，尤其是财阀、终身雇用和行政指导的制度，有助于日本在吸收外国技术方面获得成功。这些制度中的每一项制度都有助于日本提高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的能力。第二，日本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就是要使那些资金比较充足而劳动力比较缺乏的经济发展的先进技术，适合劳动力比较多这样一种情况。注意因素比例对于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是必要的，但是日本人必须把这一点与依靠他们的主要资源即劳动力资源结合起来。日本人创造性地探索了调节必要的因素比例与国内因素供应量和价格之间不调和的途径。缩小这种差别的一个方法是挑选那些比较最适合国内因素比例的现代工业活动——例如从二十世纪头一个十年到二十年代的纺织品。另一个著名的方法是通过更密集地使用劳动力来更加充分地利用资金。在日本现代经济增长的整个过程中实行多班制。即使在一些技术先进的工业部门，也通

过转包合同，用劳动力来部分地代替资金。由于对引进的技术作了这些改进，制造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提高了。第三，一直到1895年中国赔款以及纽约和伦敦为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贷款以后，日本才能依赖外国资金。在此之前，日本和外国的领导人都对进行这种投资是否安全和有无保证这一点感到不放心。

虽然这两个国家在它们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大力依靠西方的技术，但是俄国的工业化更加依靠外国的企业家和外国的投资，尤其是在十九世纪。由于1891年俄国实行保护关税，那些希望在俄国做生意的外国人，不得不通过外国的直接投资来做生意。俄国经济的落后，以及获得利润的良好机会，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外国资本差不多占俄国工业全部新投资额的一半。1900年，外国人在采矿、冶金和工程等行业中拥有的资本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外国的投资大大地扩大了俄国的股本。俄国引进的外国技术，包含在引进先进的资本设备本身之中——并且采取引进人力资本的形式，即到俄国来的外国技术人员以及有经验的企业家和经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在俄国南部建造的钢铁厂，其技术水平和规模与当时西欧正在建造的钢铁厂相同。此外，由于外国人参加管理，那些钢铁厂跟上了西欧的进展，并且在世界上的钢铁工业中一直保持着主要钢铁企业的地位。由于外国公司的竞争，俄国的公司如果要生存下去，也就不得不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实行保护关税以后，俄国的公司确实避免了外国的竞争，但是无法避免设在俄国的外国公司的竞争。实际上，这种关税有助于外国公司进入俄

国，加剧了国内的竞争。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曾企图招收外国经理参加，有许多人是重新回来参加，协助恢复和扩大苏联的工业，恢复和提高它的技术水平。给外国人特许权的计划只占工业产量的很小一部分。即使如此，它的作用也不应当忽视，因为它比人们普遍认识到的要广泛。这项计划至少接触到了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而在有些部门——采煤、电气设备、通讯、机动车辆——这项计划看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五年计划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展的工业化运动的推动下，苏联人实行了大规模引进外国技术的计划。除了引进先进的技术以外，苏联人还从国外请来了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工程顾问。1930 年到 1932 年底是建设非常集中的年头。据说，1932年在苏联工业部门工作的外国专家差不多有七千人。据一位人士称，在这些年头建造的任何规模的工厂没有一个不与西方的技术和建筑业有联系。据说，斯大林在 1944 年说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所有大工业企业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立起来的。

苏联人在其尽快改革经济的运动中，以特大规模从西方引进技术。不这样做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他们继续一面引进外国技术，一面对他们自己的科技研究和训练计划进行大量投资。虽然这项计划的成果是很大的，但是俄国人在掌握现代生产技术方面没有象日本人那样成功。他们在这方面的短处在当前这个时期变得更为明显了。

农 业

作为经济增长结构，农业的作用在前面已经谈到过了。但是，由于在产量结构已经转向工业部门以后很久，农业作为就业的场所和劳动力的提供者，在两国仍然有重要意义，所以有必要作为一个经济部门来加以论述。

日本农业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增长的规模，很快就可以加以归纳。从整个明治时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农业产量提高得越来越快。从那时起，它的发展速度急剧下降，甚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其它经济部门回升时，农业也没有恢复。事实上，只是到了五十年代后五年，下降的趋势才发生逆转。在这三十五年时间里，稻子一直是主要农作物，小型农场是主要生产单位。

从经济观点来看，日本在明治时代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不靠引进西方技术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日本提高农业生产率是靠改进老的耕作方法，是靠从先进的西部向落后的东部推广这些优良的方法。那时在日本臻于完善的那种技术——往往称为明治技术——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劳动强度，而花费的资金很少。

在二十世纪初期，在传统的技术上取得进展的机会依然存在，但是可以改进的余地变得更有限了。大多数农民使用肥料的数量已经比过去多了；在日本的许多地方已经推广了较好的技术，种籽质量达到的水平也比过去高得多，尤其是在日本的西部。然而，到二十年代初期，已经不可能用传统的技术取得更大的进步了，传统的投入已达到最高的水平。从此

以后，农业成了日本经济的病夫。产量不能令人满意，又需要更好的耕作方法了。可是，更好的方法需要一种非常不同的技术。该是采用资本密集度更高的耕作制度的时候了，采用这种耕作制度要使用更多的机器，投入更多的资金。存在着许多起阻碍作用的因素：生产单位小；人与土地的比例不利；许多人仍从事农业生产，没有机会到工业部门就业，台湾和朝鲜生产的廉价的殖民地产品的竞争。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农业衰退了三十多年。1920年以后的这些年头的历史，充满了佃户们的骚乱、反对寄生的地主所有制的呼声和农民的苦难。在十九世纪进行得很顺利的事情，在二十世纪化为了灰烬，一直到三十年代末，还看不到有什么解决办法。

俄国农业在这八十年变革时期的发展，有一个方面是相当令人吃惊的，那就是土地的生产率提高得很少。非常粗略地说，1939年的农业总产量（农作物和畜产品）大约只比1860年提高一倍半，播种面积大约只增加一倍。因此，在整个八十年里，每英亩的产量大约只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在1913年之前的年头里，每英亩产量提高的速度与播种面积扩大的速度是相同的，都是百分之五十六。但是从1913到1939年，每英亩产量下降了百分之十七，而播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二十七。

从1860到1913年，俄国的农业小规模经营占支配地位，这种经营很少使用农业机器、肥料和科学方法。先进技术在这些方面的使用主要限于西部某些地区和经济作物。按当时的标准来衡量，每英亩和每人的产量都是低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保持了把土地分成许多块条田的三圃制。由于人口增加，公社定期重新划分土地的重要性也提高了。事实

上，由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农村人口增加得相当快，条田越来越窄了，有时变得不到三英尺宽。斯托雷平在1906年进行的改革是为了鼓励农民退出公社，并把他们的条田合并成农庄，有四分之一的农户确实乘机利用了这项计划，后来由于战争爆发，计划就中断了。

从1928年到三十年代末，苏联农业并不象工业和大多数其它部门发展得那样顺利。从1938到1940年，农业平均总产量仅仅略高于1928年的产量。农作物的产量提高百分之十三点七，但是由于畜群遭到严重摧残，畜产品的产量比1928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三点九。牛的头数从1928年的六千零一十万头，下降到1933年的三千三百五十万头的低点，1939年恢复到五千三百五十万头的水平，但是后来在1940年又下降到四千七百八十万头。其它牲畜的头数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在1928年以后的十年里，苏联的人口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十四，这实际上就是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农业总产量事实上大约下降了百分之十。

由于实行集体化，大农场在俄国农村中占了支配地位。农业机器得到了推广，肥料和灌溉设备的使用量开始增加，还企图改进生产技术。尽管如此，土地的生产率明显地下降了。可是，由于实行机械化和为改进耕作方法所作的努力，确实有可能减少农业工人的数量（而不是所花的工时），它们还能不使劳动生产率下降。按世界标准来衡量，1940年俄国农业的生产效率在各个方面，包括农庄管理水平和农民的情绪，都是很低的。只有在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能力方面，俄国的农业制度才是相当成功的。

工　业

在变革时期日本和俄国的工业生产的增长，可以用三组行业来进行比较。这三组行业在表 10.3 中作了充分的说明，它们是：第一组行业主要是食品加工业和性质相同的生产活动。这些行业包括木材和粘土产品，它们生产方式的传统特点仍很明显，一般使用资本密集度低的技术。第二组行业生产纺织品和皮革制品，它们从资本密集度来说，居中间位置。第三组行业主要生产化学品、金属和机器；一般说来，这些生产活动具有"比较重型的"和比较现代化的特点，代表着可以称之为资本密集度高的、"仅次于纺织业的"技术。

在十九世纪，日本的工业产量中第一组行业占支配地位。然而，在二十世纪，产量结构发生了两个相当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第二组行业相对地说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第二个变化是，由于在三十年代日本准备进行战争，第三组行业相对来说甚至发展得更快。例如，在1919年，各组行业的产量比例如下：第一组，百分之二十；第二组，百分之五十一；第三组，百分之二十九。但是，如表10.3所示，当经济已经受军队的重大影响时，这些百分比就发生急剧变化。

在俄国，第一组的食品工业和第二组的纺织工业，尤其是棉布，在 1860 年以前比较发达，但是从1860到 1913 年，第三组行业——煤炭、黑色金属和石油——发展得比较快。一些粗略的数据表明，在1897年，第一组行业占就业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九，第二组占百分之三十二，第三组占百分之三十九。又

如表 10.3 所示，到 1940 年，这些百分比都发生了变化。然而必须指出：(1)俄国1897年和1940年的数据是从不同的来源得来的，因此它们的可比性可能是有限的；(2) 1940 年的就业人数和产量数据也是从不同的来源得来的，它们的可比性也是有限的；(3)第一组包括木材和木材制品。在俄国，这是一个大工业部门(1940 年，它占就业人数的百分之十七，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二)，并且具有第三组行业的某些特点。如果把这个行业从第一组转到第三组，那么俄国 1940 年的就业和产量结构看起来就与日本的这种结构惊人地相似了。仍然存在的一个差别是，在日本，第三组行业就业人数所占的比例，比它的产量的比例来得小，这表明，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平均的劳动生产率。而在俄国，情况正好相反。对这种差别的一

表 10.3 各组行业的产量和就业人数所占的比例(%)

	第一组 ①		第二组 ②		第三组 ③	
	就业人数	产量	就业人数	产量	就业人数	产量
日本						
1909	24.8	29.6	62.8	50.7	12.4	19.7
1919	20.9	20.0	54.8	51.0	24.3	29.0
1940	18.8	19.0	24.4	18.4	56.8	62.6
俄国						
1897	29.4	37.2	31.6	34.8	39.0	28.1
1940	33.6	42.7	21.1	20.2	45.2	37.1

① 第一组：食品；木材和木材制品；陶瓷、石头和粘土制品；印刷、出版及有关行业。

② 第二组：纺织品；皮革和皮革制品。

③ 第三组：化学品、石油、煤炭；橡胶和橡胶制品；钢铁；有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制品；运输设备；机器；电气设备；其它工具和设备。

种可能的解释是，俄国采矿工业所占的比例大，而其劳动生产率低。

这两个国家的工业部门之间的另一个对比是生产的规模。正如表10.4的数据所表明的，日本和俄国在这方面的差别是惊人的。虽然两国的经济都朝着大规模生产越来越多的方向发展，但是到1910年，俄国已有一半以上的工厂劳动力在雇佣500名以上工人的企业中工作，而日本到1940年还低于这个数字。

表10.4　在不同规模的工厂中工作的工人的比例（%）

雇员人数	日本		俄国	
	1909年	1940年	1910年	1950年①
50人以下	45.6	36.5	11.6	9.2②
50人到499人	33.6	27.2	35.0	21.2
500人以上	20.9	36.4	53.4	69.6

① 俄国1950年的数字不会由于没有掌握1940年的数据而有很大差别。

② 这个数字是在雇员不到100人的工厂中工作的工人的比例。

最后，凡是对日本和俄国的工业化进行比较，都不应当排除对劳动力的来源进行具体的考虑。非常笼统地说，从企业家的观点来看，日本的劳动力形势几乎始终是有利的。比较先进的教育水平保证了存在合格的人材。要求工作的愿望是强烈的，纪律性是好的。最重要的是，企业家能够以非常有利的工资率雇佣工人，一般说，工资率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少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日本的廉价劳动力，工人素质好，日本企业在竞争中具有很大

的有利条件。

在对两国的工业化过程进行比较时，还必须记住，日本现代大企业的工资—就业制度有它众所周知的特点，“按工龄长短定工资级差”和“终身雇佣”就是这些特点的象征。在日本，工资的标准和构成是由各企业，而不是由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劳工市场确定的。日本的工资—就业制度还包括这样一些特点：工资的高低与文化程度和具体的学校、年龄以及在一个企业工作时间的长短等个人因素密切相关；普遍进行在职训练；干某一项工作和个人的工作效率对工资的影响，不如生活费用和工人的地位对工资的影响大；工人和他的公司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和衷共济的心理，这一点在大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企业的工人流动率很低，很少将工人调往小单位或从小单位调入工人。必须重复说明，这些特点只与整个劳动力中那些有幸在现代化大企业中工作的少数人有关。然而，工资低的小企业，还可能表现出具有更大个人性质的家长作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农村和工厂之间的流动，还有助于削弱和抑制部门和阶级意识。然而，日本工业的增长并没有防止通常都会产生的工人住房条件拥挤和恶劣的后果。

在革命前的年头里，俄国产业工人同土地的关系甚至比日本工人更密切。他们往往是村社的社员，每年有一部分时间回到村社去帮助收割庄稼。即使那些已经与乡村割断一切牢固的个人联系的工人，也不能一夜之间就抛弃农民思想意识。一般说，俄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很恶劣，他们工资低，住得非常拥挤，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是贫困的、受剥削的劳动

力。可是，尽管他们工资低，但也有人说从企业家的观点来看，他们是一个花钱多的因素，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也很低。

在革命以后的头十年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形势恶化了。许多最有经验的和够格的人由于政治原因，不再在工业部门工作了，或者被解除了负责的职务。然而，在1928年以后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普遍实行教育和在职训练计划，工业产量确实有所提高。俄国有一点与日本不同，那就是，虽然工资级别确实随各人的教育水平和资格的不同而不同，但是俄国某一级别的工资额直接体现工人生产的数量。此外，在三十年代工业化运动的喧闹声中，工人的流动性，特别在某些地区，是很大的。

对外贸易

日本与俄国发展形式的差别，没有一个领域比对外贸易看得更清楚了。在整个变革时期，日本的对外贸易额迅速增加，而俄国的对外贸易额在二十世纪则显著下降。日本主要出口制成品换取原料，而俄国则出口谷物和其它原料来购买制成品。

日本对外贸易额增加的速度，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比世界贸易额快一倍，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里比世界贸易额快九倍。在其中的大多数年头，日本是制成品的出口国，它的主要顾客在亚洲和北美。出口的主要产品，从十九世纪的蚕丝，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棉纺织品。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机器的出口逐渐变得更为重要了。然

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日本出口的商品中，“轻工业”产品占主要地位，其中纺织品是主要项目。这些从事出口的工业部门还表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出口”的，也就是说，它们把相当大的一部分产品输往国外。

日本作为一个出口国，它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它能降低成本，使它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在几个短时期内，日本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是由于对日本产品的需求量增加，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但是从长远来说，是由于日本的出口工业不断注入外国技术，因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国外顾客乐意购买日本货物。

尽管自参加世界经济以来日本对外贸易取得了这样好的成绩，但是直到最近，它一直受到国际收支逆差这个外部因素的限制。这些逆差起最高限额的作用，周期性地阻碍经济进一步增长到接近投资猛增时期的最高水平。日本外汇储备的地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贸易差额决定的，因此，进出口额的增加是决定什么时候实行最高限额的永久性因素。在进口方面，由于缺乏土地和自然资源，最严重的“供应限制”是在原料和燃料的进口方面，在二十世纪，还在粮食的进口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这种限制始终在起作用，尽管日本成功地用其它办法代替了除原料和燃料以外的其它进口货。但是代替进口货这种办法不可能做得很充分。国际收支逆差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一再迫使日元贬值。在1945年以前，外部因素对日本现代经济增长的压制，无疑在心理、政治和组织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后果。一些最富于想象力的经济机构由于资源贫乏而受到严重限制——例如大贸易公司。日本资

源贫乏显然也是它在美国实行石油禁运以后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原因。一般说，原料根基差这种情况，造成了贫穷和提摸不定的心理气氛，这是任何经济增长率的统计数字所不能医治的。

从俄国来说，革命以后实行的政治限制，对于减少贸易额和降低参加世界经济的程度，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1913年以前，沙俄的贸易显示了不发达经济的一切典型特点。俄国出口原料，进口机器和其它工业品。它出口的东西主要包括谷物、木材和石油，实际上，在二十世纪初叶以前，俄国是世界上第二大产油国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在1913年以前，俄国进口的东西主要包括机器、设备和它不生产的某些材料，即橡胶和有色金属。进口货还包括一些虽然国内产量不断增加，但国内需求量超过当地生产能力的物资：辗压有色金属、铜、煤和棉花。

进口机器和设备极其重要。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些物资的进口量增加了四倍。1913年，它们占国内机器和设备的生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这些机器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外资公司引进的，当时，外资公司在俄国的经济中占显著地位。由于外国的投资，一般说，俄国在商品进出口方面保持着顺差。在二十世纪初叶以后，由于俄国付给外国人的红利和利息流往国外的数额，超过了外国流入俄国的投资额，使人产生这样的错觉，以为俄国是一个资本输出国。

在战争和革命以后，俄国的对外贸易额引人注目地下降了。出口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913年的百分之十

点四，下降到1929年的百分之三点一。虽然苏联政府在几个五年计划中总的政策是保证苏联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独立，但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贸易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由于计划强调为工业积累资本，进口机器和设备又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到1932年，机器和设备的进口额，上升到占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五的水平。某几种机器（汽轮机、发电机、锅炉、机床和金属切削机床）的进口额，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即从1928年到1932年，增加到占这些货物供应量的增加部分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九十。总的来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资本货物的进口额占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二到十四。此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某些基本工业原料（铅、锡、镍、锌、铝和橡胶）的进口量，占苏联经济的消耗量的百分之九十到一百。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苏联的对外贸易额下降了，这主要是由于苏联实行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的结果。但是财政方面的某些发展也起了作用。由于出现了影响市场经济的萧条，农产品等原料的世界价格，比机器的价格跌得多。因此，苏联人进行对外贸易花钱越来越多。此外，他们发现，很难获得他们认为有力偿付的外国信贷。

由于这些原因，在1932年以后，苏联的对外贸易额急剧下降。出口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曾经达到过百分之三点五的高点，而在1937年下降为百分之零点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即从1933年到1937年，资本货物的进口额下降到占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重要物品依靠进口的程度下降了，有些下降幅度还相当大。例如，拖拉机的进口量在1931年几乎占拖拉

机库存量的增加部分的百分之六十，到1932年下降为百分之零。到1937年，只有铜、铅、锡和镍的进口量占这些物资国内总消耗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此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进口对于俄国经济的增长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显然，如果不进行对外贸易，苏联的工业化就会大大推迟。然而，接着，对外贸易对于苏联经济的增长远非是一个战略因素了。随着国内生产能力的建立，苏联的经济越来越变得自给自足了。

总之，尽管有传统和政策不同这种背景，日本和俄国的经济所生产的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数量是差不多的。日本明治时代的领导人进入国际社会的时候，正是自由经营方式的威信占压倒优势的时候，这种方式符合他们自己的愿望，以及对在封建社会争取摆脱贵族控制的斗争后期成效不大和不公正这种往事的回忆。这些领导人起先试图实行刺激，并想使经济活跃起来。在1881年，他们愿意把政府的大部分投资出卖给未来的财阀联合企业的建立者。然而，在建国事业中，那些企业的建立者是政客们的正式伙伴，家族公司的传统，是象封建社会的勇士家族那样，用创始人立下的规矩进行管理，它有它自己的规矩，严格禁止浪费和轻举妄动。是过去的偏爱而不是制度以各种方式为当前的目的服务。

在俄国，彼得一世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央政府进行干预和外国参与工业化的传统，影响了早期工业化的发展。不过，事实证明，在消除农村中影响农业发展的障碍方面，俄国的大改革不如明治时代在同期进行的改革有成效。直到帝国的最后十年之前，个人有权拥有地产的制度和国内市场，并没有发展成为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农村基础。只是在实行集体化以后，

政治连续性的中断才带来了在计划时期企图实现的完全的集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在上面所谈的整个时期中特殊的政治连续性——体制、目的和上层人士的连续性——对于那个国家的发展来说，看来很可能是一个最有利的因素。

国际比较

我们可以将日本和俄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化时期经济增长的情况，同经过挑选的几个西欧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我们有这些国家的某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数据。与之进行比较的国家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英国和美国，它们的数据——从农业产量到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列在表10.5上。

在1913年以前的时期里就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说，刚刚开始增长的日本（百分之二点七）和俄国（百分之二点五）完全比得上其它国家。它们比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增长得快，比德国和瑞典稍微慢一些。只有美国比它们增长得快得多。

至于这个时期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日本（百分之一点七）也比较高，只有美国和瑞典超过它。俄国的成绩（百分之一）不是那么好，除意大利外，所有国家都超过它。

从1913到1938年，日本和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比所有其它国家都高。它们能取得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国家发生了大萧条，而日本和俄国避免了大萧条的影响。

在这两个时期里，日本和俄国的农业产量在上述这些国家中是最高的或者是接近于最高的——工业产量也是如此。

表 10.5　国际比较

	日　本	俄　国	德　国	法　国	意大利	瑞典	英　国	美 国
平均年增长率(%)								
国民生产总值								
1870—1913	2.7①	2.5	2.8	1.6	1.4	3.0	2.0	4.3
1913—1938	4.0	2.8或4.7②	1.6	0.9	1.7	1.8	1.1	2.0
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								
1870—1913	1.7①	1.0	1.6	1.4	0.7	2.3	1.1	2.2
1913—1938	2.7	1.9或3.8②	1.1	0.8	1.0	1.3	0.7	0.8
农　业　产　量								
1870—1913	2.0③	1.7	1.5	0.7	缺	1.7	0.0	2.3
1913—1938	1.2	1.0	0.0	缺	缺	0.0	0.9	1.1
工　业　产　量								
1870—1913	5.6③	5.2	4.4	2.6	3.7	5.9	2.0	5.0
1913—1938	7.1	4.0或6.8②	1.6	0.4	2.0	3.3	1.7	1.7
人　　口								
1870—1913	1.00	1.52	1.16	0.17	0.66	0.70	0.88	2.09
1913—1938	1.33	0.89	0.51	0.02	0.67	0.46	0.43	1.17
绝　对　水　平								
193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以1964年的美元计算，以十亿为单位）	37	90—93	43	42	27	缺	56	228
1940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以1964年的美元计算）	554	510—542	1,101④	1,017⑤	580⑥	缺	1,234⑦	1,886

①　1879—1913　　②　请看本书英文版第162页　　③　1874—1913
④　1937　　⑤　1931　　⑥　1941　　⑦　1937

它们的增长率，尤其是日本的增长率是相当惊人的，虽然，如果把1928到 1940 年这个阶段单独列出来，那么苏联本来会表明它增长得最快。在1913年以前的时期，俄国的人口增长率是高的，日本一般；在 1913 年以后的时期，日本的人口增长率最高，俄国大体上是一般水平。

到1937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达到了大体上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四十的水平。然而，193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比除意大利以外的所有国家都低。但是从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到1940年，日本和俄国差不多是相等的。它们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上和意大利一样，相当于法国和德国的一半，略低于英国的一半，大约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三十。

第十一章　社会的相互依赖

日本和俄国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发生了四分之三世纪无情的、往往是混乱的变化。由于政府实行影响深远的计划，由于迅速实现现代化所产生的间接的，但是同样带有根本性的后果，旧社会的残余屈服了。日本在这个变革时期之初，实行了最彻底的社会计划，这种计划是在领导的指导发生变化以后制订的。在俄国，这种计划是在革命以后不久实行的，整个苏联社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了最引人注目的变革。然而，从1860到1940年，几乎每过十年都出现了社会变革加快的势头。但是，尽管变化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重要的连续性还是保持下来了。

日本和俄国的相似之处，又为我们进行比较分析提供了出发点。例如，由于这两个国家的人口不断增加，它们每十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三。这两个国家的工人和行政人员人数增加的速度要快得多。各代人之间、男女之间、地区之间、大小不同的居民点之间，文化程度的差别，成了确定谁有资格取得范围不大，但日益扩大的受人尊敬和报酬优厚的职业的关键性因素。至少在这个变革时期的初期和末期，对乡村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听命于中央当局指示的强有力的村庄及村庄间的组织来实现的。无可比拟的城市化速度，使得这两个国家放弃了以前以土地为基础的开发资源的方法。虽然存在着一方面派人员出去为城市提供劳动

力和接受教育，一方面又要扩大农村生产这种新的压力，但是家庭休戚相关的关系还是保持下来了。在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二元社会。一端是官员、知识分子和大公司的许多雇员，他们分享着工作有保障这种难得的权利。另一端则是普通的农民，他们缺乏最起码的教育，在城市社会里往往只能找到临时的和低等的工作。在这些二元社会中差距不断扩大的阶层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由较低阶层升入较高阶层的流动，这种流动成了连结这些阶层的重要环节。

上述情况是日俄两国的一些相似点。然而，对日俄两国的不同点进行考察往往使这许多相似点遭到忽视。这两个国家当然有不同之处。苏联的社会是由革命和内战，以及由十年的摇摆和试验形成的。这十年的摇摆和试验终于导致进行被称作"建设社会主义"的和平时期的大规模动员。如果对两国在十九世纪进行的改革运动作比较的话，那么俄国改革的效果证明不是那么显著。文化普及得比日本慢；城市化也落后于日本，一直到革命以后十年才赶上；土地的私人所有制的发展一直到革命前夕都是犹犹豫豫的，在集体化运动中干脆废除了。另一方面，在日本，家庭融洽，村子团结，城市秩序井然，这些都为不断进行改革提供了更为持久的基础。在俄国，继续进行的改革暂时支撑了摇摇欲坠的组织形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确立新的格局时为止，其动力是有意识地努力重新分析社会阶级和改造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现代化的类似力量在日本和俄国逐渐兴起，但是，使国家向前发展遇到的种种曲折在俄国所包含的强制性比日本要大得多，代价也大得多。

人力资源

日本和俄国人口的变化，也走过了类似的道路。两国的人口最初分别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三弱和百分之六左右，后来由于出生率高于死亡率，以及帝国的扩大（虽然对日本来说，为时不久），到1940年分别占世界人口增加以后的总数的百分之四以上和百分之八，其中，帝国扩大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小得多。每个国家的自然增长率一般波动不大，一般说，出生率超过死亡率千分之十到二十。俄国的自然增长率一般略高于日本，但是，由于死亡率有几次短时期的上升，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所以从长远来说，两国的差距就缩小了。

日本和俄国从很高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过渡到比较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速度异常快。在出生率和死亡率不断下降这方面，日本比俄国领先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但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俄国实际上赶上了日本。虽然很难弄清苏联在三十年代这混乱的十年中的情况，但是苏联的死亡率显然比日本下降得快，如果不是突然停止合法的堕胎，那么出生率本来也会接近日本的水平。在这两个国家，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下降，表明它们迅速过渡到每个母亲生很少几胎和估计寿命延长这两种情况，但这种过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很久才完成。

由于两国可以从事生产和要求得到住房、消费品和服务的人口比过去多得多，因此，取得国家日益增加的财富的条件经常发生变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实行改革以后的头几十年里，过去的武士和农奴主中占据高级职位的人很多。这两部

分人在失去世袭俸禄或农奴后得到了国债的补偿，他们还利用文化程度高和前程远大的有利条件，开始争取得到新的、有利的高级职位。然而，许多以前的农奴主并没有经历什么突然的变动。他们继续保持世袭的贵族地位，拥有庄园，依靠农民为他们劳动，这些农民分到的小片土地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收入来养家和支付赎金。与此相反，日本从前的武士差不多都不拥有土地，他们被抛弃后到处飘泊，争着谋求行政、军事、警察和教育方面的工作。许多武士为了重新开始新的生涯，离开城堡市镇到乡村去，或者离开东京(过去叫江户，东京是在皇宫搬到这里以后重新命名的)回到故乡去。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义以后，废除武士阶层的工作进行得很利落，付出的代价也比较低。过去的上层人士比较快地转而承担新的任务，并且迁往日本新的地方。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另一类上层人士已经巩固了他们对俄国和日本新建工厂和政府机关的控制。不论他们是工业家、金融家，还是土地所有者，或者——与带有资产阶级和富农味道的名称相对立的——国家管理人员、行政人员，或集体农庄主任，这些人依靠受过教育的和有技术的下级，以及党政当局来改善他们的单位在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中的地位，在这些方面，他们表现出类似的领导才能。在俄国，以前几十年的企业家，已经让位给那些执行党的指示的忠诚的官员。在日本，从各类商人中间产生了财阀和无数小商人。革命以后，俄国的上层人士，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上层人士不同，他们更充分地动员起来了，直接为实现共产党或它的代表确定的目标出力。日本的上层人士早已表示过，并且一般已得到证

明，他们是愿意为国出力的。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阶级地位与文化程度密切相关。占全国人口百分之零点几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被吸收去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和专业工作。到三十年代，苏联受过全部中等教育的人，在与他们年龄相仿的人中占百分之十，他们找到职员的工作，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这批人的数量增加了，其它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大概还有受过一点技术教育的人，竞相谋求工厂里的技术工作。大部分工厂工人只进行体力劳动，不需要受过什么专门训练。在二十年代以前，大部分日本产业工人都是年轻未婚女子，她们为了养活自己和补贴家用，进行几年有害于健康的劳动。日本未完成六年以上教育的男子，俄国未完成三年以上教育的男子，大多继续从事农业劳动。(在日本，用于学习语文所需的额外时间，可能略微弥补了这种不平衡)。事实上，教育阶梯很难爬而且很费钱，但是它决定了绝大多数日本人和俄国人选择职业的范围。

由于文化程度高往往有可能使人们的社会阶级地位上升，因此，受教育的机会变得极其重要，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方面，有三个对比显得很突出：(1)男子受教育的机会比女子多；(2)城市居民比农村的人受教育机会多；(3)青年有有利条件，因为每过十年，受教育的平均年数似乎都要增加。在二十年代末，俄国居住在城市的男子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居住在乡村的男子多四十七倍。然而到三十年代，苏联的男子正在丧失其优先地位。而在日本，父母的财富仍然是一个更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初等教育在日本普及得比较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以前二十年，日本就已经接近于普及小学教育了，而俄国小学生的人数几乎还没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然而，俄国中学入学人数，尤其是大学入学人数所占的比例较高。日本中学和大学注册入学学生的比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逐渐提高了，但是苏联在三十年代取得的大踏步的进展，使得苏联在这些方面远远领先。总之，日本人口接近消灭文盲较早，在整个变革时期受初等教育的人所占的比例较高；俄国由于在这个时期结束时受过初等教育的人数迅速增加，因此在整个变革时期使更多的人可以提高文化程度。

由于各阶级的人的文化程度提高了，所以他们生活的质量在许多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从报纸上，到三十年代从收音机和扬声器中得到消息，受到教育，有时了解互相争论的观点。生活水平，特别是城市中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福利措施，尤其在苏联，使许多人受益。大规模的运输工具和电气化迅速发展，日本尤其是这样。在这些年头中的大多数年头里，消费水平提高了。然而在最后十年或二十年里，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从迅速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分出大笔的钱来满足群众的需要。不断增加的人口需要比较多样化的饮食，日益城市化的居民需要单独的套间，那些要求已经提高的人们需要各色各样的消费品，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日本和俄国新的领导人要优先照顾其它方面而无法提供。在战争岁月里，这些短缺现象都变得更为严重了。

下面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二十世纪头十年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和俄国的乡村青年作一简短的比较，来结束对人力资源所作的这一概要的论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乡村

中的一些习惯实际上仍未受最近的改革的影响。大多数上过学的人。至多只有最起码的文化水平，成功地离开乡村的机会比较少。在日本和俄国，1900 年以后不久上学的那一代人遇到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青年们有机会掌握乡村需要的技能，或者在城市找到工作，这比他们父母的情况要优越得多。日本农民抓住这些机会大概比较容易，因为他们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摆脱了限制流动和移居的法律障碍。与此成对照，在俄国，由于加强了在全村范围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以及加强对移居的控制，因此限制迁移自由的一些规定一直保持到1905年，有的一直保持到1917年。从有关在 1906 年出生的人的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俄国乡村变化速度缓慢，这些数据表明，在那些活下来达到成年的人之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从未受过三年以上的教育，只有百分之七的人完成了中学教育。虽然如此，即使是这样的受教育程度，也比以前几代人在这方面的机会有显著的改善。由于在这两个国家出现了二元社会，农村子弟发现短期搬到城里去比较容易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什么机会在小小的现代城市部门找到一个位置。

然而，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社会阶级的分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于农村子弟大批流入城市，城市非熟练工人成倍地增加了。许多服务性行业熟练工人和雇员的人数甚至增加得更快。到变革时期结束时，这两个国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在日本和俄国，文化程度高得多的人大为增加，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去从事新的职业了。在三十年代，青年是注定要应征去打仗的，但是他们的选择机会开始比他们前辈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俄国在革命、内

战、集体化和清洗时期，许多高级职位大变动，更加上降低学费，鼓励为妇女劳动力安排新的工作等做法，这些都提供了选择机会，这些机会突然变成了数以百万计的人获得成功的经历。战争继续进行着，实际上使机会增多了。日本在战争的头几年，通过工业和军事训练的分包合同，学习技能的速度加快了。日本和俄国都经过战争的破坏而保存了有技能的人力，但日本比较侥幸，死亡率较低。

居住方式

在改革时期，日本和俄国的居住方式，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城市人口总数从五百万增加到两千万，俄国从七百万增加到二千五百万。日本的农户数几乎一直保持在五百五十万户，而俄国的农村人口翻了一番，差不多达到一亿二千万，大约有250万户。与俄国不同，日本完成早期的变革时，农村人口没有显著增加。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农民的要求增加了，但是福利没有相应增加。初期的现代化、城市和农村的尖锐的两重性的发展，以及农业的商业化，曾有破坏村庄的团结的危险。然而，日本和俄国在进行改革的困难的头几十年里，成功地保持了对农村的控制，在这几十年里，新实行的自由使得富农能够购买更多的土地，结果，土地的分配情况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了。在日本，尽管在二十年代发生了一些骚乱，但是对农村的控制还是相当顺利地继续保持下来了。富裕的地主的兴起，并没有损害以前的上层人士或原先存在的

与乡村的联系，而是作为受到早期的改革和农业日益商业化这种现象促进的继续进行过程的一部分。与此相对照，俄国通过集体重新分配赎金的支付额，在某种程度上是重新分配土地这些老的做法，保持了村庄的团结。这也是通过在全村范围内约束农民迁移来保持的。当这些做法受到严厉的批评时，俄国实行了新的改革，使得农民比较易于离开村庄和积聚他们自己的土地。

这个时期的中间几十年是富农的地位显得突出的时期，但是也是俄国对农村的控制特别不健全的时期。富农得到了旧贵族的土地，并威胁着以共同承担的义务为基础的全村范围的联系，但他们没有什么时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们是在未受到严格控制的、由政府造成的敌对气氛中活动的。在苏联，改变土地分配不平均的状况对于恢复对农村的控制也许是必要的，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使用很大的暴力。与消灭武士不一样，消灭富农采取了大规模杀戮和送往劳动营的办法。在农业实行集体化以后，以固定价格进行征购代替了市场规律。

合并村群的过程在日本进行得很顺利，但是俄国在实现集体化之前进展缓慢。用地方管理中心和商业中心替代定期集市和商品交易会，这对于每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是必要的。在日本，小村庄已经被并入较大的单位，在变革时期，它迅速成为新近叫做村的小单位。随着商店的商业活动的扩大，地方市镇承担了以前集中在定期集市上的贸易。在俄国，由于商品交易会和定期集市较长期地保持了它们的重要性，城乡差距扩大的速度快得惊人。因此，将村群合并成一个叫

做乡的单位的工作证明是失败的。

村和乡在十九世纪以前就有了，但是作为改革过程的一部分，它们作为行政单位得到了加强。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村社会增加了新的负担。由于男子离开农村去城市工作，尤其在日本的城市附近，男子转到非农业部门去当临时工或正式工，农村妇女劳动力就被动员去填补男子留下的空缺。集体农庄越来越多地使用妇女劳动力，从而减少了工资和购买城市产品的费用。由于依靠妇女参加农业劳动，这两个国家动员群众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参加战争的能力提高了。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城市化的程度仍比俄国高。在这七十年里，两国的城市人口都经历了十年的停滞。然而在这几十年里，两国都作了巨大的努力，这些努力对于改造城市，使其适应以后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十年里以及在俄国革命以后的十年里，由于土地的使用和社会阶级的分布发生了变化，城市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其余的几十年里，城市一般发展得很快。虽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居住在五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里的居民只有二百五十万，但是到1920年，总人数增加到一千万，到1940年增加到二千五百万。俄国的城市发展得比较慢。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只有百分之十二的人口居住在有二万或二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里(见表11.1)。二十年代以后，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到1940年，这个总数大约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只比日本少百分之十三。虽然日本在1930年，人口比较多的俄国在1926年，都一样有三十一个人口在十万或十万以上

的城市，但是到1940年，俄国跑到前面去了，这种水平的城市有八十二个。从1890到1910年，以后又从1920到1940年，日本城市化的速度特别快，城市变革的速度在这半个世纪里在世界上是最快的。然而，日本需要花五十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城市发展工作，俄国只花了十年时间就完成了一半以上。

在这个时期里，日本人不但比较城市化，而且他们也比较集中在大城市里。在1930年，苏联的人口远远超过日本的一倍，苏联居住在有二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里的居民的绝对数（区别于百分比）大约比日本高出百分之三十，居住在有十万或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里的居民人数，大体上与日本相等。但是，苏联居住在有五十万或五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里的居民，只有日本的一半，居住在有二百五十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里的居民，还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此外，日本的城市越来越集中在四个大工业区里，到1940年，这四个大工业区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大都市和特大都市在日本发展起来了。

表11.1　日本和俄国的城市化

城市规模	城市人口百分比			
	1867—1878	1897—1898	1920—1926	1939—1940
（以千为单位）				
日本：　10^{+}	11	19	32	44—48
20^{+}	9	14—15	24	38
100^{+}	6	8	18	30
俄国：　10^{+}	9	12	13—14	26—27
20^{+}	5	9—10	12	24—25
100^{+}	2	4	6—7	16

日本和俄国城市化的另一个对比是日本城市的连续性大。1811年俄国二十个最大的城市中，到1940年只有七个保持在头二十位的行列里，而在日本，由于大城堡市镇变为县级行政中心，在城市名次的排列上，唯一的大变化是在十九世纪出现了横滨和神户等著名的海港城市。

在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除了上述这些差别以外，俄国经历的动乱比日本多得多，这些动乱以城市发生革命达到了顶点。由于日本以前的武士上层人士一向是从城市进行统治的，所以这个国家没有强有力的农村利益集团，因此，日本牺牲对农村的关心来促进城市的发展——换一句话说，就是促进城市化和发展二元社会——也许比较容易。日本城乡之间的通讯渠道也很发达，农村的群众很快就能得到各种消息，了解改革的情况。苏联人直到三十年代才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这种关系使他们能毫不在乎地牺牲农村的利益来促进城市化。

总之，在日本和俄国，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都跑到城市里去了。这个过程在日本发展得比较快，也比较顺利，农村人口没有大幅度增加，城市也没有发生长期的混乱。新的上层人士在农村的出现，并没有伴随着敌对情绪的高涨。对村民的控制放松了，尤其是对从农村运往城市的货物的控制放松了，这些从未影响日本二元社会中现代部分的继续发展。俄国的村庄最后合并成比较大的单位，它的城市的发展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这两个国家的一亿居民中，只有一千四百万人居住在城市里，但是在1940

年，它们二亿六千五百万居民中，将近有一亿人居住在城市里。

组织结构

从1870到1940年，日本和俄国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发生变化，家庭在人口和年龄的组成上也连续发生变化，它们作为生产单位是逐渐衰落了。妇女有更多的机会找到非农业劳动的工作，受教育，脱离盛气凌人的婆婆而建立小家庭，这些自然改善了妇女的地位。随着专门的教育机构和生产组织的发展，人们花在家庭以外的时间越来越多了。由于个人权利得到维护，家长的权威逐渐削弱了。然而，对于在这个时期的头几十年里发生的这些变化的程度，不应估计得过高。包办婚姻的现象继续存在，妻子仍然有责任照顾公公和婆婆，大多数家庭仍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结合在一起。在日本，体现传统家庭的许多特点的1898年民法典，一直实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革命前，俄国的家庭就已经开始摆脱这些老习俗了。个人主义的，甚至是反家庭的观点，在怀有不满情绪的俄国知识分子中间找到了代言人，这些观点有许多在欧洲国家也有所表现。革命以后，鼓吹改造和离开家庭的人，要求制订新立法来解放妇女，放宽对离婚的限制，给予个人以削弱家庭控制的其它权利，他们的这些努力获得了成功。虽然这些政策中的许多政策在三十年代又倒退了——当时离婚更不容易得到批准，家庭重新被认为是控制社会的基础——但是经过革命，建立新的夫妻关系无疑是比较容易了，这种关系符合就业机

会和教育的变化，成为经过改造的城市家庭的核心。

在三十年代，日本和俄国的家庭制度有一个有趣的相似点，那就是，两国都自豪地在国内声称，它们的家庭制度是样板，比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全世界其余地方的其它家庭制度优越得多。在日本，孝敬父母被描绘成是忠君的基础。在苏联，夫妻平等被认为是培养新的社会主义品德的适当土壤。然而这些不同的理想掩盖了家庭变化过程中的许多类似点，这些类似点与在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方面的类似点是相一致的。加强对家庭的控制是两国领导人的共同目标。

然而，虽然在城市环境中，家庭在法律上也许得到了加强，但是，它不可能继续成为实质上是无所不包的、自给自足的单位。工作单位成了人们彼此相识的补充场所，这对于处在新环境中的城市居民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在俄国，庞大的工业劳动大军出现得比日本早，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业劳动大军主要是农奴劳工。农奴制废除以后，许多短期外出工作的工人，仍然要对村社负责。革命前俄国工厂的工人世世代代都是农奴劳工，长期与农村保持着联系，所以他们从未被有效的纽带与工厂组织连在一起。从1890到1914年，俄国产业劳动大军迅速扩大，他们集中在大工厂里，这样，城市人口中就出现了一部分集中的、往往具有破坏性的人。日本的工厂发展得比较慢，依靠妇女劳动力的程度更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止。与此同时，事实证明，采用传统方法的日本小公司能够使城市劳动力一体化。

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这两个国家逐步形成了工厂组织的新形式。在雇佣、训练、提升和付酬等方面采用系统化

的方法。凭文化程度衡量新职工的潜力。到三十年代，大企业已能向工人保证，它们长期需要他们。日本主要按工龄定工资的制度以及强调雇员福利的制度，有助于大企业实行终身雇佣计划。苏联采取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工人参加决策的新形式，伴随这种新形式而来的是实行计件工资制。实行这两种制度以后，就不怕人员流动性大和劳工市场混乱了。日本的制度使职工产生了一种献身于公司的强烈感情，使大公司能够有秩序地发展，反过来，大公司成了小分包公司宝塔的塔尖。苏联国营工厂实行的制度，也保证了工厂能有秩序地经营，使得产业劳动大军在消灭私营公司后能以极快的速度扩大。

这两个国家创造的工厂组织，不仅是靠契约关系，而且也靠关心雇员个人福利结合在一起的。日本家长式的管理方式和苏联代表国家管理的制度，使得工人可以得到住房设施，并发给特别津贴来改善新迁入城市的人的条件。工会在企业中的活动范围很小，没有权利组织罢工，但是它们确实有助于使工人在组织中感到有保障。

行政机构和党组织也是这种组织结构的一部分。在武士行政机构在日本全国各地解散以后，文官行政机构建立起来了，其人数大体上相当于以前的武士户主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些官员最初大部分是从武士阶级吸取的，他们作为天皇的代表，而不是象以前那样作为将军或大名的代表，享有很高的地位。他们获得了以前只有武士才能享受的某种荣誉。这些官员由于在教育和生涯方面的经历差不多是相同的，所以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具有献身精神的能人集团。他们广泛的影响

渗透到地方一级。这种文官机构不断扩大，到四十年代末已扩大到二十多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东京。在变革时期，庞大的军事机构自然也对日本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俄国的帝国行政机构比起日本的尚处于幼年时期的行政机构来要庞大得多，但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它发展得比较慢了。要进入这种机构有许多渠道，包括贵族连续供职的机会。然而许多俄国人决定不到政府供职，宁愿从事其它职业。俄国政府不象日本政府那样是一支起统一作用的力量，由于士气低落，内部派系比较多，大概比较难以控制。

革命以后，文官行政机构扩大得很快，把以前由私营部门进行的活动也接收过来了。此外，不参加行政机构的党员，也通过他们的领导和监视来进行协助。苏联人树立了一种新的高尚的道德观，使人联想起过去日本武士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特别强调为国家服务的重要性。在这方面，苏联人比1920年以后的日本做得更厉害。俄国的新政府和党组织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网，渗透到整个俄国社会，它们不允许下级机构自行其事，新近加强的家庭结构除外。专业协会等其它组织，只能在党的严密监视下活动。组织工作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基地是劳动营，在三十年代，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被作为囚犯送入劳动营。

那时，组织上的过渡在日本比较容易进行。虽然个人对封建领主的忠诚变为对天皇的忠诚，但是家庭关系相对来说并未受到影响。个人与家庭、公司和政府的关系的特点仍然是忠诚与献身精神。所有这些组织都在发生变化，但是并没有威胁其成员的基本价值观念或忠诚。事实证明，在俄国确立

新的组织形式比较困难。曾经作为农奴控制机构的补充，后来取代了这些机构的乡村组织遭到了破坏，但是家庭和公司要填补这个真空并不成功。结果，新的行政机构和党组织，通过对个人的行动进行更严密的监视和实行更加严厉的高压统治，创造了井然有序的条件，即使没有家庭和公司也产生了在日本表现得很明显的那种献身精神。在三十年代，两国领导人的新方针，使人们对现存的效忠方式发生了怀疑，但是新领导人成功地强制行使了他们的权力。

重新分布的过程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流动性和移居的重新分布过程在日本和俄国达到了创纪录的规模。大部分的流动性是单向的：农民家庭出生的人当上了城市工人和职员。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十五年中，两国流入城市的净人数加在一起，总共达四千多万，而1940年两国的总人口只有二亿四千万多一点。苏联人口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属于世界历史上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

正如已经指出的，接收那些向较高社会阶层流动的移居者的城市组织，到三十年代已经采取了新形式，提高了很快接收大量移居者的能力。然而，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有秩序的移居主要取决于他们在自己离开的村子里的关系。日本只有长子有继承权，而俄国则是根据儿子的多少分配村子里的土地（一种多人继承的形式），这种差别，由于死亡率下降，能够活到成年的儿子比过去多，因而变得更有意义

了。日本的移居进行得很顺利。在那里，户主一般都送那些预期到二十岁无论如何也要离家的长子以下的儿子到城里去，他利用在村子里的关系来帮助安排这些儿子的工作。人们都不再指望这些儿子回村来，除非他们短时期回来探亲和讨老婆，然而这些移居者并没有完全与亲属脱离关系，因为亲属们曾保证他们在新的环境中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家庭制度的结构看来是使移居能顺利进行的要素，这种结构要求不继承财产的孩子们离家。

在俄国移居城市的人口中，十六岁到三十岁的男子也占大多数。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农村的土地是根据一户有几个儿子来分配的。结果，各个家庭都不愿意让儿子长期离开。农村里的习惯做法阻碍了那些移居城市的人完全脱身。那些确定已经永久逃往城市的人，尤其在革命以后，很快就设法割断了他们与农村的联系，这一点与日本人不同。

有两条移居的途径特别值得注意。到三十年代，在日本甚至还要更早一些，在这两个国家要进高等院校学习，必须在竞争非常激烈的入学考试中考得好。谁被某些学校录取，实际上谁就保证能找到受人尊敬的和报酬丰厚的工作。第二条途径就是通过参军，农村青年走这条途径比较容易。俄国早就实行征兵制了，日本到1873年才实行。因此，在整个变革时期，日本和俄国的农民定期应征入伍，受训练，然后从武装部队组织中退伍。对于许多并非大俄罗斯民族的人来说，在这段经历中见识了大多数俄罗斯人的习惯，促进他们在主要是俄罗斯人的环境中升入较高的社会阶层的流动。在俄国内战期间，在红军中服役成了一个明显的有利条件，具备这个条件，以后

就有资格得到好处。尤其是在三十年代，日本的军队成了适合社会需要和进行技术训练，帮助士兵们具备获得较高的收入和名望的条件的主要工具。在这两个国家，武装部队协助进行早期向农村地区推广现代技术的工作，后来在缩小二元社会中两种水平的差距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俄国革命对社会流动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分地工作中分配不均的现象减少了。工资的巨大差别缩小了，虽然在三十年代又大大地扩大了。个人不能再积累财富。雇用他人变得非法了，即使个体经营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唯一可靠的持久的收入来源是耕种小块土地，向国家和集体提供自己的劳动力。

在拥有大部分财富的人们中间，从较高的社会阶层向下降的巨大流动、离散和被剥夺权利，以及新的提升标准的确立，这些都在现代经济部门的需要迅速发生变化的时候及时发生了。即使在日本，进入现代经济部门以及在现代经济部门内部得到提升的标准，也一直到二十年代才正式定下来。在农业以外的部门经营个体经济的日本人的比例也在下降。大公司里受过教育的领薪水的雇员增多了，与俄国的情况不同的是，小公司雇员的人数甚至增加得更快。此外，家庭拥有土地、工厂和其它形式的财产的现象，继续使日本青年在三十年代追求新的机会时具有有利条件。

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在讨论社会的相互依赖的整个过程中，已经看到了演变和革命的差别。在这四分之三的世纪里，日本社会的连

续性比较大，这在人与人的关系的一些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自然，到三十年代，日本和俄国这两个社会都转而实行任人唯贤的标准和注重具体的工作关系了。对一个人的评价，越来越不是看他的父母是谁，而是看他为促进某个单位的目标能做出什么贡献。在这方面，日本和苏联的主要差别在于每隔多少时间对一个人做一次鉴定，为什么要做鉴定——以及由谁来做鉴定。在日本，个人感到比较放心，因为他知道，虽然精心培养起来的个人关系决不是不起作用的，但是在按资历晋升的道路上要越过间隔很宽的障碍决定于在公司指定的考试中的成绩，和公司的选拔程序。那些未能越过头几个障碍的人，仍会在团结一致的集体中工作，只不过热情稍微冲淡一点而已。

在苏联，个人在工作中、邻居中和家里不是那么感到放心。日本人怀有的那种无条件的忠诚，是对过去的信条的忠诚，是对当前稳定的集体环境的忠诚。然而，俄国要求的忠诚，是倾向于对捉摸不定的未来信条的忠诚，是对它并不总是可以预料的或可以识别的代表的忠诚。焦虑和恐怖威胁着人与人的信任。日本人在讲话中坚持用敬语来称呼别人，而俄国人则愿意以新名词同志相称。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极其不同的经历，但是日本和俄国人民在三十年代显示了异常与众不同的和类似的特点。他们在迅速变化的痛苦中是逆来忍受的，对于这种速度加快的变化，适应得异常快。

国际比较

各过渡性的社会在从农村到城市的移居方面有很大的不

同。有些过渡性的社会，如1870年的日本和俄国，保持着人民仍不熟悉工业革命的社会的大部分特征。其它过渡性的社会，如1905年的日本和俄国，则不可摆脱地陷于实现现代化的艰苦奋斗之中，在这样的社会里，农业部门，或小小的依赖不熟练工人的城市部门继续占优势。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如1940年的日本和俄国，它们被承认是进入现代化过程较晚的国家，虽然高度现代化的大多数标志离实现仍然相差至少十年。人口增长率、文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和职业分布情况等标志的巨大差别，就是这类过渡性社会多样性的特征。

自然，还可以用其它标准来衡量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过渡性变化的速度。每一个标准都有它内在的问题：当社会在实行现代化的道路上经过各个里程碑时，过渡的时间要多长。在人力资源方面，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是衡量的标准，在工业、事务、技术和服务部门工作的劳动力的比例长期的增加，也是衡量的标准。考察一下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中的居住形式就可以看出，城市化的速度是截然不同的。有些社会经过一个世纪的过渡以后，脱离农业的人仍然比较少，城市人口只增加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而在其它一些社会，这些数字就比较引人注目。然而，居民分布情况的不断变化，表明城市中公开的或隐蔽的职业是很多的，这种情况，加上令人讨厌地所谓的“寄生性城市”，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事实上，在这些标志发生初步的变化以后，许多社会的城市化的速度慢下来了，同时它们仍然是生产初级产品的社会。

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和变化是区分过渡性社会的另一个根据。在少数国家的至少有二万人口的大城市里，人口在半

个世纪内从百分之十增加到百分之三十，这主要是由于地理上的高度流动造成的，而在日本和俄国，在人口增加的同时，由较低社会阶层向较高社会阶段流动的程度异常高。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的现象，在这两个国家是同城市内部社会流动的机会十分协调的。同样，在日本和俄国，大城市人口爆炸性的增长，是靠扩大和填补城市的其它等级水平来支撑的。首先必须承认，人口大规模地从农村迁往城市主要是这种过渡阶段的一种现象，各个社会在完成人口迁移的速度和顺利程度方面是不同的。

日本和俄国城市化的速度是特殊的，前者从1895到1940年增长得比较平稳，后者从1926到1940年属于猛增。在向城市迁移规模最大的时期，日本和俄国以组织工作做得好而著称，它们对解决协调移居工作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指导。这两个国家大大加强了农村教育计划，日本大约到1900年，苏联到二十年代末几乎所有的青年都识字，这种情况有利于两国选择合适的移居者，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日本农村识字人数的增加和俄国农村中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日本的家庭对选择移居者掌握着很大的控制权，这也就是在迁移的来源地农村里解决这些问题。俄国在这段时期的前一半时间里，农村的集体对支付赎金和同时对移居保持着控制权。后来，当向城市移居的人数增加时，由于成立集体农庄和恢复实行国内迁居证制度，就可以对移居工作进行周密的管制了。在过渡时期的初期，许多国家对农村的控制受到了破坏，日本和俄国与这些国家不同，它们看来保持并加强了控制农村人口外流的方法。

另一方面，迁入城市以后，要用各种方法使移居者适应城市的环境。在这个时期的最后几十年里，使城市保持稳定的一个因素是，日本城市里的大企业开始实行终身雇用制。同样，在苏联，城市生活中的许多福利，是按照与就业有关的标准来分配的。苏联和战前的日本都找到了证明和验明新来者在城市中的身分的方法。苏联由党和警察对城市居民的就业和居住地进行严格的监督，而战前的日本则实行著名的街道协会或保甲长制度。

因此，在日本和苏联逐步形成的，对由农村往城市迁移的人口的控制的特点是传统与革新相结合。这两个国家都继承了上层人士在地理上经常流动，以及年青男子普遍迁往城市的传统，它们都采取家庭、团体和行政管理的传统形式。随着移居人数的增加，这两个国家拟订了新的办法，尤其是城市接纳的办法。苏联大规模的迁移，不是那么依靠家庭和团体，而是用城市优越得多的条件和机会去引诱农村的居民，同时，由前所未有的监视和恐怖机构来处罚越轨行为。

1949年以前的中国代表了那些城市人口仍然仅仅占大约百分之十的过渡性社会。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了，有些通商口岸成了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业中心。但这种情况并没有使省城和地方城镇相应地发展起来。一些在外地主及其雇工迁往城市，从而使与城市的某种传统的联系纽带遭到破坏，而又没有建立象日本和俄国那样的新格局。只有在1949年的革命以后，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数才迅速增加。当最后断定城市人口过多时，对这种迁移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在实行大跃进以后，人们才又一浪接一浪地

从农村迁往城市(文化大革命以后又出现了这种情况)。苏联已表明,它有潜力按计划加速实现城市化,而中国是实现人口由城市向农村倒流的第一个社会。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过渡以后,中国可以迅速进行有控制的迁移,但是,他们仍然在摸索有效地分配非农业劳动力到大小不同的定居点去的办法。

在其它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的城市地区,有许多贫民居住区,还有许多人失业。城市地区优越的条件,和越来越美好的前程,引诱着农村居民摆脱在村子里的变相失业状态,因为在农村,强壮的劳动力的人数,超过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充分利用的劳动力的人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断提高的人口增长率和大量流入城市的人口造成了一种压力,要求把资源用于满足移居者的需要。在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中,日本和俄国比较特殊,它们没有面临移居者的费用螺旋形上升的问题。

日本和俄国实现城市化的速度看来比较快,在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实现城市化的情况不多,选择和利用向城市迁移的人的方法比较好。移居和城市就业机会扩大这两方面的相互关系,由中央计划人员进行一定的调节,但是它也受不同的势力的影响,这些势力有时让农村居民离开,有时不让他们离开,有时吸引他们到城市里来,有时不让他们到城市里来。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和俄国可能用控制和社团连坐的传统方法来较有效地加快和减慢人力的这种流动。

第十二章　知识与教育

两国进入现代时期时，在知识与教育方面已具有很有利的条件。日本受过东亚文明的价值标准的长期教育，并把学问尊为道德的指南和统治的基础。日本开始进入现代时期时，群众就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因此政府要传达其意图很容易。俄国开始时高等教育水平很高，但是普及教育却由于各集团之间在社会和物质方面的差距而受到妨碍。日本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进行全面的变革时废除了军人特权阶级，并迫使其成员在新社会接受任务；俄国在废除农奴制后遇到的问题是，它要联系和关心的人远比过去多。日本的教育改革使已存在的学校网变得合理和集中了，而在俄国则是大大扩大这样的学校网。俄国上层知识分子比较多，他们脱离农村同代人的程度远比日本上层知识分子严重，因此俄国对扩大和分享教育的危险性比较感到忧虑；可是日本认为，扩大和分享教育是使以前落后的地区和集团活跃起来的学习手段。俄国的世俗化开始得较早，并在革命之后完成了这项任务。而现代日本则赋予其政体以半宗教的色彩。到了二十世纪，当几乎所有适龄学生正在从标准的课本接受教育时，家庭和军营发挥了加强学校所教的课程的作用，而现代化的手段使更多的人对帝王的神威产生了一种新的明确信仰。

两国城市化、工业化和动员的趋势很强调文字印刷。日本

由于组织严密，内部联系较为密切，而俄国修建的规模很大的铁路网也发挥了使国家成为一个整体的作用。日本面积小，而水力资源丰富，这就加速了农村电气化的进程，可以补充铁路网的不足。在这两个国家，出版业很发达，源源不断地出版大批翻译作品、报纸、杂志、小册子和书籍。

俄国在整个时期，尤其是在革命之后，进行压制和控制的程度要比日本大得多，其原因是俄国的面积、中央集权和参与等问题要复杂得多。沙皇专制制度在适应现代化过程中经常受到来自下层的反抗，而革命政府又感到各个阶级都与它作对。在日本，由于早期的政治动乱和政府决心制定宪法，那些在革命前使俄国感到苦恼的问题迅速得到解决。日本在新社会形成时对同等地位的集团作出的承诺，往往使腐蚀性比较大的种种不满情绪大大减少。日本政府几乎从不信任人民，但也不十分害怕他们。

教育制度方面的背景

在变革时期，日本和俄国有一个基本的类似点，两国既成功地保持了某些重要的传统价值标准的方向，又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广泛而有效的教育机构体系，其目的是向人民大众传授为迅速实现现代化所需的技能和其他态度。两国在这方面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在普及教育的过程中国家卓有成效地发挥了领导作用。甚至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两国政府已在教育领域采取了广泛的主动行动，但在这以后，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日俄两国都普遍极力主张赶上“西方”，因此，作为向全国灌输一致的献身精神

和使人民掌握获取财富和力量所需的技能的工具，教育就具有新的迫切性了。

两国政府都努力劝阻私人不要发挥主动性，因为这种主动性可能会向国家在全部正规教育中所占的主导地位进行挑战。在俄国，由中央统一领导的各级正规教育制度的基础在十八世纪已经奠定了，虽然这个基础并不雄厚。但是在整个十九世纪，这个制度在许多方面依然并不完善，尤其是在初等教育方面，因为教会学校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正如在前面所提到的，教会学校受国家的资助，而且对国家并未形成特殊的威胁，但是它们从未被认为能代替统一的公立初等教育制度的理想。这点在1917年以后更是如此，因为在那时，新政权富于战斗性的无神论教育政策要求取缔教会的一切教育职能，并把教育权全部集中在国家手里。到1900年，一些由私人馈赠而开办的非公立的院校补充了公立的和教会的教育机构，但是在1917年以前，它们也受到严密的管理，以后则被纳入国家教育制度。

在德川时代深受儒教影响的那几个世纪里，日本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世俗化了。虽然在明治时代的开头几年，由教会办的教育机构曾受到欢迎，但是它们传播宗教的活动始终受到限制。随着现代结构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日趋完善，体现天皇神威的新的国家意识进一步抑制了宗教教育。从此以后，集中指导和一元化成了日本公众教育的特点。在二十世纪的日本，私立高等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但是获得声望的主要道路还是进那些经费比较充足和得到较多支持的国立学校。在二十世纪，日本存在着多重的统治集团，这就

使一些主要的世俗私立大学有可能同它们自己的政治与经济机构联系在一起。

日本的私立大学约占全部大学的一半，这与俄国的大学全部由国家办的制度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是，绝大多数私立大学的学生上的是世俗大学，它们在思想上对国家很少或毫无威胁。有些世俗大学（尤其是早稻田大学）确实是本着反对明治寡头统治的精神建立起来的，但是这种反对是国家本身完全认可的。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于经济拮据和政治压力，使得私立大学实际上成了国家控制的高等学校的一部分。

除了对私立学校进行限制和控制之外，在整个变革年代里，日本和俄国都长期存在一种倾向，即对地方上办学的主动性坚持实行官僚主义的集中控制。两国都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时期——日本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新政权仅仅为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生存下去就必须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教育控制权下放到地方一级。虽说如此，最后的趋势仍是由中央政府集中指导全部的教育政策。在整个变革时期，两国均有权力很大的教育部，它们不仅管理学校，而且也履行广泛地控制文化活动的职能。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的文部省发起对国家的遗产进行研究，并想了许多办法来发扬民族文化。俄国的文化启蒙部（以后称为人民委员会，然后再次改为文化启蒙部），顾名思义，它所负责的教育职能远远超出单纯的学校教育，而是积极致力于阐述和宣传民族文化观念，这种观念在 1917 年以前以“官方的民族主义”作为基础，革命以后则以社会主义作为基础。

义务教育与群众的文化水平

到变革时期结束时，日本和苏联的义务初等教育规划已使得全国人民都有了文化(在苏联的某些少数民族中有少数例外)，并能对来自中央政府的统一的信息作出反应。不过两国取得这一成就的时间是很不相同的，日本在最初致力于义务教育和实行这种教育的速度两个方面都远远地走在俄国的前面。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平民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数已经很多了，估计全体男性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受过这种教育，而俄国的百分比则是很小的。日本较早取得这一成绩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日本的上层人士对平民教育采取了异常积极的态度，这种态度反过来又反映在日本早就致力于实行义务初等教育这一点上。在明治维新仅四年之后的1872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项全国教育法，规定全国人民不分男女都要受四年义务教育。到1907年，增加到六年，到那时，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学龄儿童已在公立小学上学了。与俄国相比，日本开始时的基础要好得多，来自上层人士或平民的抵制比较少，因此，日本甚至从未试图估量全国的"文化水平"，并且能够在十九世纪末卓有成效地使群众都有了文化。

另一方面，在这个较早的时期，俄国的成绩要逊色不少，并因国家和人民大众都坚持对普及教育采取消极态度而受到妨碍。在整个十九世纪，沙皇政权对它自己控制印刷品内容的能力表示怀疑，从而倾向于认为群众有文化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威胁。于是国家将其大部分的教育精力集中于高等教育上，

尤其是集中在大专院校上。而俄国的农民本身则并未消除对学习的疑虑，他们有时对国家在教育方面采取的行动表现出敌对情绪。只有当教育在人民心目中明显地与改善其社会地位相结合时，它才得到公众的支持，并被他们所接受。直到1905年革命之后，沙皇政府才明确致力于创造群众性的文化，比日本足足晚了一代人。不过，到那时，大城市里所有三十五岁以下的男子，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已具有可以参加工作的文化水平（常常通过自身的努力）。同时，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城市年青女子也达到了这类水平。所以，那时的主要任务是向农村普及文化。1905年之后，尤其是在苏维埃新政权全面致力于普及初等教育之后，俄国在完成这个任务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俄国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文化水平仍然很低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成了一个特殊的难题。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认真地关心在所有这类少数民族中间普及文化。

虽然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两国正规的学校教育是教育和文化的主要源泉，但是军队的训练和工厂的培训对普及教育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它们提高了人们的文化和技能，在变革的早期阶段尤其如此。事实证明，军队和工厂作为教育渠道是很有效的。因此，国家有意识地对它们进行监督。事实证明，不论在哪种情况下，这种教育对政治秩序都起不了破坏作用，日本军官集训或许是个例外，它在许多方面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民的紧张关系负有责任。

义务教育成绩之一是扩大了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两国的妇女都被动员起来作为工业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日本，尽管妇女从一开始就可以受初等教育，但是进一步的

机会却受到严格的限制。在1945年之前，除了极少数例外，日本妇女进不了名牌国立大学，而只能上较次的女子大学，这些女子大学只教授家政而不进行职业训练。在过渡年代中，妇女在日本文化生活中成名的寥寥无几，这反映了这种缺乏教育机会的情况。

可是，曾长期在高等文化领域起过显著作用的俄国妇女，她们通过教育制度受职业教育的机会比日本妇女多得多。比如说，到1897年，俄国有六千余名妇女受过大学教育。1917年之后，俄国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得更为显著，使得她们到这个时期结束时在负责的岗位上远比日本妇女引人注目。

通讯系统

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日本和俄国都应用新技术改造它们的公私通讯系统。两国都充分认识到建立有效的全国通讯网的必要性，并优先建立和扩充现代邮电系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很久，俄国已经建立了这种系统，并很快就采用了电报，但是日本迅速赶了上来，比如说，到1880年，日本按人口平均计算的邮件量超过了俄国，而且在以后十年里又增长了一倍，在整个时期的其余时间里增长率一直比俄国高得多。不过，俄国在1914年之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电报量一直遥遥领先于日本，部分原因是创办较早，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地理因素。但到了1914年以后，战争与革命对俄国的通讯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在十九世纪，与国家创办通讯网的同时，在两国还出现了全国性的“通讯市场”。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出现了一

个“职业通讯工作者”阶级，包括新闻记者、受人欢迎的作家以及后来的广播员。在最初阶段，最重要的群众通讯工具也许是每日出版的报纸，在十九世纪后期，两国的日报迅速增多。到了1900年，日本和俄国的日报日益发达，包括好几家经济上可以存在下去的大报，这些报纸发行到全国各地，发行量达几十万份。

随着两国通讯市场的不断扩大，二十世纪在两国出现的大众文化远比过去多样化和都市化，其水平虽不如美国，但在许多方面已可与西欧媲美。变化特别明显的是两国都扩大了通俗杂志和种类繁多的专业性报刊的发行量以及电影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从国外进口成千上万部影片之外，日本和苏联每年还摄制两百多部故事片，使两国进入了世界上电影生产国的最前列。

公私两部分在全国通讯市场上的力量对比是造成整个过渡时期关系相当紧张的根源，两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在一些重要方面有重大的差别。总的来说，日本全国通讯系统中的私营部分比俄国的大，而受到的限制比俄国少。比如说，在过渡时期的前半期，日本的日报不仅全是由私人经营的，而且在许多场合公开批评政府。从报刊的早期发展阶段起，日本政府就实行新闻检查，但是这些措施从来不是完全有效的。到二十世纪，报刊本身日益不关心政治了，更多地成为营利的企业，因而与政府的紧张关系就自动地缓和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尤其是在三十年代，日本政府大大加强了对报刊，特别是对政治性的小刊物的控制，但是这些控制也从来不是一律有效的。尽管日本当局想方设法严厉压制报刊的舆论，但即

使在战争年代，日本也有真正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不大的。

在俄国，情况则完全不同。首先，在帝国统治时期，俄国政府在发展报刊方面所起的作用比日本政府大得多。比如说，政府各部都出版自己的报纸，它们有压倒私人新闻事业的作用之势。可是，在帝俄后期，最大的报纸大多为私人所有，尽管政府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但这些大报不时大胆采取独立的姿态。然后随着苏维埃国家的成立，这种力量对比激烈地向有利于国家控制的方向发展，为了国家的目的，通讯市场实际上全部实行了国有化。各级私人通讯量的急剧减少反映在信件数量的剧烈下降上，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恢复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同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了政治目的又大力发展各种公共通讯手段。为了进行宣传，成功地动员了书画刻印艺术、电影和戏剧，并且利用了较为通俗的宣传工具。

科学知识与技术教育

日本和俄国的政府对现代先进知识的应用采取高度功利主义的观点，它们把这些知识主要看作是为赶上西方获得所需实际技能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获得知识。两国都系统地实行促进自然科学优先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并强调所有研究的实际应用的政策。在俄国，这种政策是老传统，它最初是由彼得一世倡导的，后来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由威特伯爵领导的部又把它大加发扬。但是在俄国和较小程度上在日本，并没有因强调这个重点而排斥基础科学的研究。1917年前后，俄国一直支持基础科学的研究，其程度除

了最先进的欧洲国家之外远比任何其它国家大得多，这个政策即使在要求集中力量于“有用的”知识的最强大压力下也从未放弃过。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日本人在德川时代与西方的知识是隔绝的，所以它要在现代知识方面取得平等地位，困难就比较大。不过，在由“荷兰派”学者奠定的重要基础上并在国家政策的大力鼓励下，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后的三十年时间里设法建立了一个获得和传播现代知识的完善的本国机构。其方法与俄国人在早些时候所用的方法相仿，即请来外国专家和派遣本国学生去国外留学，努力建立一个自主的全国科学界。俄国人完成这个过程大约用了一百年时间，日本人大约只用了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到了1900年，日本拥有的大学、博物馆、研究中心和图书馆，在大多数方面可与西欧媲美。

但是，直到二十世纪，日本人才能培养出对知识的发展作出具有国际水平的贡献的学者和科学家，而俄国人自十九世纪初期起一直在培养这类人材。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批日本研究人员，尤其是在医学和理论物理学方面，已经得到国际上的承认。文化与语言上的差异继续使日本的科学界与世隔绝，其程度是俄国人所从未经历过的，结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才被完全承认是世界知识界的主要成员。

正如在许多别的领域一样，两国政府在传入和推进现代知识的各个方面承担了主要的责任。日本德川时代深奥的新儒家学术传统，很容易变成新的由国家倡办的现代知识机构，使儒家强调统治者的主要职能是关心知识和教育这种思想长

期存在下去。在俄国，在十八世纪作为促进先进知识的主要工具的科学院，在整个变革时期作为管理和促进现代知识的官方机构，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俄国，虽然这样注意促进高深知识的发展，但并没有忽视培训管理工业化国家所需的中等水平的技术专家。说明两国在这方面取得成就的最好证明是，两国从未大量缺少过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人员。到了十九世纪后期，两国都有了完整的现代专业的基础结构，它的所有成员都被组织在全国性的协会里，协会内部定期进行联系。在正规教育制度内部，两国都极为重视建立技术和职业学校网。在日本，这个规划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实现了，而在俄国，帝俄时代在建立此类学校方面所取得的某些进展，在苏维埃政权实行非常功利主义的教育政策下大大得到加强。

教育的政治用途

日本和俄国都迅速认识到由于扩大公立小学的入学人数而出现的实行有控制的政治社会化的可能性，但是日本不同于由国家办托儿所的苏联。在日本，六岁前的重要年头的社会化依然全部置于传统的家庭控制之下。日本和俄国力图通过在教育中公开灌输政治思想，防止由于从国外大量引进多方面的现代知识所带来的对本国民族特性的腐蚀。教育内容上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难以捉摸的平衡，是一切搞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日本明治时代的正规教育制度在其发展初期，在许多方面都没有公开的政治内容。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

知识分子和决策人中间发生了关于日本文化特性的激烈争论之后，对这种没有政治内容的现象作出了反应。这次争论促使日本从1890年到1910年逐步形成了正式的国家思想体系，它在许多方面是重申各种比较老的保守传统。这个“天皇制度”的思想体系从1905年起就被编入全国统一的小学教科书中，它非常强调忠于天皇、服从父母和上级以及所有人都要服从集体。经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教科书进行连续不断的修订，初等教育增加了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容。

在俄国，沙皇政权对教育的政治用途丝毫也不迟钝，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国就到处宣扬官方的思想意识，这是独一无二的。虽说如此，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最彻底地和最系统地利用教育为国家目的服务。虽说这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教育的政治化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两者差别仍很大。苏维埃政权的思想体系远不止象日本那样仅仅重申现有的民族主义气质。更确切地说，苏联的思想体系谋求在全球事业的名义下培养新的狭隘的忠诚。在斯大林统治下，又重申了俄国比较特殊的重点，包括崇拜民族的光荣历史，这与日本在同时期所突出的重点并无不同。虽说如此，与日本“天皇制度”相比，苏维埃政权的马列主义显然是一种革命的标记。

这个差别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解释为新的苏维埃国家特别需要粉碎旧的忠诚和培育新的忠诚。而日本人在这方面没有必要作什么努力，至少是没有必要有意识地制订这样的政策，因为通过经济压力，上层武士阶级自动消灭了。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武士阶级的一切实际意义已经消逝，因而日本政府能无拘无束地将这个阶级的价值标准转而为整个民

族所用。但是，在俄国，贵族作为一个阶级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纪初，这就激发了一个崭新的革命思想体系来对抗它，后来中国也重复了这个过程。

日本和俄国的另一个差别是，苏联教育的政治化甚至扩大到高等学校，而日本则主要局限于初等和中等教育。比如，俄国的大学规定联共党史为必修课，作为不断对学生灌输思想的过程的继续。日本的大学，特别是有名的帝国大学，即使在战争年代，也自傲地发扬学术自由的传统，并在一些著名的事件中对政府提出挑战，反对政府企图对它们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控制。虽然在这些对抗中，大多数是政府获胜，但是大学教育的整个内容仍然对政府保持温和的敌对态度，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大学里一向很受欢迎，这就说明了这一点。

知识分子的作用

知识分子——从广义来说是指那些受过高等现代教育的人——对一切实行现代化的国家都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他们既具有对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专门知识，又是对政权的一个威胁，因为他们有担任领导的潜力，如果不给予恰当的重视和奖励，他们很容易产生一种疏远的倾向。在变革时期，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俄国，只有极少数受过教育的上层人物与政府严重疏远，成为公开的政治威胁——简单说来，成了“知识分子阶层”。可是不管两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绝对人数多么少，他们在政治上却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和俄国，知识分子反抗的演变过程在形式上是惊

人地相似的。在这两个国家，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传统，是由因逐渐丧失权力而感到不满的老的上层人士在十九世纪形成的。这种形式的激进主义在两国都具有向后看的民粹主义色彩，他们从旧的农村传统中寻求力量以反抗现代城市变革的压力。在俄国，这个贵族知识分子阶层是作为明显的反叛势力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出现的，他们的力量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民粹主义运动中达到了顶峰。在日本，在1868年之前，武士感到不满的例子很多，实际上，这种不满是支持明治维新的主要力量。可是，这次政治革命成功之后，武士阶级中仍然有一些重要的部分并没有象明治时代的领导人那样采取向前看的态度，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们发动了公开的叛乱。这次叛乱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1877年萨摩之乱的领导人西乡隆盛，他的民粹派激进主义和强调内省的个人修养的思想，与同时期持异见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相似之处。

在日本和俄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激进主义最初在许多方面表现为那些已经成为现代化牺牲品的人所进行的反抗。与此相反，二十世纪初出现的那种新的激进主义，其根源在于由现代化产生的一个社会阶层，即现代国家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新的上层人士。一般说来，这部分人不是靠出身，而是靠学习成绩取得地位的，虽然其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纯粹是平民出身的。与旧知识分子比较起来，他们的态度是非常西方化和向前看的，虽然他们常常不自觉地吸取了十九世纪激进派进行反抗的全部传统。

日本和俄国的这些新知识分子之间最显著的差别在于他

们的成就，而不是他们的思想。在俄国，是知识分子指导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在日本，这类真正由现代知识分子进行的反抗规模较小而且显然未取得成功。实际上，这种反抗是在俄国革命的强烈影响下进行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成为显然是有组织的反抗，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采取了强大的学生运动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通过这些运动逐渐渗入日本的知识界。尽管这种反抗在初期很有力量，但是到了三十年代，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有效地把它镇压下去了，结果成千上万的日本年青知识分子被捕。

当然，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俄国知识分子表面上的胜利和日本知识分子的失败是容易使人误解的。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的逐渐巩固，导致对知识分子的反抗进行控制，这与日本三十年代中期和末期的情况十分相似。另一方面，日本由于1945年的失败和旧政权威信扫地，左翼知识分子又起来广泛进行反抗了，这种反抗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使激进的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在俄国，这种自由一直未得到恢复。

国际比较

总的说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和俄国可以说已经赶上了最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教育水平、全国通讯网和先进的现代知识的产生等方面，两国已不分高低了。实际上，从事后回想起来，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两国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其实已经走在一些西欧国家的前面了。战争固然曾打乱这种格局至少达十年之久，但是，日俄两国在第三个时期即

高度现代化时期的成就却促使人们对两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发展给予肯定的评价。在这二十年里，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显然远远超过日俄两国的国家；但是，按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日本和俄国将是在下一个时期达到与美国类似发展水平的仅有的两个国家。

在普及教育方面，日本能够以最小的损失改造现代以前极其牢固的基础，并比俄国整整早一代人的时间卓有成效地实行不分男女的义务初等教育。在这点上，俄国作为一个实现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发展先进的高等学校早于扩大初等教育，它的这种经验也许是有代表性的。总的说来，俄国能够避免在最高一级出现教育过剩这样的破坏性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代许多搞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中颇为普遍，使得象印度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出现受过大学教育的高级人材找不到职业的现象。日俄两国有能力充分注意中等水平的技术和职业教育，这种力量在搞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中间并不总是普遍存在的。

作为世界上第一批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日俄两国不得不将政府和私人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投资于发展教育网。日本在明治时代初期决心“到世界各地寻求智慧”，在此之前，俄国的学生已经在西方的大学里学习了。但是，一旦这些制度在二十世纪臻于完善以后，去外国留学就只限于给予少数人作为特殊奖励了，而不再是多数人预期要走的道路了，结果就有可能节省大量经费。

从日本的近邻中可以找到两个国家来进行有趣的比较。朝鲜在1910年被日本并吞之前，由于社会动荡，无法采取有效

的措施来发展教育。此后，日本人慢慢地建立了小学网，而提供高等教育的速度甚至更慢。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学龄儿童在受教育，而在高等学校和帝国大学求学的人绝大多数是日本国民。高等学校使用日文，最后甚至连中小学也用日文了。因此，在人民的民族主义构成反政府活动威胁的情况下，同样的日本教育行政官员对要实行的步骤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态度。各种出版物和联系也同样受到了限制。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从在日本得到公认的一切文化因素中得到好处，此外还从公开的和竞争性的文官考试制这个刺激因素中得到益处。不过，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由于社会和经济问题，传统机构的效能下降了。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的识字率几乎肯定比中国要高出许多。

日本抵制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在1905年击败俄国人的成就，有助于促使中国放弃传统的文官考试制，并且激发中国学生涌向日本。据最高的估计，仅在1906年，东京就有八千名到一万三千名中国学生。这只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到国外现代教育中心求学的运动的开端，而不是结束。在二十世纪，中国由于政治动荡和野心勃勃地计划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所以在受过外国训练的知识分子和缺少文化的普通平民之间形成了比例失调这种头重脚轻的结构。正当日本减少对去国外留学的人的奖励和局限于使用在国内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材的时候，中国的官方和非官方恰恰在扩大对去国外受教育的人的奖励。结果大批高级知识分子成了世界公民，他们与本国许多同胞往往没有联系。与此同时，全世界都看到日本的教

育工作者较狭隘、不善于表达和有局限性。但是，这些日本人都是他们自己的社会和制度的产物并牢牢扎根于其中。

日本和俄国在发展教育和研究工作方面都有一个特殊有利条件，即不存在任何能对政府的主动行动提出挑战的机构。这个有利条件并不是所有最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具备的，也许它们并不需要这种条件：英国、法国和美国都发扬了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的悠久传统，这些传统或许是促进因素而不是障碍（虽则教会学校的问题，在有些国家，比如在法国，肯定是起分裂作用的，而不是起促进作用的）。对于作为实现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的日本和俄国来说，政府在这些事务上的主动行动是一股力量，而在首批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里，这种主动行动在许多方面可能是一种起否定作用的影响。

正如已经指出的，两国均对教育的政治用途很敏感，并发展了明确的教育思想。面对具有普遍性的现代知识的国际化趋势，所有搞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都特别需要探求维护狭隘的民族精神的方法。但是，最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疑也是完全有此必要的，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因为当时民族抗争激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俄两国的教育内容都极为狭隘，虽然在这方面它们与西欧各国可能没有很大区别（当然不包括德国）。如何在狭隘的和普遍的教育之间保持平衡看来是个问题，实际上，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也许会变得更加尖锐。

关于国家在建立教育与研究制度过程中的作用，日本和俄国同参加现代化过程比它们晚的国家比较起来，两国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不过这种意义可能毫无实际内容，因为在

参加现代化过程比较晚的国家中，强大的民间机构能与国家所作的努力相抗衡的国家是极少的。我们最好还是从反面来说明这个问题：不论是日本还是俄国都没有可能阻碍现代教育和知识发展的强大的民间机构，比如说，独立的教会。不过，在许多参加现代化过程比较晚的国家里，宗教机构和保守的学习传统对国家积极推行教育现代化的努力显然是一个威胁。

但是，那些开始搞现代化比日本和俄国晚一两代人的国家可能具备某些特殊的有利条件。至少它们所面临的状况极为不同。比如说，在传播方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可以应用无线电和电视这两个有力的工具。这些现代工具有助于创造与十九世纪的日本和俄国大不相同的条件，当时两国只有电报和文字印刷这两种传播技术可以利用。当然这些新技术对实现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来说，虽然是有用的，但也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们不仅使国家的选择机会增加了，而且也使敌视国家的力量的选择机会增加了。

比较笼统地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着手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面临着大量新知识，这些知识简直无法象十九世纪末日本那样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加以吸收。此外，由于有了瞬时的国际通讯系统，它们的期望比较高了。日本和俄国使用过的传入现代知识的方法，实现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也不能有把握地加以重复使用了。举一个普通的例子，派遣留学生去国外探求现代知识对十九世纪的日本和俄国来说是一种有利于提高本国生产技术的好方法，但对在二十世纪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说来，其结果往往具有很大的破坏性，造成“人材外流”。

从教育的政治用途这个角度来说，日本和俄国的经验都表明，在二十世纪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需要同样注意通过教育反复灌输民族特性。仿效两国的榜样大概并不十分困难，虽然大多数国家的趋势是过于强调教育的政治方面，因而损害了促进现代知识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和客观的探讨精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和俄国都表现出危险的极端态度，当普遍强调政治时，教育中狭隘的成分就可能采取这种态度，两国的经验还表明，如要在知识和教育的民族性和普遍性这两个重点之间保持平衡，最大的挑战可能在于保护后者。

第十三章　结论：进行变革

在这个变革时期里，日本和俄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致之处，那就是政府领导有能力动员人民和资源来进行十分重大的改革。在俄国，这种能力确实曾经遭到过破坏，但是造成这种破坏的1917年革命，又成为以空前的规模重新建立这种特点的第一步。两国的最大差别首先在于它们进行高压统治的程度不同。俄罗斯帝国政权从1860年到1917年，尤其是以后的共产党政权，实行高压统治远比日本政府厉害。日本发展的特点是既有高度的协调和控制，又没有实行那么严厉的高压统治。在日本，许多反对现代化的原教旨主义反动派中，不存在一个阻碍现代化的重大社会力量。

重要的是，不应低估改变日本和俄国现代以前的环境时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某些方面有助于后来的现代化，也有助于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要求。借鉴外国而又不致于危害民族特点的历史，必须经过空前规模的引进的考验。同样，维护帝国的制度会受到许多新因素的压力，其中包括以新兴的官僚和管理人员替代老的上层人士。实际上，事实证明，沙皇们不愿接受新的代议制形式和对帝王的颂扬这两点，在不同的方面最终成为不稳定的根源。

作为在过渡时期开始时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出现在面前，即需要为废除武士和农奴主等高级消费者以后剩余的

农产品重新开辟渠道，而同时又不致于造成地方消费量的大幅度上升或生产下降，也不致于引起广泛的暴力或长期大大增加开支，从而在为现代化而努力和积累投资资金的过程中威胁有技能和有经验的人员的合作。在日本，首要的任务是废除武士的俸禄和停止这个封闭阶级的特权。俄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在于由农奴制造成的，至少是长期形成的农民的态度和习惯。第一步必须迫使农奴主不再占有农奴。结果，日本轻而易举地迅速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在俄国，虽然农奴得到了解放，可是农奴支付赎金和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却拖了很长时间才解决。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日本和俄国的社会现代化能达到什么程度，这可以用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可称为参加现代化过程比较晚的国家进行变革的必要条件来加以说明。这些必要条件包括：第一，广泛地借鉴外国而又不丧失民族特性的意识和改革外国的制度使其适合国内目标的能力；第二，使现代以前的协调和控制的格局从原来为维护主要是农村和农民的社会的目的，转变为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迅速变化的目的；第三，实行旨在加速传统经济的增长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的政策；第四，促进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其速度要与政治和经济能力的发展相适应；第五，迅速普及初等教育和提供与变化的速度直接相关联的技术和高等教育。

国际环境

对于参加到处都在进行的现代化过程比较晚的国家来说，借鉴外国的东西显然是必要的，但过多地借鉴会损害改革

现行制度的潜力。维护和取代相结合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这也许是不那么容易确定的。由于有在现代以前的时期学习外国模式的经验，日本和俄国在作出必要的决策时要解决一些问题也许比较容易些。有选择的借鉴既不会威胁民族特性，也不会导致用于现代化重点项目的资金大规模转移。这种有选择的借鉴在事先大概不一定要有学习外国模式的悠久历史，现代以前的日本和俄国的历史就有这样的特色。可是在有了先进的国际通讯系统的时代，要建立相对的闭关自守状态、明确的民族特性以及仔细地挑选从外国借鉴的项目等环境是困难的。日本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极端的闭关自守与俄国在十八世纪以前和1917年之后，特别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特殊的闭关自守的形式，看来反而使两国在以后更渴望有选择地输入外国的东西。当代的中国看来正在重复这种有意闭关自守，坚持内部制定的战略具有活力和优越性以及有选择的借鉴的局面，其程度超过任何其它国家。

虽然日本和俄国实现现代化的国际环境颇为相似，也就是说，当两国设法按西方首先制定的方针改革它们的社会时，它们成功地维护了国家主权，但是在其他方面，日本能较好地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尽管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日本在参与世界政治活动时较为谨慎，而且在1941年以前成功地避免了承担要冒重大失败风险的国外义务。在这方面，历届俄国政府都不是那么成功，它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卷入了战争，这些战争大大地干扰了国内发展计划的执行。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里，日本能较好地向西方进行借鉴，而未招致军事上的严重失败。

政治的发展

在迅速实行现代化的种种必要条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在中央、中层和地方各级要有强有力的政府。在变革开始之前，俄国和日本都具备了这个必要条件，虽则日本的上层人士在各级有效地行使权力的程度特别高。随着苏联共产党的扩大，苏联上层人士的管理效率达到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水平的基础奠定了，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个阶层的权力扩大到了农村。

在八十年的变革时期里，两国上层人士的组成都发生了剧烈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回顾这段时期可以说，两国社会都曾有众多的老的上层人士，以及训练和使用他们的机构，这个事实对发展过程绝不是障碍而是非常有帮助的。虽说如此，光有强大的政府机关或人数众多的、受过很好训练的政府官员，并不足以实行社会变革。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很可能牺牲发展政策而追求比较短期的目标，而最广大的熟练的行政官员可能既为创造性的改革服务，也可能同样为维持现状的事业服务。日本和俄国与其他许多渴望发展的国家的区别在于，两国不仅在人材与机构方面具备了必要的条件，而且它们还决心把这些条件用于实现变革的目标。

经济的增长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和俄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增长速度比较快(1914年以前，在主要国家中，只有美国、瑞典和德国的增长率超过它们；在二十世纪三

十年代则没有一个国家超过它们)，这是由于改变现有机构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结果。

两国政府不断改变它们在经济方面的作用，这可能是改革现代以前的机构使其适应新任务的最明显的例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两国政府都曾把相当大的经济力量主要用于维持原有的农业经济，不久就转而用这些力量鼓励现代经济的增长。日本和俄国政府比西方国家更能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各自的经济，直接影响是通过投资和开支，提供必要的公路、铁路、港口以及其他公共事业等基础设施；间接的影响是创立为工业增长所需的土地改革、地方政府、货币、税收和银行等组织结构。1914年之前，两国政府的作用只不过是强化它们以往的职能，并改变这些职能的方向，而俄国政府一般要比日本政府卷入得更直接些。当然，在1917年之后，苏联政府的作用至少在理论上是全面的，而日本政府的作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队的影响扩大之前，并未大大加强。

以1880年以前的商人为代表的、具有企业管理才能的人们中间发生的转变更为显著。在日本，这些人转变为制造商和金融家阶级的速度要比俄国来得快。与日本的同行不一样，俄国的企业家们更多地依赖外国的参与和政府的调节，虽然在1914年以前的十年中，日本正在形成相当数目的、较独立的卡特尔。1917年以后，除了短时期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外，独立企业在俄国已不是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日本，独立企业在战后年代变得日益重要了。

农业和制造业的关系也与以前的时期大不相同了。农业部门为两国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积累——在现代以前的时期，

两国的农业条件非同一般——这些积累反过来又提供了多余的物资，使得两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具有重要的有利条件。

在技术和专业结构领域，日本和俄国广泛地依靠比较现代化的西方。俄国在有组织的和集中的借鉴方面有着较新的经验，但是尽管如此，两国的这个过程在规模和形式上都有不少类似之处。在这些年头里，没有任何其它参加现代化过程比较晚的国家如此注意将外国技术和制度纳入它们现有的结构，在以后的各个时期，恐怕也没有什么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两国的借鉴过程当然也有不同之处。俄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的资本和企业家，有些经济部门在二十世纪之前有一半以上的资本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但是，在苏维埃政权下，技术转让和外国专家的参与只集中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日本，除了在头几年有控制地让数目有限的外国人参与之外，这个过程的进行没有大量外国人参与管理，在1905年以后的年头里，随着工厂的逐渐成熟，外国的资本和技术变得较为重要了。

社会的相互依赖

只要考虑一下两国在这个变革时期里避免了一些什么事情，就可以从它们社会一体化的共同特点中学到许多东西。首先，它们避免了过分的自然增长率。死亡率逐渐下降，出生率不久也逐渐下降了。其次，它们没有堵死由较低的社会阶层向较高的社会阶层流动的途径。它们迅速改变基本上是由封闭阶级组成的社会，允许开放社会流动的道路。第三，除了俄

国革命前后的一段时期之外，它们保持了对农村的控制。强大的农村组织再度得到维护，从农村外迁进行得秩序井然，最初是逐步进行的。许多相对来说尚未现代化的国家与十九世纪后期的日本和俄国之间两个最明显的差别是，在今天的现代化国家里，死亡率突然迅速下降和它们的城市化水平比较高。

现代以前的日本和俄国社会，以其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较大而著称，但与许多正在实行现代化的社会相比，这些数字就不大了。可是，在日本和俄国，城市化前进的步伐直到过渡时期快结束时仍然是缓慢的。虽则在今天正在实行现代化的任何社会，看来不可能扭转人们向城市迁移的趋势，但是日本和俄国的教训表明，严格控制迁移、对城市就业场所进行严密的组织，以及使宝塔型的城市协调地得到发展，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较小的社会不一定能象日本和俄国那样发展完整的城市网，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其城市化水平仍然很低，它现在可能正在应用这些教训，小心谨慎地控制城市的发展，使处于宝塔各级的城市协调地得到扩大。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现代以前社会相互依赖的水平可以转化为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程度。作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比较城市化的社会，日本和俄国比多数参加现代化过程比较晚的国家更容易转化为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由于在有关社会相互关系的问题上进行借鉴比在其他问题上进行借鉴要困难得多，所以一个社会是否能毫不费力地达到有节制的出生率、开放社会流动的机会以及控制人们从农村逐步向城市迁移，这必须首先依靠以往存在的条件。

这些以往存在的条件在日俄两国比在多数其它社会更容

易转化，但是两国仍有重要的差异。在日本，有关从乡村到城市的移居的变化在整个变革时期是很大的，但变化的步子很均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移居的速度稍微快一些。在俄国，这种城乡移居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几乎在一切方面都进展得很缓慢，一直到二十世纪头十五年才慢慢快起来。战争和革命使这个进程猝然中断了，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当这个进程在政府的推动下恢复时，它的速度是任何别的社会所不及的。

知识与教育

随着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教育和传播的规模扩大了，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根据扩大的程度来确定一个社会变革的性质，甚至确定它的成果。意大利在十八世纪不得不输出一些文化程度极高的人员；在二十世纪的印度，有技能的干部找不到职业；而土耳其则无力为成千上万半熟练人员在国内的工业部门安排工作。与这些国家不同，日本和俄国比较成功地培训了熟练和半熟练人员，并为他们安排了工作。

不过，两国遇到的困难仍然是有启发性的。日本一开始在面积上就有很大的有利条件，其经济和政体都经受了广泛的向心影响，因此重要的海港城市的发展，甚至连全国的偏僻地区也很快就能感受到。它的人口集中在沿海地区，因此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现代运输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有利条件。日本现代以前的文化遗产和对书写文字的敬重，促进了教育设施的协作和合理化。虽说如此，由于日本集中力量于现代学问的实用方面，所以高级科学机构的发展就放慢了。幸而它能从西方贸易国得到技术和货物，这样就克服了本来可能阻碍

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些因素。与此相反，俄国在传播方面遇到了面积和距离的问题，在文化方面则缺乏日本存在的那种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由于俄国在高等文化方面一贯倾向于西方，所以它培养了一批人数虽然不多，但十分活跃的上层人士，他们精通现代科学，结果，它的发展在上层是很强的，但基层很薄弱，而日本的基层则是很强的。俄国为这个差异所付出的代价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格格不入的，并几乎成了城市里和政治上种种不满表现的中心因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整个革命时期。但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和俄国的特点是政治上实行高压统治，扩大了与现代先进国家科学潮流的距离而处于相对的孤立状态。

两国虽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也有上述明显的缺点，这个事实表明，对于实行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如果有区别的话，在这些国家里，要求进行变革的压力会更大）来说，分阶段进行的问题将是个规律而不是个例外。鉴于愈来愈多的问题是由于政治决策和经济资源造成的，而不是在工作中偶然造成的，所以进行动员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出现问题时，政治制度是否能识别它们，并作出反应。

日本和俄国实行变革的经验有两个重要的共同特点：一个是它们都能协调和控制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另一个是它们都能借鉴较发达国家的制度，从这些国家引进技术和资本，而又不给国家主权造成重大损害。它们由于发挥这些能力来解决新问题，所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最初几十年里

就能比较迅速地进行变革。俄国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时面临外敌的情况下发挥进行社会协调和控制的能力来对全国进行动员，日本则发挥这方面的能力来建立一个完整的和几乎是自给自足的社会。在变革时期，两国同样有力地发挥这些能力来变革它们的国家。曾经使两国在以前几个世纪里采纳拜占庭和中国模式的借鉴能力，以及使俄国人在十八世纪为了防御而部分地采纳西方的制度的借鉴能力，为两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非常广泛地依靠西方模式和援助作好了准备。

虽说如此，有意义的是，总的说来，改革现代以前的制度，特别是在重要的政治领域，能比借鉴发挥更大的作用。技术上、法律上的帮助以至于宪法，都能借鉴。但是由受过适当训练来管理国家的官员联结起来的，从普遍接受的中央机关到地方官员的一系列关系，则是不能借鉴的。不能期望农民和地方当局以及中层当局把他们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交给中央政府，除非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用这些钱来办他们同意办的公共福利事业，并且规定工作重点的政府是合法的。由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两、三百年中，日俄两国都有很发达的政治制度，所以两国都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协调和控制制度来指导它们完成将一个农业的农村社会改造为一个工业的城市社会的艰巨任务。在日本和俄国，由现代以前的政治领导人过渡到搞现代化的政治领导人这个过程造成的损失，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小得多，英国可能是个例外，两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大改革是由旧社会内部有经验的领导人发动的，而不是推翻整个政治和社会结构的结果。

日本和俄国在变革年代的共同特点，当然不应掩盖它们之间的显著差别。虽则明治维新不是一场革命，但是它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改变政府方针这种比较小的改革相比，无疑是政治关系的一次较为重要的变化。此后，在变革的各个阶段——十九世纪后期、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治领导人互相压制，以及政府对各反对派和人民采取的高压手段，在俄国比在日本又要严厉得多。

在整个变革时期，日本政治领导人在指导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方面比较稳定和一贯。俄国在这方面则不是那么一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从1906年到1913年以及1928年之后是取得进展的时期。1917年的革命在某些方面确实是世界上最激进的革命，所以人们习惯于(由于与法国革命相似)把俄罗斯帝国看作是“旧政权”，而苏维埃国家则是颇为新颖的和不同的国家。但是从政治制度这个角度来看，由于中央和地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没有遭到其它公认的机构的严重挑战以及具有动员全国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能力，所以1917年前后的相似点也许比不同点更为显著。

正如日本和俄国的例子所说明的，有些国家可以改革现代以前的协调和控制制度使之适应新的需要，这就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即没有类似传统制度的其他参加现代化过程比较晚的国家能不能进行社会改革。比如说，非洲和亚洲大多数发展得比较晚的国家成立全国性的独立政府的时间不长，经济有限。是否能借鉴外国的思想、制度和技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是否有适当的协调和控制制度。作出借鉴外国制度的决定、选择和改造外国制度的能力以及将外国

的制度移植到本国的进程，都需要安定和技能。当接受的国家正在以前独立的或自治的领地上建立民族国家，并保卫自己不受其它国家竞争时，这种能力就更加需要了。日本和俄国在其变革时期都曾想扩大帝国的版图，但两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早已建立了受到世界各国承认的、疆界分明的国家了。

日本和俄国的变革经验还使人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拥有适当的资源基础不也是进行变革的必要条件吗？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现代以前的经济能否生产多余的物资来投资于现代经济的增长。在这一点上，协调和控制又是极其重要的。按大多数标准来衡量，日本是一个贫乏的国家，大部分资源它都没有，土地虽然肥沃，但密度过大。与此相反，在俄国国内，工业社会所需的资源几乎什么都有。那么日本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率为什么能赶上、有时还超过俄国呢？这可能是由于它用集约的方法来开发现有的资源，培养发展所需的技术人材以及输入国内缺乏的资源。与此相反，俄国一直倾向于使用粗放的方法，只依靠土地、资源和人力的财富，而比较忽视技能和技术。如果把这些经验应用于其它参加现代化过程比较晚的国家，那么看来教训在于(只要那个国家不象没有石油的沙特阿拉伯或科威特那么贫瘠)，就进行社会变革的能力而言，重要的是领导人动员全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经验和政治才干，而不在于资源的多少。

对于其它参加现代化过程比较晚的国家来说，日本人在这个时期的经验有一个方面可能远比俄国人的经验具有指导意义。俄国大概是面积广阔，但人口密度很小的大陆国家的

唯一例子。中国也是一个巨大的大陆国家，但是它在开始现代化的进程时，人口密度确实是很大的。在进行现代化的努力中，尤其是在农业方面，俄国能够运用粗放的，而不是集约的发展方法。日本不能采取这样的方法。日本人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按照在国际贸易中利用比较有利的条件的方针，以精心提高生产率来求得繁荣。对他们来说，这些比较有利的条件绝大部分在轻工业，轻工业的原料可以进口，用大量劳动力制造出来的制成品可以产生很大的价值。对其他参加现代化过程比较晚的国家来说，比较有利的条件很可能不在轻工业。也许在服务业或者现代化的农业。不过，如果不集中主要力量来利用它们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有利的条件，而是集中力量利用国内比较有利的条件，那么任何参加现代化过程比较晚的国家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第三部分　当代

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们，掌握着关于社会经过变革实行现代价值标准和体制的许多例子。几乎所有国家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这个过程。然而，现在已经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不超过十几个，它们解决在这个发展水平上的问题的经验只有几十年。尽管它们取得经验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在结构和规模上，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与正处于变革过程的社会有很大的不同。高度现代化的特点，与变革时期的特点有相当大的不同，所以要求有一套不同的必要条件。有些政策在满足变革的必要条件方面可能是成功的，或者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维持高度的现代化也许是勉强够格的，或者甚至会起反作用。最先实行现代化的国家的实用主义，往往被继它们之后实行现代化的国家变为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妨碍继续实行实用主义，而要克服变革和高度现代化提出的不断变化的挑战，又必须采取实用主义。

在国际环境中，当前存在的互相依赖的程度，比以前各个时期大得多，不仅在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间存在着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而且在它们和它们与之交换重要资源的不那么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这种互相依赖关系。随着制造业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作为变革时期特点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毫无例外地缓和下来了，因为人们认识到依赖外国供应的程

度提高了。在投资和金融方面也展现出存在着类似的相互依赖的触角。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由于有了核武器，每个国家的安全都远远地比过去更加取决于其它国家的行动，包括那些遥远的国家的行动。就这样，国家的政策同国际环境发生了相互关系。能否实现和保持高度现代化，取决于是否参加政治、商业和金融的国际市场，那些不能在这个更广大的舞台上进行竞争的国家，它们的发展水平看来只能是比较低的。

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令人感到最为不安的国内政治问题，往往不是一个社会阶层反对另一个社会阶层的问题——尤如以前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那样——而是那些使所有社会阶层共同感到不安的问题，例如通货膨胀、社会计划的管理以及城市和郊区的居住方式等问题，换一句话说，就是在公众需要的许多事情中间分配大笔经费的问题。以前的思想是如何在雇员、工人和农民中间分配财富，这种思想的重要性现在已趋于下降；新的思想，如提倡平等对待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思想，正在迫切希望为人们所接受。由于公共福利的管理问题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所以政策问题越来越多地经过政府机构内部辩论，并在代表各种集团的特殊利益的非政府组织的参加下得到解决。在有民权传统的社会里，让代表其它不是那么有组织的地区和社团的选民参加，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先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工农业方面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了，工业部门集中生产花色品种繁多的消费品。经济发展的这种新趋势，与在工业化初期使用比较简单的技术和比较强调生产生产资料这种现象，形成了对照。

在高度现代化的国家里，由于生产设施的规模和互相依赖性大，它们可以在生产力的程度和水平上得到空前的经济实惠。同时，大批的生产可能耗竭现在可以得到的资源，并污染环境。考虑到这些趋势，再加上人口的增长，使有些人预言，作为变革时期特征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要结束。但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看法认为，由于新技术在需要的压力下得到发展，将来会有新的能源和原料。可是，发展这些新技术的费用目前还不能预料，也许要对价值标准和体制进行象变革时期那样深刻的改革。现在的生产水平使得人们可以较多地强调消费者的需要，较少强调制造者的需要，经济组织的经理有条件把福利而不是利润作为生产的主要目标。社会已经有能力向所有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了。

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社会的相互依赖的程度，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并用数量来表示，因此有可能预测正在迅速到来的条件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或即将生活在)城市地区。各种各样专业的劳动力大约有百分之五在农业部门就业，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或更多的人在工业部门就业，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五十以上在服务部门就业。百分比的这些变化是引人注目的，因为在现代以前的社会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从事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劳动力都不到百分之十。今天，出生以后的估计寿命正接近 75 岁或75岁以上，而在现代以前为25岁或 25 岁以下。虽然由于物质丰富而生活放纵和现代生活的紧张状态，某几种疾病会得到发展，但是在过去造成大量死亡的疾病，已经得到控制。由于实行节育，生育率下降了，与比较低的死亡率大体相等，因此

恢复到人口增长率低但是又有波动的状况，这种状况也是进行变革之前的社会的特点。

随着机会的显著增加，一般都是个人和家庭与社会越来越隔离。出生以后搬家的居民可能占一半或一半以上，与此同时，教会等社会团体的削弱更引起个人和家庭与其它人疏远和感到寂寞了。看来现代化程度越高，这种疏远和反常的状态就越严重。家庭和文化起限制作用的影响看来在整个变革时期都是存在的，而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许多个人在进行社会交往时，只有个人经验和社会同等集团的影响，而没有较为明确的准则。自愿暂时不满足各种欲望——节约是为了投资而不是为了消耗——对于变革过程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这种态度往往被一种追求眼前的满足的趋势所代替，这也是现代以前的社会的特点。随着公认的行为准则明显的衰退，产生了一种比较合理的和世界主义的观点，以及一种移情于各种不同态度和文化和容忍模棱两可的态度的能力。

随着社会变得更加高度现代化，知识和教育就越来越重要了，人们普遍认为，保持和发展先进技术的能力，比资本和资源更重要。据估计，先进社会用于产生和传授各种形式的知识的经费高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每十万人中可能有多达二千名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而不发达国家每十万人中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学生不到一百人。有不少职务也要求由掌握先进技能的人来担任，这种职务的范围是很广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完成了初等教育，完成中等教育的人所占的比例差不多同样高。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都已

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很难找到工作。研究和教育增进了普遍有用的知识，因此，造成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越来越少的现象。即使如此，由于并不妨碍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许多特有的价值标准和体制继续起作用——实际上对于保持它采取有效的行动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教育计划必须包括这样一个基本目标：它必须鼓励在扩大科学和技术方面必不可少的价值标准，同时又不忽视那些保障特有的体制的价值标准，这些体制对于各个社会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普及的社会科学文献中有一种倾向，认为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已经完成了，一些时髦的名词，如"实现工业化以后的"、"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和"史后的"等，反映了这种看法。此外，作为变革过程的特点的许多倾向确实自然地消失了，这看来是明显的。当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有了文化，完成了初等教育，甚至完成了中等教育，住在城市里，并在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工作，那么变革过程看来是完成了。人口重新分布的完成、经济的发展接近于现有资源的极限和地球承受污染能力的极限，以及人们平等地享受公共财富，甚至连以前受歧视的那几部分人也能这样，所有这些看来标志着若干类变革的完成。

然而，其它各类变革并没有完成。最重要的是，以科学和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知识的增长，并没有显示出放慢的迹象。对人类的福利极为重要的许多课题的研究工作，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这种进展反过来不能不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至于以什么方式来影响，现在尚不能

预言。作为变革时期特点的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一体化，正以国际上相互依赖的形式继续进行着，从而开辟了这样的前景，那就是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最终可能包括整个地球。这种情况看来不可能通过各个社会并行的发展来实现，而是通过扩大超越国界的公私价值标准、体制和进程等加强国际一体化来实现。因此，对于高度现代化的社会来说，当代变化的范围，与变革时期一样大，虽然不是同样为人们所理解。

可以说，已经达到并且能维持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的特点，包括能成功地完成五项任务的能力。这些任务可以概括如下：(1) 在一种包括许多国家的市场和供应者在内的政治经济中参加竞争——而不是象变革时期那样仅仅是有选择地借鉴；(2) 以各种活动来管理复杂的社会，这些活动必须在有充分的自主权的情况下进行，以便卓有成效地吸收特殊的利益和专门知识；同时也要协调地进行，以便能在一体化的社会中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以前的任务是使现代以前的能力为现代所用；(3) 用高度的技术知识来促进新的原料的生产和发展——而不是实行农业机械化和提高生产能力，这些是变革时期的主要任务；(4) 确定社会的相互依赖的形式，这种形式要适合于有高度专门技术的和流动的人口——而以前的问题是使农村人口适应城市的职业；(5) 组织研究和教育，这对保持高度现代化是十分重要的——而在此之前的时期，高级的研究工作并不是一种基本的需要，而群众性的教育主要是使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掌握基本技术。

第十四章　国际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国际环境，以及随后世界政治斗争的发展，是如何影响日本和俄国为赶上西方所作的努力的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十多年里，战败的和被占领的日本在国际舞台上不是一个主要角色。苏联虽然是战胜国，它的国际威望提高了，但是它同样被排除在西方国家的国际机构之外。战争的胜利巩固了苏联领导的威信，而失败和改革使这一代日本领导人中的许多领导人名誉扫地，这些领导人曾经把对外扩张放在优先于国内发展的地位。苏联在克服了德国军国主义对它的安全造成的威胁以后，现在正在为摆脱受压抑的状态而斗争，这种状态是由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奉行遏制政策造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成对照，日本却发现它发动战争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达到了：由于殖民主义在亚洲的崩溃，它一度得不到的一些地区的资源，现在可以得到了；允许出口额引人注目地增长的自由贸易的时代开始了；由于参加了美国的安全保证区，日本就可以大大节省国防开支了。结果，促进了日本偏重消费品生产的经济的发展，而长期以来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的方针在苏联占了支配地位。

战争及其后果

对于日本和苏联来说，战争时期是孤立时期。这两个国家都是作为较大的联盟的一部分参加战争的，但是它们都不充分相信它们的盟国，也不同它们的盟国保持充分的联系，它们都是单独作战的。苏联从不鼓励同向它提供大量物资的盟国密切协调作战。日本不向它的盟国德国和意大利通报它参战的计划。直到战争后期，苏日中立条约似乎是在这个时期签订的条约中比较成功的一项条约，但是，当日本在1945年8月试图通过俄国的渠道投降时，俄国人却以对日宣战来作回答。

1941年以后，斯大林主义分子担心来自外部的颠覆，再加上军事上的挫折，迫使这个政权退回到国内战线上去了。尽管口头上说的是联盟和共同努力反对法西斯，但是同外国的交往却受到严格的限制。由于在1943年和1944年获得胜利而不再遭受挫折，俄国势力进入了东欧，但是它仍然担心被颠覆，所以决心试图在被占领的国家扶植顺从的亲苏政权，并且获得了成功。

日本在1938年宣布建立反帝的“东亚新秩序”，这加强了日本的扩张主义倾向，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使得日本似乎有了获得地区霸权的希望。然而，这些胜利是短命的，日本很快就发现，它与它的殖民地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了。由于缺乏资源，尤其是缺乏石油，使它不可能利用东南亚的原料。由于无力补充所损失的空中掩护，日本海军1944年在菲律宾海面上的战斗是注定要失败的。那时，美国的轰炸破坏了日本与朝鲜和满洲之间的交通线，甚至破坏了日本国内的交通线。日

本放弃了一切驻外机构和代表。日本与外部世界的一切接触都要经过美国占领人员的审查。无事可做的外务省，向日本政府和占领军之间进行调解的联络处提供人员。尽管日本被外国占领，但是它与外界的联系比自德川政权处于闭关自守状态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少。

战争还使这两个国家遭到严重破坏。德军在苏联领土作战时，俄国有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工业，百分之六十的交通运输设施，以及被占领地区的大量房屋遭到破坏。由战争直接造成的俄国死亡人数，据估计有七百多万士兵和同样数目的老百姓。德国进攻的初期造成的物质破坏最严重，因此，差不多过了五年的时间，重建工作才能开始顺利进行。

日本为取得初期的胜利，在生命和财产方面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小的，直到1944和1945年战争决定性地变得对它不利以后，这些代价才是巨大的。美国采取的海军战术，尤其是潜艇战术，几乎把日本现代的海运船只摧毁殆尽，到战争结束时，日本贮存的急需原料实际上消耗光了。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美国的轰炸差不多把日本城市的各种网路全部摧毁了，生命和房屋的损失是巨大的，与此同时，被孤立在遥远的被占领领土上的陆军和海军，伤亡惨重。在战争中，大约有一百八十五万日本人丧生，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老百姓，他们是在美国用燃烧弹进行轰炸时烧死的，美国的这种轰炸，摧毁了日本城市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战争结束时，从国外遣返了六百五十万日本人。另外，落在俄国人手里的七十五万日本人被慢慢地和犹豫不决地遣返回国，结果，其中有许多人在西伯利亚劳动时死亡。因此，这两个国家的工业中心和城

市中心所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是差不多的。然而，日本遭到破坏比较晚，而且此后很快就得到援助帮它重建；俄国遭到破坏比较早，由于战争和处于孤立状态，俄国得到的重建援助比较少。

如果说，日本和俄国在战时遭到的破坏是差不多的，那么，战争对日本和俄国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却是不同的。俄国在战争的头几年里在军事上遭到了挫折，后来，被德国人占领的地方又背叛了。然而，德国的暴行所激起的爱国主义热潮，以及俄国政府成功地利用了全国团结一致抵抗外敌的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时代），很快就把这些背叛行为压下去了。放松党的控制也促进了爱国热情的高涨，俄国在战争中取得的最后胜利，证实了在实行五年计划期间得到好处的许多人是支持政府的，证明在斯大林领导下制订的政策是正确的和有道理的。然而，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导致党的控制的进一步放松，相反，俄国政权利用国内的困难和国际上的不安全，作为恢复三十年代制定的严厉的政治纪律标准的借口。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的头几年里取得的惊人的胜利，使人民产生了一种欣喜若狂地相信国家的使命和信任政治领导人的情绪。后来，为了开发新领土和保卫交通线所作的使人筋疲力尽的和越来越不成功的努力，产生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灾难感，使人们同政府共命运的情感日益薄弱。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四分五裂的上层人士为结束战争而斗争，而普通老百姓则为在食品匮乏，个人生命毫无保障的严重情况下为维持生命而奋斗。日本在 1945 年投降时，工业经济有很大一部

分被破坏了，筋疲力尽的群众对日本的领导完全失去了信任。日本的失败，使得可能反对对日本社会和以后的政府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人减少了。美国占领军发动的改革，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实际上，日本人以很大的热情欢迎这些改革。保守的日本人习惯于服从权威，不那么保守的日本人则表示衷心的拥护。新的一代很快就成长起来了，这标志着在要求进行革新和近乎革命性变革的愿望方面，与日本以前的领导决裂了。

日俄两国战后在国际关系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差别。苏联领导人在雅尔塔和波茨坦要求作出、并且得到了保证这件事，反映出他们对盟国有怀疑。当俄国军队在东欧和东北亚占领额外领土时，俄国政权在当地实行的政治控制越来越严，到它在1947年决定不参加马歇尔计划时，关于在东欧行使绝对主权和不受阻碍地进行领导的明确决定已经作出了。俄国为了进一步在阿塞拜疆、希腊、柏林，最后在朝鲜行使霸权所进行的活动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苏联同美国发生了对抗。要实行这些政策，就要保持战时驻军状态的许多方面，一直到斯大林逝世，苏联新的一代领导人逐渐出现时，政治体制和实践才开始发生变化。俄国认为，“帝国主义分子”是反对共产党“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不仅包括西德和日本，而且还包括它的战时盟国，它就是以这种观点来看待战后的国际关系的，并按这种观点来制定它的经济和政治计划的轻重缓急。

在美国的领导下，西方国家迅速将它们的士兵复员。由于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欧洲国家有可能重建它们遭到破坏的经济。英国用放弃殖民地的办法，来保持它的经济的优先地位，而法国和荷兰则通过使它们在北非和东南亚的殖民地一

块一块地逐步实行非殖民化来设法保持它们的国际地位，因而同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势力发生了冲突。美国开始不支持这些政策，后来终于支持了，因为它越来越担心苏联会利用不发达世界动荡的政治局面。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取得的胜利，以及一年以后他们又对朝鲜战争进行的干预，看来使人们更加担心世界上发生两极冲突。虽然由于斯大林逝世，朝鲜停战，以及签订了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协定，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是这些担心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末。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几乎完全不为国际问题所担忧。由于在1951年签订和约以后日本的主权得到了恢复，它又在美国的倡议和保护下，逐渐恢复参加国际活动了。因此，它所处的国际环境，在经济上对它是有利的，在政治上是比较轻松的。它不再有什么"敌人"了，它周围的国家都感到满意，其中的一个国家占领着它。因此，一直到1952年之前，日本无需作出真正的决策，在1952年，它必须在台北的中国政府① 和北京的中国政府之间作出抉择，而这也绝不是什么自主的抉择。所以，它可以自由地集中力量来进行国内建设。

在美国占领当局的领导下，颁布了一系列制度改革法，其目的是要取消军队，并鼓励在政治上实行多元论，以取代被打败的领导。1947 年通过的宪法规定放弃战争和军队，这部宪法成了上述理想的象征和保证。在明治时代，不平等条约能否废除，取决于是否对制度进行改革，日本当时与明治时代一样，又不得不进行改革作为恢复主权的一个条件。然而，当时

① 作者在本书中几处重弹二个中国之老调，显然是非常错误的。——译者

的日本与明治时代也有不同的地方，在明治时代，日本进入的世界，正迅速地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瓜分，而在亚洲，看来只有中国和朝鲜为它提供了增进其利益的机会，但当战后的日本重新参予国际事务时，它发现中国和朝鲜由坚定的民族主义政府领导着，南亚和东南亚新近获得了独立。以前对日本的出口货极为重要的大陆市场关闭了，虽然日本以前得不到的来自其它地区的原料，不久就得到了。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国际事务提供的机会和这些地区的不稳定，不再使日本内部的政治活动迷失方向。联合国和美国通过的关于种族平等的条文，消除了战前有损于日本的自尊心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排除在联合国和西方的国际活动之外，并且由于参加了朝鲜战争而被列入黑名单。日本的稳定和恢复，对于联合国在朝鲜的存在和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因素。1951年签订的美日安全条约规定，美国支持日本对付外部的威胁和由外部策动的内部的危险。日本虽然在战争中失败了，但是在许多方面是胜利了，并从国际气候中得到了好处，而这种气候对俄国的经济则是一种惊人的负担。

对抗的得失表

朝鲜战争加强了美国和苏联的对抗态势，接着出现的敌对状态，造成了一种国际环境，这种环境有利于日本的迅速发展，而对俄国的发展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战争结束以后，俄国成了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首领。为了抵消北约组织国家在西欧重建军事力量的努力，俄国通过华沙条约担当了它的集团的军事领导。它几乎是保

持着总动员的状态，对于在战争后期它所控制的地区实行军事占领，有时对这些地区进行军事干预，如1956年干预匈牙利，1968年干预捷克斯洛伐克。虽然苏联感到，它可以随心所欲地要求东欧盟国在经济上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它还是给予中国相当大的支持。由于进行军备竞赛，苏联在整个战后时期的军费开支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苏联为了研制核武器，必须要有复杂的技术，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苏联在1957年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以此为象征，它在初期在探索外层空间方面居于领先地位，这个事实清楚地证明，它的科学和技术是成熟的。然而，苏联进行这些努力的资源是有限的，因为它自己的盟国不是那么发达，并且由于与西方对抗，苏联进口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在1972年同美国签订经济协定之前，苏美贸易额仍低于战前水平。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政府出口先进技术是受限制的，因为它们担心，苏联的军事力量会从中得到好处。

在太平洋和东亚地区，苏联政策的重点是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密切合作，这种政策一直执行到五十年代后期。在五十年代初期，苏联和中国结成了联盟，其矛头是针对被认为仍然是危险的日本及其盟国的，作为回答，美国和日本在1951年签订了安全条约。条约规定，日本给予美国在日本保持军事基地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保证，保护日本不受攻击，并且在日本政府的要求下镇压由一个外国挑起的日本国内的骚乱。这项条约在1960年作了修改，有效期延长十年，删掉了有关国内颠覆活动的文字。到1970年以后，双方达成谅解：任何一方如要终止这项条约，必须在一年之前通知

对方。苏联在好几年的时间里，试图恢复1905年以前它在满洲办运输和进行开发的权利。在1953年以前，它在中国保持着开采矿产资源的联合股份公司，这些公司与在东欧开设的联合股分公司差不多。此外，苏联提供用于发展经济的贷款，倡议互派大批学生和教员研究和讲授苏联式的现代化。这个运动的主要得益者也许是人民解放军，它完全重新装备起来了，并且得到了一支使用喷气式飞机的现代化空军。中国对它自己的力量，对它的苏联盟友的技术优势充满信心，它在西藏采取的有力的边防战术，它对金门和台湾进行的一系列威胁，最后是在1962年对印度的威胁，① 这些都反映了它的这种信心。然而，在赫鲁晓夫取代斯大林以后，俄国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控制削弱了，到五十年代末，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从根本上削弱了中国同莫斯科的密切关系。然而，中苏合作虽名存实亡，但对日本得到美国和西方的援助，则起了重要作用。

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恢复了日本的主权，同时谈成的安全条约承认日本"有权进行单独的或集体的自卫"，因此，警察后备队就合法化了。警察后备队是在美军于1950年撤往朝鲜以后成立的。这支新的军队后来重新命名为自卫队，它是一支有限的防御力量，作为美国作出的保护日本不受外敌侵略的保证的补充。到1970年，日本自卫队共有陆、海、空军二十五万人。日本很快重新参加了国际活动，承担国际责任。

---

① 1962年印度对我边境进行侵犯，我国作出自卫性反击，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要采取的行动。作者在这里却颠倒是非，说成是我国对印度的威胁，这是非常错误的。——译者

条约没有提到日本对冲绳的主权，它仍由美国统治，直到1972年，日本才恢复了对冲绳的主权，人们普遍认为，这标志着战后时期的结束。虽然日本同中国大陆的贸易也开展得很活跃，但是在美国的坚持下，日本同意承认中华民国(台湾)，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在1972年改善关系以后，日本转而承认北京，但是，它并没有牺牲同台湾的贸易中的领先地位。

在五十年代初期，日本同东南亚新独立的国家签订了和约。日本用货物和劳务赔偿这些国家的战争损失，这是在谈判这些条约时谈成的。这样，日本的商人和制造商又回到了这个地区。1956年，日本结束了同苏联的战争状态；同年12月，由于俄国人对于日本进入联合国不再使用否决权，日本就成了联合国的成员。它还成了旨在发展南亚和东南亚经济的科伦坡国家集团、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及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一个资助成员国。它在1964年主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在1966年发起建立亚洲开发银行，在1970年举办了一次国际展览会。因此，在这个时期里，中国近乎处于孤立状态，俄国警惕地保持着受遏制的地位，而日本则是重新活跃起来了。

由于经历相似，日本和俄国的经济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恢复也有若干类似之处。这两个国家的工厂在战争中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在同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进行长期的斗争中，它们的生产技能提高了。它们必须重建工厂，当然就用它们能够得到的最新的和最先进的技术来重建这些工厂。然而，俄国必须把安全和国际责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它还不够发达，无法同时支撑消费品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迅速发

展。俄国的军费稳定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左右；日本出于爱好和需要，它的军费很低，保持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以下。

当苏联得不到外国的技术援助时，日本却是这种援助的主要受益者。日本进口的技术，其中大部分是美国技术，对日本是极其重要的。从1950到1968年，日本大约签订了一万项进口技术的单项协定——通过购买，签订合同，或者进行合作，总金额将近十五亿美元。日本的工业按照当时能够达到的最先进的水平得到了重建，而日本所花的费用和时间很少，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那么所花的费用和时间就会多得多。

美国为日本的工业提供了市场，这种援助对于日本经济的恢复也是重要的。此外，在美国的赞助下，日本进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友好的市场，日本得到原料也大大方便了。在五十年代，日本的出口额大约每年增加百分之十五，比世界贸易额的增长率高出一倍以上。它同美国的贸易逐渐占它的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日本成了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日本在开始恢复经济时，急需美国为在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提供的货物和劳务支付的款项；但是到1970年，日本在与其工业贸易伙伴进行的贸易中，就有了巨额的盈余，而且盈余额越来越大，这是日本所取得的成绩的象征；到1973年，由于花在能源上的成本越来越高，日本的对外贸易才没有盈余。即使如此，日本工业的新发展并不完全靠国际环境有利，虽然这种有利的环境对工业的发展是重要的。

相互依赖的挑战

战后时期的对抗状态到七十年代初期结束了。由于参加对抗的国家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双方的关系有了缓和。越南战争提供的证据证明，要控制民族主义运动或“人民解放”运动，就不能不采取彻底摧毁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不再是切实可行的了，因为谁使用这种方法，它本身也会受到威胁。由于这个原因，缓和的过程加快了。

到六十年代后期，在前十年结成的中苏联盟，已经变成了严重的敌对状态。苏联的敌意及其在边界上的活动，成了中国深感不安的根源，事实上，这种情况还产生了一种反响，那就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和文化革命以后，中国领导内部出现了不稳定。苏中双方都争着要在支援越南暴乱方面起领导作用，但是它们又都想万一在可能爆发战争时能得到以前的敌人的支持。因此，五十年代意识形态论战的主题和言论比较少了。

日本发展成为世界第三位的经济大国，使日美联盟出现紧张局面。在日美贸易中，日本由入超变为有了巨额顺差。对于正在同通货膨胀作斗争、并在越南打仗的美国来说，由于以前受它保护的国家突然繁荣起来了，它就不禁认为自己成了替罪羊。事实证明，对于急于实行贸易和资本自由化的美国人的抱怨，日本的反应是缓慢的。为保护脆弱的经济而实行的限制贸易的措施，在这些措施的目的达到以后很久还在实施。日本经济的恢复，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胜利，现在开始被说成对美国的政策来说是一个问题。

1971年夏季，美国政府宣布，它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惊人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宣布同中国恢复友好关系以后，又采取了强行解决国际货币危机的步骤。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日本首相田中很快就到中国访问。尼克松总统访华时，拟定了一种事实上承认大陆政权，同时又与台湾保持正式关系的形式。而田中的做法与此相反，他同北京建立了正式关系，同时事实上承认台湾，并与台湾保持贸易关系。尼克松还到苏联去了一趟，然后欢迎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访问美国。日本接着也迅速采取行动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自五十年代起，日苏贸易一直在迅速增加，到1970年，在工业化国家中，日本成了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事实上，日本也是中国大陆除香港外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新的经济结构的特点是，它从苏联进口的货物主要是原料（它从美国进口的货物亦如此），而它出口的则是制成品、技术，甚至厂矿的成套设备。日本还着手签订在西伯利亚北部的弗兰格尔湾修建现代化港口的合同。日本继续坚持要俄国归还最南面的千岛群岛作为同苏联签订正式和约的一个条件，但是俄国人拒绝讨论这个问题——这显然是由于他们害怕这样做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修改中苏边界创造一个先例。同样，日本由于害怕得罪中国，不愿爽爽快快地帮助俄国开发西伯利亚的燃料，因为如果俄国的能源供应情况得到改善，那么中国的边界问题就会增加。

因此，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轻重缓急和设想，到七十年代就过时了。日本完全恢复独立以后，要求保持更为强大的态势，承担更多的义务。由于东亚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复杂局面，所以进行交往和选择的机会看来可能更广泛了。同

样，苏联也采取了一种比较灵活的观点，这种观点反映出，它对国内形势更为自信了，同时意识到国际上相互依赖关系带来的好处。

国际比较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将日本和俄国从进行变革过渡到实现高度现代化的过程中，四十年代以后的国际环境的作用同其它国家的经验进行比较，这几个方面是：领导层连续性的中断、参加联盟体系及对联盟体系的义务、得到和提供外援以及国际化的程度。

领导层连续性中断的情况，在战败国中自然比在战胜国中突出得多。由于战争而与过去的政治领导层决裂的现象，在那些由共产党掌握了控制权的国家里，甚至更为彻底。在大多数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里，就象在北朝鲜一样，共产党是在苏联实行军事占领以后取得控制权的。在欧洲和亚洲的其它国家（南斯拉夫、北越和中国）里，当地的革命运动往往是由有相当丰富政治经验的人领导的，因此，战时游击队运动的领导人取得了国家的控制权。政治连续性中断的情况，在以前的殖民地国家里也许最为严重。战争的结果使亚洲和非洲有七十多个国家获得了独立。

日本和俄国对于这些变化起了重要作用：日本人帮助摧毁了东南亚的殖民地政府，尤其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政府，俄国人则在他们占领的地区发起成立了共产党政权。在日本国内，战败和被占领产生了这样两个结果：一是国家摆脱了这

样一代领导人的统治，他们曾把对外扩张作为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放在优先地位；二是为开始奉行影响国内经济发展的政策创造了条件。在俄国，军事上的胜利使战前国内的实用主义发展成战后的教条主义；在三十年代，有关发展的政策在变革问题上是灵活的和富有想象力的，但是到了五十年代，这些政策变为对战后的问题采取刻板而僵硬的态度了。

在战后的年头里，所有发达的国家都卷入到冷战的对抗中去了，但是，尽管如此，日本对于国际问题的立场是独特的。日本不象德国，也不象意大利，日本没有受到国土被分裂、与苏联的陆地边界接壤，或者国内有强大的、有经验的共产党等威胁。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它可以从朝鲜战争中所起的供应国作用中得到好处；此后，它为美军提供基地，并为美军服务，这样它的外汇不断有了盈余。在六十年代以前，大多数日本人感到，在日本参加的国际政治活动中，他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然而，在六十年代，他们获得了完全的自主，他们独一无二地摆脱了代价高昂的束缚。他们的宪法和美国的保证，给予他们一种固定的保护，使他们不必花巨额的军费。他们同美国签订的安全条约，并没有使他们承担具体的义务，而北约组织则使大西洋国家承担了这种义务。邻近的军事大国中国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威胁，所以进一步限制了日本发展常规武装力量。日本有必要在东南亚采取一种“低姿态”的立场，这种必要性从心理上和政治上加强了日本国内不愿意重整军备的情绪。因此，日本比任何其它发达国家都更接近于可以自由选择卷入国际事务的程度，同时试着避免搞进攻性武器或武装部队。

日本在获得外援方面的地位也比俄国的地位有利得多，与美国的西欧盟国的地位差不多。从1945到1969年，美国提供的用于发展经济和作为军援的贷款和赠款，总数大约达一千三百八十亿美元。日本得到了四十多亿美元，主要是在从1945到1961年这段时间得到的。在美军占领年代里，日本的出口收入特别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援助为日本进口外国货提供了百分之三十八的费用。按人口平均计算，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援助为二十七美元，而对西德是七十七美元，对意大利是五十一美元，对英国是一百二十二美元。美国的其它盟国按比例得到了更多的援助，但是，在日本，成本与生产率的关系产生的是乘数的结果，这是特别重要的。后来美国技术通过非政府途径的转让比提供援助还要重要。苏联及其华沙条约盟国实际上没有得到美国的援助。有些东欧国家通过赔偿、开设联合股份公司和提供优惠的贸易条件，为苏联的重建作出了贡献。然而，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向它的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包括古巴和中国）提供了贷款和赠款，总额估计为八十亿美元到一百亿美元。俄国还执行向其它国家提供赠款的计划，这些国家主要是印度、伊拉克和埃及，数额大约为十五亿美元。到五十年代结束时，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援助，而中国却制订了它自己的一项小规模的对外援助计划。1964年，日本在参加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以后，也保证要拿出百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对外援助，并且有选择地利用多边机构来提供这种援助。

尽管存在着冷战的对抗以及革命和混乱时期的紧张局面，但是，战后的世界也有史无前例的国际化的特点。可以看

出，世界上的国家是分等级的，有些是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国际交往只有一部分是由政府组织或控制的；有一些是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外汇储备有限，国际交往主要是政府之间的交往。俄国由于要进行政治控制，并由于经济奇紧，所以比较接近于政府之间的交往，在俄国，越过边界进行不受限制的私人交往是极少的。日本在六十年代中期进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达”国家的行列之内，处于中等水平。它的国际交往先是受占领当局的控制措施的限制，后来又受自己制订的财政控制措施的限制。为了保护日本的工业不被财力比较雄厚的外界利益集团并吞和不受到它们的竞争，占领当局主持制订了有关立法，这些立法有助于将日本的市场保留给日本的制造商，这种情况持续到六十年代以后好几年。然而，被占领的年头以及在此以后的年头也是日本与非日本人交往的首次重大经历，因为经过日本城市和基地的美国人数以百万计。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日本更加充分地国际化了：为了适应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对外国资本和货物的限制逐渐减少了。而流往国外寻找投资场所的日本资本的数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有意义的是，到国外旅行的日本人的人数引人注目地增加了，1972年达一百三十九万二千人，比1971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五，比1968年增加百分之四百。1972年来日本游历的外国人达七十二万四千人，比1971年增加百分之十。

在战后的年头里，竞争性的经济援助、殖民主义的衰落以及国际化等因素，都使国际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战后经济利益的分配是不平均的，对许多国家来说，政治上的考

虑和人口的增长冲淡了这些利益。日本从这种环境中得到的好处比任何其它国家都多。日本由于其所处的地位，可以充分利用它不参加争夺权力的国际斗争的立场，它的发展速度比任何其它国家都要快。俄国没有得到类似的好处，由于国防开支和政治开支大，它只能有限地利用战后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机会。

第十五章　政治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失败的日本和胜利的俄国所走的政治发展道路在某些方面的差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在苏俄，胜利巩固了斯大林的独裁政策，而在日本，美国占领当局实行的民主化和分散权力的改革，起了恢复议会民主的作用。虽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发展——苏联实行非斯大林化，日本把占领当局实行的一些改革又改回来了——使战后初期的那种差别有所改变，但是直到七十年代，两国正式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别仍然是非常明显的。今天，日本的政治生活是以根据法律建立的代表机构和利益集团的公开竞争为基础的，而苏联的政治生活完全是以共产党为基础的，共产党起着合法的政治权力的独家票据交换所的作用。尽管最近几年内苏联出现了一些自由化的倾向，但是公开的政治压力仍然比日本大得多，在日本，持不同政见的人享有言论自由，重要的问题是在广泛的公共论坛上讨论的。

但是在某些方面，日本理想的多元政治结构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一致和划一的程度，同苏联是不相上下的。例如，两国都同样一致认为（只是在最近，日本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发展经济。两国政府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都起着广泛的作用，虽然日本的经济仍然是市场经济。在全国轻重缓急的安排上，一个显著的差别是在

国防方面，苏联的军事力量所占的比例大得多，这种情况反过来又造成了紧张的政治局势，而从总的来说，日本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在日本党派制度的实际运营中，一致的程度同样比多元结构所应体现的程度要大，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除了三个月以外，牢固控制政局的只有一个政党。日本反对党的声音是很大的，但是它们的人数一直很少。中央政府权力的更迭主要是通过执政党内的派系斗争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在苏联，尽管共产党仍然起着正式的垄断作用，但是它对各种政治利益集团越来越采取容纳的态度。

两国的领导人也是相似的，因为执政者都是性质非常相似的和普遍受人尊敬的官员，他们都受过类似的教育和具有类似的政治观点。在苏联，这种相似性是通过共产党培育的，而在日本，这种相似性是通过所有公私大组织采取基本相同的招收和提拔人员的形式来保持的。在日本，由于种族几乎完全是同一的，所以保持这种相似性在某种程度来说比较容易，不必作那么大的有意识的安排。在苏联，就必须不断注意使少数民族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问题。

除了政治结构不同，政局稳定程度相似这两点以外，日本和苏联还有一个基本的总的共同点：由于现代化程度更高了，它们都发现有必要取消或者至少改变在变革时期实行的那些强制性最明显的和单打一的政策。在取得了先进工业国地位以后，要赶上西方的紧迫感就减少了，因此，政治领导人和整个政治制度要求人们为实现国家目标作出牺牲的能力也减弱了。但是，随着社会的复杂性和互相依赖程度的螺旋上升，产

生了一种新的要求，那就是要求政治制度具有灵活性和对各种事物要加以区别对待。因此，不管在各自政府的活动中有什么样的具体差别，在这一时期内，日本和苏联都出现了一种基本相似的趋势，那就是在政治制度内部，越来越多地注意和容纳各种利益集团。它们的领导人已不象以前那样想通过政府计划来作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合法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日苏两国的首要任务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是意料中的事。苏联的胜利——虽然在生命和物资方面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巩固了，甚至加强了斯大林的政权。在日本，效果正好相反。全面的失败使旧的政治制度威信扫地，造成七年半的美国军事占领，在此期间，建立了一个新的立宪结构。日本政治制度的这种"民主化"可能没有占领当局的改革者所希望的那么彻底，但是尽管如此，它打破了许多旧习惯，建立了一个同苏联的政权显然不同的政权，后者继续依靠个人和他的亲密顾问的决定行事。

战争的结局不仅使两国政治制度之间的明显差别固定下来了，而且也改变了两国各自的国策。假如两国在整个战后年代的首要政治目标是尽快发展经济，那么对这一目标的追求是各自大不相同的国际环境造成的。对由于停战而不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军事作用的日本来说，发展经济的工作可以作为目的本身来加以促进。对深深陷于冷战之中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急于取得自己新的"大国"地位的苏联来说，发展经济是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和福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战略核能力的取得标志着苏联的这一努力的成功和转向另一个时期的开端，在那个时期中，政治领导人可能把发展经济看作是要追求的目标，这有许多相互关联的原因，外交目标只是其中之一。同样，1952年占领的结束以及后来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这件事也标志着一个过渡阶段的开端，经过这种过渡，不能再认为经济目标和外交目标是互不相干的了。

如果要考虑两国政府在它们的选民的心目中是如何重新取得合法性的，那就不应仅仅考虑苏联的强制制度和日本的自由制度之间的简单的差别。虽然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具有强烈镇压色彩的特点依然存在，但是它们对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性已经大大减少，尤其是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和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的成功所产生的影响相比更是如此。实际上，苏联和日本政府在战后年代取得的成功比其他任何事情更使它们具有合法性并使它们得到了公众的支持。家庭和社团反过来也提高了公众接受和支持政府的程度，因为在那里，对正在兴起的一代反复灌输促进政治上忠诚的价值标准的工作大多数是成功的。

决策和人员

经过几十年的紧张和捉摸不定的局面以后，在战后的头十年内，两国的制度最后稳定下来了。日本在1947年建立了新的立宪制度，尽管这个制度最初受到了左派政治力量的某些威胁，但事实证明，它是非常稳定的，历届内阁的任期比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任何一届内阁都长。在苏联，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相当捉摸不定的时期，但

是最后成功地实现了从个人统治转变为由党统治的过渡，这一工作最初是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进行的，其后更加有条不紊地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进行。当然，在许多方面，两国政治制度的这种稳定是由于没有发生任何大战或严重的国际危机。但是不管国际环境的影响如何，日本和苏联战后年代的政治制度比前半个世纪稳定得多。

在对日本和苏联当代的政治结构进行比较时，必须考虑“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政府形式之间的传统差别。在作这种比较的时候，需要作两点初步的说明：第一，这里的重点是研究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结构，而不是研究这些名称对对外政策和国际秩序可能有什么影响；第二，同“资本主义”、“多元化”和“民主”相对照的“共产主义”这样的名称，常常表示出某种理想的格局，而在政治制度的实际运转中可能只有隐隐约约的一点反映。

在作了这些说明以后，日本和苏联的制度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极为重要的差别。在苏联，共产党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而日本则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国家，它有各种各样根据法律建立的和公开竞争的政党和集团。在苏联制度内部，公开采用强制手段的事例也比日本多得多，虽然在对比较隐蔽的强制手段进行仔细的研究之后，可能会发现日本人实行的限制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多。另外，也很明显的是，在苏联，一切重大的经济活动仍然是通过国家管理的，在那里国民生产总值中由政府机构直接管理的部分比日本大得多。

虽然这些差别是重要的，但是在其他某些主要方面，日本

和苏联似乎是十分相似的。例如，由于它们经济发展的水平高，全国性的大型公私机构就要通过计划作出影响两国各个生活领域的重要决定。虽然私人所有制使日本的工业管理人员得到的正式的自主权可能比苏联管理人员来得大，但是他们的成败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制订长期计划的能力以及使高度现代化社会所要求的计划性和国家本身的计划性相协调的能力。组织得比较严密的先进的工业社会，比现代以前的或过渡性的社会，更需要有某种形式的全国性计划机构，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俄国，个别企业或部门进行真正自主的经济活动根本不再可能了。

对于应用于当代日本政体的"多元化"这个词，不妨也作一些重要的说明。由于始终存在着要赶上西方这种推动力，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一切现代活动的特点一直是非常强调国家的集体利益而不是强调个人和团体的利益，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于这种态度，政府的政策和私人利益仍然很难分清。使日本政体的多元化显得不那么明显的另一个因素是，上层人士始终是团结的，这种团结有助于使行政活动的各个方面，不管是企业界、政界还是国家机构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使日本政体的"清一色"色彩相对来说比多元化制度的理想所应体现的大得多，而多元化制度的理想是占领时期的改革者所十分珍惜的。

另一方面，苏联政权统一的或"清一色"的程度看来比这个名词所应体现的要低得多。苏联的工业并不是按照银行和贸易公司的方针组织的，而银行和贸易公司在协调日本经济生活中的私人部分这一方面是卓有成效的。由于缺乏这种有

效的协调机构，国家经常不得不默许个人和地方机构脱离由中央计划机关确定的常常是不现实的总指标。自斯大林去世以来，苏联的政治制度也表现出它对党政机构内和整个社会中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反应有时是相当灵敏的，这些利益集团在政治力量的基础上对现有的有限资源进行争夺。在确定需要的时候，既不顾及各个利益集团的组织形式，同时又要考虑这种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仍然为内部谈话确定了界限。但是尽管如此，苏联政治制度的日常活动表明依靠多元化的竞争和小心地争夺权力的程度增加了。

如果对两国决策机构中的上层人士作一比较，那么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相似点，这些相似点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变革时期。两国仍旧保留着一个上层阶级，他们具有共同的经历、文化程度和价值标准，这就有助于减轻谈判和妥协的复杂过程的困难，从而给两国的政权带来了稳定。在苏联和日本，最能说明上层人士具有共性的标志之一是，"上层人士"经常"互换位置"，即某个行政领导部门的成员可以轻易地调至另一个部门，从而造成了重叠现象，进一步提高了这个制度对付利害冲突的能力。

不管日本上层人士的社会成分在战后有多大的变化，它仍然采用明治时代的方式，从等级固定的教育机构里吸收高级领导人。此外，根据资历（但也充分考虑到功绩）提拔的制度——日本现代部门的单位几乎都实行这种制度——保证了在任何一个时候居于关键职位的人都是同一代的。因此，不管是企业经理、政府部门首脑，还是国会议员，他们的情况可能都是这样：上过名牌大学，年龄是可以断定的、价值标准和生

活方式是非常相同的。日本的社会秩序给外来客留下"清一色"的印象的原因就在这里，而不在于社会根源。

苏联上层人士共同特点形成的时间比日本近，控制得也比日本严密，但是最后结果是相似的。独一无二的共产党机构在形成共同特点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方法在日本是不需要的。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了一代完全是在苏联的制度下成长和教育起来的领导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搞的清洗加速了这一进程，因为在清洗中，苏联早期的领导人中许多意见比较不同的分子被搞掉了，斯大林本人最后的去世为确立挑选上层人士的标准形式开辟了道路。六十年代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进一步加强了最高一级的共同性，这既是由于大量吸收"局外人"的必要性减少了，也由于在以前经济发展得最迅速的几十年里结合在一起的工作集团保持原封不动。当然，这种共同性有着非常消极的一面，因为高级领导层越来越稳定，现在它的成员的年纪显然比日本的领导人老，而且常常保持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观点和方法。但是在日本的政界和企业界内部，有时会出现自行其事的人和靠个人奋斗起家的人，这着重说明了迅速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是可能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战争年代和在战后不久的年代里，在上层人士结构内部连续性中断了。

苏联今天仍然象它整个历史上一样必须对付多民族带来的后果，而日本是没有这种问题的。在共产党内，各民族的代表人数仍然是不平等的，大俄罗斯人继续控制着中央机构的领导权。但是，通过党的选拔政策以及通过由党组织、学术界和军事单位开办的高级培训机构，在上层人士一级，至少许多

最不平等的现象目前看来已经解决了。当然，重要的裂痕依然存在，但是这是另一种性质的裂痕。现有的官僚“组织”或“集团”是根据它们在国家内部所行使的专门职能而不是根据它们的成员的社会或经济背景来划定的。

特殊利益集团

苏联和日本的政治制度除了政党的作用明显不同以外，都是由中央“政权”控制的，在苏联，中央“政权”是由共产党和政府组成的，而在日本，它是由全国选举出来的执政者、高级公务人员和主要工业家组成的。但是许多特殊利益集团同政权有联系，它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力量，能使中央感觉到它们的需要。正是在这些集团参加政治活动这一方面，可以看到两国之间的一些最重要的差别。

在可能是明显的利益集团中间，首先是军队，但是在日俄两国，它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大部分时间内实际上是中立的。在美国占领期间，日本战前的军队完全解体了，新宪法取消了在前一个时期结束以前它所拥有的政治权力。由文职人员控制军队在许多方面是占领当局实行的改革中最重要和最持久的一项，因为它消除了日本战前上层社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部分拥有它自己独特的教育制度，受它自己的特殊的价值标准的指导。自1950年以来，日本逐渐建立了新的军队，它委婉地叫做“自卫队”，以避开宪法第九条规定的不得保持战争潜力的禁令。到1970年，自卫队约有二十五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人员。但是，人们对军队战前的政治力量记忆犹新，从而起到了遏制自卫队的作用，使它谨慎地保持一种严

格地只搞专业的态度，在政治制度内部只有极其微小的影响。

俄国的军事机器为日本的十倍以上。它消耗国家的大量资源，它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所起的作用还没有完全被人所认识。但是，共产党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异常注意确保军队纳入整个国家的轨道，确保它只拥有极其微小的独立政治力量。这种控制是通过多种方法实现的，例如由党对军队及其训练机构进行广泛的监督，对新兵的教育计划也进行这种监督。也许比这些方法重要得多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和政权共同进行英勇的努力给人们留下的记忆，这种记忆现在通过积极的宣传仍然小心地保持着。因此在沙皇政权时就存在的军队服从政党的传统保持下来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基本关系不可能受到破坏。在苏联，军政当局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怎么明显，比较明显的是各军种之间为争夺经费而进行的竞争，这已经成为全国有关如何分配资源的一切辩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两个国家的第二个特殊利益集团是少数民族，这个集团在苏联比在日本大得多。日本只有一个这样的集团，那就是朝鲜族，人口为六十万，占日本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弱。虽然对朝鲜族的歧视并未消失并使激进党派得到了一个明显的起团结作用的因素，但是由于他们人数很少，在整个政治制度中决不会起过多大的作用。

在苏联，少数民族问题就完全不同了。非大俄罗斯人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他们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教育和社会发展水平也在迅速提高。苏联领导人对付这些变化的措施是多

种多样的，有时候力图在每个突厥语系民族内部增育一种集团感，以便与泛突厥语系民族意识相抗衡，有时候力图使少数民族俄罗斯化，办法就是让大批大俄罗斯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定居。但是，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好几个地区，发生了有组织的骚乱和暴力行动，尤其是在波罗的海、高加索和乌克兰等地区。不过，总的说来，为了对付少数民族的潜在政治威胁而煞费苦心想出来的各种办法一直是成功的，中央政策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分离主义的压力。在苏联，宗教团体的一切独立的公开表现都受到了粗暴的对待，为这种行为辩护的理由是一样的。因为某些有组织的宗教——尤其是犹太教和天主教——一直是同某种民族愿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它们引起的担心同国内其他离心力量引起的担心是一样的。

日本已经采取了要求政教完全分离的政策，战前普遍存在的官方利用佛教和神道为民族主义目的服务的现象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各教派本身则保持了服从政治权力的长期传统。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好斗的佛教创价学会，自1964年以来，它通过它的政治组织公民党在全国政治生活中一直是很活跃的，并且在全国选举中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绩。但是公民党没有表现出对政治秩序造成任何威胁的迹象，一般来说，它的行为是相当温和和有节制的。

作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劳工，在苏联和日本从未取得过象在西方国家内取得的那种程度的政治权力。这种趋向今天依然存在。日本的工会运动在美国占领当局的鼓励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了支持社会党的主要源泉。但是，这个党在

作为战后日本的特点的"一个半党制度"中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政治力量。此外，日本的大多数工会是在企业而不是行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往往同日本家长式的工业管理制度很适应。劳工进行公开对抗的事例是很少的，虽然在前所未有的发展年代里，他们认为没有这样做的必要性。苏联工会的政治力量比日本工会小得多，尽管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曾作过努力想使工会组织负担更大的责任。苏联的工会仍然是受共产党"自上而下"的严密指导的，它们的主要活动是在下级和中级参加就劳动定额和奖金制度等问题作出决定。它们仍然得不到罢工的权利，也不得参加作出有关资源分配和工资水平等重大决定。中产阶级职员和技术人员人数的增加和威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两国劳工的权力。

在日本和苏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业人口已经大大减少，今天，他们很少采取好斗的政治态度。但是，就全国的政治力量来说，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农民是执政的保守党获得支持的重要源泉（虽然这个源泉日益缩小），作为报答，他们要求并且得到了对他们的农产品实行慷慨的价格补贴制度。在苏联，农业部门是国家领导人相当关心的一个方面，因为他们知道，农业歉收会大大削弱赫鲁晓夫的力量。但是，这并没有使整个农业得到政治权力，尤其是对大量贫苦农民来说更是如此，设在城市里的一心想着工业的政权对他们几乎仍然是置之不理的。

日本和苏联的政权能够得到新的利益集团的支持并把他们纳入日常的活动，表明这一点的就是它们吸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白领阶层或专业阶层的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以来，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得最快的年头里，两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白领阶层担任的职位迅速增加。尽管如此，在这些人中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是为政治机构所欣然吸收的。在日本，这些新的专业人员并没有多大的政治权力，而在苏联，虽然他们只是在最近才爬到党的上层，但是他们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最大集团。没有被成功地同化的唯一受过教育的集团是日本的学生以及日本和苏联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战后的日本，学生运动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因1960年的安全条约而发生的危机期间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中，学生和知识分子同其他的左翼团体一起成功地推翻了岸信介政府。但是尽管如此，保守党的控制仍然是牢固的，政治制度继续发挥着有效的作用。在苏联，由专业人员和上层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个人数不多但声音很响亮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六十年代产生了某种影响，但是由于警察采取了统一的行动，再加上采取一种迫使著名的批评者流亡国外的政策，这个运动正江河日下。由于这些持不同政见者都是在斯大林时期备受折磨的人们，所以这种特殊形式的政治反对力量是否会继续到第二代是值得怀疑的。一般地说，苏联的学生和年纪较大的专业人员对政治是不关心的，他们沉缅于自己的事业以及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他们把这些看作是一致的目标。

日本和苏联的日益繁荣使得作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消费者在决策方面占有越来越重的份量，虽然只有日本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有组织的消费者运动。但是尽管如此，在苏联随时都可以感觉到要求把资源用于消费品和劳务而不是用于资本投资的呼声。在这种初期的“运动”的压力下，某些苏联期刊

担当了表达消费者观点的责任，一贯努力就消费者所关心的问题发表民众中有代表性的意见。

日本和苏联的统治集团的最上层几乎都是男的。但是，在这一层以下，在妇女作为一个集团参与政治进程这一方面，苏联显然走在日本的前头。日本只有百分之三的妇女是国家政治机器的一部分，而苏联执政的共产党有百分之二十的党员是妇女，在中层的决策岗位上和在各个专业中，妇女都是很多的。她们享有广泛的司法权利，而且组织严密，参加国际组织时就更是如此。但是，在两国，妇女都不是一支强大的独立政治力量。最近在日本组织的消费者的抗议，也许是这一总的格局的一个局部的例外。

最后，当然应当指出，在日本，所有上述特殊利益集团都是通过多党制参加政治活动的，而在苏联，他们都是通过单一的共产党组织表达意见的。两国这样形成的一些集团，不管是独立组成的政治组织，还是一个党内的非正式"派别"，都具有利益集团的性质，它们的共同点超过了使它们的成员组织起来的具体问题。日本的政治行动过程还有一个有趣的方面，那就是形成了"公民集团"，对环境受到的具体威胁提出抗议。这些集团在许多地区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还没有成为更大规模的持久的组织。各种各样集团的存在使两国有了"安全活门"，通过这些活门，许多压力和不满情绪就可以在政治制度的结构内找到正常的出气孔。这些安全活门及其继续发挥作用的能力，是衡量两国政治制度在适应高度现代化的要求方面是否成功的准绳。

冲突及其解决办法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以来，由于制度的稳定以及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两国政治冲突的激烈程度比前一个时期低多了。在战后年代里，整个说来两国都是平安的，因此内外冲突都减少了。

随着政治暴力行动的减少，国家公开使用强制手段的事例也大大减少了。在日本，进行警察监视和思想控制的政府机构在美国占领时期已经完全解体了，在苏联，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劳改营大部分已经取消，派警察进行监视的现象也普遍减少了。

可以衡量的政治暴力行动的水平在日本比在苏联高，因为在苏联，共产党以外的一切形式的政治活动——甚至联系——都是严格禁止的。在日本，由于国会外的政治活动是合法的，所以政府不得不把罢工和示威看作是正常的，只是设法不使其发生暴力行动罢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建立了一支经过专门训练的防暴警察部队。尽管多年来发生了许多起政治暴力行动事件，国会外的政治活动本身已经经常化、体制化、甚至是分门别类进行的，所以它对日本制度下的正常生活并不造成威胁。

与此相反，在政治暴力行动比较少的苏联，为了防止暴力行动的发生，国家采取各种强制手段的事例仍然比日本多得多。与过去的年头一样，反对发展经济产生的副作用仍然是发生政治暴力行动的主要根源，虽然在六十年代，有些暴力行动是由那些感到政府的政策落后于国家的需要的人引起的。同

这两种发生暴力行动的根源有关的是，苏联不断作出巨大的努力向公众宣传国家的信念、理想和目标。

日本和苏联仍然是这样的国家：由于经常由个人来解决冲突，规定的法律准则大大削弱了，这与它们以前的法律观念是一致的。同时，在过去二十年内，两国越来越朝着建立一种以法律准则为基础的秩序的方向前进。美国的占领使日本的法律制度按照英美的方针进行了广泛的改革，虽然后来为了同日本的习惯相适应作了一些修改。在苏联，批评斯大林主义的官方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都是把1936年的苏联宪法的条款作为依据的。尽管发生了这些情况，两国的公民通常是不诉诸警察或法庭来解决私人纠纷的。总之，法律主要仍然是国家的特权，而不是公众的工具，大多数冲突都是通过和解、第三者的调解和个人的谈判解决的。

国际比较

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政治结构和程序必须适应当代技术所创造的条件。它们必须积极地满足因变革而出现的新集团的需要，在接连不断的迅速变化中维护内部的稳定和有利于参加国际机构。对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些任务虽然并不是容易完成的，但比较简单，因为在它们的变革时期，它们无需加快变化的速度或为了动员人民而采取严厉措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变革是在压力比较小的环境下实现的，所以它们没有采取什么一旦达到高度发展水平以后必须加以废除的极端措施。日苏两国最近的政治经验与发达得比较早的国家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不得不把较多的注意力放在

改变在变革的年代里建立的集中控制的政策和机构上。在日本，这是在占领当局的影响下突然发生的；在苏联，改变的过程延续了一代人的时间，现在仍未结束。同早发达的国家相比，在这两个成功的晚发达国家内，这是战后人们关心的主要政治问题。

由于日本和俄国属于少数几个正变得高度现代化的晚发达国家的行列，所以要证明其它的晚发达国家最后也都将遇到日本和俄国所关心的政治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为了指导变革的进程而建立严密而集中的政治控制的晚发达国家，看来最终可能同样需要在一旦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后改变这种控制。

日本和苏联的经验也说明了晚发达国家在具有高度现代化社会的特征之后应当如何维护内部的安全。从现有有限的证据——当然不包括苏联的秘密警察——来看，日本和苏联为维护秩序所需的警察部队的人数与人口的比例，似乎大体上同英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差不多，比法国和意大利小一点，不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半。即使苏联的数字由于没有把主要执行国内任务的军事人员包括在内因而是不确切的，但是日本和苏联的警察部队比具有同样政治制度的国家少这一事实也是很有意义的。

日本和苏联的政权比较稳定，这是由于它们能够顺利地转移行政权力。这不仅同它们自己前几代人的历史形成了对照，而且同其它许多晚发达的国家的经历也是截然不同的，在那些国家内，权力的转移会引起关于应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来行使新权力的往往是很激烈的大辩论。议会制度无能的一个

标志是不断地更换内阁和部长，就象一批领导人终身任职常常表明共产主义制度的无能一样。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日本和苏联看来也是比较稳定的。日本并没有发生使意大利陷于瘫痪的那种议会斗争，俄国已摆脱了由一个不变的派别（就象继续主宰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生活的那样的派别）长期进行控制的局面。

发生抗议示威的次数少是表明两国政府比较稳定的另一个证据。当然，在俄国，示威几乎完全是被镇压的，在日本则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不妨指出，从1948年到1967年，日本发生抗议示威的次数少于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因示威而死亡的人数同这两个国家相比是极少的。据报道，在同一时期内，苏联因政治暴力行动而死亡的人数有几百人，但是即使这个数字按人口计算的比例以及和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特别是同那些迅速发生变化的国家相比，也是比较低的。目前衡量政治稳定性还没有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标准，虽然在政治上反对政府的人的命运在苏联显然比在其他大多数国家要严峻得多。

如果暴力行动不再是日本政治生活的特点和在俄国已经大大减少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发展达到了公众的期望的缘故。甚至在早发达的国家中间，也还远没有普遍取得这种成就，英国和意大利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晚发达的国家中，这种成就也不是普遍的，就象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日本和俄国政治社会化的效力加强了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对苏联和日本的儿童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两个国家用它们的主要理想教育年轻一代是比较成功的。两

国花在教育上的大量经费和在校人数所占的很高的比例，再加上电台和电视台播送新闻和专题节目的大量时间表明，这两个社会都有充分的渠道来加强初步的社会化。

衡量日本和俄国善于革新的程度的令人满意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尤其是观察家的印象给人描绘了一幅混乱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图象。但是，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在政治方面，两国现在看来不大想改变现行机构或者建立新的机构，除非承认有这样做的极大必要性。例如，俄国和日本在承认建立有力的国家机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要性并据以采取行动这一方面，动得不如英国快，甚至不如美国快。在建立福利机构方面，日本甚至落在匈牙利和波兰等不那么繁荣的社会的后面。在应用电子计算机（更不必说办公室用的机器了）进行公共管理方面，苏联比西欧及北美各国显然要慢。另一方面，在训练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方面，两国走在法国和英国等早发达国家的前面，这一事实表明，它们仍然致力于新知识带来的那种形式的革新和变化。

有关日本和苏联进入国际生活的现有标志是不完全的，已有的标志也不是没有矛盾的。但是尽管如此，这些标志还是表明了一般说来与早发达国家相似的跨国接触的程度，虽然两国的具体形式是不同的。除了美国以外，苏联派往国外任职的政府工作人员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在对外援助方面同美国的情况是一样的。即使如此，它的国际交往和国际旅行方面看来远没有许多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那样彻底，在参加国际组织方面落在所有其他早发达国家的后面。与此相反，日本在参加国际组织方面是同西欧和北美的各个大国并驾齐驱的。但

在同时，日本国际旅行的人数不及爱尔兰、墨西哥和阿根廷，同远没有日本发达的经互会成员国或者同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一些地区性组织的成员国相比，日本直接参加正式的国际贸易团体和地区性联合会的程度是很低的。

第十六章　经济结构和经济的增长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和俄国的经济一直在向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社会的结构和生产水平靠近。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俄国和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占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在美国之后），这反映出它们产量的增加和众多的人口。估计1973年它们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很高：日本为三千八百二十二美元；俄国为二千四百五十美元（美国为六千一百二十七美元），虽然这比许多先进国家的经济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要低。

日本经济增长的速度在战后年代比苏联快得多。如表16.1所示，从1950到197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九点九，俄国为百分之五点五。它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比俄国快一倍多。的确，日本在这些年里的增长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日本的增长率是在六十年代这十年里，而不是在五十年代提高的。另一方面，俄国的增长率在整个战后时期虽然比较高，但在五十年代以后却跌落下来了。

日本和俄国还一直在向最现代化的社会的部门结构靠近。到七十年代初期，这些社会通常把它们百分之四十或者更多的劳动力分配在服务业，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劳动力分配

在制造业，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或者更少的劳动力分配在农业。象在表16.1中可以看到的，日本在1970年已达到了这样的劳动力分配比例，事实上它到1972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所占的份额已降到百分之十五以下。然而，俄国距离高度现代化的结构更远一些。它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所占的份额虽已是1940年的半数，但仍然很大；它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所占的份额比较小。

表16.1　经济数据比较(%)

	日本		俄国	
平均年增长率：	1950—1973		1950—1973	
国民生产总值	9.9		5.5	
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	8.7		4.0	
按部门分的国民产值：	1940	1970	1940	1970
农业	16	6	29	24
制造业	53	50	45	47
服务业	31	44	26	29
雇佣劳动力所占份额：				
农业	44	19	54	27
制造业	31	41	28	45
服务业	25	40	18	28
按最终用途分的国民产值：				
消费	65	52	63	58
资本积累总额	24	40	26	30
行政管理	11	8	11	12

日本和俄国朝着高度现代化的方向所取得的进步，已经要求并继续要求对增长结构和体制进行重大改革，这些结构和体制在八十年的变革时期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它要求改变

把人数比较少的一批管理人员和工人集中到为数有限的重要任务——钢、煤、纺织、铁路、公路、中心城市——上的做法，建立规模大得多的和复杂得多的企业，那里有大批技术专家，在管理机构内部和劳资之间形成新的关系。在俄国，变革时期用来动员熟练工人和资源的手段，用于这些新任务并不很合适。日本也曾有过它的困难，虽然它比俄国能更好地适应高度现代化社会的种种要求。

日本经济发展得比较快的原因，有些看来清楚地反映出它在价值标准和体制方面所具有的传统；战后时期的一些特点的形成可能还有其它因素。日本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进入现代时期时，城市化程度、通讯系统和行政管理技术都超过俄国；这些能力在它在变革时期参加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经济变得僵化了，特别是就新企业来说更是这样。判断新的冒险行动和意见不仅要根据它们固有的价值，而且还要看是谁提出的建议，他有什么背景以及他在什么地方受的教育。日本在1945年的失败，对它来说无疑在许多方面都是一场灾难，但是失败对消除经济上的这些僵化现象也曾起过作用。新的领导人在企业部门和政府中崛起，事实证明，他们是有生气的、讲求实际的，而且对战后时期的经济挑战是能适应的。

俄国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迄今还没有这样灵活。虽然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对改革经济进行过许多讨论，也作过改革的尝试，但是没有发生卓有成效的变化。现在苏联的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受在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的指导。战后时期受过教育和训练的新一代，正在走向有

权势的工作岗位，并且可能比较顺利地实行改革，这种改革对解决高度现代化社会面临的问题是必要的。

两国花在防务上的经费数额不一，这也影响了它们相对的增长速度。大量的防务开支对于充分使经济增长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全面影响，这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但是没有人否认影响是很大的。军事开支会从增长领域夺走投资和熟练人员。日本的防务负担轻——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而俄国接近于百分之十——使得它在谋求经济高速度增长方面得到了明显的好处。

对复杂的经济的管理

日、苏两国经济增长的进程之间比较显著的差别之一是在计划和管理方面，苏联一直保持着它在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种种极其集中的形式。然而，由于日本自由经营的经济中公私企业之间的合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所以两国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别已经缩小了。这种公私企业并存的情况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但是它确实使这些区别有所变化。

苏联继续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制度，这是它把斯大林式的管理方法普遍延续到五十年代这种做法的一部分。这项改革由于苏联确定要在军事上达到同西方的均势这一目标而得到加强。这一目的到五十年代末大体上已达到了。在苏联人取得这些军事成就的同时，新的一代领导人掌权了，这些领导人是欢迎有机会考虑对经济进行广泛改革的。

从三十年代开始，为了便于管理，苏联的经济按工业门类

划分成许多部。政治领导人和计划人员直接同这些部的部长们联系；对各部门的企业实行按成绩进行奖惩的制度。这种划分有它的积极作用，但是也造成了内部王国和在这些王国之间造成体制上的障碍。为了纠正这种局面，在1957年采取了区域性的经济管理形式。整个经济被划分为大约一百个区，一个区里的工业企业全部由那个区的经济委员会管理。某一个加盟共和国内各区的经济委员会由那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管理，而各加盟共和国则由莫斯科的苏联部长会议管理。

经济区的组织形式有某些优点——它提高了本地资源的效能，从而减少了由于部门重叠而造成的一些浪费——但是它也有许多弱点。事实证明，要进行全面的协调和控制，是极为困难的，工业部门重要物资的供应系统几乎完全打乱了。同样重要的是，中央鼓励使用新技术的能力受到了损害，因为研究和发展组织不再同能够催着要求采纳新思想和采用新技术的中央各部发生联系了。此外，机构改革一项接着一项，而且来得那样的快，以致经济区的管理人员今天不知道明天到底由什么人来下达指示——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一种环境，不利于经济的有效运转。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苏联在1965年放弃了区域性的经济管理形式，恢复了按门类分部的形式，这样做是毫不使人感到奇怪的。

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在六十年代初期激烈起来了。制订和执行计划的情况都被认为需要作一次全面的检查。制订经济计划的方法已经三十年没有改变了。它们着重依靠费劳动力多的和需要大量资料的计划计算法。由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中央制订计划和进行管理就更困难了。随着公司和专门

产品的增加，公司之间和不同产品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大大增多了。新产品复杂程度的提高，要求对投入的原材料规定得非常明确，从而缩小了质量变动的允许范围和投入产品的允许代用范围。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对集中制订计划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增加了所需要的制订计划的力量，还要求大大提高精确性。一位苏联经济学家预言，如果制订计划的方法不提高效率，那么到1980年，就要用苏联的全部劳动力来做编制计划和管理工作。

执行计划中的缺点甚至更加明显。这些缺点主要是刺激手段造成的，他们的刺激手段是，各级经济单位为完成和超额完成规定的指标，就可以得到高额奖金。这种制度的缺点是，奖金并不是按绝对成绩而是按相对成绩发放的，也就是说，按完成指标的情况发放的。企业经理因此力求完成指标的情况要好，但定额要低，并且设法限制超额完成任务的幅度，以免给计划人员造成借口，过分提高将来的指标。这种局面还使人们不大愿意革新，因为得革新奖的时间过于短暂，不能弥补因革新失败所冒的风险。它还使得人们有意不充分报告生产潜力的真实情况，而这正是中央计划人员为了有效地编制计划所急切需要的情报。

苏联计划制度中另一个固有的问题，是主要以数量作为奖励的标准。苏联的公司往往只注意它们自己的生产，而不注意那些购买和使用它们产品的人们的需要。在奖励产量的制度的压力下，质量就不管了，花色品种和交货协议不执行，供应系统靠不住，很少考虑改进产品来使其对买主更加有用。实际上，当一个公司不得不进行革新的时候，这种革新通常也

是生产过程而不是产品本身的革新。最后一点是以不适当的物体大小作为生产指标而造成巨大的浪费：由于以吨为计量单位，企业都愿意生产重型机械而不愿生产轻型机械。

制订计划方面的这些缺点由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突出起来，集中制订计划的缺陷也比之以往愈发不能容忍了，因为不能再用相等的力量有力地将它们加以抵消。这些力量包括迫使经济部门按政治领导人的意愿来完成资源的全面调拨和改变产品的组成和用途的能力，到六十年代初期，这些力量不再那么重要了。

苏联领导人在着手开展工业化运动和最初使用集中制订计划的办法时确定的原来的目标，到这时又或多或少达到了。工业化的经济已经建立起来。这时的任务已不再是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而是在既定的（或者说慢慢变化着的）结构内部使经济得到增长。这只能够通过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来完成。按照特定商品安排先后次序不再象以往那样简单明确。如果没有几个显然是重点经营的部门和承受错误冲击的次要部门，苏联集中制订计划就会遇到困难。在一个需要微观效率和必须作出无数选择的环境中，集中制订计划的力量削弱了，它的弱点突出出来了。由于1958年以后产值增长率和因素生产率的下降，苏联领导人明确注意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尤其重要的是，资本的生产率下降了。强制的高投资率这种促使生产增长的力量，曾经是集中计划下苏联增长结构的核心。苏联领导人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这个核心遭到侵蚀。

以后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一是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在经济学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虽然它们对于苏联编制计

划的方式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它们使苏联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科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第二个情况同苏联的消费者有关。为了通过增加消费者的福利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把增加消费者的福利当作目的本身，对苏联消费品的数量和组成已给予更多的注意。苏联消费者对决定消费品产值的构成有了更大的发言权。最后一点是，从1965年开始，对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下达到苏联企业的指标的数目减少了。而且工作成绩的主要标准已从产值改变为销售量和利润的数量。希望是，随着分散作出决定的情况增加和更多的以价值和利润作为标准，苏联经济中的微观效率将会提高，从而提高因素生产率和导致经济增长恢复到较高水平。但是1965年的经济改革看来并不成功，主张用其他办法来改变体制，譬如建立大规模生产综合体的谈论越来越多了。这些综合体将把若干企业联合一起，具有大规模多样化经济的优点。人们也希望，这种综合体将通过它们的研究和发展部门，鼓励人们比较愿意革新和加快苏联经济中使用新技术的速度。

从占领结束到1971年迫使日元重新定值的"尼克松冲击"，日本政府的主要经济目标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值的增长率。近些年来，这一改革有时候被称为"不惜任何代价的增长"，这么叫并非不公平。这一政策由三个密切相关的部分组成：一是实行把政府的征税额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税收改革；二是鼓励对工业投资，主要是私人投资；三是鼓励出口。

日本政府通过它的税收政策帮助那些正在投资和迅速扩充的公司和工业部门。譬如，资本收益税很低或免征；利息收入税的税率比工资的薪金低；加速折旧提存规定得非常宽。因

此盈余都留在私营部门中最进步的（为了经济增长）分子手中，可用作私人投资。政府征收的税是微不足道的。

政府还实行大力鼓励出口的政策，这项政策一直实行到六十年代末。主要的出口商在财政方面可以得到优惠；政府机构积极向外推销日本商品；为开拓市场提供帮助；要求生产厂商注意抓住使用新技术的好机会。政府作了大量工作来提高日本商品的声誉。

实际上，政府的目标已产生这样的结果，即把具体的工业部门作为发展的对象。最初是选择钢铁、造船、煤炭、电力和肥料等工业部门。到六十年代，注意力转到汽车、电子、石油化学和电子计算机等部门上去了。被选定为发展目标的工业部门始终得到广泛的保护，理由是要给它们一些时间来获得内部的活力和外部的比较有利的条件。虽然按许多高标准来要求，这一些政策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而且并不总是成功的，但是许多强壮的婴儿由于保护得法而成熟了，这无疑也是事实。日本工业政策好就好在为最有希望的增长领域提供帮助。

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并不是战后时期的创新，而是有效地继续执行早在十九世纪就已采取的方针。最近，除了其它人以外，通商产业省有才能的官员一直是这项政策的主要制订人，他们一贯强调通过市场来制定政策。日本由中央制订计划的工作做得一般，至多能被称为是指示性的。成功取决于企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之间是否能取得广泛的一致意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和谐是以牺牲消费者和公众的利益达到的。增长、出口和投资是宠儿；社会经常费、福利和低价消费品就象小媳妇。这是批评者的看法，但是支持政府政

策的人也可举出充分的理由。首先，他们认为日本战后的政策是一种全国性的投资活动，大多数人到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就会得到好处。第二，他们断言，日本的工业政策使国家同时具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点。资本主义的主要优点是效率高，由于允许竞争和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就可以保证有高效率；同时，由于政府和企业界的关系密切而和谐，再加上实行合理而完整的政策，就可以在政治上对增长的进程实行相当大的控制。第三，他们辩解说，由于采取这种既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又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办法，就可以实行比较合于逻辑的、明确而一贯的工业政策，这种办法是“赶上（西方国家的）经济”的最好例子之一。日本根据西方国家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历史格局，有条不紊地选择了一些工业部门，并给予帮助，结果是日本的经济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变得更加成熟和先进。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综合经济的迅速增长所产生的某些有害的副作用，如环境污染和城市拥挤，成了日本和俄国所关心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在日本要严重得多。按日本的领土面积来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世界上最高的；在单位土地上进行的经济活动，比在任何其它国家都多。以噪音、水和空气的污染以及城市的拥挤来说，后果是严重的。此外，虽然两国政府的政策都强调最大限度地提高总产值的增长率，但是在日本用于社会而不是用于个人消费的资源特别缺乏。

增长和生产率

农　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而不是农业)的国民产值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总的格局，在日本和苏联是显而易见的。对这些部门中每一个部门的增长因素，都需要单独进行考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农业在日本和苏联都处于衰落状态。过时的技术和从殖民地进口的廉价的大米，一起挤压日本的农民，而在苏联，从1928年集体化开始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农业产量没有增长。在战争结束以后的年头里，农业部门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部分是由于较多地使用了现代科学技术，一部分是由于两国政府决心提高农业生产率。

日本从事农业、渔业和林业等初级产业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从1950年的百分之四十，下降到1970年的百分之十九。这一部门的产品现在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相应的生产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数。不过，这几个统计数字会使人产生一些错误的印象。虽然农业的就业比例仍比较高——美国约为百分之五，西德不到百分之十——但是今天日本的许多农民只劳动一部分时间，而且很大一部分劳动是由妇女承担的，常常是上一些岁数的妇女承担的。

俄国从事农业，包括林业但不包括渔业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仍比日本要高。虽然如此，所占比例已从1950年的百分之四十八下降到1970年的大约百分之二十七。根据西方不久前的推算，苏联的农业差不多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

二十五，因此农业产量的波动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很大。从1953到1958年，农业发展很快，从1958年以后，农业的增长速度慢下来了，这对苏联经济的增长率全面下降起了重要的作用。

日本战后农业最明显的变化是增长率加速了。在战争年代，日本的农民每年只能把产量提高百分之零点五。现在农业产量每年增长百分之三以上，比近一百年来任何时候都快。政府坚持保证国内的农业有利可图，办法是保护农民不受来自朝鲜和台湾的便宜食品的竞争和维持国内的高价格。

日本的农民还从比较低的投入价格中得到好处。迅速发展的肥料、农具、塑料薄膜和非常先进的经济的其它产品，都以优惠价格供应给农民。工业支援农业采取按照小农场现有的条件来改进机械和工程的形式，如改进动力耕作机。这些改进的结果之一，是大规模的经济单位正在日本农业中初露头角。它们的盈利额固然由于美国主持的土地改革规定了农场的规模（除北海道为十二公顷外，都是三公顷）而仍然受到限制，但是这些限制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

两国领导人决心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在日本，因为农民利用新的农业技术很容易，所以除了保护政策之外，他们不需要什么别的了。日本不象俄国，不可能在农业上做到自给自足，在当前的条件下，日本的农业没有真正比较有利的方面。从严格的经济前景来看，日本在大得多的程度上依靠比较便宜的进口食品更为合乎逻辑。然而，农业对执政的自由民主党来说仍然是取得政治支持的极其重要的源泉，它也是雇佣劳动的一个重要源泉。此外，日本不大愿意依靠外国的

食品来源。因此，政府的政策仍然是保护农业。

俄国农业产量提高得晚一些，而且由于政策相当多变而忽高忽低。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的头几年，即从1953到1958年，产量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六点八，或者说这五年里大约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农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自留地）的总劳动日增加不多，但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很快。集体农民的实际工资增加一倍——比城市拿工资的人增加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产量提高了。

同人们经常想象的情况相反，对农业的投资额比产量增加得快得多，结果是资本生产率大幅度下降。由于赫鲁晓夫大力推行"新开垦"计划，播种面积在这五年里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亩产也提高了，这主要是由于增加投资和肥料的数量，改变作物混种（"玉米计划"），或许也是改善耕作方法的结果。

从1958到1964年 即赫鲁晓夫垮台的那一年，产量的增长率是随着投入的增长率变化的，而投入的增长率下降了一半还要多。结果是产量的增长率从1953到1958年的每年百分之六点八，下降到1958到1964年的每年百分之一点七。此外，在遭天灾的1963年一年里，由于谷物产量锐减，苏联不得不从西方进口一千万吨谷物，以便勉强维持低得不能再低的食品供应水平。

集体农民的实际工资在1958年以后的五年里也仅增长不到百分之十五，这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无异是泼了一瓢冷水。还有一个与数量有关的影响是：使得农民，特别是年轻的，身强力壮的农民不安心务农。

农业投资的增长率在1958年以后下降了一些，虽然它还是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但资本生产率下降了。1958年取消机器-拖拉机站本来是有希望通过取消对农庄的双重经营来帮助提高苏联农业的效率的，但实际上可能反而促使生产率下降了。取消机器-拖拉机站以后，富有成效的拖拉机修理设施大大减少了。由于损坏的拖拉机得不到修理，再加上长期缺乏零配件，所以大量的拖拉机搁在那里开动不了。

到1958年，“新开垦”计划差不多已结束了，从而丧失了增长的源泉。在赫鲁晓夫要求增加产量的压力下，新开垦的土地连续不断地种植谷物，因此情况就更糟糕了。不久之后，新开垦的土地的产量开始下降。为了弥补这个损失，赫鲁晓夫在1962年开展他的“垦荒”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开垦了千百万英亩的草原并种上了费劳动力比较多的作物，如蚕豆、豌豆和甜菜。

赫鲁晓夫感到，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关键在于要有比较好的管理人员和改进管理方法。他连续不断地改变组织安排，力求在保持中央控制的同时，发挥地方的主动性。1958年以后，组织上的这些变化往往使党的官员的权力超过政府官员的权力，最后的结果是管理质量降低。他的继任者由于受政府内部农业利益集团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对农业政策作了一些修改：规定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每一年的年度谷物收购指标保持在常年的水平上，比前五年高不了多少；提高收购价格，对计划外的交售规定较高的价格以资鼓励；对农业的投资额增加了，1961到1965年占国家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到1969年则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六。1970年的产量增加了，但

是第二年的产量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在1972年（又一个灾难性的冬季），产量急剧下降，使苏联不得不再次从西方进口大批粮食，数量差不多达三千万吨。

将俄国的集体化农业同日本的小农结构比较以后，可以明显地看出苏联的制度面临的一些问题。虽然实行集中的计划可以迅速改善农村的工资结构，大量增加耕地面积和对作物的格局进行全面的改革，但是它也使政策经常发生急剧的变化，这对农业生产是有破坏作用的。在日本，政府的干预主要是在小农面临城市的变化和外国的竞争时保护他们，但是关于投资和作物种植的决定主要是由农民自己作出的。两国农业政策的这种差别，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那么悬殊的，因为苏联市场上出售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肉类、家禽和蔬菜是由集体农民在自留地上生产的，基本上是在中央计划结构之外的。

工　业

日本和苏联在战后年代都力求使工业产值高速度增加——它们取得的成绩也比任何其他先进国家的经济更大。在这两国之间，日本的工业增长得更快一些。从1953年到1972年，日本的工业产值高速增长，年增长率达百分之十三点一，而苏联的年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七点七。日本工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私人的巨额生产投资以及引进和改造外国的先进技术。

消费经济中的工业生产要求使用先进的技术，这种技术必须不断地予以更新，办法就是向其他先进社会学习新知识。

没有这种情报和技术的交流，工业技术虽然也能达到一定的水平，但是正象日本和俄国在它们处于与世隔绝时期的情况所表明的，工业结构越发达，单靠自己的力量来繁荣工业的可能性就越小。

引进技术对日本工业的增长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战后的经济与战前不同，日本自身在军事上的发明创造力的转移使战后的经济得益非浅。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曾被迫更加依靠它自己的潜力，这就为战后变刀枪为犁锌的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从三十年代起，到五十年代初期恢复日本主权的时候止，正常的国际关系遭到了破坏，这一情况使国际上最先进的实践和日本国内一般的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大大扩大了。在这十五年左右与世隔绝的时间里，日本的技术水平相对来说是下降了，因为少数几个不断掌握尖端技术的国家，在这一领域中取得的进步更为迅速。这么大的差距意味着，日本许多老的和公认的工业部门已趋落后，还意味着在起源于其疆域以外的全部新的经济活动中，日本是落伍了。在五十年代以后，日本一方面做全新的事情，一方面改进做熟悉的事情的方式。它能够这样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拥有经过训练的人力。

发明创造力的转移的长远影响往往受到忽视，因为这种现象的影响曾被认为只在短期内是重要的，其实不一定是这样。例如，1930年日本的机械工业规模很小，它只占制造业增值总额的百分之十九点七。从1930到1940年，机械工业的增值额上升到令人吃惊的百分之四十八，原因是清楚的。当时，政府大力提倡大量生产机器，因为这同生产弹药和军火有关。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人为的增长，牺牲了更多的民用产品的生产活动。尽管如此，机械工业确曾高度集中生产武器和类似产品，在这样做时，它确实得到了进行大批生产、发展技术知识和提高人们技术的机会。这种为了战争所作的努力，对刺激本国的发明创造力和技能可能是极为重要的。得到国际合作已越发困难，从三十年代末期起，日本人不得不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从技术观点来看，他们搞得很不错。日本的军械、军舰和飞机的质量，一般说来是不错的并具有竞争力。战后，机器的增值额急剧下降，到1955年下降到百分之二十点八的水平；甚至到1961年，它也只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三。

但是，至于发明创造力的转移，重要的是，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学到的和创造的东西，有许多转到战后有益的活动方面来了。飞机制造厂改产小型摩托车和小汽车。有些军火制造厂开始生产缝纫机。光学工业则广泛依靠在战争期间制造射击瞄准具、轰炸瞄准具和其他光学设备时学到的技术，研制各种高级照相机。原先在武装部队里担任负责职务的人，现在分散在日本各增长工业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日本战后对西方技术的依赖，可用支付专利费的数额来衡量，在1950年以后，这种费用迅速增加，从1955到1961年，平均年增长率达百分之三十三；此后这个增长率逐渐下降，到1966年下降到百分之七点五。随着技术差距的弥合，引进技术的增长率开始逐渐下降。这种技术同时应用到老的和新的工业部门。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战后日本发现它自己的各种比较老的和得到公认的技术，都落在世界上领先的国家的后面。这些都是战前有基础的工业——如工程、钢铁和化学制

品等部门——但是由于与世隔绝和战争，这个基础的质量下降了。至于从三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在一些国家诞生的“新的”活动，日本甚至更加落后。电视、许多合成制品和大部分其他科学技术战前毫无基础。日本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能够同时向两类落后状况开战。

这类说法很难用数字加以具体化，虽然日本人有几次试图这样做。据政府科学技术厅估计，在1956年，将引进的技术同时应用于新老工业部门的工作正全力进行。引进的技术约有一半是用来改进战争以前就有的活动的；另一半是买来建立全新的生产线的。到1966年，局面根本改观。战前的活动赶上来了，引进的技术仍然绝大部分是新东西。

日本工业的进步自然集中在那些技术进步和出口机会最有希望的领域。结果是，化学制品、机械和电气设备等工业部门在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比较老的纺织业的地位相对来说下降了。钢铁、日用电子设备、造船、汽车以及最近发展起来的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的成就，一般来说都同大企业有联系，而其中许多大企业同以前的财阀有种种关系。但是，日本工业规模的混合结构并没有消失。中小型企业仍然是——甚至在目前——很大的就业场所。大企业（雇佣工人五百名以上）在著名的工业部分中占统治地位，但是在食品加工业甚至在纺织业中，雇佣工人不到五十名的企业仍然占大多数。

企业规模的这种混合结构一直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经久不变的特点。这无疑同仍然存在——虽然日益减少——剩余劳动力有关，因为小规模工业为了生存必须实行低工资。日

本的工业在使各种规模的公司成为一个密切的整体方面，似乎也作得特别出色。大生产者广泛签订再承包合同和发放信贷，虽然可以认为这些安排一般是有利于规模比较大的伙伴的。尽管这样，这种密切的联系无疑有助于规模较小的企业取得较大的发展。

同日本的增长记录相反，战后苏联工业虽然增长得很快，但是它的年增长率却下降了，1950到1960年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1960到1972年下降到不到百分之七。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能达到差不多百分之七，这依然是十分高的，但是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工业增长率的下降成了苏联领导人关心的一个问题。

从有关劳动力与资本同时投入量以及同时投入的生产率增长的数据中，可以看出造成这种下降的原因。虽然工业投入的增长率只从1950到1960年的每年百分之六点一，下降到1960到1972年的每年百分之五点七，但是投入生产率的增长率却从前一个时期的每年百分之三点五下降到后一个时期的每年百分之一以下。因此，工业生产增长率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下降的原因，不在于工业投入增长率的下降，而在于投入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了，苏联的一系列情况不同于日本的经验。

造成因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这种下降的一个原因是苏联的军事和空间计划。自1958年以来，苏联军事计划的扩充采取了扩充尖端武器而不是扩充人力的道路。的确，武装部队的规模缩小了。他们非常强调研制新的先进武器，这就促使投资增长率下降，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军方占去了很大一部分

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最好的和最新的机器和材料。这对整个民用工业部门，特别是对那些正在进行技术改造，即正向使用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比较高级的商品过渡的工业部门，产生了削弱作用。这些工业部门无法得到它们所需要的训练有素的人员和新型设备。此外，在俄国，从军用生产转入民用生产的技术似乎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因素生产率还由于使工业劳动力迅速增加的种种方式而受到损失，虽然事实上达到寻找工作年龄的人只有一小部分。工业部门劳动力来源之所以能扩大是由于武装部队、农业劳动力、非工人（特别是妇女和青年）的人数和潜在的学生人数减少了。所有这些来源产生的影响是工业劳动力的质量降低了。

日本和俄国近几年都从其他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引进技术。日本引进技术，是为了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它在这方面已取得惊人的成绩，俄国引进很少一些，而且不那么有效，其目的是为了应付国内的需要。此外，苏联本国进行技术革新的力量，有很大一部分被国防工业占去了。

正象日本和俄国进入现代时期时，拥有熟练的和有文化的工人后备军一样，它们进入战后时期时也拥有受过训练的、合格的劳动力，它们的现代工业拥有可大可小的劳动力来源。中等的人口增长率使得农业部门能提供劳动力，日益提高的农业生产率使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当低的水平。

从1950到1970年，日本的经济在有些方面仍是双重经济：先进的工业部门与传统的小规模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以及农业并存。虽然战时死亡率高，但是传统经济部门有大量的劳动力可以提供，此外不仅还有从日本的殖民地回国的大量人力，

而且还有在战后婴儿激增时期出生的未来的新手。虽然工资增加的幅度有时相当大，但是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比工资提高得更快。在那些利用引进技术最多的工业部门，每件产品投入的劳动力成本下降了。

在苏联，工业经济的劳动力来源不怎么充裕。俄国战时的死亡率甚至还要更高一些，而战时出生率却很低；到五十年代末，参加劳动大军的人数是非常少的。

在日本，按企业工会系统划分的劳工组织是软弱的，体制上的安排对资方有利。尽管如此，如前面指出的，许多日本产业工人仍然据有“终身雇佣”的地位，这给了他们某种形式的职业保障。它也减少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和业主同工人签约的必要性。日本特有的这种劳资关系制度经常被称为“家长式的”。虽然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但应当承认，双方都得到了相当大的经济利益。

苏联的劳工组织在制度上也对企业领导，也就是对政府有利。苏俄的工会不是在同企业领导发生冲突时代表会员利益的独立组织。相反，它们是政府在奉行它的政策(使经济高速增长)时动员劳工的工具。譬如，工会设法通过在各企业间、企业内部以及车间和个人当中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来刺激工人增加生产。近些年来，苏联工会为了维护它们在工人中间的信誉，从而维护它们对政府的使用价值，在处理因评定技术等级、奖金、降级、解雇及有关问题而发生冲突时，比较保护工人的权利了。

服 务 业

人们普遍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服务业——商业、金融、公共管理、卫生、教育、娱乐以及为个人、家庭和企业服务的工作——的作用相对来说越来越大了。有关发展的数字证实了这种看法，正如前面表16.1中提供的日本和俄国的数字证实了这种看法一样。然而，日本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较大，日本和俄国在服务业方面存在着差别，这些都值得注意。对六十年代初期以来的数字经过仔细研究以后可以看出，日本服务部门劳动力所占的比重，比人们预料的与它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任何国家都要大，苏联所占的比重则比人们预料的要少得多。这应如何解释呢？

服务业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相应增长是供求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在需求方面，随着消费者收入的增加，他们花在服务业方面的款额，同他们多花在农产品和制成品方面的款额相比，增加得比较快。第二，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愈加趋于专业化，内部的环节也增加了，对服务业的需求，特别是对商业和金融服务的需求同样增多了。第三，为了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造成的需要，政府用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卫生、教育和福利——上的开支有提高的趋势。在供应方面，由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低，吸收到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比吸收到制造业的劳动力要多，最后，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供求因素。城市居民需要多种服务——银行、商店、房地产办事处、饭馆——而他们自己又是潜在的服务业工人的来源。

对这些因素在日本和俄国怎样起作用这个问题进行广泛

的分析，不是本书研究的范围，但是在对日本和俄国的服务部门作简要的比较过程中，对它们可能有所提及。日本的服务业所占的比重高于与其发展水平（以按人口平均收入、城市化程度和参加劳动的人所占的比例来衡量）相适应的标准，俄国低于此标准。如果人们先把服务部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商品和金融，另一部分为其他服务业，然后再把每一部分细分，那么两国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就会显示出某些有意思的和意外的细微的差别。在日本，商业和金融业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标准，但是在其他服务业中，劳动力的比例差不多正好符合与其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标准。就俄国来说，情况相似，但要颠倒过来。此外，如果对两国的商业和金融业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作直接比较，那么可以看出，日本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比俄国高出两倍还要多（百分之十七比百分之五）。

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同私营企业的作用和工业的组织结构有关系。日本的私营企业提供了许多小规模的商业服务，在苏联显然不是这样。而且，在市场经济中，金融部门从个人储蓄者手里吸取资金，在投资者中间分配这些资金，然后再把投资的收益转到储蓄者手里。在苏联的经济中，这些活动的第一项和第三项几乎是完全没有的，第二项用集中的方式处理，一般是按照既定的计划来掌握的，因此不会发生经过调查再作决定的重大活动。再者，苏联经济中的批发供应系统比日本要小，因为在苏联的计划和控制系统中，公共管理机构接管了批发贸易的许多职能。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工业中公司之间的关系很不稳定，因为俄国的公司一般说比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公司规模要大，自给自足程度较高，因此通过供应

系统进行联系的环节比较少。

作为这些因素在俄国发生作用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公共管理部门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在苏联比在日本和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要大。不过，这并不是实情。这个比例在苏联约为百分之二点五，在日本为百分之四，在美国为百分之五。此外，认为苏联的工业中"隐藏"着额外的行政管理人员，这也不是实情。苏联工业中管理人员所占的百分比，低于日本和其他经济先进的国家(虽然单以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说，苏联的百分比要高得多)。虽然普遍的看法与此相反，但是苏联国内外的看法是，在苏联的经济中，管理人员比较少，这可能是苏联的管理水平低的原因。

使得苏联服务业水平比较低的，一个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一般把服务行业看作是非生产性的，攻击商人是投机商。在苏联，由于马克思轻视服务业，所以商业和大部分其他服务行业的工人得不到尊重，工资低微。在日本，态度则十分不同。日本人有提供优质服务的悠久传统，对服务部门的文化艺术和有关方面，有很高的欣赏力。所以，日本的服务业工人比他们的苏联同行要受尊重，工资也比较优厚。

不过，有一个服务部门(公共卫生、教育和福利)，苏联超过日本。在苏联从事教育和科学工作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很大，为日本的两倍以上，甚至比美国还要大。苏联卫生和福利部门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也超过日本，虽然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在卫生和福利方面承担的义务较少。

苏联公共服务业劳动力所占的比例比较大，这个事实说

明，苏联政府早就承认了这些服务行业在经济上也是生产性的。这些服务行业是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同世界经济的关系

日本和苏联的经济制度之间最明显的差别大概在于它们同世界经济的关系方面。这些差别包括它们在国际上的经济力量、对对外贸易的态度、对贸易的管理和贸易与国内经济的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的不同。

在过去二十年中，日本的出口额迅速增长——甚至比产值和世界贸易额的增长还要快——所以它在世界商业中所占的份额也增加了。进入国际贸易的产品质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造”是质量低劣的同义语；最近，“日本造”意味着设计先进，做工精致，价格低廉。战后的形势还把消费者瞩目的产品——小汽车、照像机、计算机等等——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最近几年中，还发生了对世界经济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另一个变化。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日本始终保持着国际收支长期出现逆差的趋势。从1968到1972年底，日本取得了顺差国的地位。不过，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其他原料的日益短缺，已对日本保持收支平衡的能力造成威胁。

日本在国际上的经济力量目前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但是实际上，从日本的历史趋势来看，日本的经济是比较着眼于国内的经济。譬如，出口额在总需求量所占的比例曾从1907年的百分之五点五逐渐上升到1937年的百分之十七，

但是到1955年，下降到百分之九点四，到1965年仍然仅占百分之十三点六。同样，出口增长额在总需求量的增长部分中的比重大大低于战前的水平：三十年代占百分之二十七，而六十年代占百分之十五。但是，如果考虑到日本进出口的性质，这种减少对外贸的依赖的现象是并不奇怪的。日本的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兼有几个使它在历史上具有独特性的特点：大国（人口超过一亿）；没有原料的富国（许多极为重要的天然资源依靠进口的比率超过百分之九十）；经济发展的速度比大部分其他国家快得多（至少快一倍，经常是快两倍）。这种同时兼有这样三个特点的不寻常的情况，是由于原料进口和制成品出口集中引起的。伴随而来的是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因此，到1971年，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出口货是制成品，同样比例数的进口货是食品和原料。

这样的发展大体上持续了二十年，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日本一直是成功地出口日益先进的产品的国家，因为现代工业在庞大的国内市场、政府的保护政策、得来容易的外国技术和有利的储蓄投资条件的帮助下迅速成长起来。再者，战后年代的出口价格稳定，而大部分其他价格却上涨了，这说明降低成本的技术在出口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市场对其他国家的制成品从来都不是特别欢迎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日本奉行保护新建工业的政策，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许多制成品达到成熟阶段以后很久；同时也由于日本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出色，其他国家的产品难以与它们竞争。无可怀疑，日元定值过低也起了帮助作用。在日本长期出现顺差面前，这些因素逐渐导致国际上日

益强烈的抵抗，这是并不奇怪的。这种抵抗表现为其他国家要求（日元）升值、进口国家中间发出保护主义的威胁，和坚持要求扩大通往日本市场的渠道。

随着出口问题而来的还有进口问题。资源消耗的增长率已加速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许多必需品百分之百地依赖进口，许多其他必需物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依赖进口。日本经济的飞速增长意味着，它对世界资源的胃口确实已变得大得惊人。在1969年，日本消耗了“自由世界”石油的百分之九、铁矿石的百分之十六、锌的百分之十六和镍的百分之十九。如果将来按当前百分之十的速率进一步增长，显然将造成更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在七十年代初期，世界的许多部分对于日本对原料的需要量已经感到很紧张了，1973 年底到1974年初的那个冬季的能源危机暴露了日本在这一方面的不稳定地位。

与此相反，苏联对对外贸易的政策直到最近不是鼓励它的增长而是减少它的增长，以便减少俄国经济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那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的依赖。这一政策与人们常说的“闭关自守”政策不完全一样。因为当短期内有必要靠进口来完成一项计划时，这就非进口不可了。由于采取这种态度，出口被看作纯粹是为了支付必需的进口货而不得不做的坏事。长期的政策则是提高国内的生产能力，生产通常为完成生产计划所需要的投入，避免对两方的依赖。实行这种改革的预期结果，特别是对象苏联这样拥有多种多样的资源基地和众多人口的一个横跨大陆的国家来说，就是对外贸易的水平比较低。而且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苏联的贸易额在三十年代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确曾下降到极低的水平。

从五十年代起，这种主要由于政治原因而厌恶贸易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对社会主义集团内部的国家，因为在它们中间据说洋溢着友好气氛；其后是对先进的工业国家，因为军事安全感日益增长，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敌意减少了。苏联的对外贸易额在战争以后开始上升。到1950年，贸易额为1930年的三倍，在以后的十年里又翻了一番。不过，苏联的出口额与国民产值的比例仍然是低的，大大低于日本，虽然这一比例已从1938年的百分之零点五上升到五十年代末的百分之二点五左右和六十年代末的大约百分之三。

在战后的头几年里，苏联主要是同其他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1955年同共产党国家的贸易几乎占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八十，而同西方工业国的贸易只占百分之五。后来，同非共产党国家的贸易开始相对地增加得比较快了，到六十年代末，苏联同共产党国家的贸易占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五，同不太发达的国家的贸易占百分之十三，同先进的工业国的贸易占百分之二十二。

六十年代苏联贸易的商品组成与日本大不相同。苏联主要进口机械和设备（约占百分之三十五）以及消费品（约占百分之三十）。大约百分之七十五的机械和设备是从东欧进口的，其余部分是从先进的工业国进口的（从工业国进口的货物百分之四十是机械和设备）。进口的消费品有将近一半是食品，这个百分比随着苏联农业产量的变化而变化。（正常年景，俄国是个谷物纯出口国，大部分是向东欧出口。）制成消费品的重要性增加了，其中大部分来源于东欧，但是到六十年代末，来自西方工业国的制成消费品愈来愈多了。

苏联在六十年代主要出口燃料、原料和半成品。这些项目占苏联对西方工业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它们在苏联对东欧的贸易中也占支配地位，虽然它们在这十年里从占苏联对这个集团的出口总额的大约百分之七十下降到大约百分之五十五。同时，苏联向东欧出口的机械和设备从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十三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二。苏联出口的机械和设备，大部分是向东欧出口，其余部分是向不那么发达的国家出口。石油的出口量在六十年代增加了一倍，这主要是由于向先进的工业国的出口量增加了。到七十年代初，俄国将其原油总产量的大约百分之二十用于出口，它出口的石油和石油产品差不多有百分之四十五销往工业国家。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外贸易对日本战后经济的增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不论从进口先进的外国技术来说，还是从发展出口工业来说，都是这样。这一进程在苏联则远不是那么明显。苏联的贸易由于上文所指出的采取不依赖的政策和由于西方工业国施加种种限制而受到阻碍。不过，除此以外，来自贸易的好处也由于苏联集中计划制度的某些特点而受到了限制。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统一由中央来作，加上把尽快发展经济当作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这些都导致了把重点放在进口上而使出口遭到损害，并形成了进口和出口是相互依赖的观点。这样一种政策认为贸易是物物交换，它反过来又鼓励双边来往。由于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内部价格的混乱性，这些发展就显得更突出了。苏联制订生产计划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形的、事先设计好的投入-产出关系。然而，在决定应当用什么样的出口货作为“投入”来“生产”

某些需要的进口货("产出")时,是不能采取这种办法的。关于出口货的选择和出口水平的决定,要求采取与苏联生产计划人员进行设计的作法很不相同的方法。对这样一种作决定的体制来说,国家的价格(或者说由价格提供的情况也一样)是需要的,利用价格的办法也是需要的。苏联人正开始探讨这些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大力依靠双边易货协定,出口传统产品和他们大规模生产的某些工业品。

妨碍苏联有效地进行贸易的另一个因素同苏联计划人员在编制计划时遇到的困难有关,即使进行高度的合并,这些内部连贯的计划也包括千种以上的产品。改变对外贸易计划或活动会打乱保持收支平衡的进程,因而计划人员本身可能就有意贬低贸易的重要性。外国人不得随意购买苏联的商品,因为这样会打乱计划;此外,苏联的计划人员不愿意按他们不合理的内部价格出售商品。这种"商品的不能转换性"乃是造成货币不能兑换的因素之一,这反过来又成了苏联贸易的多边安排水平低和贸易收益减少的原因之一。

更为直接的是,苏联经济的管理体制和现行的经营刺激制度妨碍了进口外国先进技术的工作。苏联对外贸易的主要经营单位是各对外贸易组织,它们是对规定的各类产品的进出口拥有垄断权的,独立核算的法人组织。目前,这些单位大概有五十家,其中一半以上经营机械、设备和仪表产品。进口外国商品的苏联企业同外国公司的一切贸易谈判都由它们进行。此外,上面谈到的经营刺激制度鼓励苏联的经理们不要革新。部长们要企业经理人员采用新技术本来就够困难的了,由于在引进外国技术时,要受一个独立的机构即对外贸易机

构的干预，这就更困难了。不仅这种安排不方便，而且对外贸易机构有它自己的，脱离其苏联委托人的刺激标准的刺激标准。可想而知，这样一种局面产生的工作态度并不总是有助于有效地选择、寻求和应用外国先进技术的。

俄国在那些由先进技术占支配地位的世界市场上，一般是没有竞争力的，一个原因是并没有为了要苏联的公司向世界市场销售产品而对它们施加竞争性压力。相反，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评价公司的生产成绩只看它们是否能完成计划当局制订的生产指标（在最近期间，是完成国内销售和利润指标）。此外，在苏联的计划制度下，重点是放在产值方面；各公司始终是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经营的。产品的销售是有保证的。在这样的状况下，产品质量低劣，从而在那些必须保证质量的领域里影响了出口的发展。而且，对只注意实现迅速增长的目标的经济进行集中指导，助长了苏联经济的内向性，也就是说，满足国内计划经济的需要是压倒一切的。在这种状况下，引进的外国技术只用在满足国内经济需要的工业部门，而不是用来发展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出口工业部门。

日本和苏联同世界经济的关系的一个根本不同点，在1973年石油危机中清楚地显现出来了。这次危机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原料不足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危机，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只是逐渐承认这种危机对它们的继续增长是一次重大挑战。对日本来说，阿拉伯的石油禁运无疑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灾难。

到七十年代初期，日本在能源、冶金原料和食品方面，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已变得非常之大，并有愈来愈大的趋势。日

本从政治上作出了反映，办法是降低资源消耗率、提高利用核能的能力、同中东国家签定建造石油化学和其他大规模企业的合同作为赚回它的石油开支的手段。一方面，这次危机对石油和大部分其他原料都自给自足的苏联经济的主要影响，则是它的进口货（由于其贸易伙伴的通货膨胀）和出口货（石油和黄金）的价格都提高了。这些情况几乎肯定使它得到了好处。

国际比较

下面表16.2中的数字说明了日本和俄国的经济同世界上几个高度发达的国家的经济的对比情况。表中还有它们1972

表 16.2　国际比较 1950—1972

	日本	俄国	西德	法国	意大利	英国	美国
增长率1950—1972（每年的百分比）							
国民生产总值	9.9	5.4	6.0	5.2	5.2	2.5	3.8
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	8.7	3.9	5.0	4.2	4.6	2.1	2.3
比较水平							
1972年国民生产总值（十亿美元）	341.0	548.7	292.0	220.8	118.4	152.3	1155.0
1972年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	3218	2217	4736	4269	2179	2731	5532
1972年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	36.5	32.4	26.5	27.4	20.2	19.0	18.6
1972年劳动力的分布（%）							
农　业	15	26	8	13	18	2	5
制造业	43	45	56	46	49	51	36
服务业	42	29	36	41	33	47	59

年的对比数字。从这些数字中可以明显看出，日本经济的增长率从1950年以来一直很高。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九，按人口平均计算，每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七——大大超过其他先进国家的经济达到的增长率。日本保持的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值增长率说明，按人口计算的产值在不到八年半的时间里翻了一番。苏联经济达到的增长率，虽然只有日本增长率的一半，但是按世界标准来衡量，也是不低的。苏联的增长率同法国和意大利相等，低于西德，但高于美国和英国。可以看出，日本和俄国的经济增长率高的一个原因，是它们的投资率高。

最后，国民生产总值和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以及最近期间各部门劳动力分布的数字表明，七十年代日本和俄国的经济已同先进国家的经济处于同等水平。在总产值方面，俄国占世界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占第三位。按经济发展的其他指标（按人口平均的产品和劳动力分布）来说，日本的经济显然达到了高度现代化的水平，苏联正接近这一水平。

第十七章　社会的相互依赖

在日本和苏联，过去的三十年可以划分为时间大致相等的两个社会变革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极大的努力来进行几乎是无限的战争动员的时期，这是努力要求人们每天作出的牺牲，也许比这场使人穷财尽的战争中任何其他交战国所采取的措施要求人们作出的牺牲还要多。接着是紧张的重建年代，在这些年头里，战胜国的重建工作取得成绩稍微要快一些。在五十年代以后，各个家庭由于渐渐习惯于拿比较多的薪金，于是就把注意力转到采取高度现代化社会所特有的那种消费和过悠闲生活的新方式。他们甚至比以前更加急于设法把他们的子女安置在教育阶梯上令人向往的那一级上。他们不再遇到人口增长过快、二重的工作形式、城市化的速度快得危险，或者落后的乡村条件等问题。这些因素作为人们考虑的大问题，已开始逐渐淡薄，甚至完全消失了。现在人们越来越关心的事情，已集中在谋求更为满意的职业、享受城市环境、得到现代化的舒适生活条件这些方面了。

要回顾战后日本和俄国的社会差别，得从战败和占领对日本的各种制度，如土地所有制、教育以及包括继承权和婚嫁在内的家庭习俗的影响说起。换句话说，日本的社会习俗在四十年代后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发生这些变化之后，出生率和农业人口迅速下降，农业人口先是下降到占劳动力的三

分之一，后来又下降到仅占劳动力的五分之一。总之，日本正在取得一个高度现代化社会的种种特征。到六十年代末，消费社会的特点在日本远比在苏联明显。

胜利使得苏联在三十年代开始使用的方法重新得到肯定，但是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许多极端的作法不再继续使用了。苏联逐渐从内部进行改革，许多苏联人甚至比日本人更害怕恢复以前的种种作法。对于到国外旅行、出版和集会自由的许多限制，实际上并没有作根本性的改变。从离婚率和劳动力流动率比较高这一点可以看出，苏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脆弱，苏联的办法是由政府承担更大的义务，包括成立日托托儿站、国家发津贴、高等教育与保健收费很低或免费提供等，来调节这种关系。尽管这样，农村人口仍然比较多，比较贫穷；在六十年代，以建设共产主义的名义普遍推行的那种单打一的工作方式，继续使人明显地采取唯唯诺诺的态度。相反，在日本，大学青年在离开家庭那一段捉摸不定的时间里则公开进行反抗，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公开不满情绪，在他们找到工作以后不久也就消失了，他们一旦在一家公司找到工作，就有可能干上三十年。

人力资源

对人口特征进行的最后分析表明，两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在战后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生率上升了，此后，两国的自然增长率都从大约千分之二十下降到不到千分之十。日本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比较早地规定堕胎为合法以及结婚的平均年龄增加。苏联的出生率

虽然下降得比较慢，但是下降的时间持续得比较长，直到两国出生率差不多相等时为止，但是苏联的许多非斯拉夫民族仍保持着很高的出生率。出生率下降的原因首先是，在日本和俄国的城市居民中，越来越多的人决心要少生孩子。在苏联，由于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所以在1950年以后的二十年里，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日本。虽然苏联通过兼并别国领土人口有所增加，但其总人口由于战争中的大量死亡，在1950年曾下降到仅仅为日本八千三百万人口的二点二倍。然而，到1970年，苏联人口接近二亿四千多万，而日本直到不久以前才超过一亿，这样两国差不多又恢复到了以前的差距。日苏两国遭受战争破坏的程度多少有点相似，在长期内人口变动的情况也十分相似，所以它们在以下一些方面彼此颇为相象，这就是单身老年妇女非常多、家庭的平均人口下降、新进入劳动大军的人数令人不安地减少（战后出生的婴儿长大成人的那几年除外）和人口的平均年龄低。

虽然两国的人口合起来不到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但是以受教育和受训练的年限和以职业分布的情况来衡量，它们人口的素质则在逐步改善。譬如，在1939年，俄国只有百分之八的工人受过七年以上的教育；三十年之后，这个数字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农民和职员的平均文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大部分在中学时期失学的人因缺乏技艺而得不到晋升，这些人中包括：作为德川时代最低贱的集团的残余而仍然受到非正式阻挠的百分之一的日本人中的许多人和苏联某些少数民族的成员。但是对那些在校学生来说，通过考试来显示卓越才华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在战后的日本，一些身居高位的人受到整肃，财阀解体，大地主或在外地主所拥有的土地事实上被没收，因此，社会阶级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些变化中的有些变化，使得日本的情况更加接近于俄国的情况，虽然小地主和小商人的长期存在以及大公司的恢复，说明两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日本在农业人口的下降方面一直远远地走在前面；事实上，从1940年以来，农业劳动力在日本劳动力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已减少一半以上。主要门路是进入第三产业，而不是象在苏联那样进入第二产业。农村中只用部分时间务农的家庭大大增加了，大部分农活往往是由妇女和老年人干的。不过，在日本的城市地区，从事劳动的妇女比俄国少得多。

两国进行的种种改革，缩小了工资差别，苏联有意在各方面缩小差别的次数比较多，但是可以到专设商店购物等工资以外的差别，还是把苏联的上层人士与其它人区别开来了。一个有助于缩小工资差别的因素是，苏联放弃了计件工资制而实行计时工资制。俄国还实行并扩大了最低工资制。白领雇员人数继续增加，在国内移居的机会增多，在这两方面可以找到两国的相似之处。白领雇员的继续增加主要是在大公司，国内移居的机会增多在日本是由于取消了对长子继承权的法律保障，以及由于农村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减少，日苏两国则是由于劳动力日益缺乏，这对新就业者是有利的。迁移在日本是不受限制的，但在苏联，迁移仍受各种各样的限制，这影响了人们离开集体农庄和在莫斯科等若干大城市定居。

由于连续二十年不断增加工资和其他收益，人们普遍出现了要求增加消费的倾向，并且对政府作出的有关福利事业

和私人机会的决定的种种缺点十分敏感。在战后时期，日本实行了现代的社会福利政策，虽然大大壮大了的工会施加种种压力，但是这些政策仍然没有多大的实质性内容。个人发生困难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得靠家庭成员和企业基金给予接济。在日本，男子退休年龄通常为五十五岁，比苏联规定的退休年龄早五年左右。由于退休年龄比较早，两国现在都面临着劳动力缺乏，迫切需要重新雇用退休工人的局面。免费的或由政府提供大量补贴的公共服务事业在俄国发展得比较快，社会工资（即不在个人工资中发放的福利费）现在已增加到大约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大部分用在养老金和教育方面。社会工资为苏联公民提供了公共服务，而在日本，这些公共服务有很大一部分需要由私营部门提供。在这两个国家，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会工资，有很大一部分是按照与就业有关的标准分配的。

在消费时代，重要的不仅是消费者要花多少钱，而且是他或她把钱花在什么方面。在苏联，房租和交通费都是非常低的，而购买食品的开支却占了家庭预算的一大部分。不过近些年来，由私人合资兴建的住房工程造起来了，使得那些长期等待分配既很缺而又很狭小的住房等得不耐烦的人，可以用他们自己的钱来盖房子了。由于住房匮乏，加上小汽车价格昂贵又不好买，这就特别限制了青年人和上了年纪的人同家人分开过活。近来，红利作为一种支付形式在俄国已逐渐不多见了，但是日本工人却要依靠一年两次数目可观的分红来为将来退休、孩子上大学和为象购买住宅、小汽车以及现代化家庭用具的初期付款这样的巨额开支而储蓄大笔的钱。日本

供消费者挑选的优质商品、花色品种比苏联多得多。不过，由于大城市里房租很贵，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住不起那些比俄国的公寓房子高级得多的公寓房子。由于工资的多少在非常大的程度决定于资历的深浅，所以许多年纪比较老的日本雇员薪金很高，而苏联年纪比较老的工人，由于文化程度没有最近培养出来的青年高，所以得不到这样高的工资。毫无疑问，日本那些靠工资生活而快要退休的人，就是靠这些重视经验的差别，来保持对家庭成员，甚至对那些不在家中居住的成员的某些控制的。

总之，这两个国家已具有高度现代化的明显特征：人口增长率低、职业分布有利于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中等教育已差不多普及、进入大专院校的升学率高。它们已成为接近成熟的消费和福利社会。在最后实现这些特征的进程中，日本比较快地为许多家庭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方便条件，但是苏联已实现了它的某些诺言，部分地提供了名目特多、收费很低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向它的城市居民提供这些服务。尽管两国有这些相似之处，但是今天表现出来的盛行消费主义和无与伦比的福利主义的形象，却是大不一样的，而且并不完全准确，由于顾此失彼，哪一方面也没有使人深感满意。

居住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城市生活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之间一直存在着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越来越大。战后在城市大众实现高水平消费之后，这种变化产生的后果引起了公众前所未有的注意。在日本，由于政府对稻谷的价格补贴不断增

加，村民从事收入较多的非农业劳动比过去容易了，所以城市和农村生活水平的差距开始日益缩小。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成了商贩，把日常的农活交给不大适于找职业的家属去做。苏联的农民由于远离各主要城市，另找收入较多的职业要慢一些。现代耕作技术发展缓慢也是劳动得不到解放的一个因素。不过，为集体农庄庄员确定了最低工资。此外，国营农场的发展损害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场员的文化程度较高，固定工资也较高。今天，苏联有百分之四十的人不住在城市里，他们十分均匀地分属于这两种形式的农业综合体。

在这两个国家，乡村在这种新兴社会里的地位问题并未完全解决。自治村显然已经消失。苏联人首先用三十年代的集体化敲响了它的丧钟，但是日本人从战后土地改革以来行动得很快，因为以大于村庄的地理单位为基础的共同利益组合发展了，它们共同拥有许多生产因素，并对它们进行指导。现在甚至连长子都离开家庭到日本的城市里去挣比较高的工资，这一事实说明，正在进行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不过，在日本，人们普遍承认，存在的问题是小块土地的制度化妨碍了为使用现代耕作技术而有效地集中土地。在苏联，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任务比日本麻烦得多，因为自留地还是非常重要的，使人很难办，早该实行的对农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计划能否成功还很难说。在苏联，发动知识青年回乡用他们的技能解决农村的问题这项工作仍然特别难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急剧下降。日本和俄国的城市居民的人数在战争结束后短期内下降之后不断增加，在四分之一世纪内翻了一番还多。日本在

城市人口的增长方面一直走在前面，在全国一亿多一点的人口中，有七千万人住在城市，全国有一半人口住在拥有十万或十万以上居民的城市里。全国百分之四十五的居民住在从东京到大阪的人口密集的城市化地区，受过高等教育和新找到职业的青年在这个地区所占的比例甚至还要高。城市越大，市区面积扩大得越快。日本确确实实已成为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稠密的社会。

和自然增加率一样，城市化的速度在苏联也落后了大约十年。到了六十年代末，苏联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才下降到百分之二左右。到这时，苏联的城市人口在三十年中差不多增加八千万人。1939年，苏联十万人口的城市仅有八十二个，而到了1970年，这种城市的总数已达二百二十一个，远远超过日本现有的一百三十五个的数目。当然，虽然苏联的城市居民比日本多一倍，但是苏联至少还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把它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安置在城市。

由于合起来增加了一亿一千多万城市居民，两国的城市问题已达到爆炸的程度。几乎所有的城市居民现在都住在一排排的公寓房子里，虽然在雨后春笋般地新建的市郊卫星区，特别是在日本，不那么拥挤的住所是可以找到的。现在各城市都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首先是污染日益严重、娱乐设施稀少和公共交通拥挤不堪等问题，这些问题看来是人们对最近的将来感到严重关切的问题，在日本尤其如此，虽然公共交通设施令人羡慕，犯罪率比较低。

加速城市化显然曾给日本带来过好处，但在城市问题越来越多时，加速城市化看来可能已经成了坏处。日本国土的

面积小，但人口稠密，它非常匆促地使农村和城市一体化。为了几乎使每一个人只要乘几小时高速列车就能到达国内几个大城市所作的努力差不多已经完成。与此同时，在苏联辽阔的领土内，地区差别依然存在，有些地区的自然增长率仍然很高，农村人口甚至继续增长。如果苏联人对于认为城市规模越大生产率就越高的那种不容置辩的说法，能够找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那么他们看来就比较能够把他们庞大的计划力量有效地用到规划新城市和城市网的工作上去。

组织结构

战后，在家庭结构、经济企业和行政管理部门内部发生的变化，反映出日本的组织机构出现了民主化，苏联的组织机构出现了非斯大林化的趋势。

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有关家庭的法律条文都作了修订。家长的法定权力和责任取消了；平分遗产取代了长子继承权。现在，所有子女，而不仅是长子或长女，都有责任赡养他们年迈的父母，妇女得到在各个方面与男子平等的保证。虽然并未因颁布新的法律而使离婚率提高（在苏联，离婚率提高的现象越来越多），但是这些法律使得妇女有可能主动提出离婚，并且加强了独立的核心家庭，使得青年夫妇比较容易脱离父辈的家庭，削弱了长辈和晚辈家庭之间那种等级关系。同时，家庭的许多传统作用保持下来了。丈夫不在家里消磨闲暇时间，包办婚姻继续盛行，未婚夫妇在婚礼举行之前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态度仍然是比较保守的。

妇女解放道路上的障碍在这两个社会中性质是不同的。

苏联的妇女在许多方面已获得解放。一位苏联白领雇员的妻子往往在医务和教育等部门担任负责的、但报酬一般并不优厚的职务。她的问题仍然是如何说服丈夫分担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使得双方都有闲暇时间。然而，一位日本人的妻子却由于她的赚钱能力低得多而受到限制。实际上，给她对家庭和孩子的特殊控制权是为了不让她要求有平等的工作和享受闲暇时间的机会。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双职工家庭在苏联已成为现实，在日本则没有。同其他现代化社会比较起来，一个不那么明显的相似点是，俄国和日本的夫妇与众不同，他们常单独过活——在苏联是因为双方都有有意义的工作；在日本则是因为丈夫不住在家里。

自五十年代以来，在这两个国家衡量一个人成就的大小主要看他薪金的多少。日本人都希望得到"职员"的职位，得到了这种职位，他就能得到优厚的而且不断提高的工资，工作就有了保障，并可从本职工作以外的活动中捞外快。在小公司里，家长式的经营方式仍然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希望在一家大企业里终身任职的愿望，也会使职员对该企业非常忠诚。苏联寻找职业的年轻人也非常关心他们的薪金，但是对某一家公司没有同样长远的情感。如果他受过专门教育，他首先必须尽义务到国家分配他去的地方劳动两年，这是一种向谁也不愿意去的地区提供劳动力的办法。之后，他可能暂时被西伯利亚或北方的高工资所吸引；不过，那些地方由于生活条件很差，所以劳动力的流动率很高。在日本同在苏联一样，劳动力一向供不应求，不存在长期失业的问题，现在是非熟练劳动力逐渐减少，人们更加愿意到大机关找拿薪金的职业的时代。

减少使用劳改犯，减少对旷工的惩罚和采用增加物质刺激的各种办法，这些都是非斯大林化的非常明显的例子。不过，国家对个人一生中的重要决定仍进行种种控制，在这方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行使无限权力的党和国家机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使得个人循规蹈矩。它们可以不让一个人得到提升，或不让他做本行工作；它们可以不批准他在他所选择的城市里居住；它们可以使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员很难继续做他们的工作或继续受教育。对党的决定不给予盲目的、冠冕堂皇的支持，这仍然是一种严重的罪过。对于那些在政府、教育和艺术等易受责难的部门担任职务的人，以及对于那些还在学校学习的人尤为如此，因为在校学生很容易被剥夺升学的机会。出版、同外国人保持接触和到国外去旅行的机会，在这个控制很严的社会里都被看作是特权。不久前限制犹太人晋升的种种规定，就是证据，说明这一整套控制办法是怎样加以应用的。

在日本和苏联，有组织的人员必须保证克服城市居民那种暗地里磨洋工的毛病。为了报答公司对他们的家长式的保护，日本人必须不遗余力地进行劳动。尽管战后的批判已使人们不愿为实现私人企业的目标而卖命，但是人们普遍与工作单位和衷共济的感情一直保持到现在。在苏联，理想的劳动关系的象征是“共产主义星期六”，在那一天，人人劳动不拿报酬来显示全国目标的一致。虽然许多人把这些并非经常的义务劳动日看成是一种负担，但是集体劳动的成绩和国家的成就以及按“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付给个人的报酬，甚至比在日本更加被赞誉为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当然，与此

同时，常常用“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来说明不允许有越轨行为、进行无休止的思想灌输和偶然给予残酷的惩罚是正当的。

重新分布的过程

在最近几十年里，日本和俄国的迁移率和流动率一直很高，虽然苏联有些少数民族一直是很少迁移的。战后日本的土地改革是一次最彻底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在通货膨胀的那几年里就差不多消灭了佃户，没有造成长期偿付的负担，没有流血，也没有造成恶感——这些情况在早些时候俄国改革土地关系时都出现过。除了日本在四十年代后期进行的这次改革外，两国都没有作过任何明确的努力来改变阶级关系。

今天，在这两个社会里，存在着对社会流动和地理上的流动至关重要的三个决定性的时机：入学考试、第一次选择职业以及挑选配偶。所有这些决定通常都是在五年或十年的时间内作出的。这两个社会的上层人士都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使他们的子女有较多的机会通过入学考试和获得如意的职业。比较有钱的苏联人和日本人都让他们的子女从小就上名牌学校，在他们参加最困难的入学考试之前，对他们进行特别辅导。在日本，考试是笔试，但在俄国是口试。高等院校还要单独考试。

日本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的毕业生在某些方面有特殊的有利条件，虽然最好的大学是公立大学。在苏联同在日本一样，私人关系，包括事先就与身居高位的人拉关系，对于找到好工作可能是特别有用的。在这两个国家，在学术界和其它各行各业都存在着非正式的赞助人及其追随者的集团。在苏

联，这种垂直关系对于保证政治上的可靠常常是很重要的。

婚姻时常被忽视而没有被当作造成流动的一个因素。通过精心选择配偶（在日本往往通过变相的包办婚姻），一辈子的前程可能因此飞黄腾达，也可能因此遭遇坎坷。对一个如意的配偶的身分进行相当仔细的盘算这种现象，很可能在这些国家都存在。在这些国家，新婚夫妇如果希望留在某些大都市里，通常必须先同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显然，差不多所有新婚夫妇都是希望留在大都市里的。婚姻对于追求地位的人也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要获得地位，可能最好是通过家庭关系来培植至关重要的私人关系。所有这些影响流动的决定，在这种个人抱负经常遭到破灭的竞争性社会里具有更大的急迫性。

人与人的关系

苏联不断地反复宣传理想，所以许多苏联人以及外界人士都认为，理想正在付诸实践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想本身上面。苏联不仅严格控制人们对他们自己社会的过去的了解，而且也严格控制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这就使许多苏联人增强了信心，认为他们在实现令人向往的目标方面一直在不断地超过其他国家的人民。如果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口头上说的真实情况与实际上的真实情况之间存在着差距，所以苏联社会的理想在影响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是毫无意义的，那么这种结论是错误的。纵然这里的焦点主要在于现实表现，但是不应忽视共产主义理想对于同他人保持大公无私的关系所具有的潜在的积极影响。

要观察苏联的理想和实际脱节的情况，最好看一看顾客在日本和俄国受到的不同待遇。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接触是售货员和顾客之间短暂的接触。在日本，存在着这样一种感情，认为应按一定的标准为顾客服务；为报答顾客可能支付的货款，售货员承担着一种义务。然而，苏联的售货员对顾客态度粗鲁，这是比较常见的现象。许多效率不高的现象使得苏联的日常生活令人筋疲力竭和泄气，这不仅是因为消费者的利益被放在次要地位，也是因为人们普遍不管别人是否方便。

在当代，日本人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精神，恐怕甚至比苏联人还要强。个人属于历史悠久的垂直构成的集团，这些集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渗入其成员的私生活，它们很重视为保持和恢复和谐的关系而采取的步骤。在苏联，心怀不满的人因为担心集团的监督会使他暴露，所以必须保持自我孤立状态。但是，日本心怀不满的人不是这样，那里新的集体正按一定的规律得到发展。譬如，战后由于人们寻求一个压倒一切的和团结一致的团体，宗教就在受教育不多和流动的人们中间得到了恢复，被称为创价学会的宗教团体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这两个国家，现在还是强调集团结合。别处能够接受的种种态度和行为，在这两个国家都要受到劝阻。但是随着人们逐渐习惯于繁荣景象，他们迷恋于外国商品，竭力模仿新型的音乐和新式时装。追求一时的风尚可能并不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但是一时的风尚却有可能使两代人发生冲突，使各社会阶层之间出现新的分歧。为了抵制新思想的涌入，苏联当局

比以往更加卖力地颂扬祖国和军队，更加宣扬对列宁的崇拜，但是日本人的反应仍是矛盾的。毫无疑问，在今后二十年中接近实现物质十分丰富的目标的时候，苏联人将面临新的挑战，要求他们更加确切地说明共产主义人与人的关系的意义，日本人将不得不把传统的价值标准重新结合到一套比较连贯的现代理想中去。

原先落后十年的日本和苏联，在这短短的三十年内都已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其标志是，它们的人口增长率已稳定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城市化的速度已放慢下来，城市人口的增长不会再快过总人口的增长速度。由于两国达到了先进的现代化，它们就不那么严格要求人们什么都唯命是从了。苏联采取了初步的步骤，使社会主义非斯大林化，美国占领日本期间进行的种种改革，使天皇的统治制度民主化。结果，这两个国家的个人权利比三十年代扩大了。

不过，对个人权利的限制仍然存在，这是过去采取比较循规蹈矩的态度的后遗症。在日本，人们在团体里和接受家庭权威时仍表现得特别顺从。此外，花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国民财富所占的比例很小，这给那些收入低于平均工资的人造成了严重的负担。总之是非常顺从，强制手段用得不多，没有什么福利。在苏联，许多权利受到严格的限制。没有什么人能够迁移、自由到国外旅行、接受外国出版物、在他们国内同外国人保持不受监视的接触、或对范围广泛的问题公开发表批评性意见。虽然家庭和同辈的压力对象婚姻和离婚这样的决定没有什么限制作用，但是政府的决定却影响着个人私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使用什么样避孕工具和看什么电影。苏联的

领导人有意识地设法把选择的自由限制在很窄的范围内。苏联仍在异常大的程度上用直接限制自由的办法来动员人力物力，而在日本，对个人的抉择并没有什么法律限制，结果是促进了现代化。

国际比较

经过压缩的现代化过程对于少数几个成功地迅速完成了过渡阶段的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无不留下一联串的问题要在以后的高度现代化阶段加以解决。当向城市迁移的速度慢下来的时候，当加入劳动大军的人数逐渐下降的时候，当争取收入最多、威望最高和权力最大的工作的竞争加剧的时候，就要求对政策作比较突然的改变。城市知识青年为谋稀少的工作岗位而进行的竞争，越来越多地是在十分强调公众消费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实行把福利和报酬结合起来的新制度，对许许多多人来说，成了继续普遍争取升入较高的社会阶层，继续为迅速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工作的重要因素。

一个公众消费社会的出现，是进行比较的一个有益的焦点。公众消费的概念在小汽车、电视机和其他耐用消费品供应量增多的比较现代化的社会里，具有普遍意义。以美国为先锋的实现现代化比较早的社会到五十年代才果敢地步入这个用户至上的时代；而这些社会里大批琳琅满目的产品，很快地使处在不同过渡阶段的国家产生了希望。日本和苏联作为到五十年代后期才能向它们的许多人民提供一些这类新产品，作为实现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日本和苏联的例子着重说明了对越来越大的用户至上的压力可能作出一些什么样的回答。

两国都面临着城乡生活条件的差别长期得不到消灭的问题。我们初步提出的一个假设是，当向城市迁移——这种迁移已经使社会的人口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成为城市人口——的速度慢下来的时候，必须大大缩小城乡间在生活条件、工资等方面的差距，如果要继续迅速实现现代化的话。苏联的农村部分仍然比较大，它在弥合这一差距方面一直是缓慢的。反之，战后日本在缩小城乡收入差别方面远远走在前面。日本的农村居民要得到大众消费品比苏联的农村居民容易。但在五十年代作了一些初步的努力来向农村居民提供物质刺激之后，苏联领导人在过去十年中显著地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福利，这包括实行最低工资制、发养老金和其他一些在此之前集体农民享受不到的福利。甚至城市消费者享受的某些福利现在也正在扩大到乡村。成为过渡时期的特征的那种严重的城乡两重性，在这两个国家还都远远没有被克服，但是为缓和某些这种差别而采取的许多步骤，正使得这两国同其他先进的现代化社会更加相似。

生活水平的第二个两重性在日本和苏联已显露出消失的迹象。城市内部在工资和福利方面的差别已缩小，有利于经常得不到大公司雇用的非熟练和半熟练职工。在这一方面，苏联做得比日本快，因为苏联采取的社会福利措施比较多，城市贫民享受的福利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些福利。因为城市里严重缺乏劳动力，工资级差就缩小了。苏联有代表性的政策是，不仅国家给予补贴，而且把计件工资改为计时工资和齐心协力提高蓝领工人的工资。在日本，就业一直向大公司转移，因为大公司仍然是工资比较高、劳动条件比较好、职业较有保

障和福利比较多。与此同时，因为劳动力缺乏，使得小公司也不得不提供类似的吸引人的条件。苏联的轻工业工人或者由小公司雇用的日本工人的工作条件仍然比较差，但是这些部门间的差别已大大缩小了。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城市劳动力的待遇比较平等了。我们说与过渡时期比较，这些差别消灭了，这对继续以很快的速度实现现代化是重要的，要判断我们这种论点是否正确，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家庭用具和其他耐用品的消费或许已成为激发劳动热情的最大一股力量。缩小工资福利的差别和增加消费品的供应，促使人们普遍把劳动看作是过“好生活”所必需的收入来源。各种各样新的耐用消费品的相继普及、利用闲暇时间的兴趣越来越大，以及生活上追求西方的时尚，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去寻求待遇更高的职业。日本和俄国通过延长义务教育时间和增加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已把一个人一生取得最优厚的报酬同在个人抱负更大、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中的学习成绩联系起来。

日本和苏联的共同经验说明了已经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为了保持很快的发展速度需要做些什么。不过，必须指出，正是在旧的动员力量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变得不那么起作用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差别，即日本加速发展，而苏联的发展速度缓慢下来了。共同经验的一个方面是，城乡之间长期存在广泛的和日益扩大的差别之后，工资差别逐渐缩小了。仍然存在于两国的另一个共同因素是从最现代化的社会进口大众消费品不断扩大供应。这种扩大使饮食、服装以及包括小汽车在内的一系列现代化方便条件发生了变化。

生产消费品一直比较缓慢的苏联，生产率提高的不那么快。到当代中期的某个时候，选择职业和应用技术的重要推动因素将有所变化，这不是不可能的；日本社会的工资分配和消费的形式将比较迅速地加以调整以适应先进的现代化社会的新要求，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而苏联在工资和福利的分配方面所作的调整，基本上同日本所作的调整相似，可能也使苏联继续以很快的速度实现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成就。

第十八章　知识与教育

在知识与教育方面，日本和苏联在近几十年中具有最现代化国家的一般特征：高等教育机构规模庞大，而且愈来愈大、大力开展先进的研究和发展工作、现代的电子传播网不断扩大。当然，在这两个方面，两国仍存在着重要差别，这反映了它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不同特点。它们高等教育的程度和内容是差不多的，但是苏联用于研究和发展的经费大大超过日本（这主要是因为苏联的军队远比日本为大），日本则在现代化传播方面大大超过俄国（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的社会远比俄国小，同种的程度远比俄国高）。这两国之间最明显的类似点也许是，虽然它们分别把知识与教育列为重点，但到七十年代初期，这并没有使它们的国家的目的和社会稳定这两个变革年代的主要目标出现明显的差别。

群众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日本和俄国把它们教育工作的重点逐渐从普及初等教育转到对群众实施高等教育方面。苏联到五十年代初期就完成了使全体人民都具有适合工作需要的文化水平和实行六年制（后来改为八年制）义务教育的任务，从而纠正了从沙皇政权继承下来的教育制度头重脚轻的危险状况。最近日本把义务教育延长到九年，苏联延长到十年，

这样，中等教育作为一个单独的阶段实际上已经消失，并且引起了一股关心高等教育的内容和质量的新浪潮。

这两个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方式是完全相同的。两国都承认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是个重要因素，而经济增长是它们国家政策的中心目标。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这两个社会参加高级研究的水平，足以同西欧和北美国家相匹敌，而且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它们。在达到高等院校入学年龄的青年中，日本约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俄国约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正在受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日本已采取步骤让妇女接受高等教育来纠正它早先在妇女教育方面的落后状态；受高等教育的女子的比例在战争结束时大约只占百分之二，到1970年提高到差不多占百分之三十三。与此同时，苏联已为它的少数民族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新机会。

在日本和俄国，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显著增加，这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院校，开设了各种质量不同的课程。两国教育系统都由少数几所名牌大专院校占支配地位；一小批上层人士在这里受第一流的教育。这些院校在产生新知识方面也是领先的。不过，两国绝大多数学生上学的学校，质量和名望都差得多，在这些学校里，教育常常是采取上大课的方式来进行的。在苏联，这些高等学校通常是为了适应当地人民学习上的具体需要，由地方上办的。日本在每个县都有一批类似的国立大学，但是大部分没有名气的高等学校仍然是私立学校，这些学校大都集中在东京都—大阪地区的各大城市中心。

两国最有名气的院校都得到国家的支持，在俄国，这些院校是免费的，在日本，收费不多。与此相反，日本比较多的私

立大学则必须收比较高的学费。在苏联，给学生的助学金在大部分学校内部和学校之间很不一样，这要看学生学的专业或学科占多大的优先地位。苏联在教育方面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发助学金为手段，把人员输送到具体的研究领域。

俄国和日本的青年认识到，教育对他们本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经济条件的改善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尽管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学习紧张，也要竭力争取受教育。两国都主张用考试来测验成绩而不是测验智能，非常强调记忆和技能；举例来说，写作大都受到忽视而着重于数学（在数学教学方面，日本和俄国都已得到国际上的承认）、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

两国大学课程的内容也是相似的，都注重专业训练。在美国占领期间，强使日本的大学按美国的模式来办，着重于内容广泛的自由式教育的尝试并没有获得什么成功。可以看出，日苏两国的课程重点是不同的，日本人特别注意法律和经济学方面的训练——经营企业和行政管理所需要的专业技能——而苏联的大学仍注重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然而，从课程的技术性和专业性来说，则没有什么区别。大学致力于造就管理一个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专家，而不是学识渊博的上层人士。

教育方针仍然是集中控制，日本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由国家控制的。从确定标准和制订人力计划这个角度来说，集中控制能带来许多实际的好处，但是它也助长了形式主义，人们已为此发出了对大学进行改革的呼声。日本的高等学校掌握在私人手里的越来越多（虽然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几乎是没有掌握在私人手里的），但是既便是这些学校，文部省也进

行广泛的控制，这些控制比较有效，因为非国立学校有巨大的财政压力。

虽然日本和苏联的高等教育存在着重点学校、分布不当和官僚主义等等问题，但两国在努力造就大批目标明确和训练有素的专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对高等教育的质量感到不满的情绪在日本比苏联更明显，但是日本的学生大部分是不声不响的，整个来说对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满意的，只重视专业，主要关心他们国家的经济繁荣可能向他们提出的挑战和可能给他们带来的保障。

现代知识的产生

近些年来，日本和苏联发生了大转变，从吸收有益的外国知识转变到关心新知识的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的失败，打破了日本与当代科学技术革新部分地隔离的状态，再一次促使它处在一个追赶西方知识的时期。在战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日本在大多数领域弥合了这一差距，成了国际科学界的一名正式成员。苏联同样也摆脱了斯大林时代那种部分地孤立的状态，同全世界在科学知识方面有建树的人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它对科学和技术的注意一向大大超过日本；在1970年，拨给研究和发展的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苏联为百分之四点二，而日本为百分之一点八。这个差别部分地反映了俄国的军事预算比日本要大得多，但是日本虽然军队的规模比较小，却一直在不断地增加它对研究和发展的投资，并在六十年代“赶上了”西方的知识。

作为世界知识界的主要参与者，日本和俄国在自然科学

方面取得的成就远比在社会科学方面明显。在自然科学方面，日本人两次获诺贝尔奖金，俄国人四次获诺贝尔奖金；社会科学由于政治上的限制，进展缓慢。在苏联，这种限制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就是要人们严格遵守苏联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在日本，1945年这个军国主义国家垮台之后，一种刻板应用的马克思主义建立了新的威信，其最初的结果是人们对社会科学普遍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过，在过去二十年中，强求一律的压力在这两个国家都减少了，它们已经认识到，研究社会科学对于了解和掌握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仍停留在"追赶"的阶段，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在此之前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两国都趋向于注意美国的研究方法。

现代的公众传播系统

俄国人和日本人都有很发达的现代公众传播系统。日本在这方面要比俄国先进得多，因为它有如下有利条件：人口的同种程度较高、国土面积小、在电子方面有特殊专长。电视机——一支重要的社会化力量——的销售量激增，而日本比俄国增加得更快。1960年，苏联按人口计算的电视机拥有量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虽然这个比例在1970年提高到三分之二。按人口计算的收音机拥有量表明，最初是苏联人多（1960年每千人有二百零五台，而日本为一百三十三台），这个优势很快就消失了（在1970年：日本为五百五十一台；俄国为三百九十台）。日本的电话机也比俄国多得多——按人口计算，1952年为俄国的两倍，1970年为六倍。只有看电影的人数，苏

联远远超过日本，1970年苏联平均每人看十九场次，而日本平均每人看两场次。

今天，两国传播系统的一个颇为明显的区别是，日本的系统只用一种语言，俄国的系统使用苏联各族人民的多种语言。苏联出版的全部书籍中，有一半多一点是用俄文以外的其它文字出版的，其中大部分是供本地区消费的。许多书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或者是同俄文书的内容十分相似的，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书使少数民族的多样性得以长期保存下来，这种多样性始终是俄国和苏联的生活的一个特点。与此大不相同的是，日本的民族比较单一，自然它不必花这些钱来对少数民族进行宣传了，但是日本的书法很复杂，因此他们用在印刷品上的钱财和精力仍然比任何其它国家都要多得多，也许中国除外。举例来说，日本使用打字机远不如苏联那么普遍，而苏联本身在这一方面又是远远落在西欧的后面的。

在苏联全国城市中产阶级青年当中，民族的多样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两国共有的另一个因素，即一支庞大的、自成一帜的“青年文化”抵消了。这一文化的成员企图正式参加他们国家的大都市生活。如果说两国(特别是苏联)的正式传播媒介强调在各自的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价值标准的话，那么青年文化则趋向于表达私人的价值标准。两国的青年文化都是靠他们自己的庞大的传播网维持的，这个传播网是非正式的，其基础是录制的音乐、出版物和第一手的旅游经历，对日本人来说，现在已扩大到去外国旅游的经历了。在苏联，这些渠道和他们宣传的理想往往成为官方监视的目标。

传统价值标准的存在

尽管有所谓青年文化的干扰，当代的日本和俄国仍然强调简朴、勤劳和忠于集体的价值标准。在日本，这些价值标准部分地可以追溯到德川时代武士的传统，在整个现代时期，大部分社会阶级盛行这些价值标准。苏维埃政权也竭力企图在大俄罗斯和民族地区反复灌输这些价值标准，由于在俄国农民当中忠于集体的精神始终受到高度的评价，这项任务就比较容易完成。

从日本和苏联用类似的方法抚育孩子这一点中，可以找到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两国的这些努力是相似的。两国的儿童在长到大约六、七岁之前，一直受到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怀，其方式是鼓励强烈的依赖情感。因此，惩罚的主要形式是不顺着他们或不喜欢他们。然而，当儿童到了入学年龄的时候，父母的态度变得比较严肃了，因为孩子开始在学校受精心的教育，养成服从集体的习惯。在这两个社会，由于旧的家庭关系的削弱，学校对学生进行价值标准的教育就更显得重要了。在日本，用这种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人，都喜欢忠心耿耿地为所在单位服务，而不喜欢个人为了取得区区成就而毫无组织地进行竞争，举例来说，日本的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就反映出这种教育。苏联的教育则倾向于培养这样一种思想：每个人的工作都是整个国家工作的一部分，苏联坚持不懈地努力把各个领域的劳动都同全国的既定目标联系起来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苏联，人们效忠于中间的组织和机构的观念不怎么强，这可能是苏联劳动力中长期存在的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的原因。

除了关心培养专一的忠诚态度之外，在这两个国家都能发现一种普遍存在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人们至今仍抱有这样的信念：每个国家都还负有追赶最发达的社会的特殊使命，即便是在那些已经达到同等水平的领域也是如此。这种情感是教育系统精心培养起来的一种觉悟，人们由于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国家历史悠久，这种感情就更强了。苏联还要作进一步的努力把俄罗斯和非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作为民族特性的媒介在这两个国家仍然存在，但是它们无力对社会的和政治的价值标准施加任何直接的重大影响。两国宗教总的状况就是这样，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日本的创价学会，创价学会是一个佛教运动，它已壮大起来了，它的会员占日本人口的百分之十，这个运动通过同它有关的公明党已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除此之外，两国最重的宗教生活大概就是几个热衷于布道的教派，它们往往具有相信太平盛世会到来的倾向，但是即便这些教派，对民族的价值标准也施加不了什么看得见的影响。

在日本和俄国，人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对价值标准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种一致的看法是从以前的时代延续下来的，绝不能保证价值标准在将来的稳定性。事实上，在这两个国家，人们对价值标准的看法似乎越来越分歧。经济的繁荣有破坏曾经促使人们赶上西方的那种刺激性的危险，这种刺激性对维持国家的价值标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普及小汽车，从而要求个人有独门独户的住所等现代的具体变化，对旧的忠于集体的思想正形成严重的威胁。到将来，传统的价值标准的解体

可能使国家对价值的构成重新进行严格的控制。这两个国家早些时期的经验不乏出现这种可能性的先例。

国际比较

现在要得到统一的国际统计材料越来越容易了，所以可以将日本和俄国同当代世界上其它国家进行比较，这在变革时期是不可能的。下面是两国同三十个左右其他国家的比较，这些国家不是已经高度现代化了，就是正在迅速实现高度现代化。

到七十年代，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的青少年——大致从六岁到十八岁——所占的比例，在所有的先进国家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证实了在高度现代化阶段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别是高等教育。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9年的统计，二十到二十四岁的在校学生所占的比例是，苏联占世界第二位，为百分之二十七，大大超过日本（百分之十六），但仍大大落后于美国（百分之四十八）。同欧洲国家相比，日本看来大概处于一般水平：略低于瑞典（百分之十八）和丹麦（百分之十八）；大致同法国（百分之十六）和南斯拉夫（百分之十五）相等；高于西德（百分之十二）、奥地利（百分之十一）和英国（百分之十）。在非欧洲国家中，以色列（百分之二十）和菲律宾（百分之二十）都大大高于日本，这种情况显然是畸形发展。菲律宾的情况特别突出，因为菲律宾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差距过大，结果，由于幻想破灭而出现了尖锐的紧张状态。

这些教育方面的数字说明，不仅同日本相比，而且同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国家相比，苏联已非常重视高等教育。不过从

1969年以来，日本的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其速度比大部分其他国家更快，说明它象苏联一样，采用了美国的而不是欧洲的发展群众高等教育的模式；从1969年以来，日本和俄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差距继续缩小。

很难找到衡量先进知识，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先进知识的可靠标准，来作世界性的比较。当然，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个标志是战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人数，苏联（四人）占第五位，列在美国（四十六人）、英国（二十二人）、德国（九人）和瑞典（五人）之后；日本两次得奖，同阿根廷、澳大利亚、意大利和瑞士并列第七位。其他的标志是衡量研究和发展工作的那些标志。从每一万个人中从事研究和发展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来说，苏联在1969年是世界上最高的（三十八点二人），其次是日本（二十七点七人）和美国（二十六点二人）。有些东欧国家，如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可能同这三个名列前茅的国家差不多，我们手头没有它们这方面的数字，但是西欧国家都达不到这种程度，站在前列的国家有荷兰（十五点三人）、法国（十一点七人）和西德（十三人）。许多先进国家所占的比例甚至还要小，如加拿大（十人）、瑞典（六点六人）和英国（七点九人）。

这些关于从事研究和发展工作的人力的估计数字，必须辅以财政开支的估计数字。从这方面看，日本无疑是落在一些领先的欧洲国家之后的。以1969年用于研究和发展的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来说，苏联（四点二）之后为捷克斯洛伐克（三点六）和美国（二点八）。低于美国而高于日本（一点八）的有英国（二点四）、加拿大（二点四）、波兰（二点

三)、荷兰(二点二)和法国(二)。低于日本但高于百分之一的国家有比利时、奥地利、以色列、瑞典、挪威和南斯拉夫。从这些统计数字中可以得出的最一般的结论是，日本从事研究和发展工作的人力所占的比例是中等的，而俄国的人力和资金所占的比例都非常高。

在公众传播方面，日本由于实行着眼于消费者的改革，使它走在苏联的前面，并跻身于最先进国家的行列。日本的日报发行量为每一千人五百一十份，超过它的只有瑞典(五百三十四份)。苏联(三百四十七份)低于英国(四百六十三份)、东德(四百四十五份)、挪威(三百九十六份)和丹麦(三百六十八份)，但是高于澳大利亚(三百二十一份)、西德(三百一十九份)、美国(三百零一份)和法国(二百三十八份)。在电话机方面，日本的名次远远前于俄国。它每一百人有电话机二十八点二部，少于美国(六十点四部)、瑞典(五十五点七部)和加拿大(四十六点八部)，大致同挪威(三十点七部)和英国(二十八点九部)相当，大大高于欧洲的平均数十八点八部。与此成对照的是，苏联每一百人仅有电话机四点九部，远远低于欧洲任何国家，大致同阿根廷(四点二部)和智利(四部)相当。

但是，在收音机的使用方面，苏联弥补了电话机拥有量少的缺点，表现出对公众传播媒介的喜爱大大超过对私人联系工具的喜爱。事实上，1971年每一千人拥有收音机的台数，日本(五百七十三台)和苏联(四百零八台)虽低于美国(一千六百二十三台)和加拿大(七百七十三台)，但都高于所有欧洲国家(如：瑞典，三百七十台；英国，三百三十台；法国，三百一十三台；奥地利，二百九十台；意大利，二百一十四台)。在更为先

进的电视机方面，日本（每一千人有二百二十二台）堪与西欧国家比美，比瑞典（三百二十三台）和英国（二百九十八台）少，但同法国（二百二十七台）和挪威（二百二十九台）一样多。当然，两国都没有达到美国（四百四十九台）和加拿大（三百四十九台）的水平。苏联为一百六十台，位于意大利（一百九十一台）和西班牙（一百三十二台）之间。

在公众传播领域中一个奇特的现象是，甚至到了1970年，电影在苏联还是大受欢迎，这是令人感到惊奇的，因为到了那时候，电影在所有其他先进国家已经受到电视的沉重打击。苏联平均每人每年看十九次电影，只同处于类似或更低的发展阶段的几个国家差不多（意大利十一次；西班牙十次；保加利亚十三次）。相反，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现在拥有的电影观众并不多：日本，二次；美国，五次；加拿大，四次；瑞典，三点八次；法国，三点五次；英国，三点二次和澳大利亚，二点六次。很明显，电影作为公众传播的一种工具，在苏联已被动员到在高度现代化社会中无可匹敌的程度，坚持着战前时代创造的先例，这是苏联拥有电视机的人比较少的一个原因。

第十九章　结论：当代

我们对当代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得出的总的结论是，两国已向着高度现代化的西方社会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大大地前进了，但是日本向这一方向前进得比苏联更远。日本社会之所以变化得比较快，可能是由于它从实行变革政策过渡到实行维持高度现代化社会所要求的政策较为容易，以及它在现代以前的时期搞密集型发展，经验比较丰富。

我们从中得出这些结论的日本和苏联的发展，从本书所作的五类比较来说，为研究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从实行推动迅速变革的政策，过渡到实行适应高度现代化社会需要的政策时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基础。我们还希望比较粗略地研究这一过渡所形成的格局，因为它们反映了这两个国家早些时候的经验。

国际环境

象日本和俄国这种比较现代化的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大破坏以后，在四十年代能迅速得到恢复，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代化主要并不在于工厂和铁路，而在于人力资源，何以见得呢？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日本和苏联，以及德国和其他国家虽然在物质上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恢复得很快。

要从二十世纪的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中迅速得到恢复，需要有一定的才能，这种才能任何现代化的国家可能都是具备的。但是要进一步迅速实现现代化，就要有更好的素质，而这种素质并不是那么垂手可得的。在这方面，日本人和俄国人重新进行发展的能力是值得注意的。这两个国家为了适应高度现代化的需要所做的调整都不是轻易地完成的。日本的做法是明治初期的做法的重演：大刀阔斧地改变领导机构，正式抛弃过去的做法，而学习外国的模式，这两点为迅速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稳固的基础。在美国的占领结束之后，没有作进一步的大变革而保持了原来的势头。同样，苏联相应的发展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造成了人事上的变动，但是领导作风比较犹豫不决，国际环境比较动荡。

四十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对于这两个国家在这样一个时期引进和发明新技术的能力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这个时代中，先进的技术已成为维持制造业和服务业水平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日本的发展和苏联比较慢的调整形成了明显的对照。除了在传统的制度上存在着影响全局的差异之外，一个起重大作用的因素是冷战。在这一紧张时期里苏联每年要把大约百分之十的资源用到防务上，比日本为此目的的拨款多十倍。此外，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还在技术领域实行有限的但是具有实质性的抵制。对日本来说，这个时期是迅速吸收西方技术的时期。一个有关联但基本上是独立的因素是，战后苏联的意识形态具有排外性。在关键时刻，苏联领导人倾向于把外国人的思想看作是破坏性的，在战后最初的十年里，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俄国的知识分子同西方的发

展隔绝起来。

在六十年代，苏联虽然取得了同美国的战略均势，但与此同时，苏联的增长率却相对地但又是意义重大的下降了，看来这是导致1972年5月苏美协议中写进缓和字样的主要因素之一。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似乎要求同其他国家保持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保持的那种广泛的关系。由于日本掌握了更有竞争力的技术，它比苏联更能对付相互依赖的挑战。日本在原料以及市场方面都广泛依靠其他国家，这就使得它在七十年代的能源危机中显得非常脆弱，目前它正在进行灵活的调整，使它的供应来源多样化，并发展别种能源来代替。对苏联来说，多年来同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保持敌对关系的代价是巨大的，结果是它利用缓和所提供的机会比许多人预期的要慢。

政治结构

日本和苏联的一个重要相似点是，同战前时期相比，国家公开使用强制手段的情况减少了。动员人们给予支持和参加政治活动以及处理反对派的办法多半靠法律保证和对主要的集团作出积极的反映。如果考虑到过去对日本天皇和党魁斯大林的颂扬，以及容不得不同意见，那么这些变化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但是在这一领域里，苏联发展也比日本慢得多。高度集中的指导在最初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对于动员苏联社会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并且使苏联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是当社会变得愈加错综复杂因而要求实行比较灵活的方针和

进行较多试验的时候，这种集中指导就成了妨碍适应新形势的一个障碍。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领导人在动员俄国广泛的自然资源和培养各族人民的技能方面，曾取得一些成就。但是那些为了提高管理效率而着眼于分散的措施，仍然被看作是对共产党垄断权力的一种威胁，长期的变化仍然取决于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条主义的训练和没有多少教条主义的观点的比较年轻的官员是否能逐步上升到掌权的地位。与此相反，日本的战败削弱了致力于维持现状的老一代的影响并培养了比较讲求实际的年轻一代。这些例子着重说明政治制度的极大重要性，要改变这些制度来满足高度现代化的需要是很困难的。

经济结构和经济的增长

为保持和加速经济的发展而寻找新的增长结构要更多地依靠获得和利用技术革新成果。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要使经济得到增长，作出决定的过程和刺激制度必须加以改变，摆脱变革时期普遍采用的种种作法。在苏联的强制经济中，不进行竞争和政府机构的中央集权的性质阻碍了这一革新的进程。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的二十年中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在改变头几个五年计划中行之有效的动员办法方面，仅仅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另一方面，日本的经济显示了更加广泛得多地依靠技术革新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日本人由于一代讲求实际的领导人的得势和充满希望的国际环境这两个有利条件，卓有成效地发扬了他们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的传统。

在七十年代，日本的积蓄率和增长率以及在按为消费市

场进行技术密集型生产所要求的方针调整经济体制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俄国。同时，日本的经济深深地依赖其他国家供给原料，因此日本的经济比较容易受国际市场的变化的影响。在苏联，主要是由于行政管理和政治上的原因，广泛采用外国技术的速度要缓慢得多。由于缺乏刺激日本的生产率的那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的挑战，苏联则不怎么受对外贸易变化莫测的情况的影响。

社会的相互依赖

互相合作和渗透在当代高度城市化的环境中具有新的意义。在日本，小家庭仍举行纪念祖先和结婚的仪式，大公司提供家长式的保障并实行主要以年资为依据的累进薪金制，这些都维护和加强至关重要的团结和纽带。在俄国，对共产党表示冠冕堂皇的支持以及要人们为集体服务而进行喋喋不休的规劝，比起在斯大林统治的年代里，所使用的方式不那么令人畏惧了，这有利于俄国的一致。在这两个国家，集体为了使人们作出成绩而对个人施加的强大压力，现在达到了顶点，高等院校入学考试非常之难，就表现了这一点。毕业之后，为了使人们在劳动中发挥积极性而施加的压力，就不是那么明目张胆了。

在现代化社会里，到处需要大量消费品。新的期望把国际环境变成了一个充足的，虽然不一定是随时都能得到的方便和时尚的来源。消费者的动力使得采取新式的控制和协调成为可能，而以比较低的生活水平为基础的旧式的控制和协调已经过时。为了适应新的消费时代，日本和俄国都已作了

许多调整工作。在苏联，这些调整是不充分的，因为轻工业生产仍处于次要地位，许多商品仍然供应不足。不过，享受余暇时间的新门路已经开辟，包括集中在黑海沿岸等休养地区度假的热潮。日本的消费者从六十年代起要得到商品和服务就更加没有什么限制了，而使他们感到不满的是地方小而拥挤。人们追求的商品到处大批供应而且花色品种齐全。日本服务部门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较大，这说明它比较重视投消费者所好。

对这两个国家进行的比较再一次表明，日本适应高度现代化的条件更快一些而且更加全面。苏联的生活条件没有改得那么快，劳动积极性也不能适应最近国家计划所规定的任务。在这两个国家能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作很多，所以要刺激人们在教育上取得成绩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靠提供一系列新的商品和服务。从艰苦的条件到过比较豪华的生活的这种转变，可能不一定会使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提高社会觉悟和更好地保护环境，但是这种转变看来的确为进一步提高现代化的速度提供了动力。

知识与教育

正是在这个高度现代化时期，使得一大部分人口能够受到中学和大学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是发展初等教育并对优秀人材进行专业训练，过渡时期要求普及初等教育和大大发展中等教育，只有到了高度现代化时期，一般水平或高于一般水平的学生才能受高等教育。在日本和俄国，个人最大的愿望和报负是受高等教育；政府本身的政策和现实的经

济状况都鼓励他们抱这种愿望。因此，政府是否能满足这种新的要求而又不损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成了对它们在高度现代化阶段能否全面发挥效能的重大考验。

上面我们概要地叙述了我们对本书中所作的五类比较的研究结果，现在让我们探讨一下它们形成的类型同现代以前和变革时期的那些类型的关系如何。正如我们对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作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印象特别深的是，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为达到和保持高度现代化所要实行的改革大大不同于变革时期的政策，领导人在这种过渡中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也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日本和俄国的经济使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如果要达到与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同样的发展水平，它们在变革时期必须比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更要加强政治控制和协调。它们不仅必须比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更快地建立运输网、开发天然资源、建设工厂和将一大批居民从农村安置到城市里（对所有这一切，都要提供食品、教育和住房），而且它们在完成这些任务的同时，还必须从事各种各样的国家建设方面的工作：保卫和巩固国家领土，制定比较有效的国家行政制度，使参加政治活动的作法适应利益集团的变化和公众方面的新的期望。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在一个总的说来比较稳定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中一步一步地达到所有这些先决条件的。

高度现代化社会的要求大大不同于在此以前的变革进程中的那些要求。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无文化到有文化、从手

工业到制造业，以及从地方和地区自治到中央集权的变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动乱都已被克服。新的着重点则放在提高专业化的程度上，这种专业化将导致增强国际上的互相依赖、范围更广泛的利益集团政治上的协调和聚合，建立比制造业雇用更多劳动力的服务行业，对于密集在城市中心里的增长缓慢的人口进行规模更大的社会动员，为了满足科学和技术密集型社会的需要，普及中等教育和大办高等教育。

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经验是，它们为了适应高度现代化无可改变的要求而进行的种种试验，与它们为了适应变革时期的要求而进行的种种试验是完全相同的，虽然它们在使它们的价值标准和体制适应新的迫切需要时并不都是同样成功的。与此相反，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它们在经历这一过渡时遇到的困难会大得多。它们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它们在改变多年来已牢牢地扎了根的、集中程度极高的变革措施时，必须作比较大的调整，还在于要采取比较讲求实际的态度，这种态度对高度现代化的社会是必不可少的。

正是在这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本和俄国的影响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日本，灾难打破了那已成为教条式信条的过渡政策的影响，而在俄国，它却趋向于加强这种政策。从更大的方面来说，纪录似乎表明，要推倒那些墨守旧政策（这些政策在变革时期成了公认的智慧的象征）的人的权威，并且让那些准备按高度现代化的要求，对轻重缓急和体制作出改变的人出来当权，就必须对领导人作重大的变动。

日本在1945年的失败就是这样一次民族灾难，而且领导

机构的变化是十分彻底的，所以，尽管战前的许多官僚幸存下来了，但还是可以对当代的问题采取一种新的讲求实际的态度。1929年开始的萧条标志着美国的连续性出现了类似的中断，虽然其程度要轻得多，由于实施新政而使公私部门的关系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成了美国高度现代化的形式的特点。同样，自从1945年以来德国和意大利发生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革，法国从五十年代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而发生民族危机以来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变革，也是因为有了新的领导才实行的，如果没有失败的打击，新的领导要得势就会慢得多。

一个国家毫无疑问能够通过由于各代人态度的变化而产生的逐步的适应过程，完成两种过渡，先是从现代以前的政策过渡到变革的政策，然后是从变革的政策过渡到高度现代化的政策，但是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

在这一方面，苏联与日本不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所起的作用是增强过去一代人那些公认的作法，从而使那些急于使苏联的价值标准和体制适应新的挑战的决策者得势的时间推迟了。大部分外国观察家把"斯大林主义"同对政治反对派采取镇压措施联系起来，而在俄国国内，"斯大林主义"主要是指行政管理上过分集中。虽然在主要任务是使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实现工业化的时候，作出清一色的决定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在当代，这种做法对消费经济

和同消费者有关的体制以及对政治和社会价值标准所要求的种种灵活性和试验，却成了障碍。斯大林的死并没有使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发生任何意义的、长远的变化，只是通过人事一代一代的交替这个缓慢的过程，观点才逐渐发生变化。苏联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具有激进意识形态的制度，它适应技术进步不断提出的挑战比较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僵硬的性质是这种制度所固有的，但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国际环境的不安全更进一步地阻碍了适应性的发挥。

为了理解日本和苏联在当代为什么变化得很快，探讨从它们现代以前的经验中派生出来的更为长远的价值标准和体制也是重要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现代以前的那种价值标准和体制——我们在前面把它们算作对经济和社会政策采取“密集型的”做法，同俄国的“粗放的”做法相反——在当代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同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相比，日本和俄国在从变革时期的要求过渡到高度现代化社会的要求的过程中，也和其他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一样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但是日本为完成当代特有的任务比苏联更有准备。如果没有长期的经验为日本达到二十世纪末的技术要求作了准备，那么失败和被占领这种促进剂就不会对日本的发展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了。

前面已经指出，差不多到1980年，日本在现代以前采取的“密集型”方法，在城市化和文化水平较高以及从事行政管理的上层人士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大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反映，当时俄国在现代制造和通讯技术的知识和使用方面正处在遥遥领先的地位。更加概括地说，日本是靠提高技

术来增加产量的，而俄国是靠增加物资和人力来达到同样的结果。这种使用技术密集型方法的比较丰富的经验，使得日本在变革时期不得不在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情况下进行国际贸易竞争时，处于有利的地位。在当代，由于效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日本使用技术密集型方法已使经济得到空前的增长。在俄国，在先进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已被承认是一个令人伤脑筋的缺陷。

第二十章　对了解现代化所起的作用

在考虑本书对人们比较全面地了解现代化所起的作用之前，最好回顾一下使得日本和俄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诸因素之间几个重要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在现代以前的时期曾存在过最明显的而以前却为人们所忽视的相似点。这两个国家曾以罕见的规模进行协调、控制和动员人力物力，这在尚未开始搞现代化的社会当中是很突出的。它们拥有的这些非凡的能力，只要稍微改一改，就非常适用于现代化建设。

同样这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同点，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在资源使用上的不同倾向。在现代以前的时期，日本城市化的程度和识字率要高得多，这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组织性比俄国更强。而俄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加速它的社会变革之前，曾同西方有过密切的接触，对现代思潮和技术也熟悉得多。它还拥有丰富得多的自然资源（包括居民稀少的可耕地），使用起来毫不爱惜，而人口稠密的日本，组织自然资源基础的能力比较强，事实证明，对实现现代化来说，这个基础是比较贫乏的。资源利用上的这种差别，在日本方面，我们把它叫做用“密集型”的方法解决社会组织和社会变化问题，而俄国用的是“粗放的”方法。

本书指出的相似点，不仅是两国都存在着先决条件，而且

也指它们都迅速实现了变革和高度现代化的种种要求。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日本和俄国能通过改革和后来在俄国通过革命，把它们早年的能力变为政策，以便利用科学和技术革命所提供的机会。这两个社会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进行的变革有明显的类似之处，在我们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可以看到这些相似点。日本的社会比较一体化，也许还有它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深，这些都有助它在变革时期得以幸存下来而没有经历革命性的动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证明有比较强的能力适应高度现代化所要求的技术密集型方法，新一代领导人当权以后，日本更能适应这种方法了。苏联的管理办法已证明是比较死板的，前一个时期高度集中的作法改变得比较慢。

但对于这三个时期中的每个时期，我们比较重视相似点而不是不同点。在现代以前的时期，日本和俄国似乎都已与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方不同了。鉴于人们理所当然地指望从英国和法国的历史上得到实现现代化的真谛，人们也可以指望从日本和俄国了解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而且这对绝大部分社会更有借鉴作用。作为处于变革中的社会，它们两国在比早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更为迅速地和以大得多的规模进行工作的同时，都加强了协调和控制。而且在当代，它们在迅速取得高度现代化社会的特点方面，继续显示了重要的相似点。有少数几个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已接近最先进入此行列的国家达到的现代化水平。日俄两国属于这少数几个国家之列，所以它们提供的记录，值得那些关心社会变革的人们作仔细分析研究。

日本、俄国和现代化的模式问题

在结束本书时，不妨问一问，日本或者俄国，或者这两个国家是否可以作为与众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这种模式是否有任何具体的方面对于几十个不那么发达的国家具有借鉴作用。这样的问题终归是很大一部分论述发展的文献的基础，人们在谈到本书研究的这两个国家时经常提出这些问题。

有些人往往把西欧和美洲实现现代化比较早的社会当作主要的模式，把这些社会看作是那些想达到比较先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式的社会引进或适应的具体技术和体制的取之不尽的源泉。然而，许多人已对这样一种想法提出异议，他们的看法是以他们对各种各样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首先是俄国和日本作出的分析为根据的。日本人和苏联人固然在它们的整个历史阶段广泛借鉴，而且在近期着重依靠了“西方的”模式，但是，本书中提出的证据证明，它们的借鉴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被借鉴国家的许多重大体制几乎未受到注意，虽然其他一些体制经过研究后被吸收了。

我们把日本和俄国具有的许多特征叫做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叫做进行变革和实现高度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有意义的是，这许多特征同西欧和美洲早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的特征是相似的。在这种程度上，日本和俄国以及几个已达到类似发展水平的其他实现现代化比较晚的社会，可被认为是同实现现代化比较早的社会一道形成一个具有现代以前的和现代化特征的共同模式，而我们倾向于认为这种模式是普遍

用得上的。正如已经指出的，这些共同的特征包括集中进行政治控制和协调的能力，管理资源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鼓励社会互相依赖的能力以及通过研究和教育来产生和分配知识的能力。基本上，这些特征体现了领导人通过公私机构为实现现代化动员社会的资源的能力。

日本和俄国——以及数目有限的较晚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同早实现现代化的社会都具有这些基本特征。但是作为进入现代化行列较晚的国家，它们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的政治制度顶得住随着既要变革社会，又要在先进社会的环境中保持一体性这种双重压力而出现的大得多的困难，这些先进社会既是榜样又是威胁。

本书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日本和俄国引进体制和技术是成功的，但是这种作法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只有当引进国在体制迅速变化和公众对参加政治活动的期望越来越大的时期，能在政府领导人和国内各种利益集团之间保持和谐的协调和控制的时候，这样作才是可能的。有人说，无论日本还是俄国所使用的发展战略的细节，都可作为其他进入现代化行列较晚的国家学习的模式，任何这种说法必须以对特定的有关引进国作出的估价作为依据。如果日本和俄国引进西方模式的过程是一种什么标志的话，那就完全有理由认为，其他国家成功地从日本和俄国引进的特点将含有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特点毕竟也将改变引进国的情况，因为这些情况与日本和俄国的情况是不同的。如果引进国不能作到既对新的模式进行改造，使它适合它自身的环境，又不使它失掉对现代化的作用，那么作为模式向日本或

俄国学来的那种“现代性”就不会主动给引进国带来好处。

从到目前为止的情况来看，要使日本或俄国的体制和技术成为其他国家很容易学习的模式还是不大可能的。除了在本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那一段帝国冒险时期之外，日本一直不大肯于把它自己的制度作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模式。后发展的国家即使愿意借鉴日本的作法，它们也普遍认为这种作法并不是随时可用于它们自己的条件的，而从这种观点来研究台湾和朝鲜可能是有益的。苏联的体制和作法成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俄国的影响下经过改组的东欧国家学习的样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古巴、南斯拉夫和中国学习的样板。虽然分析这些国家的体制的种种形式可能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们都打着某种“共产党国家”的招牌，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它们中间的差异反映出它们在改组的前夕人力资源和体制是很不相同的。

换句话说，能够作为模式的日本和苏联的体制和实践，不仅是这两国近代历史的产物，而且也是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新的实践与这些国家甚至在变革的进程开始之前就已经具有的众多的先决条件相互不断发生作用的产物。进入现代化行列较晚的国家未必具有日本和俄国在一个世纪之前所具有的所有先决条件，当代各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多种多样的变化，在今天，大多数社会搞现代化已取得相当丰富的经验，所有这些情况都不利于成功地运用日本的或者俄国的模式。只有对发展得比较晚的国家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才可能澄清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日本或俄国所发展的具体的模式。

这并不是说，日本和俄国的经验对于发展得比较晚的国家来说并不比发展得比较早的国家的经验更有借鉴作用。恰恰相反，本书得出的结论是，这两个国家对于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卓有成效地解决了现代化所固有的问题。但是如果认为它们确有借鉴作用，那么人们怎样识别它们的经验中什么是真正至关重要的呢？资本主义的日本和社会主义的俄国抽象的发展原则肯定是互不相同的，就象体现日本的资本主义和俄国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互不相同一样。

虽然本书着重讨论我们认为是存在于日本和俄国之间那些基本的相似点，但是我们也尽力指出那些不同点，概括起来，应当说这些不同点就象在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两个国家之间可以发现的任何差别那样尖锐。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这种对比中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在谈到最近的时代的时候，当然必须予以适当的强调。但是它们仅仅影响前半个世纪，所以它们并没有构成贯串这两个国家全部历史的基本对比因素。正如在本书的不同章节中所指出的，日本和俄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别是，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资源，即日本是“密集地”利用资源，而俄国是“粗放地”利用资源。这种差别在1700年就有了，今天仍然存在，并在这两国各自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践中留下了印记，这个印记之深，足以把它们同生活在这种或那种同样制度之下的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关于这两个国家的全面发展的形式，密集型和粗放型这种差别看来比之在论述这个问题的大部分著作中经常提到的意识形态的差别具有更为基本的性质。

尽管有这种差别和某些别的形成对照之处，但更加概括地说，日本和俄国的发展确实存在着相似点，这些相似点是根本性的，所以可以作为现代化的一种独特的分析模式。我们认为，这些相似点与其说在于这两国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所奉行的任何政策(虽然在许多方面它们是相似的)，不如说在于一个多世纪之前这两个国家具有的先决条件。在第七章中详细论述过的这些先决条件，除了下面指出的那些，还包括一定程度的政治一体化、能够产生盈余以用于投资的经济、教育系统的种种基础，以及比较先进的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它们为判断某一个模式提供了根据，日本和俄国就是按这一模式实现现代化的。

粗略看一下这些对日俄两国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就会使人想到日本和俄国与大部分发展得比较早的国家之间的差别有多大。举例来说，对英国、法国和美国来说，先决条件固然包括这些因素中的大部分，但是对日本和俄国来说，它们历届政府协调和控制社会的功能、动员资源以及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的东西的能力则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在发展得比较早的国家中，也许只有对德国来说，这三个特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大概是因为德国在许多方面也是第一个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但获得成功的国家。早在二十年代，托斯泰因·费布伦就提请人们注意德国和日本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似点，在此之前半个世纪，俄国和日本都曾被德国的经历吸引住了。

西方国家的发展和这两个国家的发展之间这种广泛的差别着重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或者

一元的进程，现代化也不是西方的现代化。在十八世纪，还没有搞现代化的先例，一个在那时开始搞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具备的条件，与一个世纪以后进入这一进程的国家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不同的。要描述整个进程，必须把发展得比较晚的国家所有改变了的国内和国际环境考虑进去。发展得比较早的西方国家所建立的发展模式，在今天很难说是对还是错。不过，不宜用它来说明在一些重要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进程，因此应当用对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更有借鉴作用的模式来代替它。

今天没有什么人会否认，对于日本和俄国的经验所作的分析，能够大大修正人们对西方发展模式的看法。至今还不那么明确的是，日本和俄国的经验教训要作多大的修正之后才能在大部分其他发展比较晚的国家，特别在那些缺乏日本和俄国开始变革的进程时所具有的先决条件的国家，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模式。这样一个问题用本书中提供的材料是无法回答的。不过因为它显然是很重要的，日本和俄国的经验的借鉴作用值得加以适当研究。

其他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对其他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应当从了解一切进入这个行列比较晚的国家的共同点和它们在同实现现代化较早的社会有所接触的前夕彼此的差异点之间的重大区别开始。一切进入这个行列比较晚的国家，在适应现代化模式的过程中，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尽管这样，它们通过转化和引进来进行体制改革的能力是很不一样的。

因此研究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的第一个目标，应当是确定它们以前存在的社会结构为利用科学和技术革命所给予的机会提供了什么样的能力。

对现代以前的社会的研究大部分是无法比较的；而且至少一直到最近为止，对相对的发展水平知道得很少。本书得出的结论认为，同将成为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其他社会相比，日本和俄国到1800年已达到现代以前先进的发展水平，得出这种结论的根据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不久前对德川时期的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学家以大量的文件对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俄国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所作的大量研究、西方和苏联对俄国的政治体制进行的研究以及利用城市网所作的比较研究。为确定其他现代以前的社会的发展进程，需要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研究。这种比较性的研究还应检验另一种假设是否正确，这种假设是，我们在本书中从先决条件的角度讨论过的各个社会搞现代化的能力，并不一定是现代以前某一发展阶段的直接职能。譬如，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石油输出国虽然缺少日本和俄国特有的大部分先决条件，但是它们却能以暂时利用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前所未有的投资率一下子就把变革完成了。

在研究日本和俄国的经验对解决实现现代化比较晚的社会的问题所起的作用时，必须对它们现代以前的经验的重要差异进行分析。在现代以前，仅有少数这样的社会同日本和俄国一样保持了领土的连续性和持久的中央政治体制。这些社会包括中国、朝鲜、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伊朗、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暹逻-泰国和阿富汗。这后两个国家，或许

还有波斯-伊朗，保持它们的政治完整并非靠内部力量，而是因为它们能够在相互冲突的大国压力当中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所有这些国家不得不给比较先进的国家的利益以不同程度的特权，但是除了短暂的时间之外，没有哪一个国家向殖民主义屈服。

其他进行现代化比较晚的社会，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那些国家，成了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前哨。甚至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它们仍然反映出殖民地的性质，因为少数欧洲人的后裔剥削多数土著和以前的非洲奴隶，因为它们在文化上和经济上依赖欧洲，后来依赖北美。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这些国家中有些国家主张搞现代化的领导人——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那些领导人相反——并没有取得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影响。

现在已成为独立国家的亚洲、非洲和大洋洲上百个或更多的社会，在现代以前未曾有过或很少有政治一体化的经验。它们第一次建立了由全国政府领导的忠于不同民族和政治集团的国家。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政府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曾面临类似的建国问题，但是它们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相互依赖方面比较先进，所以虽然有不统一的种种障碍，也能够变革它们的社会。欧洲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发生的战争和进行的妥协，是各国人民重新组合和巩固的进程中所付的代价的一部分。在欧洲，这种进程在七十年代的条件下产生了相当稳定的局面。然而，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它们是在二十世纪从政治一体化、经济发展和互相依赖的水平低得多的情况下起步的，所以看来更为可能的是，各国人民重新组合和巩固的

进程至少会象在欧洲所经历过的那样漫长和痛苦。

日本和俄国的结构要适应急剧增加的协调和控制的需要很容易，这是非同寻常的。大部分其他社会看来缺乏这些能力，作进一步研究的一个目标可能是要具体说明，日本和俄国在同现代化接触之前，它们的主要控制结构的脆弱性，以及在变革初期存在的实行新的控制措施的基础有些什么不同。对其他进入现代化行列较晚的国家的一个含义似乎是，它们首先必须对政治结构进行一系列改革，然后才能确立控制和协调的形式，这种控制和协调是来自中央的，比较不受当地和家庭的影响。这一进程现在在中国已经进行或者正在进行中。

我们从日本和俄国提供的证据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但获得成功的国家，都有某些重要的相似点，它们迅速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是现代以前的时期存在同样条件的必然结果。进一步的研究应检验这一结论，并研究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的社会的连贯性，它们作为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具有有助于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在程度上是各不一样的。随着对现代以前的社会进行比较的手段更为精确，这种研究的目标可定为：(1) 具体分析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但获得成功的国家的先决条件（以比本书对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更为广泛的研究为基础）；(2) 把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的先决条件同实现现代化比较早的社会的先决条件作比较（本书仅简略地作了初步的尝试）；(3)按照已达到的发展阶段和现有控制和协调形式的可变的连贯整体来排列到现代以前的社会。当然，在所有这种研究中，对现代化作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应当是对现代以前的社会进行比较。

其他社会在满足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方面比日本和俄国遇到更为困难的任务。有些社会已经发现，由于旧的控制和协调形式遭到破坏，新的技术、城市和组织形式又被嫁接到以前存在的条件上，所以它们必须寻求别的现代化途径来代替。不论是在当前还是仅仅在一再遭受挫折之后，总之，领导者已开始探索合适的战略来加速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寻求和应用实现现代化的新办法的进程中，没有理由怀疑，一个在开始时进行现代化的能力不强的国家，实际上可能比一个继承了优越起步地位的国家取得更大的成功。对这些国家的要求是，它们必须奉行这样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利用过去遗留下来的财富，并作种种努力尽快寻求和应用别的富有建设性的办法来代替那些不存在的先决条件。寻求替代办法的进程在这里不是指“引进”，因为替代办法必须是与一国的过去有关系的。鉴于国际环境不断变化，要利用过去遗留下来的有利条件和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引进的东西来弥补国内的不足和增强国内的财富的有利条件，其方法就必须是继续不断地了解全世界的最新情况。

日本和俄国的相似点，对于确定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但获得成功的国家应具备什么样的必要条件，已证明是有启发性的。根据这些相似点，我们认为其他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必须达到同样的条件，在这样作时，要注意保持平衡，因为为达到一个条件所采取的步骤将对其他条件产生影响。遗憾的是，对两个国家——它们都是在国际环境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不同于今天和明天的国际环境的时候进行重大的现代化变革的——进行的比较，不允许超过对进入现代化

行列比较晚的国家可能具备的必要条件最初所作的说明和对替代办法同某些密切相关的先决条件的关系所作的介绍。不过，从这些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的机会看来是特别有希望的。这种研究应考虑到下列重点：(1)详细说明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但获得成功的国家必须具备的条件；(2)指明那些缺少各种先决条件的国家必须找到必要条件的替代办法；(3)确定由于国际环境发生变化而改变寻求替代办法的任务的方式；(4)根据为了代替不具备的先决条件而制订替代办法的程度在连续统一体中安排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日本和俄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并没提供一个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模式，但是它们的确把注意力集中在实现现代化的某些普遍必须具备的条件上，集中在为达到这些条件必须把过去和当前融合在一起这一点上。

至此，考虑一下日本和俄国之间的比较与中国的现代化的特殊关系是适当的。中国同日本和俄国相似，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反映着许多世纪以来领土和人口保持着连续性。和在俄国一样，中国的革命也并不意味着过去与将来是毫不相干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得特别缓慢，最近它加快了变革的步伐，由于出现了在许多方面看来是一种新的达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模式，今天它对现代化发生了巨大的兴趣。

作为一个现代以前的社会，中国的情况介于日俄两国和许多其他社会之间。日本和俄国在现代时期一开始就有很强的进行变革的能力，而许多其他社会的能力似乎并没有这么强。到十六世纪，中国在许多方面曾经达到了先进的发展阶

段，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国显然被日本和俄国远远抛在了后面。中国也曾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全国政府这种悠久传统，这是有利条件，但是在地方一级，要适应新型的控制和协调，困难就相当大。

从1949年以来，中国人似乎作出了其他国家的人民所没有作出过的成绩。他们已从高度分散的和以家庭为本的协调和控制的基础，过渡到能在大得多的程度上进行协调的基础，和倾向于把中国这个实体作为整体来考虑的某种概念的基础。在所有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当中，仍然成问题的正是如何把控制机构从中央扩大到地方各级。不稳定和混乱使得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控制的尝试成了灾祸。按照日本和俄国之间的这种比较来仔细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将为概括先决条件和替代办法之间的关系提供比较坚实的基础。

虽然有些作者，也许还有某些读者将把兴趣从日本转到俄国、再转到中国来进一步研究本书的意义，但是我们期望，这里所作的比较也对许多进行现代化变革的其他国家会有借鉴作用。认为这些结论对中国有借鉴作用的理由是，在中国同日本和俄国之间，至少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它们在现代以前达到的发展阶段、这三个国家的规模和它孤立无援的程度，都存在着总的相似点。此外，中国有一个时期曾明确地采用苏联现代化的模式。同样的种种考虑可能有助于把应用对日本和俄国的比较结果的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对于规模、孤立状况、仿效的模式和已经达到的变革阶段的变化，都应当予以特别的注意。

正如现代以前的社会存在的条件既可能有助于进行变革以建立现代化社会，也可能使变革复杂化一样，选择迅速实现现代化的计划，对于以后保持高速度现代化阶段将会产生种种后果。我们已得出这样的结论：为适应先进的现代化而作调整在日本比在苏联要早。这种差别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以前采取的战略所固有的。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很可能在别处造成类似的复杂情况，虽然我们预料，在短期的结果看来有希望的时候，领导人们不会因可能出现长期问题而却步，但是他们应当明白在变革时期选择的政策对于下一个现代化阶段的含义。近来日本现代化的速度超过苏联，这说明避免对变革的问题采取高度集权主义的解决办法是可取的，尽管无可否认地需要进行严格的控制与协调。

还可以预计，对这个现代化阶段将作进一步的研究，虽然这种研究的范围必然是有限的，因为进行到这一阶段的国家为数不多。关于进一步研究的重点，我们设想是：(1)对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的高度现代化的特殊要求加以具体说明(又要以比这里得出的初步结论更加广泛的研究为依据)；(2)把这些特殊要求同早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的特殊要求作比较，看看它们是否已同变革时期的职能要求一致起来；(3)把先进的现代化社会按照它们满足这些要求的程度列在一个连贯统一体内。

最后，我们为进一步研究现代化提出一些总的指导思想。我们建议在各社会中间和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间进行直接的有系统的比较作为这种研究的形式。有些国家已分别进行了许许多多单独的研究，但是我们试图进行的那种对两

个规模巨大的社会的重大结构问题直接进行比较仍很少见。应当再进行并改进这种比较。我们还主张对社会的变化作纵的剖析。在本书的结论中，对现代以前的社会和现代化要求之间的关系，对成功的变革方法和为实现高度现代化而进行的调整之间的关系，给予特殊的注意。其他的研究也应把这些时期连结起来，这样作是可取的。我们还认为，对于象现代化这样多方面的过程，应由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代表合作进行研究。密切合作不单是限于交换论文和联合出版著作，这种合作应是将来研究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目标。最后，为了丰富学术成就，进行某一次研究必须为了进行一系列的其它研究打开视野。我们提供这份对日本和俄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希望它将鼓舞人们对现代化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